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3卷 第4期 | (总第10期) | 2019年12月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3卷 第4期 | (总第10期) | 2019年12月 |

主 编: 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 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行主编: 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马歇尔·布朗 美国华盛顿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克劳德·劳森 美国耶鲁大学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布鲁斯·罗宾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安·海爾曼 英国卡迪夫大学
聂珍钊 浙江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劳瑞·瑞米 湖南师范大学

Editorial Board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shall Brow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Claude Rawson, Yale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Jiande L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ongyi Che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ruce Robbins, Columbia University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nn Heilmann, Cardiff University
Zhenzhao Nie, Zhejiang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auri Rame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主 管: 湖南省教育厅

主 办: 湖南师范大学

编 辑: 《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邮 箱: jflc@hunnu.edu.cn

地 址: 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电 话: 0731-88873041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6-436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1536/H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9 年 12 月 28 日

定 价: 28.00 元

海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海外发行代号: QR9393

国内发行: 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国内发行代号: 42-380

整体设计: 周基东

排版制作: 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 (CNKI) 收录, 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 CN43-1536/H*2019*q*16*160*zh*P*¥28.00*3000*14*2019-12

目次

东方学研究

- 001 作为方法的“东方学” 刘曙雄
008 批判性对话与中国“东方学”建构 曾琼

文学研究

- 015 “实用批评”：缘起与目的 曹莉
024 洛恩小说中的文学与军事启蒙 史敏岳
034 朝鲜金泽荣对《诗经》《论语》等若干问题考论 王成
043 加里·斯奈德《大棕熊经》的后现代性 罗坚

翻译史研究

- 053 以译求同：麦都思对朱子理学中“理”的翻译 帅司阳
069 《岩窟王》翻译文本的接受与影响研究 禹玲

翻译研究

- 083 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对比实证研究 王湘玲 王婷婷
094 《诗经》中“帝”字的英译研究——以《诗经》的四个英译本为例 吴晓龙

语言学研究

- 103 “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研究 刘芬
113 转喻心理加工深度的认知语用研究 范振强
130 CET对大学英语学业成绩考试的反拨作用——基于北京市10所高校期末试卷分析与教师访谈 董连忠

麓山笔谈

- 139 跨文化视角下的东方和西方 陆建德 阮炜

Contents

- 001 **Shuxiong Liu** Orientalism as a Method
- 008 **Qiong Zeng** Critical Dialogu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China
- 015 **Li Cao** Practical Criticism: Origin and Purpose
- 024 **Minyue Shi** Literature and Military Enlightenment in Johann Michael von Loen's Novel
- 034 **Cheng Wang** Korean Litterateur Kim Taek-yeong's Textual Research on *Book of Songs* and *The Analects*
- 043 **Jian Luo** The Nature of Post-modernity of Gary Snyder's *Smokey the Bear Sutra*
- 053 **Siyang Shuai** Seeking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 A Study on W. H. Medhurst's Translation of "Li (理)" in Cheng-Zhu Confucianism
- 069 **Ling Yu** Study on the Acceptabil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ankutsuou*
- 083 **Xiangling Wang, Tingting Wa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an Translatio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in E-C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peed, Quality and Translators' Attitude
- 094 **Xiaolong Wu** The Translation of "Di" (帝) in *Shijing*: A Case Study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 103 **Fen Liu** A Study of "Emotive Intensifier + X" Construction
- 113 **Zhenqiang Fan** The Depth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Metonymy within a Cognitive-pragmatic Perspective
- 130 **Lianzhong Dong** CET Washback Effects on the Achievement Test of College English: A Stud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nals of Ten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 Interviews
- 139 **Jiande Lu, Wei Ruan** East and West: A Crosscultural Lens Dialogue through

FLC

东 方 学 研 究

作为方法的“东方学”

◎ 刘曙雄

内容提要：现代意义上的“东方学”始于西方学者对东方的研究。东方学者加入东方学研究领域之后，开启了不同于西方“东方学者”的民族视野。在西方的东方学内部，同样存在细微差异，欧洲的东方学与美国的地区研究也不尽相同。近年来，中国东方学兴起，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世界东方学研究增添了新的话语体系。世界东方学发展史上这些互相关联的维度不仅在知识体系上推动了人们对东方学的理解，而且也为人们了解东西方对东方的认知方法和思维定式提供了实证材料。

关键词：东方学 方法论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19) 04-0001-07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Orientalism as a Method

Abstract: “Orientalism” in the modern sense began with the study of the East by western scholars. After joining the field of oriental studies, oriental scholars opened up a national vision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Oriental Scholars” in the West. There are also subtle differences within orientalism in the West, and European Orientalism is not the same as the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of Chinese Orientalism,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world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been proposed, adding a new discourse system to the world oriental studies. Thes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Orientalism not only promot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Orientalism in the knowledge system, but also provide empirical materials for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gnitive methods and thinking patterns of the East.

Keywords: orientalism, methodology, discourse system

Author: Shuxiong Liu,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东方学既可以被认为是关于东方的知识,也可被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作为研究方法的东方学,可以从以下五个互相紧密联系的维度来论述。这五个维度是:总结东方学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反思西方学者创立的东方学,回顾中国东方学创立过程,比较欧洲的东方学 and 美国的地区研究,剖析文明冲突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总结东方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从研究经验中形成的思维定式

东方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是我们对有关东方某一领域、某一方面进行研究时的客体,以及我们对这一客体所持的思考方式和方法,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合。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有固有的联系与适用性,东方学的研究对象从地域范围、文化特质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因此东方学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也形成了某些特定的研究思路与范式。

东方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很广,可以说包罗万象。如果一个事物可以包括进去很多很多东西,那么它的属性就比较容易模糊。所以,人们从东方学丰富而又庞杂的研究经验中形成的共识和思维定式相对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而言,应该同样值得研究者重视,甚至更值得重视。以东方文学研究为例,我国的东方文学研究,作为东方学的基础,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实际上走过的是一条注重方法、追求方法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分为几个区间:1) 东方文学作品的翻译;2) 东方文学国别研究;3) 东方文学比较研究;4) 交叉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如心理文化学理论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这些区间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相互重叠和相互衔接的。我们从东方文学研究发展过程中获得的认识,提高了我们的鉴赏能力,丰富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当我们给学生讲授文学课程时,我们早已经不是只重视传授作品的内容,而是更注重对人物的发掘和对历史的评判。后者无疑包含了方法论的深化,显示了科学研究的巨大魅力。萨义德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中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方面论述了东方学,他把东方学认作一种思维方式,提升了我们对东方学研究方法论的认识。这是他关于“东方学”的一大贡献。

二、反思西方学者创立的“东方学”: 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话语体系建构

东方学的发展经历了 500 年的时间。16—18 世纪是东方学的创立阶段。早期的东方学是从学习和掌握东方民族的语言开始,通过收集古代东方的手抄本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钻研古代东方的语言,对其进行翻译和研究。17 世纪,牛津大学开设近东语言课程,随后出现了波考克(Edward Pocock)创作的《阿拉伯史纲》(*Specimen historiae Arabum*)。18 世纪东方语言学获得发展,西方创办了一些研究东方语言的专门学校,《古兰经》、《阿维斯塔》、《摩奴法典》

等东方经典翻译出版,比较语言学也应运而生。19世纪中后期是东方学的确立时期,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重要国家建立了东方学研究组织,召开国际东方学会议。在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汉学是重要的内容。许多西方汉学家长期居住在中国,对中国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他们翻译介绍中国的典籍,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推动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东方的认知。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对日本、印度和中东地区也给予高度关注,产生了《阿拉伯文学史》、《印度文学史》等颇具影响的东方学重要论著,奠定了东方学的学术基础。

西方的东方学可以归纳为:1)东方学是西方人开拓的,是一门西方了解和认识东方的学问;2)20世纪之前东方学是西方学者创立并由西方学者主导的一门学问;3)东方学既发挥了发掘文明、创立学问和传承知识的功能,也充当了为西方殖民主义政策服务的工具;4)东方学研究中强大的西方话语体系,脱胎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

“西方中心主义”或曰“西方中心论”的发生和演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它突出地表现了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学术界拥有分量越来越重的话语权力。“西方中心论”的产生有多个原因。首先,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西方现代殖民主义的扩张。作为许多东方国家的殖民者和宗主国,他们拥有至高的政治权力,自然也就拥有学术上的话语权力。其次,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和文化传播技术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的印刷业、出版业的大发展也为西方话语在东方的大行其道提供了支撑。正如萨义德所明确指出的西方东方学的本质:东方学“阐释的对象正好是东方、东方的文化、民族和地域”(259),由于阐释者都是西方的东方学家,即“对东方语言和历史有着渊博的、主要是学术方面知识的专家”(438),“在有关东方的讨论中,东方是完全缺席的”(266)。

三、回顾中国东方学的创立过程: 东方学从一元走向对话

20世纪,东方国家掀起了蓬勃的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东方民族的觉醒意味着,东方各国的志士仁人和知识分子自觉地寻找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的途径,以不同于西方东方学界的民族视野观照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开东方学研究之先河。于是,从权力话语方式的角度,我们看到东方学从“西方中心论”的一元走向对话,走向多元。

中国东方学自觉的学术研究经历了近代“西学东渐”和“东西方文化论战”。“五四”运动以后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东方学学术史上一批自觉的东方学家著述立说,宣扬东方文化和东方哲学,论述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乃至日本、朝鲜、越南和缅甸等许多东方国家的历史,为我国东方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国东方学最初主要是以北京大学所开创的“印度学”为主要内容。蔡元培1917年初任北大校长,按照现代教育的要求设置学科,开设新课,其中“印度哲学”便是新课之一。与此同时,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任教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和中国佛教。他讨论的问题大都与印度有关。之后北大聘请了从俄国

来的学者钢和泰。钢和泰在北大讲过三门课程：梵文、印度宗教哲学史和古印度史。印度著名的诗人泰戈尔于1924年访华，他的思想和文学作品对我国的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独秀选译了泰戈尔的名诗《吉檀迦利》（*Gitanjali*）中的几首短诗，发表在1915年10月出版的《青年杂志》上。国学大师陈寅恪先后在多个西方国家学习东方古代语言，其中包括印度的梵语和巴利语。回国后，他任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也在北大教授“佛经翻译文学”课程。1930年，汤用彤到北大任教，他开设的课程中包括“中国佛教史”和“印度哲学”。1946年，北京大学创办东方语文学系，聘请季羨林任系主任。季先生在德国，学习和研究的是印度和中亚的古代语言，包括梵语、巴利语、吐火罗语等（王邦维 98-104）。

北京大学的东方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并拥有一支学术研究的团队。始建于1946年的东方语文学系迄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北京大学东方学学科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时期：1）1946年至1952年，东方语文学系建立和初创时期；2）1952年至1992年，蓬勃发展的东方语言系和东方语言文学系时期；3）1992年至1999年，东方学系时期；4）1999年至今，后东方学系时期（1999年，学校决定将东方学系、俄语系、西语系、英语系合并，成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学系最后分解建立了7个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与中国“东方学”的建设和发展密切相关，都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到现在至少经过了五代学人的努力奋斗。它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有三点：1）东方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2）这门学科从早期单纯的东方语言教学发展成为东方各国文化研究的综合学科，已经在最初从西方大学移植过来的人文学科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成长为中国东方学学者同东方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学术领域；3）东方学学科的形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

北京大学的东方学发展历程是中国东方学发展的一个缩影。我国还有许多著名的东方学家。饶宗颐是当代一位了不起的东方学家，《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是他80余年学术生涯的结晶。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宗教史学家陈垣在中国宗教史、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常任侠是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学者，对中国与印度、日本的文艺交流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金克木是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的梵学研究和印度文学研究成就斐然。林志纯为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年代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和赫梯学研究的骨干。这些学术大家的著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东方学的宝库，标志着中国东方学的崛起。

世界“东方学”从16世纪至20世纪经历了近500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中国东方学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现在这些方面：1）由西方学者主导到东方学者参与，出现东西方学者共同开展东方学研究，东西方学者之间有了合作的可能；2）东方学学术中心由西方独有到东西方并存；3）东方国家学者以各民族的视野开展研究，逐渐摆脱了西方思维定势和认知模式的束缚，突破“西方中心主义”障碍，对世界的多元文化发展发生了影响作用。

四、比较欧洲的东方学和美国的地区研究： 学术的“东方学”和对“东方学”的偏离

西方各国中，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是最先利用发现的新航路寻找原料产地、对东方进行掠夺式的殖民活动的国家。17世纪后期，英国崛起，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衰退后，英法两大帝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夺。英国在20世纪初走向没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成为其他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新的侵略者和殖民者。

在东方民族反抗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和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中，东西方是二元对立的，是不可调和的。然而，作为学术研究的东方学，尽管它产生的背景和发展所伴随的环境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文化因素，但总体上说，东方学仍然保持着浓重的学术本色。

以英国东方学为例，英国东方学到18世纪建立了完整的研究体系，它的奠基人和推动者是琼斯（William Jones）。琼斯对伊朗学、阿拉伯学、伊斯兰学、汉学，特别是印度学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琼斯凭借自己对多门东方语言的掌握，向西方世界翻译和介绍了众多东方经典作品，其中以对印度文学的译介及梵语与印欧语言的比较研究方面，成就最大。他的研究还涉及东方法律、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涉猎范围极为广泛。他在印度创建的孟加拉亚洲学会和创办的刊物《亚洲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英国东方学的发展。尽管琼斯的东方学研究相对客观，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殖民主义的影响和制约。以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为例，西方一些国家的殖民者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陆续前往印度开展商贸活动。英国通过建立东印度公司，逐步扩大对印度的渗透和占领，最终成为最强势的殖民者。他们在获取丰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印度悠久的历史文化。18世纪末，英国学者在印度展开了学习印度语言和翻译历史文献的活动，以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为主旨的印度学逐渐形成。殖民者需要了解和熟悉印度的历史、文化和现状，需要掌握在当地通行的语言，而这种语言便是乌尔都语或称印度斯坦尼语。于是，东印度公司首先决定为自己的职员教授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经印度总督批准后，在加尔各答创办了第一所旨在培训英国人掌握印度语言、历史和文化的威廉堡学院。该学院1800年成立，有近百名教职员。学院分教学和编译两大部分，设有图书馆、印刷馆，开设语言和其他人文学科课程20余门。威廉堡学院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1）培养了印度当地的人才；2）促进了现代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发展；3）促进了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4）促进了印度印刷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传播。

与历史久远的欧洲东方学不同，美国学界的“地区研究”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以后美国按地区划分对世界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由此形成了“地区研究”的概念。美国创建的地区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覆盖全世界，主要研究对象是非西方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美国的地区研究实际上是对西方东方学研究的一个偏离，与中国、日本、印度和伊朗等东方国家的东方研究也完全不同。东方学是以语言学为基础，注重对古代典籍、古代历史和宗教的研究。美国地区研究有意地抛弃这些方面，以社会科学规划和主导对美国以外世界的研究，

尤其是对非西方地域的现实研究。从学术意义上看,美国的地区研究显示了摆脱传统东方学,重视现实社会研究的一种倾向。

“东方学”是有学术边界的,人文学科是“东方学”的基本属性,也就是说,“东方学”是研究东方各民族、各区域的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哲学和社会文化的人文学科。那么国别与区域研究(东方各国和东方各区域的研究)属于东方学范畴吗?应该说它与“东方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但过去通常不认为属于“东方学”范畴。同样,“亚非研究”从地域的角度与“东方学”涉及的地域是一致的,但“亚非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都从属于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科的社会科学领域。又如,汉学(Sinology)和现在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有联系,但又互不相同。印度学(Indology)和南亚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在学术上看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人文学科研究,另一个是社会科学研究。区分学术界限对研究而言是必要的,但跨学科研究已从发展趋势变成了一种常态,“东方学”研究范围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朝着更加有利于丰富理论和指导实践的方向发展,我们应该欢迎这种变化。

五、剖析文明冲突与文明和谐: 摒弃零和思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的作者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是政治学家,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他认为,文化差异在冷战后的世界是产生冲突的根源,政治角力将在不同文明之间,而非国家之间进行。在亨廷顿之前,西方另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刘易斯(Bernard Lewis)于上世纪50年代便开始深入研究文明冲突问题。关注宗教和公共事务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设立的皮尤论坛(The Pew Forum),2006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办了一场与刘易斯的对话,之后发表了《伊斯兰和西方:与伯纳德·刘易斯的对话》。刘易斯谈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分析了不可避免的原因。他认为,“在世界上,除了这两种宗教,再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认为,他们的真理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排他性的。他们相信,他们是上帝向人类传达的最终启示的幸运接受者,他们的责任,不是像犹太人或印度教徒那样自私地保守这些启示,而是把它们带到人类其他地方,消除任何可能存在的障碍”,“在这两个信仰虔诚的文明之间,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冲突——一场为追求同一个角色的两个敌对文明的真正冲突;也导致了追求同样的霸权——他们都将其视为自身的神圣使命”(web)。可见“文明冲突论”由来已久。

世界文明按亨廷顿的说法可以分为七种或八种,也可以按季羨林先生的说法分为四种,也可以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体系。总之,我们前面说到的中国东方学的兴起,它是相对西方东方学而言的,而西方的东方学的产生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西方的东

方学者将东方研究的对象定位于亚洲和北非，所以实际上东方学就成为了西方学者心目中的“他者”。这种对人类文化体系所做的二分法催生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和零和博弈理论。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和日益增强的国力而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政府基于中国文化传统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2013年中国政府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些新观念和新主张既是我国东方学研究的新的视角，也将推动我们继续发掘东方学丰富的内涵。

注释 [Note]

- [1] 伯纳德·刘易斯，1939年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获博士学位，曾在英国情报部门和外交部工作。1974年受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82年加入美国国籍，被西方学术界视为中东问题的权威专家。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Wang, Bangwei. "The India Studies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the Past Eighty Years".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2, 1998, pp98-104. [王邦维：《北京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八十年的回顾》，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第98-104页。]
-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Translated by Yugen Wa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The Pew Forum. "Islam and the West: A Conversation with Bernard Lewis." Translated by Wenting Li, 8 Jan. 2019, www.douban.com/note/702995308. [皮尤论坛：《伊斯兰和西方：与伯纳德·刘易斯的对话》，李文庭译。2019年1月8日。www.douban.com/note/702995308。]

◇责任编辑：马妮娅

批判性对话与中国“东方学”建构

◎ 曾琼

内容提要: 中国的东方研究有丰富的实质性研究成果,但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东方学学科意识。东方文化内部的多元性,中国东方学的研究实绩、中国东方学与西方东方学之间的关系,是应用批判性对话进行中国东方学建构的学理基础。批判性对话作为一种开放、积极、平等的思维方式,在思考和建设中国东方学学科方面,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能帮助学界思考中国东方学建构的学科特色。

关键词: 对话 中国 东方学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4-0008-07

作者单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北京 100089

Title: Critical Dialogu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rich and substan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Oriental (Eastern) studies in China, but at present, Oriental studies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diversity of oriental cultur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oriental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oriental studies serve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critical dialogue to China's Oriental studies. As an open, positive and equal way of thinking, critical dialogue has a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China, which invites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Oriental studi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Keywords: dialogue, China, Oriental studies

Author: Qiong Ze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东方学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学科,在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出版之后曾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中国当代批评话语中,讨论得最多的也是与萨义德著作相关的东方学理论体系。近几年来,部分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反思学界现有东方学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东方学学科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批判性对话作为一种开放、积极、平等的思维方式,在思考和建设中国东方学学科方面,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一、中国东方研究实绩为批判性对话的基础

西方的英美法德等国家均有东方学,日韩也有东方学,中国学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东方学学科,但存在丰富的东方研究。尽管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中国的东方学并没有由此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王向远将之称为“‘实’至而‘名’未归”(《中国东方学》A7)。回顾中国东方学,可以发现,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以自身为中心立足点来看待周围国家与地区,因此中国研究者在早期并未形成整体的东方观。另一方面,当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东方学从其发端开始,就与西方文化和西方的东方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中国东方学在其建构的出发点上,就必须既辨明自身与东方的关系,又厘清东方与西方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国东方学的东方概念之基础。尽管现在中国学界并没有东方学学科之名,但中国东方学所需要的实质性学术研究却已经具有了较厚实的积累。名之不辨,实之已存,正是中国东方学所具有的批判性对话的基础。

近年来,有部分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东方学所面临的名实不符问题,并对建构中国东方学提出了呼吁和设想。刘曙雄曾回顾以北京大学东方研究为代表的中国东方学发展,其中引述了季羨林先生关于在北京大学成立东方学系的一段话:“‘东方学系’,却是面对现实而又展望未来,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跨世纪’构思的结果。其中有现实主义的成分,也有不同于前一个的浪漫主义成分。这个名称的确定,表示我们系已经成熟,表示‘东方学’在我们中国已经正式建立起来了。”(8)朱威烈早在21世纪初也发出了打破欧美东方学霸权话语体系、建构中国东方学的呼声,提出要建构“与欧美东方学那种霸权话语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平等相待而非居高临下,客观公允而非偏颇武断,进而从历史和社会意义角度确立起我国东方学的地位和特色”(8)。王向远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东方学的文章,辨析了“东方”“西方”“东方学”“东方主义”等概念,指出了中国东方学丰富的成果,并且提出了中国东方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翻译学的方法;第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第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东方学”概念与方法》1-7)此外,他还对“一带一路”与东方学的关系做出深入剖析,指出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在本质上属于中国东方学的研究范畴,东方学可以为“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提供学术理论支持,“一带一路”是中国东方学发展的新契机(《“一带一路”》1-8)。麦永雄在当代中国学术立场上对学界的“东方主义”话语范式进行了历时性梳理(《东方主义范式的转换》190-99),并提出从跨语境诗学的三重视野审视中国东

方学的梳理与建构问题。该三重视野即强调从东方文化内部、以东方话语讨论问题的内文化视野,重视东西方之间文艺思想互为参照的交叉文化视野和寻求一种新型的、包容差异的宏阔视界的跨文化视野(《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1-9)。黎跃进还提出了对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的构想,指出这部学术史的内容应该包括:中国学术史上“东方”概念的演变;中国东方学的确立;中国东方学的纵向发展;中国东方学分支学科的学术成果研究;中国著名东方学家的东方思想研究及对中国东方学的学科审视(158-63)。除了长期从事东方研究的学者,还有一部分从事西方研究的学者也加入到了对中国东方学的研究之中,如孙凯致力于梳理法国东方学与中国东方学的关系,他考证了季羨林先生在学术渊源和学术路径上与法系东方学深厚的关系,并在相关研究中发掘了在中国学界长期被忽视的东方学家林藜光先生(39-44)。

除相关学术成果,近年来我国学界还召开了不少以东方学命名的大型学术会议,对中国东方学进行了集中研讨,如2014年5月15—1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对话·视野·方法:东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6月17—19日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召开的“‘东方学’视野下的东方文学研究全国研讨会暨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2015年11月27—29日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的“‘东方学’学科建构与中日韩印阿文学之关联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此外还有一系列以东方文化研究为主题的会议。2014年度,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出现了两个与中国“东方学”直接相关的研究课题,分别是王向远主持的“‘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和王邦维主持的“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刘曙雄从2012年4月至今主持一项长期研究课题“东方学研究方法论”,该课题旨在汇集优秀的中国学者,自觉思考中国东方学的学科建设,已出版两部直接以东方学命名的论文集《认识“东方学”》和《探索“东方学”》。

二、批判性对话在东方学研究中的适用性

有关批判性思维的系统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杜威(John Dewey)在对反省性思维的性质和结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此后逐渐频繁地被应用于学术文献之中。“批判性思维往往与反思、质疑、否定等认识环节相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性思维只具有纯粹消极的意义。事实上,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有着密切联系:没有对已有认识成果的质疑、批判,没有对新思想、新观点的分析、论证,就谈不上创新。就此而言,批判性思维不仅是创造性思维的前提,而且是内在于创造性思维全过程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思维品格”(彭漪涟、马钦荣 676)。对话不仅是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一,在当代理论话语体系中,对话与理解和解释紧密相关,不仅与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阐释与追问相关,也与对话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有关,与相互承认基础之上的发展相关,对话性因而可以包含不同的观点,推动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在国际学术界,批判性对话在教育领域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成果研究和关注批判性对话在教育中具有的价值,兰佛德(E. Louis Lankford)在《批判性对话准则》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alogue*) 中针对艺术教育提出了批判性对话的四条原则: 必须确定一个对象是否适合批评; 确保有与相关对话有关的语境; 必须确立艺术批评的目标; 必须明确所有参与者的特点 (59-65)。近年来还有不少学者关注批判性对话对于青少年教育的意义, 如托德 (Liz Todd) 的《批判性对话、批判性方法论: 在评价年轻人的儿童服务时弥合研究中的鸿沟》(*Critical Dialogue, Critical Methodology: Bridging the Research Gap to You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Evaluating Children's Services*)。随着对哈贝马斯、伽达默尔、巴赫金对话理论研究的发展, 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批判性对话又逐渐被应用到国际关系、跨文化批评等研究中。跨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对话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 在批评他者之前理解他者的价值观; 可实现的讨论所需的公平条件; 相互的坦承与信任 (James 587-607)。总而言之, 批判性对话是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对话, 它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作为对话, 它可以同时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话主体, 实现各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 第二, 它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对话, 以事实依据为基础, 同时对既成结论抱有怀疑精神; 第三, 它对批评对象和批评者自身所可能存在的偏见和盲区具有清醒的认识; 第四, 批判性对话具有开放性, 对于新证据、新资料、新观点、新解释持开放性态度, 同时不断审视自身观点; 第五, 批评性对话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对话, 它与创造性紧密结合, 其目的在于阐明已有观点可能存在的误区, 提出和发现新的观点与解释。批判性对话的这些特点, 对于厘清原初观念、通过交流理解来实现建构的中国东方学, 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适用性。

东方学是一门研究东方的学科, 其研究内容涵盖东方的历史、哲学、宗教、经济、文学、艺术、语言等。东方学中的“东方”是一个变动的、相对的概念。就地理方位而言, “东方”与“西方”是一对概念, 这两个概念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又由于立足点的不同而不同。以中国为立足点, 日本是东方, 而印度是西方; 以古希腊为立足点, 中国、日本、印度都是东方。“东方”这一概念, 同时又具有历史文化意义, 受国际政治影响, 如历史文化意义的东方不但包括亚洲, 也包括以埃及为代表的非洲北部; 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中,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属于西方, 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属于东方。当今所说的东方学之“东方”, 主要指亚洲与非洲。“东方”概念的变动性, 天然地赋予了东方学研究在地理区域上的多样性, 不同区域内的多元文化从而进入了东方学研究的视野之内。

东方学研究发轫于 16 世纪初, 经十七、十八世纪的发展, 在 19 世纪伴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和学界对东方语言文字的研究, 趋于成熟, 这些成果基本上都由西方学者取得。进入 20 世纪之后, 东方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开始加入东方学研究的队伍, 同时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开始更加深入。西方的东方学者在早期以传教士、商人为主, 后期则有更多的专业学者加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研究者自身内部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具有多元性和丰富性, 因此对于作为主体的研究者来说, 他们自身内部也具有展开批判性对话的基础。比如近年来西方学者对早期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成果的反思, 东方学者对西方学者研究的重新审视, 都可以看作是批判性对话的结果。

黎跃进把东方学分为“意识形态的东方学”和“科学的东方学”。意识形态的东方学源于

近代以来东、西方之间的殖民与被殖民,通过对东方进行整体化、类型化、本质化和符码化,形成关于东方的集体观念、话语体系和社会体制,它是一种想象构造和过滤框架,是对东方的“妖魔化”,是一种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阿拉伯和穆斯林学者,如穆斯林学者马利克(Abdel-Malek),提巴威(A. L. Tibawi),阿拉塔斯(Syed Hussin Alatas),贾伊特(Hichem Djait)都对意识形态的东方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看法,美国学者萨义德和英国学者萨达尔(Ziauddin Sardar)也都对这种意识形态的东方学的成果和其中的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反思。科学的东方学则源于一批真心热爱东方知识、投身于东方知识研究的学者,如英国的琼斯(William Jones)、法国的安格迪尔-杜贝隆(Abraham-Hyacinte Anquetil-Duperron)、德国的格罗特芬德(Georg Friedrich Grottefend)、英国的罗林逊(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法国的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等。这些学者以近代的科学方法研究古老的东方知识,为更好地理解东方文化、加深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卓越贡献(黎跃进 158-63)。由此可见,东方学的研究者,既有来自东方区域自身之内的学者,也有来自东方区域之外的学者,这些研究者本身也具有多元性。东方学所涵盖的东方文化自身内部的多元性和东方学研究者的多元性,是以批判性对话进行东方学研究的基础,它确保了对话所必要的多个主体。

在东方学研究中,客观地存在着东方与西方、东方多元文化内部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关系,这也正是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批判性对话适应于对东方学研究进行思考的基础所在。

三、批判性对话在中国东方学研究中的应用与价值

纵览目前的中国东方学研究,明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呼吁中国东方学的学者都对辨析西方的东方学 and 中国的东方学、辨析“东方”与“西方”、辨析东方学的内在涵义等概念具有明显的自觉意识。我国的东方学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师从西方、模仿西方、反思西方的过程。清末民初的学者的“东方”概念和对东方的研究得益于西方文化在当时中国学界的影响,早期近代学术意义上的东方研究滥觞于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萨义德的《东方学》在中国当代学界几乎成为东方学的代名词,20世纪之前我国东方学研究者的治学思路和方法几乎完全受制于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20世纪之后的中国东方学研究则呈现出不一样的格局。上文中国东方学研究现状中提到的各种研究成果,无论是王向远教授对相关概念的厘清和辨析,还是麦永雄教授从中国学术立场对我国目前东方学相关话语体系的梳理,都体现了对已有东方学概念的反思。还有部分中国学者对东方学一直以来使用的Orientalism这一英译提出了质疑和反思,指出Orientalism一词本身即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不适用于中国东方学的英译,并提出使用Eastern Studies一词予以替换。虽然以Eastern Studies来英译中国东方学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但这一名词概念的更迭代表的不仅是词语的转换,更是一种内在观点变化。这种反思不但体现在对整体的东方学的质疑,也体现在对其下属二级概念如东方文学的思考。这种对已

有概念的质疑和反思，正是批判性对话中批判性思维的体现。它既能看到已有研究的成就，承认西方的东方学对中国东方学的积极影响和借鉴意义，同时也对他们固有的局限性，如西方中心、西方学者认识的盲区、西方对“东方”的规定性有清醒的认识，这是批判性对话的第一步。

第二，呼吁中国东方学的学者都有明确的对话意识。在对已有东方学概念，尤其是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持审慎和怀疑态度的同时，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抱着开放的心态，重视这些成果对中国东方学发展的促进和调整作用。“东方文学包括批评话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和制约，于是，围绕东方文学史不断重写、不断引发思考。在这一过程中，‘东方文学’就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场域，它既使自身纳入西方文化话语之中，又通过复杂的张力，不同程度地保存、改造自身原有的话语”（刘研 200-204）。这种在批判基础上的开放、对话态度，保证了中国东方学具有了不断自我审视、自我反思的发展能力。

第三，呼吁中国东方学的学者均对建构中国东方学有明确要求。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符合中国东方研究成果实际情况、突显中国学者特有研究方法的中国东方学是当前具有明确中国东方学学科意识学者们的明确诉求，这也是他们质疑、对话的出发点和目标。对于构建中国东方学，部分学者已有相当深入的思考，并由此提出了全面梳理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系统整理东方学各个分支学科、重点研究突出的中国东方学学家、提炼总结中国东方学方法论等各方面的要求，这种立足于建构一个可能的新体系的做法，也是批判性对话的目标。

建构中国东方学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东方”虽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但是在东方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主体，这些文化主体之间从源头到在历史上的发展，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也具有多元性。作为东方学者，在中国东方学的研究中，应充分注意和重视这种东方文化内部的多元性，在这种多元文化内部也应当展开批判性对话，如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国学者不但应当注意同为东方文化的两者的共性，更应注意两者的差异性。探讨并研究东方共性之上的差异性，是从根本上厘清西方对东方之建构、探索和还原东方之本来面目的基础。第二，在对东方与西方进行比较研究时，应注意保持两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应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对方文化的基础上展开，同时保持开放的态度，欢迎新的证据和论争。第三，构建中国东方学，需要中国学者对自身的中国立场有高度自觉，这是一种在对话中对自我的自觉反省和定位。这种高度自觉将使得在中国东方学研究中，不但有研究对象之间的多元对话，还有研究者自身内部的自我对话，因此这种对话将不仅仅是多元的，更是多声部的。

以在中国倍受欢迎的印度作家泰戈尔为例，对其作品及其中国接受度在批判性对话视野下进行考察，可以从如下几个维度切入：第一，泰戈尔作品审美特质与中国审美追求的异同；第二，其作品所反映的印度文化特质与中国文化的异同；第三，泰戈尔作品在西方接受情况与在中国接受情况的异同及其原因；第四，中国读者和学界对泰戈尔作品理解的特点和误读；第五，对泰戈尔作品的汉译者，尤其是对从英文到中文的译者和从孟加拉语到中文的译者之间的对比研究；第六，作为中国学者，与印度本国学者和其他国家地区学者相比，在研究泰

戈尔作品时所具有的特点及不足。

中国的东方研究已累积了丰富成果,对于国外尤其是欧美的东方学研究之研究也具有一定规模,建构中国东方学不但水到渠成而且正逢恰当的时机。以批判性对话为建构中国东方学的方法论之一,在平等、公平的前提下,在持怀疑、反思、批评态度的同时,在东方内部和东西方之间进行开放、积极的对话,尊重并借鉴已有学术成果,对于建构中国东方学将大有裨益。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James, R. Michael. "Critical Intercultural Dialogue." *Polity*, vol. 31, no. 4, 1999, pp. 587-607.
- Lankford, E. Louis.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alogue."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vol. 20, no. 2, 1986, pp. 59-65.
- Li, Yuejin. "'Oriental Studies' and the Conception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ese Oriental Studies'." *Jianghuai Tribune*, no. 2, 2016, pp. 158-63. [黎跃进:《“东方学”与“中国东方学学术史”构想》,载《江淮论坛》2016年第2期,第158-63页。]
- Liu, Shuxiong. "Reviewing Mr. Ji Xianlin's Talk on Oriental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Series*, 3rd Series, edited by Xiaoxi Zha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2016, p. 8. [刘曙雄:《重温季羨林先生关于“东方学”的谈话》,载张晓希编《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刊(第3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8页。]
- Mai, Yongxi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rientalism Paradig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Orientalism."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vol. 17,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2015, pp. 190-99. [麦永雄:《东方主义范式的转换与当代中国东方学的建构》,载《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春之卷(总第1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90-99页。]
- .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 Context: Examining the Triple Vision of Chinese Orientalism." *Dongjiang Journal*, no. 4, 2014, pp. 1-9. [麦永雄:《全球化与数字化语境:审视中国东方学的三重视野》,载《东疆学刊》2014年第4期,第1-9页。]
- Peng, Yilian, and Qinrong Ma, editors. *The Dictionary of Logic*. Shanghai Lexicographic, 2010. [彭漪涟、马钦荣编:《逻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Sun, Kai. "Mr. Ji Xianlin and the Oriental Studies in France." *Études Française*, no. 1, 2016, pp. 39-44. [孙凯:《季羨林先生与法系东方学》,载《法国研究》2016年第1期,第39-44页。]
- Wang, Xiangyuan. "China's 'Oriental Studies': Concepts and Methods." *Dongjiang Journal*, no. 2, 2013, pp. 1-7. [王向远:《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载《东疆学刊》2013年第2期,第1-7页。]
- . "China's Oriental Studies: Great Achievements, No Titl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11 Apr. 2014, p. A7. [王向远:《中国东方学“实”至而“名”未归》,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11日第A7版。]
- .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Oriental Studies.'"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5, 2016, pp. 1-8. [王向远:《“一带一路”与中国的“东方学”》,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8页。]
- Zhu, Weilie. "Constructing China's 'Oriental Studies.'" *Wenhui Daily*, 2 Nov. 2002, p. 8. [朱威烈:《建构中国“东方学”》,载《文汇报》2002年11月2日第8版。]

◇责任编辑:易佳

FLC

文 学 研 究

“实用批评”：缘起与目的

◎ 曹莉

内容提要：瑞恰慈是 20 世纪文学批评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所创立的“实用批评”理论和方法使得英语文学教学和研究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剑桥大学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制度化的学科。通过历史溯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重点梳理和辨析“实用批评”的缘起和意义。注重工具理性和实用价值是瑞恰慈构建“实用批评”的基本出发点。“实用批评”更为关注的是阅读而非批评，因此，培养学生的阅读和甄别判断能力便成为“实用批评”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瑞恰慈 实用批评 文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19）04-0015-10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项目（2016THZWWH0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WW001）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北京 100084

Title: Practical Criticism: Origin and Purpose

Abstract: I. A. Richards is a pathbreaker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ers of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He created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practical criticism” which quickly shapes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to a new and disciplinary subject of higher learning in Cambridge and beyo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practical criticism” using basically 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approach.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elief i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practical value forms the initiative drive of “practical criticism.” What it concerns about most is reading competence rather than literary criticism in a strict sense. Therefore, developing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differentiate and judge is the main purpose of “practical criticism.”

Keywords: I. A. Richards, practical criticism, teaching of literature

Author: Li Ca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和其发明者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一样具有传奇色彩，也常被看作瑞恰慈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代名词。1922 年，瑞恰慈获得剑桥大学马德琳学院的首位文学院士教席（fellowship in literature），但是《实用批评》课程直到 1925

年秋季学期才正式开设。马德琳学院院长本森 (A.C. Benson) 在 1923 年 10 月 13 日的日记里写道:“晚上在学院高桌 (high table) 晚宴的时候, 瑞恰慈提出一个对英文学生进行考试的好办法——挑选 5 段诗歌和散文, 隐去作者和写作日期, 混入一篇毫无价值的作品, 要求学生发表意见和作出评价。”(11) 1923 年 11 月 19 日, 负责学院戴维森作文奖 (Davison Prize) 考试的瑞恰慈在宽敞华丽的学院大厅为参赛学生举行上述形式的笔试, 考场上的不少学生面带难色, 深情沮丧。然而, 考试结果却为瑞恰慈提供了论证和撰写《实用批评》一书的第一手资料。在参加考试的十几名学生当中, 除一位学生, 其他学生对著名诗人霍布金斯 (G. M. Hopkins)、德昆西 (Thomas De Quincey) 的诗歌评价极低, 而对二三流或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如威尔柯斯夫人 (Ella Wheeler Wilcox) 的诗歌却大加赞赏, 有些学生甚至文不对题, 误读连篇。这样的情形既让瑞恰慈感到不可思议又无比兴奋。这说明, 这些正在剑桥大学接受“最好”教育的大学生们并未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 更不具备文学鉴赏和批评的能力和品味, 由此可以推断: 迄今为止剑桥大学的英文教学不尽人意, 文学教学亟待改革。1923 年戴维森作文奖比赛可被看作是“实用批评”在剑桥发端的前奏。

1925 年 10 月新学期 (Michaelmas Term) 伊始, “实用批评”正式开课。面对 120 名前来听课的学生, 瑞恰慈兴奋地宣布:

这门课是一个实验 [……] 它将是前人从未做过的。我将给每人发一篇讲义, 上面印有各种各样的诗歌, 不标注作者姓名, 大部分作者你们不认识。我要求你们将这些诗歌带回去, 花一点时间, 只是一点时间, 我向你们保证, 这一点时间非常值得, 阅读这些诗歌并对它们写出评语。下一周你们将这个作业交给我。接下来我要做如下三件事情: 1) 分析你们的观点, 2) 将你们的观点进行归类, 3) 就诗歌并主要就你们的观点讲课。你们可以看出全部工作需要你们的特殊合作。(xii)

为了让学生能够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给每人一个编号, 学生在自己的作业上写上这个编号即可, 无需写出自己的姓名。这些无记名的作业后来被瑞恰慈作为文案 (protocols) 写入书中。瑞恰慈要求学生将“有把握的东西”和“观点的核心动机”表达出来。他强调, 这是一个关于自我认知的练习, 为的是发现我们真正在想什么, 以什么为依据。瑞恰慈之所以要求学生在不了解作者身份和写作年代及背景的情况下集中注意“书页上的文字” (words on the page), 为的是让他们在不受任何外界和先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在他看来, 这种鼓励独立思考的民主化的训练方式正是当时大学教育所欠缺的。文本之外的因素及其写作背景及社会语境对理解作品固然重要, 但对它们的了解应该放在对文本自由的、独立的判断与评价之后。换句话说, 对文本的自由独立和真实的理解与判断是文学研究的第一步, 接下来才是对文本以外的事物进行了解, 只有走好第一步, 对作品的理解才有可能准确和全面。

1926 年, 由于瑞恰慈的实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剑桥大学英文专业添加了一门新的考试科目: Passages of English Prose and Verse for Critical Comment。这门新设的考试被看作 1926 年

度剑桥英文 (Cambridge English) 本科学位考试的一次重要改革, 因为这门考试使得学生“直接面对文本, 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将得到最终的检验” (Tillyard 109)。从此, “实用批评”作为一种考试形式和教学方法成为剑桥大学英文系的保留课程, 一直延续至今^[1]。该课程训练和要求学生“对以前没有读过的篇章写出评论, 以检查总体批评能力和知识、理解和使用英文的能力以及对文学理论和争论的了解” (Faculty of English web)。

瑞恰慈在剑桥仅开过两次“实用批评”课程, 第一次开设时间是 1925 年 10-11 月; 第二次开设时间是 1927 年 10-11 月, 均在秋季学期。课程时间为八周。这期间他以课程讲义和学生作业为蓝本, 写成了《实用批评》一书, 并于他前往中国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的同年, 即 1929 年正式出版。在该书导言中, 瑞恰慈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本书的三个目标:

第一, 为对当代文化现状感兴趣的批评家, 哲学家、教师、心理学家和其他好奇的个人提供一种全新的文献; 第二, 为那些想自己搞清楚对诗歌 (或其他认知事物) 的看法和感受, 即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诗歌的人们提供一项新技巧; 第三, 寻求更为有效的教育方法以培养对所闻所读事物的判断力和理解力。(13)

以上三个目标看上去朴实无华, 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瑞恰慈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既限于文本又走出文本。在他看来, 文学批评不仅仅关乎作品本身, 还关乎文化、教育以及人的心理健康和价值判断。通过实用批评训练判断能力和理解能力, 达到改造个人进而改造整个社会的目的是其背后的根本动机, 因而这种批评具有鲜明的现实关怀和实用性。

瑞恰慈在《实用批评》中用近乎一半的篇幅列举了三百多篇围绕十三首英诗的阅读文案。在对这些文案所反映的问题进行逐条分析的基础上, 他提出从意义 (sense)、情感 (feeling)、语气 (tone) 和意图 (intention) 等四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诗歌的意义。“意义”也即“文义”, 是指说话人所言之事的意义; “情感”是指说话人对所言之事抱有的情感和态度, “语气”是指说话人对听者的态度, 而“意图”则是说话人的主观目的。瑞恰慈发现在收集上来的“文案”中, 很多对诗歌的误读源自于对其中一种或几种功能的忽视和不得要领。这就导致对意义的曲解, 对情感的混淆, 对语气的误读和对意图的忽视。为方便表述, 他用“陈述” (statement) 一词来表示传统语言学中言说的意义, 即意思, 而用“表达” (expression) 一词来表示作者的心理活动, 包括情感、语调和意图三个方面。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这四方面意义的综合。读者要理解文本的意义, 就必须对这四方面意义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全面考察, 从而对作品意义获得正确和全面的理解。瑞恰慈指出: “完美的理解不仅包括对作品思想的准确把握、对作品情感意义的正确领悟、对作品语调的精确理解和对作品目的的明确认识, 并且要恰当掌握这些意义的秩序和比例, 把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139)

然而, 尽管这套在瑞恰慈看来具有革新意义的阅读和教学方法突破了文学外部研究空中楼阁式的说教, 但是这种近乎准科学的测量统计方法依然具有其局限和漏洞。首先, 如 20 世纪 30 年代慕名就读剑桥英文系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和传媒学创始人麦克卢汉指出, 诗歌的四

种意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适用于诗歌这种特殊文学形式的批评。原因在于诗人、演说家、散文家和政论文作家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目的其实很不一样。后者的写作或演说目的与受众直接相关，而前者即诗人多数情况下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世界里（并不为受众写作），即便他的作品与受众发生联系和共鸣也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因此，一篇文章、一个演讲或一场演出缺少了特定的受众，其意义将受到致命影响而不完整，而诗歌由于特殊的个性特征，其所表达的意义不一定如此受到听众的牵制（McLuham 266-76）。其次，瑞恰慈的这种细读方法关注的是语言如何传达信息和感情，以及诗歌对读者产生心理功效的大小，这种批评方法往往较多关注作品的局部而非整体，对作品整体内在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缺乏足够的考量，这使他的文学批评更加接近于心理学、语义学或文学修辞学的研究，而非纯粹文学批评意义上的批判分析和价值判断。由此见，与利维斯（F. R. Leavis）将文学及其批评价值提高到道德层面不同，瑞恰慈主要关心的是作品对于读者在心理和情感层面的交流价值。

在《实用批评》的后半部分，瑞恰慈重新回到在《引言》中提及的批评的十大难题，着重分析了其中比较特殊的几大误区，其中包括无关的联系（irrelevant associations）和固化反应（stock responses）、滥用情感（sentimentality）和压抑情感（inhibition）、诗歌中的教义（doctrine in poetry）或教义附着（doctrinal adhesions）、技术性先入之见（technical presuppositions）和批评性先入之见（critical pre-conceptions）等。所有这些误区严重影响诗歌的阅读和批评，导致了在《实用批评》这门课上所发现的所有问题和症状。与当年的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一样，瑞恰慈将这些症状看作是文化问题，它反映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第一，提交文案的男女生的现状（standing）：这些学生接受的是世上最好的教育，可大多数人的诗歌阅读和鉴赏能力不容乐观，剑桥况且如此，世界上其他大学的状况可想而知，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学生，还包括教师。第二，不成熟状态（immaturity）：在平均年龄 19-20 岁的年轻读者中，有些人将成为中学英文教师，由于阅历浅薄，普遍存在着心智和情感上的不成熟。第三，缺少阅读（lack of reading）：女生的平均鉴赏水平高于男生，书本阅历的缺失与生活阅历的缺失互相关联。有些学生几乎没有阅读背景，明显表现出思想上的幼稚和文学经验的贫瘠。第四，分析能力（construing）：大多数学生包括那些有相当阅读经历的学生缺少分析能力；如果只是情感上沉迷于诗歌，而不能做出理性的分析，不能对他人进行睿智的、有想象力和甄别力的表达，这种沉迷能有多大意义呢？第五，固化反应（stock response）：该问题严重阻碍接受和理解自己不熟悉的和不曾感受过的经验，从而导致思想的僵化和懒惰，阻碍文明向更高级的水平发展。第六，先入之见（preconceptions）：包括评价诗歌优劣的各种考试、标准、预先的假设和程式化的概念，等等，它们遮蔽了诗歌的本来面目和本身更有价值的因素，导致对诗歌进行教条主义的理解。第七，恐慌心态（bewilderment）：即普遍存在的对诗歌的畏惧、绝望和无助心态，良好的训练和自信心的培养是当务之急。第八，迷信权威（authority）：一旦诗歌作者的名字被隐去，对诗歌的阅读就呈现另一番风情和景观，可见传统和权威的力量之强大，但是如果我们能对传统提出质疑，我们就能更加理性地检讨我们对传统的依赖。第九，多样性（variability）：对诗歌的反应成多元变化状态，一个人对某一首诗反应迟钝，但有可能

对另一首诗反应灵敏乃至深刻。第十,一般价值 (general values): 在诗歌阅读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应迟钝,辨别能力低下,理解能力衰弱折射出一种对生活价值的理解和运用能力的低下^[2]。

笔者认为,瑞恰慈对上述误区的分析不仅是对英国大学人文教育的剖析,而且是对整个文化状况的诊断,其中所揭示的当年英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普遍问题,在今日之中国大学有惊人的相似性!瑞恰慈以“文案中的文化”为题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对当代文化状况的转型忧虑。与艾略特 (T. S. Eliot)、利维斯一样,瑞恰慈在文化问题上同是阿诺德的传人,但与艾略特和利维斯不同的是,在其处理当代文化危机的方案里,瑞恰慈不仅诉诸文学 (诗歌),而且借用科学。1924 年出版的《科学与诗》提出人文与科学的命题及文理结合的理想。艾略特、利维斯恪守传统 (怀旧),瑞恰慈则看重未来,将对于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建立诗歌的乌托邦。对于新媒体,如电影、无线电及政客们的摇旗呐喊和商业广告,瑞恰慈抱有高度的警惕,他将诗歌和实用批评看作是对抗新媒体对大众的智力和情感进行欺骗与腐蚀的有效武器。因此他呼吁:认真研究语言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是当务之急,开设关于诗歌诠释和诠释理论的课程将有力地促进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语言在建构意义和传承文化方面的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瑞恰慈、燕卜苏 (William Empson)、利维斯、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等剑桥批评的几位关键人物尽管各自的出发点和路线图不尽相同,但却拥有不约而同的认识和共鸣。对瑞恰慈而言,诗歌对于生活有着特殊的意义:“当自然和传统,或者当下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背叛我们,我们就有理由反思我们是否可以人为地创造出拯救的办法 [……] 而在所有可能的方法中,诗歌这一通过我们的大脑将思想、感情和欲望组织起来的语言工具,是最能服务于我们目的的方法。就我们文明的标准来说,将语言的这一最高形式变得触手可及,刻不容缓。” (Practical Criticism 309) 瑞恰慈相信,诗歌由于其特有的感染力和想象力,必将成为一剂克服混乱、拯救世道人心的良方,而经过实用批评训练的读者在了解他人的阅读经验的同时必将会获得更多自我组织和批判甄别能力。

纵观瑞恰慈“实用批评”课程及瑞恰慈以此为基础撰写发表的专著《实用批评》,我们可以看出,“实用批评”更为关心的是阅读而不是批评^[3]。与利维斯不同,此时此刻,瑞恰慈并不关注批判性的判断 (critical judgment),而是文本的释义 (paraphrase)。他曾说:“我并不否定道德家的观点,我只是想解释它们” (qtd. in Stephen Collini 165)。深受“剑桥英文”浸染和影响的媒介大王麦克卢汉 (H. M. McLuhan) 在评价和比较利维斯、瑞恰慈和燕卜苏各自的批评特色与取向时指出:

事实上,无论是瑞恰慈还是燕卜苏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没有在诗歌的评价方面取得成功,更加公正地说,瑞恰慈和燕卜苏的目标并不在于评价 (evaluation)。(266)

利维斯先生将诗歌的功能看作是情感的教育和滋养,瑞恰慈和燕卜苏则从实用的和修辞的角度将诗歌看作是在某一特定情形下发挥作用的工具。(276)

麦克卢汉的上述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纵观瑞恰慈的“实用批评”主张,我们可以推断,

注重工具理性和实用价值是瑞恰慈构建“实用批评”方法论的出发点。自开设“实用批评”课程以来,瑞恰慈更加关注阅读的根本问题和如何通过教学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阅读能力和判断能力。有鉴于此,破除并革新看似专业(seemingly professional)但无视有效价值的教学方法,提高正确阅读和鉴别良莠的判断能力成为“实用批评”的主要目标。对于这一目标,瑞恰慈早已思考良久,成竹在胸。在1924年出版的《文学批评原理》(*Pract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的前言中,瑞恰慈曾这样写道:

掌握思想和运用思想,二者相去霄壤。每个教师一旦想到这一点就会畏缩不前。我试图攻克这个难关,正在着手写一部姊妹篇《实用批评》。极其优秀和极其拙劣的诗篇都不加署名地放在众多有识力的读者面前。他们信手写来的评论意见不妨说是提供了关于某一诗篇以及可能产生的诗评的立体看法。经过系统分析,这些材料就不仅提供了一份耐人寻味的当代文化态势述评,而且提供了一种新型有效的教育工具。(3-4)

这里所说的“材料”就是他通过“实用批评”课程收集的剑桥学生的课程作业,即他们对无名诗歌的个人解读,它们构成“一种全新的文献”,其中还有燕卜苏、利维斯,以及与瑞恰慈过从甚密的艾略特的应景之作(Richards, *Practical Criticism* xxviii-xxx)。“实用批评”意在鼓励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书页上的文字”(words on the page),而不是前人对文本的阐释或已得到普遍认同的诠释,通过细读文本并进行语义和结构的分析,领悟并揭示作品内在的诗性必然性和艺术真实性,进而达到培养人文心智,提高对真伪、是非、美丑的甄别和批评能力,净化并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空气和文化水平,是推广“实用批评”的根本目的^[4]。

从收上来的作业看,剑桥学生对那些不加署名的诗歌的理解和判断可谓五花八门,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这门课程遂成为20世纪初英国大学文学教育“意识形态比较研究的田野调查”(MacKillop 74),其中所反映的普遍存在的阅读和体验诗歌的低能或无能现象真实记录了当时英国教育的弊端和文化的危机^[5]。然而,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言,这一田野调查所获得的“价值评定的局部的‘主观’差异是在一种特殊的、受社会制约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中产生的[……]所有参加这个实验的人,基本上是20年代在私立学校受教育的年轻的、白色皮肤的、上层或中上层阶层的英国公民,他们对一首诗的反应主要不是取决于纯‘文学的’因素。他们的批评意见受到他们更为广泛的偏见和信仰的影响”(19)。在阶级社会中,诗歌的创作与人类一切表意的创作一样,并非纯粹透明,它充满了种种矛盾、摩擦和冲突。家庭出身、受教育背景、观念意识、价值取向等会随时干扰诗人和读者的意义创造和意义诠释。人们对诗歌的解读逃不出其信仰乃至偏见的制约和困扰,绝对真空、中立的对于文学价值的评价是不存在的。然而,对于这一点,瑞恰慈“作为一名年轻的、白色皮肤的、中上层阶层的剑桥大学男性学监”显然“无法充分认识到”(19),这不能不说是瑞恰慈在意识形态与文学、权力与知识领域的一个盲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瑞恰慈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者,他从青年时代就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冲动。1920年代,他一边深度参与剑桥

大学英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一边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特别是中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阴阳中和”“对立统一”的理念和思维方式让他感到神往和兴奋,并直接启发了他所提出的“综和”(synaesthesia)审美观^[6]。中国文化传统的绵延悠久更使他相信一旦具备了与世界沟通的语言媒介,中国这个东方巨人必将傲立于世界文明先进国家之林,这也是他后来转而在中国推广基本语(basic)的信心和动力所在。在此方面,瑞恰慈显然比艾略特和利维斯更具全球视野和世界主义情怀。

瑞恰慈关于诗歌的理想主义信念源自他对语言情感功能的重视。对他而言,人们对诗歌的理解和判断主要涉及情感问题。他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情感领域,这个领域所涉及的关于世界的所有抽象观念、信仰、预设、虚构乃至争议统统涉及人类的情感,这是一个现代文明人最应该关注的领域,与其相呼应的是关于伦理、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美学和关于自由、民族、正义、爱情、真理、信仰和知识的探索。而诗歌由于是人类情感经验交流的最高形式,它同时承载了人类观念和情感自然发展的历史,因而成为上述探索的核心对象和目标。对诗歌的解读不仅需要关注语词所代表的意义,更要关注使用这些语词背后的心理机制和心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的介入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瑞恰慈人生有两大爱好:文学和登山。这两项爱好使得他得以登高望远,胸襟和视野远胜常人。他一生追求并实践的跨国界(英国、中国、美国)、跨领域(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科学、通识教育、基本语)^[7],他对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始终抱有的乐观态度,他将一个学科领域的视角和方法带入另一个学科领域,对研究对象进行跨学科思考和考量的习惯和能力皆源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瑞恰慈为了英文专业的学科性和学理性诉诸科学和技术,但他对科学技术使用不当产生的负面后果,对现代学科的分化和分割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在构建以“实用批评”为核心的文学原理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努力将文学研究科学化、学科化以便为其在知识生产和学科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他企图将所有学科统一在一个以语言为中心的价值理论中,以便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共同基础,抵制知识和信息的膨胀可能导致的文化分裂。实际上,当“实用批评”如火如荼地在剑桥上演的时候,瑞恰慈已经觉察到这场由他参与发起的革新英文学科的“运动”随着“英文”在“真正”意义上自立门户,迟早难逃学科专业化(或伪专业化)、系统化、官僚化的牵制和腐蚀,未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们还能像他和燕卜苏那样在不同的学科中自由飞翔,破旧立新吗^[8]?

瑞恰慈的文学批评范式可谓瑕瑜并存。他一方面天真地“把诗歌当作一种‘微妙地调和’现代社会混乱现象的工具,如果历史矛盾无法在实现中解决,它们可以作为抽象的心理‘冲动’在冥思的头脑中取得和谐一致”(伊格尔蒙 57)。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学科的整合,将诗歌审美的经验变成日常生活的经验,并借助科学的分析手段提升诗歌拯救文明危机的“实用”价值。他在《科学与诗》中满怀期望地写道:

假若只要心理学能作出一些事体,大致可以和物理学的成就相比,则可期待实际的结果,比较工程师所能设计的愈更值得注意。心灵科学里最积极的步骤一向来

得很缓慢，不过它们已经在开始改变人类整个的观点了。（徐葆耕 1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恰慈在文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拥抱和运用科学，但他也深刻地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负面效应。战后越来越普及的“电影院和高音喇叭”向社会大众反复兜售的“固有观念”（stock ideas）正在形成对全社会道德生活的绑架和胁迫。将文学批评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使文学批评成为训练人们对语言及其使用的敏感度和增强批判意识和鉴别能力的工具，是瑞恰慈早期思想和诗学理念中最激动人心的文化理想。通过科学的手段，将“功利主义价值理论与唯美主义的人类经验”相结合（伊格尔顿 57）。挖掘诗歌的文化价值，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的救赎力量，是科学人文主义者瑞恰慈处理“科学与诗”的独特路径。

20 世纪是批评的世纪。继瑞恰慈的实用批评之后，各种批评理论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洛奇（David Lodge）在《20 世纪文学批评》（*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批评不仅是理解和欣赏文学文本的辅助工具，而且也是一个急剧增长的、有自身存在的知识体，是文学想象的价值和思想的首要载体。”（2）虽然瑞恰慈的批评原理诞生于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幼年时期，但是他对文本自足性的强调及其所倡导的细读原则，他从心理学和语义学出发，对阅读和写作的心理体验、经验组织、冲动平衡、语境意义的原创性论述使他的实用批评方法和由此形成的一整套文学批评原理和价值理论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视野。作为当之无愧的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开山鼻祖。瑞恰慈不仅开创了西方文学批评的新时代，启发了英美批评界向语言学的转向，而且使得 20 世纪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主要传统，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从心理分析到语言学和接受美学再到读者反应批评和分析美学都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受到重要启发。同等重要的是，瑞恰慈将文学、批评和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强调文学艺术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富有洞见地揭示了诗歌及其批评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重大影响和价值意义。从人文主义和民主多元主义的理想出发，他既现实又有预见性地分析阐释了新世纪来临之际科学与诗的互动关系和诗歌在科技时代所能发挥的拯救文化和世道人心的作用。由他发明的“实用批评”的方法和相关的批评概念和术语，不仅为新批评派的批评实践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且第一次使文学批评与英国文学教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被长期广泛地运用于英国和英国之外的大学文学课的讲堂。作为一种阅读策略，“实用批评”使得读者洞察语言细微表达的能力和心智感悟力得到有效的训练，而瑞恰慈对其他两位“剑桥英文”的建设者和传承人燕卜苏和利维斯有着直接影响，他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英文系的授业讲学，使得以“实用批评”为核心的文学原理和教学实践成为那一时代中英两国之间的教育和学术传奇^[9]。

注释 [Notes]

[1] 很多学生因此而慕名选读剑桥大学英文专业，20 世纪媒介理论家、“地球村”的预言人麦克卢汉重读英文本科学位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参见 Janine Marchessault, “Part I Cambridge.” *Marshall McLuhan: Comic Media*. Sage Publication, 2005, pp. 1-42.

[2] 参见 I. A. Richards, *Pract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

- [3] 参见 John Constable, “I. A. Richards: Life and Works.” *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 by C. G. Ogden, et al., edited by John Constable, Routledge, 2001, pp. xxxiv-v.
- [4] 有关“实用批评”的局限, 参见曹莉:《瑞恰慈实用批评的价值与局限》, 载《外国文学》2015 年第 5 期, 第 99-109 页。
- [5] 卢卡斯的学生克拉夫·贝尔 (Clive Bell,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 Vanessa Stephen 的丈夫) 在瑞恰慈的《实用批评》出版后不久, 看到书中所描述的英文系学生对英国诗歌五花八门的解读, 像一头困兽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声称要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写文章抗议剑桥大学怎么会录取如此白痴的学生。参见 F. L. Lucas, “English Literature.” *University Studies: Cambridge*, edited by Harold Wright. Ivor Nicholson & Watson, 1933, p. 274.
- [6] 参见 C. K. Ogden, et al. *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 (1922)*. Edited by John Constable. Routledge, 2001.
- [7] 瑞恰慈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推广基本语 (BASIC) 受挫后, 转去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剑桥, 并深度参与了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创新和改革, 成为《哈佛红皮书》(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的起草人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后, 85 岁高龄的瑞恰慈于 1978 年再度来到中国推广基本语, 直到次年在中国病倒, 在剑桥病故。参见 John Paul Russo, *I. A. Richards: His Life and Work*. Johns Hopkins UP, 1989.
- [8] 瑞恰慈等人的学科创新并非畅通无阻, 而是屡遭剑桥保守派的攻击, 参见 John Constable, “I. A. Richards: Life and Works.” *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 by C. G. Ogden, et al., edited by John Constable, Routledge, 2001, p. xxxvi; Ian MacKillop, *F. R. Leavis: A Life in Criticism*. Penguin Books, 1995.
- [9] 有关瑞恰慈“实用批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接受可参见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陈越:《重审与辨正——瑞恰慈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反应》,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 年第 2 期, 第 95-107 页;季剑青:《“实际批评”的兴起:1930 年代北平的学院文学批评——以叶公超、瑞恰慈为中心》,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 年第 1 期, 第 161-69 页;容新芳:《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enson, A. C. *Diary*. Vol. 172. Leaf 11. Verso. Magdalene College, Cambridge, 13 Oct. 1923.
- Collini, Stephen. “On Highest Authority: the Literary Critic and other Aviator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Modernist Impulses in the Human Sciences 1870-1930*.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4.
- Constable, John. “I. A. Richards: Life and Works.” *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 by C. G. Ogden, et al., edited by John Constable, Routledge, 2001, pp. xxxiv-v.
- Eagleton, Terry.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Translated by Feng Liu, et al. Culture and Art, 1987. [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 刘峰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 Faculty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2 Mar. 2012, www.english.cam.ac.uk/admissions/undergraduate/tripos.html.
- Lodge, David. Forward.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David Lodge, Longman, 1972.
- McLuhan, H. M. “Poetic vs. Rhetorical Exegesis: The Case for Leavis against Richards and Empson.” *The Sewanee Review*, Spring 1944, pp. 266-76.
- Richards, I. A. *Practical Criticism: A Study of Literary Judgment*. Edited by John Constable. Routledge, 2001.
- . Forward to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Ziwu Yan. Bai Hua Zhou Literature and Art, 2010. [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第 2 版)前言, 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 MacKillop, Ian. *F. R. Leavis: A Life in Criticism*. Penguin Books, 1995.
- Tillyard, E. M. W. *The Muse Unchained: An Intimate Account of the Revolution in English Studies at Cambridge*. Bowes and Bowes, 1958.
- Xu, Baogeng, editor. *Richards: Science and Poetry*. Tsinghua UP, 2003. [徐葆耕编:《瑞恰慈:科学与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罗辉

洛恩小说中的文学与军事启蒙

◎ 史敏岳

内容提要: 洛恩的小说属于 18 世纪德意志启蒙文学参与和探讨政治的话语传统, 小说中的战争话语一方面对当时的军事实践和战争状况进行了反思, 提出了将启蒙价值引入国家军事组织的主张, 发出了 18 世纪中叶普鲁士军事启蒙的先声; 另一方面站在启蒙的立场, 通过理想军人形象的塑造, 表达了德意志修养市民阶层参与国家公共生活的政治诉求。小说以文学创作为媒介, 表达了一种理性和人道的启蒙式战争观, 在战争书写中寄寓了对当时军人品质、战争艺术与和平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战争书写 约翰·迈克尔·冯·洛恩 军事启蒙 市民阶层 德国启蒙文学

中图分类号: I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4-0024-11

作者单位: 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63

Title: Literature and Military Enlightenment in Johann Michael von Loen's Novel

Abstract: Johann Michael von Loen's novel belongs to the 18th century German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and its tradition of discussing political issues. The war discourse in the novel reflects on the military practice and the war situation at that time, and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introducing the enlightenment value into the military organization. Through his novel, Loen expresses the reform thoughts which first appeared in the Prussian military enlightenment of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Standing in the enlightenment position, his shaping of the ideal military image is a way to express the political pursue of Germany's cultivated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life. The novel uses literary creation as a medium to propagate a rational and humane enlightened war concept. In the writing of war, it reflects the thinking of the quality of soldiers, the art of war and the hope of peace.

Keywords: war writing, Johann Michael von Loen, military enlightenment, bürgertum, German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Author: Minyue Shi,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约翰·迈克尔·冯·洛恩(Johann Michael von Loen)是18世纪德意志早期启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游学足迹遍及大半个欧洲,熟知普鲁士和萨克森宫廷的状况,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军事现状多有评述,撰写了众多的理论作品(Lutz and Jeßing 510)。除了丰富的理论著述之外,洛恩唯一的长篇小说《宫中君子》^[1](*Der redliche Mann am Hofe*)也是18世纪早期德意志知识分子反映反思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就文学史意义而言,这部小说开启了启蒙时期德意志“国家小说”(王晓珏 40)的先河,构成了18世纪德语文学政治话语传统的一部分;从思想史上看,它见证了早期启蒙思想在同时期德语文学中的影响和作用;从政治层面考察,它表达了德意志市民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事务、革除政治弊端、贯彻启蒙理想的历史使命意识和改革诉求。无论从上述哪个角度解读,该小说在德语文学,特别是18世纪的德语文学中,均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国内德语文学研究界却远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除了王晓珏在论文《启蒙时期的德国国家小说》中论述过其文体性质之外,国内几乎没有任何研究,和这部小说的意义极不相称。

在德意志地区,洛恩思考和写作的年代既是早期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又是开明君主专制的盛期(174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即位),同时也是近代战争的高峰期。思想、政治、军事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构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背景,但在洛恩同时代人看来不言而喻的事实,却往往容易被后世读者所忽视。就文学研究而言,《宫中君子》中的军事背景和战争话语就是一个常常被忽略、对于阐释小说却至关重要的细节。18世纪德意志知识分子对战争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包括文人在内的修养市民阶层相当了解战争艺术。他们关注战争过程甚于在意战争结果,不仅热衷于阅读战报,甚至还亲自追踪战争进展。七年战争时期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756—1759年,格莱姆(Ludwig Gleim)在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的启发和帮助下详细记录了七年战争的部分过程:1756年9月,克莱斯特随普鲁士军队从波茨坦进军萨克森,从当月19日到他阵亡的1759年8月24日,他和格莱姆进行了非常详尽和频繁的通信,在战场上第一时间把战况告诉友人,并且嘱咐格莱姆尽量让这些书信在学者朋友圈子中公开传阅(Birgfeld 285)。洛恩作为法兰克福的富裕市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过战争,但在自己的地产上接纳过士兵宿营,也亲眼见证过战争的过程。与贵族和高级军官之间的交往,包括1734年和欧根亲王的相遇,让他对18世纪初的军人素质、军队组织和战争实践有了切近的认识,并在大量论著中探讨军事和国家的问题(Büchel 6)。在这一背景下,战争成为小说《宫中君子》试图探讨的重要内容,战争书写是市民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介入政治军事领域、寄托启蒙理想的一次尝试,也是18世纪启蒙时代背景下文学和军事之间的一次碰撞。

一、军事启蒙的先声

洛恩的《宫中君子》主要有两条线索,其一是行政官利弗拉和蒙特拉斯女伯爵之间的爱情,其二是利弗拉在阿基坦宫廷的政治实践和战争经历。在十七章的篇幅中,小说通过爱情和政治事件的交织,叙述了利弗拉应召做官,卷入爱情纠纷、政治阴谋和军事斗争,但最终通过

自身高尚的道德、健全的理性、坚贞的友谊而走向圆满结局的故事。小说的战争书写集中于第七章和第十章：第七章交代国王因为和利弗拉之间存在爱情冲突，遂派遣他率军应对里卡提亚的进攻，并在战争中设计陷害，欲除之而后快，但利弗拉对征募的军团进行了杰出的管教和训练，最终凭借美德脱离险境，克敌制胜，维护了自己的荣誉；第十章叙述利弗拉受命前往里卡提亚与当地国王缔结和约，向敌国陈述条款之后多方受阻，最终依靠谋略达成使命。

小说对战争的描写深深植根于时代背景之中，反映了18世纪初期军事活动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就对当时盛行的雇佣兵制产生怀疑，不少人主张回归古代兵制。写出了《战争艺术》(*Arte della Guerra*)的马基雅维利就在书中痛陈佣兵制的弊端，力主以征兵制替代佣兵制，极端强调纪律和会战的重要性，详细论述了兵源、操练、组织、战法等内容（钮先钟 102-105）。就德意志地区而言，到17世纪末，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已经效仿荷兰的奥兰治军事改革，确立征兵制，从本国臣民中选拔军官，至其统治末期，一度维持着多达三万人的军队，构成了现代常备军的雏形（Hubatsch 86）。尽管欧洲一些地区的军事制度在十六、十七世纪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到18世纪初期，雇佣军仍然普遍存在，士兵在民众当中的接受程度和地位仍然比较低。雇佣军行军的懒散无序、作战的残暴草率、集体荣誉感的缺失等现象是君主在军事领域亟需解决的典型问题。

在1742年出版的这部小说中，洛恩这样描述里卡提亚发兵进犯时阿基坦的国家状况：“在面对敌国的突然来犯之时，阿基坦措手不及：它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军队充实堡垒，征募一支足以应对敌军的善战之师。但当时国中充满恐惧和迷惘，一切条件均不具备：军队不足以御敌；国库空虚；臣民大多穷困；而富人则以自身的自由为借口，拒绝为公共事务出钱出力。”（*Der redliche Mann am Hofe* 160-61）

除了国家的政治弊象之外，利弗拉在军队中也观察到各种衰败的态势：“他发现征募的军队中完全没有必要的战争风纪和军队管教；无论在行军时，还是在战场上，人们都允许士兵的任性和轻率；导致无序、拖沓、残酷和对真正荣誉的蔑视；士兵所受的训练反倒更适用于折磨百姓，而不是保护百姓。”（164）

小说从整体组织上批判了旧军队，虚构了一场以理性为主导的军事改革。为了废止军事领域的积弊，利弗拉从源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意图“在自己的军团中引入正派的军队风纪，为后世做一个表率”（165）。从兵源上严格征兵选拔，排除体格不良者，包括面相凶蛮者；在风纪上严明军法，禁止赌博等恶习；在精神上要求提升士兵的思想素质，摆脱宣誓的形式主义，军团法官不仅必须在新兵面前宣读誓词，而且必须对宣读内容加以解释，提醒新兵做正直的战士，“明白不光彩的生存比死亡更加值得鄙夷”（165）；在教育上倡导以平等和博爱的态度培养士兵的情感和判断力；在组织上，取消随军冗余，精简携带辎重，解决军队人员庞杂，秩序混乱，调度不便的问题。最后一项内容说明洛恩对军队整顿措施的描写并非文人式的纸上谈兵，而是具体而微，落到实处：在旧军队中，大量的仆从、妇女、随军小贩、辎重脚夫和马匹等不仅消耗着士兵的粮草，还拖慢了行军速度，使军队秩序混乱，调动困难。利弗拉取消了这些冗余，并规定中尉和见习士官带入战场的马匹不得多于每人1匹，而上尉

可带的马不得多于 2-3 匹。针对包裹,他又建立机构,使大多数包裹可凭借一定数量的骡马来运输,以便舍弃大量笨重的马车(Leon, *Der redliche Mann am Hofe* 165-67)。

上述军事改革措施所针对的是雇佣兵制时代普遍存在的纪律涣散、作战残酷、缺乏荣誉感和组织冗余等老问题,这些举措本身无疑带有新的时代特征,渗透着启蒙精神。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The Prince*)中早已剖析过佣兵制的弊端,并主张以新的方式治军,但他的观点和洛恩在小说中表达的精神则完全不同。马基雅维利称,“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之外,不应该有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的专业”(69),“当君主和军队在一起并且指挥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完全有必要置残酷之名于度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残酷之名,他就决不能够使自己的军队保持团结和踊跃执行任何任务”(81)。洛恩和马基雅维利的观点都有务实的一面,但马基雅维利的态度带有唯军事论和唯权力论的色彩,认为军事是政治的基础,治军的要义在于严苛;而洛恩的主张完全是启蒙式的,重视以德性和理性治军,崇尚教育和感化。

在《宫中君子》中,德性(Tugend)是一个频繁出现的概念,它不仅包含道德,还包括启蒙思想所主张各种品质。“面相凶蛮者”不得入伍,士兵需要培养“正直”的品格,要懂得维护荣誉,治军要讲求博爱,等等,无一不是在鼓吹这些启蒙价值的重要性。这并非单纯是小说的虚构,也是洛恩本人关于当时军事实践的真实观点。他于 1738 年、1743 年和 1744 年分别写过三篇冠以《士兵或军人等级》(*Der Soldat oder der Kriegsstand*)之名的论文,阐述了军人所必需的品质,包括先天的禀赋和后天获得的素养,以及道德天性和后来习得的实践知识。推崇军人的德性,包括提倡军人的自身修养,其目的在于提升军人的社会地位,提高公众对军人的接受与认可程度。为了达此目的,洛恩首先在理论上提出了军人等级的社会声望是先天决定的观点。这种“先定论”(Prädestinationslehre)认为,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能够比军人在理论上更加符合理性和信仰的要求,因此军人等级先天享有各方面的荣誉(Büchel 2)。洛恩之所以提出这种观点,也是出于现实考虑。只有倡导以启蒙价值为导向的军人品格,塑造有道德和荣誉感的军人等级,才能使民众接受军队,减轻军队在作战中对占领区的掠夺和破坏,从而尽可能地保存占领区的经济基础。后一种考虑在 18 世纪推行重商主义、注重邦国经济发展的西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尽量降低战争破坏程度的构想,至少在理论上是启蒙时代战争理性化趋势的一个产物。

理性不仅对军人的素质提出了要求,也使 18 世纪的战争成为启蒙式的战争。大量的理论建构让战争的过程变得可以计算。军队在作战时力图排除偶然性,讲究作战策略和阵法,追求会战的胜利,避免长期作战和不必要的损耗。洛恩在小说当中叙述的里卡提亚和阿基坦之间的战争,就是一场典型的启蒙式战争,体现了当时流行的战争艺术和战争观念。

小说借利弗拉应对里卡提亚人入侵的情节,在布防、安营、对战、撤退、近战等几个具体细节上阐述了战争艺术。在敌军已经攻占前方要塞弥诺珀的形势下,利弗拉首先计划切断对方入侵的道路,随后寻找有利地形布防:背靠树木茂密的高地,面向直通深谷的陡峭崖壁,用巨石在阵地两侧修筑胸墙,安置小型火炮。随后试图诱敌深入再行包围冲击,但没有成

功。里卡提亚人看到利弗拉阵势严谨，不愿正面进攻，而是试图占领高地，居高临下地在炮火可及的范围内打击阿基坦，双方于是围绕高地展开争夺战（Leon, *Der redliche Mann am Hofe* 169-82）。当时的战争对地形的重视在这里展露无余，借助地形巩固城防，依托高地发挥炮火优势，客观理智的计算和考量取代了骑士战争年代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

面对敌众我寡，援兵不至的危急情形，利弗拉没有固守僵化的荣誉观念而拼死战斗，而是依靠策略，在保存实力的前提下与敌周旋。他吩咐军士趁黑夜将大多数辎重装车，提前运回总部驻地，而后令军队分为三部分：一部分隐蔽在树林中，一部分留守军营，剩余人马守卫通道，以便撤退。随后点燃柴草，制造出营地混乱，统帅出逃的假象，诱使敌军劫营。敌军贪图财物，四散闯入军营掠夺，失去了原先严谨的战斗序列，被树林和营地中的伏兵两面夹击，最终溃败。这场力量比例不对称的战役之所以能以阿基坦人的暂时胜利而告终，主要是因为利弗拉能冷静现实地思考，合理地分布兵力，而敌方则由于军纪不严、战斗失序而败北。此战突出了18世纪战争对统帅智力和心理素质、对作战纪律和排兵布阵的要求。同时，军队之间分出胜负即宣告战争结束，战争并不以彻底摧毁敌方机动力量为目的——“取得彻底的胜利之后，利弗拉就率军回到了主营”（173）。

正如上文所述，小说中出现的军事改革和战争描写均表现出启蒙的时代特征，战争艺术建立在现实的计算和考量之上，战争也不以毁灭敌人为目标，而是在制服敌人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损耗，保存实力。洛恩在小说中描述的这种理性战争的要求，只能由利弗拉这样集各种启蒙价值于一身的军人才能满足。而塑造这样一种凭借高尚的内在品质（勇敢、正直、聪慧、道德等）在战争中捍卫自身荣誉的理想军人形象，也是洛恩在这部介于国家小说和教育小说之间的作品中要表达的启蒙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宫中君子》通过战争话语的书写对当时的军事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发出了不久之后以普鲁士军队为代表的军事启蒙运动的先声。

军事启蒙（*Militäraufklärung*）是1740年代之后普鲁士军官群体内部出现的，旨在应对正在改变的战争形态、适应军事领域之外市民社会的一场教育运动（Birgfeld 514）。自从勃兰登堡大选帝侯时期军团管理日益从私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以来，军人开始配备统一的武器，军官团体出于自身对服役和忠诚的理解开始转变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而从普鲁士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开始，军官穿上了统一的制服，从外观上也成为独特的社会群体，俨然一个自成一体的等级（Schmoller 755）。但包括军官群体在内的军人阶层在社会上却声望不高。18世纪的市民阶层往往视军队为不受控制的暴力源，这也是洛恩提出军人荣誉“先定论”的社会背景。军事启蒙的一大用意是为了对抗市民社会对军队的蔑视，也是为了能够融入启蒙圈子的新话语。其内容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战争艺术的科学化，军事变成一门独立学科，军官职业能够和其他有资质才能担任的职业具有同等的价值，其二是提高军官的各方面素质，注重军官在军事技能之外的素养。有论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启蒙发生在18世纪中叶以后，其承载者是175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其高潮发生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Horath 45）。

在洛恩创作这部小说之时，如此系统化的军事启蒙还远未开始，但小说对行政官利弗拉

的塑造已经带有比较明显的军事启蒙色彩,这一人物可以视作后来高素养军人的文学先驱。利弗拉首先拥有贵族出身,道德高尚,具备杰出军人的一切品格;其次战争经验丰富,曾参加过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战争;最后,他学识渊博,小说中称赞他精通军事工程学(Kriegsbaukunst)(Leon, *Der redliche Mann am Hofe* 161)。洛恩始终强调德性和理性在军人品格中的重要性,而后者外化于丰富的专业知识。在他关于军人阶层的论著中,洛恩认为称职的军人所需要具备的军事科学知识是数学等理性科学,包括军事工程学、几何学、机械学、物理学和流体静力学。这些学科所属的知识领域和绘画(制图)能力一道,构成了成为一个优秀军人的前提。除此以外,他还认为军官应当形成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军官的闲暇时间应该和他高贵的职业相符,拥有一种贵族或上层市民的生活风尚,除了读书之外,还有优雅的社交(Büchel 17)。这些主张在小说中融汇到行政官利弗拉的身上,构成了启蒙时代一个理想军官素质的全部内核。尽管洛恩的小说存在过度理想化的倾向,但主张军官等级顺应启蒙运动的要求,吸收启蒙的价值和品质,不仅精通军事科学,拥有高度的专业素养,而且适应军事领域之外的市民社会,培养高尚优雅的生活方式,则完全切合18世纪中期之后发生的那场军官教育运动的价值取向,可谓军事启蒙之先声。

二、战争话语作为政治诉求的表达

军事启蒙的出发点是提升军人的社会声望,从政治实践上看,它是出于巩固集权主义政体,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考虑。以普鲁士为例,国家机构的要职一直为贵族保留,而在军队中,统治阶层怀有一种“天然的精英理念和黠武精神”(唐宁 111),更偏好高贵出身的人,怀疑平民所能具备的品格,因此只有贵族方可担任军官职位。军人等级社会声望的提高,一方面能够通过荣誉来弥补君主集权政体之下因在军中服役而丧失了一定权力的贵族阶层的损失,另一方面可以争取拥有经济实力的中上层市民的支持,因为军事启蒙所提倡的道德和修养,恰好是怀有启蒙理想的德意志市民阶层所推崇的价值。

洛恩小说中的行政官利弗拉作为早期启蒙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军官,是一个代表了市民价值观念的贵族形象,他的军事行动折射出一种结合了启蒙理性和市民价值的新战争艺术。小说多次强调利弗拉与宫廷相对立的高贵品质,第一章就描写他在接到国王的诏令之后,百般纠结是否要进入宫廷,因为他崇尚单纯、自然和道德的乡村生活,厌恶宫廷的浮华、虚伪、阴暗和复杂(Leon, *Der redliche Mann am Hofe* 4)。面对国王借征战除掉他的阴谋,他坦然接受,从容出征,凭借自身的军事才能获得了战争的初步胜利(173)。在军事和政治实践之中,他又因自身的高贵品质而与其他贵族缔结了堪称典范的友谊(185)。无论是严苛的道德要求,还是出众的实践才干,抑或是坚贞不二的友谊,都并非典型的贵族特质,而是启蒙时期修养市民阶层借以和贵族抗衡的价值。实际上,小说以“宫中君子”为标题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宫廷价值和市民价值之间的冲突。这里的“君子”即“正直的人”,正直作为市民阶层标榜的内在品质,本身就与宫廷生活崇尚外在形式的特点不同。小说中自始至终存在一种将道德纳

入宫廷价值体系的努力,试图证明秉承正直的市民品质同样可以在政治实践中获得成功,甚至希望以道德修养来改善以宫廷为主导的弊端丛生的社会。因此,道德和修养这类原先属于私人领域的品质就进入了公共领域,而战争正是小说中借以证明这些品质的公共领域之一。

与今天不同的是,启蒙早期对人物的理解带有等级限制。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类似利弗拉这样的小说人物只有外部是贵族的,其内部价值却是市民的,因而当时的读者并不将其理解为真正军官的代表,“在1750年之前,军官具有强烈的等级特权意识,出身高贵。文学中的这些人物对1750年之前的读者来说,完全不是理想的军官,而是穿着制服的理想的市民”(Birgfeld 564)。因此,小说中的战争话语相当于把本来属于贵族的军事领域变成了市民价值借以贯彻自身的平台,用文学将战争变成了市民阶层的道德品质经受考验和试炼的场所,这显然体现了启蒙早期的一种权力关系:贵族对军官职位的垄断影响了小说对利弗拉的塑造,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这位理想军官必须是贵族的。但作为启蒙运动载体的修养市民阶层怀有自身的政治诉求,通过在文学上将道德、修养、友谊等市民价值融入贵族主导的战争领域,塑造了一位本质上是理想市民化身的贵族军官形象,这种政治诉求才得以表达。根据话语分析理论,话语具有一种“分离功能”(Röttger 124),可以在权力关系之中将他者排除在外。军事作为原先由贵族垄断的领域,具有受到政治权力保障的排他性,对军官拥有贵族血统的要求排除了市民阶层进入该领域的可能。但到了18世纪,军事领域逐渐发生变化,战争成为一门要求统帅具备专业军事知识和教育水平的艺术,军事科学的专业化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排他性产生了松动,军事启蒙由此成为必要。洛恩的小说表明,当时身负启蒙使命的市民知识分子至少在思想上尝试介入军事领域,小说中的战争话语在本质上试图催生一个有别于传统贵族军官、以启蒙价值为内在核心的新军官等级。

洛恩的主张反映了18世纪初战争形态和政治格局之下德意志市民等级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怀有启蒙的理想,面对鲜活的战争现实,有介入战争的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内阁战争的形态使战争的发动和进行都将市民等级排除在外,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无力使其对战争产生距离感,从而对战争进行反思。在这种状况之下,小说战争话语所表达的政治诉求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战争话语背后的军事主张,包括军事启蒙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张力;其二是这种战争话语的本质反映的不是市民阶层对战争的肯定,而是对战争的批判。

如果说1750年代德意志的读者难以将小说中的利弗拉看作理想的军人,而只能将其理解为杰出的市民,那么这恰好证明了这种政治诉求的本质:市民阶层的品质应当被纳入军事体系。但在这一政治观点上,洛恩并没有强调外在出身,而是强调内在品质,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提倡内在的修养,小说由此充满了教育和感化的意味,甚至国王最终也被利弗拉的人格所感化,成为一个明主。让市民阶层也有资格进入军官等级,这并非洛恩的本意,事实上他的思考也始终带有时代赋予的等级制烙印,因而主张一种以道德为基础的贵族政体。洛恩的思想无意颠覆等级国家的根本,而是尝试以道德呼吁来巩固和改善现存的等级状况,强化启蒙时代贵族领导权的合法性。在这种思路之下,小说中的战争话语始终围绕着军官,很少关注普

通士兵阶层,他在论著中倡导军事领域的道德提升和组织改善,也始终针对军队中的骨干群体,即由贵族构成的军官等级。

然而,以市民价值为内核的军官团体在本质上就与贵族政体存在矛盾。根据洛恩的观点,优秀军官的必要条件是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包括健康强壮的体格、高大匀称的身形、令人敬重的表情等(Büchel 12)。这些属于先天条件,虽然和道德及修养无关,但也并非贵族血统的专属,换言之,军官的天生素质并不一定以贵族血统为前提。另外,健康、力量、男性气质虽然是自然禀赋,但始终要求人们谨慎对待,这些禀赋得以保持的前提是节制的生活方式和体力上的训练,这就需要后天的修养。而洛恩关于建立贵族军事学校,对贵族军官进行必要的军事科学教育,提倡军官应当具备典范式的道德修养和娴熟的实用知识等(1744: 410),军事启蒙的观点,在转向贵族受众时必然会受到天然的阻碍,因为这些措施的背后,隐藏的是严格以效能为导向的市民工作伦理,难以与贵族—宫廷的理念相融合。换言之,在等级意识十分森严的军官群体内部推行带有市民道德色彩的启蒙价值,在本质上是对传统的贵族概念进行更替,即从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血统贵族转变为以道德修养和知识技能为基础的“功勋贵族”(Büchel 11)。小说塑造的利弗拉这一理想军官形象背后所隐藏的就是这样一种政治诉求,希望将市民所推崇的启蒙价值纳入贵族政体的框架下,包括军事领域。通过小说对战争话语的表达,战争艺术被纳入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证明启蒙价值不仅可以和战争艺术兼容,甚至还是成为杰出军人的基本品质之一。但正如上文所述,强调军人内在修养弱化了血统的地位,与传统的贵族和宫廷理念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

在这种将战争纳入启蒙价值体系的尝试背后,小说的战争话语在本质上却是反战的,至少不是一种肯定战争的态度。利弗拉参加战争的起因是宫廷阴谋,他被卷入战争之中,但在被迫面对战争之后仍然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对于利弗拉本人而言,军事服役并非一个道德高尚、内心虔诚的人证明自己的天然领域,而是在逆境之中经受考验,捍卫自身道德的场所。因为他在内心与好战精神和夸张的荣誉观念保持着距离,因此一进入军队就着手进行组织和风纪改革,按照启蒙价值的要求改善军队机体,同时秉承一种理性和人道的战争观念。在战胜里卡提亚人之后,利弗拉向军队呼吁:“勇敢的阿基坦人,请爱惜被你们征服的敌人,不要让人们的鲜血无谓地流淌!”(Leon, *Der redliche Mann am Hofe* 181)战争暂时结束之后,利弗拉随即建议国王遣使去里卡提亚,与之缔结和约,防止事态扩大,也防止里卡提亚通过新的结盟行动变得强大(246)。小说中的战争始终是自卫式的战争,始终只是一种确保自身安全、保卫和平的必要手段。利弗拉关于及时缔结和约,通过契约来保障永久和平的建议表明,洛恩的一切军事改革主张,包括在军事领域引入市民价值的提议,均以节制战争和保证和平为目的。在战后和谈阶段,利弗拉当着里卡提亚君主的面批判战争的无意义性:他认为,局势在战后总归要恢复和平,这让战时的流血牺牲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双方在战前就可以用更小的代价谈妥(275)。他无视宫廷等级制度,要求与君主直接和谈。但在这里,启蒙式的乐观再一次在宫廷的政治戏法面前碰了壁。里卡提亚国王对他避而不见,把和谈交给了大臣,自己则暗中操纵。利弗拉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只能用计谋促成和谈。在这里,事

态的发展迫使利弗拉偏离他一贯的理性和德行,认可用智谋达成理想的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在乐观之中不乏现实感。但洛恩没有因为现实而放弃启蒙的理想,小说认为普遍和平要通过各邻国之间颠扑不破的结盟来保障,也就是说永久和平的前提是各国君主承认公义的约束性效力。利弗拉的内心始终坚信,基于智谋获得的休战局面无法长久,若非君主自身得到改善,不能保证永久和平。可见,小说书写战争,无论是塑造理想军人,还是反映战争艺术,均围绕着和平问题,因此在本质上是对战争的反思。这种反思指出,要依靠各国君主承认公义,凭借各国间的结盟来避免战争,保证和平,表达了洛恩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立场和诉求。

洛恩的《宫中君子》是18世纪反映启蒙文学在政治探讨中作用与角色的典型文本,其思想和洛恩本人的政论文和军事论文一脉相承,带有鲜明的早期启蒙思想的特征。小说中的战争话语作为一种权力结构的再现,体现了18世纪初欧洲普遍的内阁战争的形态给德意志修养市民阶层所造成的影响,也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对待战争的态度。洛恩根据自身的战争经验和政治思考,表达了军事启蒙的先声,也透露了市民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通过小说中的战争话语,洛恩不仅在军队组织层面批判了17世纪的旧式军队,而且在布防、安营、对战、撤退、近战等具体细节上阐述了当时的战争艺术,这是在战略战术层面对18世纪早期军事实践中的弊端和典型问题的回应;小说将行政官利弗拉塑造为一个代表了市民价值观念的贵族形象,刻画他在被迫的军事行动中既获得了成功,又捍卫了自身的道德和价值,揭示了军事能力和道德品质之间天然的亲缘关系。借利弗拉这一理想军人的形象,洛恩试图推崇一种结合了启蒙理性和市民价值的新战争艺术,致力于主张一种理性和人道的战争观念,形塑一个适应启蒙要求、注重道德修养和学识的军官阶层。小说所探讨的军事问题既具有现实基础,也不乏乌托邦的色彩,作者站在启蒙者的立场,呼吁君主认识理性和道德的必要性,表达了把市民价值和启蒙理性纳入国家军事组织的主张,以达到国家利益和市民利益的和谐一致。但洛恩所提倡的军事启蒙思想本质上是要将严格的市民工作伦理引入由贵族主导的军官阶层,市民以成就和功绩为导向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以血统为基础的贵族价值观念之间势必产生无法克服的张力。此外,小说的战争话语还具有反战的特征,这种反战并非单纯从价值上否定战争存在的意义,而是将战争看作一种必然状态和保证和平的必要手段,倡导一种以新式战争艺术为基础的、节制的战争,希望通过启蒙促成君主自身道德修养的改善,承认公义,从而以各国间契约的形式来保障和平。洛恩在小说之后另附了一则《关于改善国家的自由思想》(*Freye Gedancken von der Verbesserung des Staats*),论述了士兵阶层和欧洲持久和平的问题,在小说情节之外又一次表达了他这种以追求持久和平为目标的启蒙式战争观。

注释 [Notes]

- [1] 小说全称为 *Der redliche Mann am Hofe oder die Begebenheiten des Grafens von Rivera. In einer auf den Zustand der heutigen Welt gerichteten Lehr- und Staats-Geschichte*, 王晓珏在其论文《启蒙时期的德国国家小说》中译为“宫廷里的正直的人,或者,行政官封·利弗拉轶事,一个针对当今世界情况的教育和国家故事”,参见王晓珏:《启

蒙时期的德国国家小说》，载《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第44页，注释13。此处拟译为“宫中君子”，是因为小说既有巴洛克国家小说（Staatsroman）的特征，又有启蒙文学的教育意图，遵循着“君鉴”（Fürstenspiegel）的传统，意在为君主的为人和施政提供典范，提升君主的个人修养。而汉语中“君子”一词是儒家提倡的人格典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主体，译为“君子”比较符合汉语习惯。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irgfeld, J. *War and Enlightenment: Studies on the War Discourse in German-Language Literature of the 18th Century*. Wehrhahn-Verlag, 2012. [Birgfeld, J. *Krieg und Aufklärung: Studien zum Kriegsdiskurs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Wehrhahn-Verlag, 2012.]
- Büchel, C. "The Officer in the Image of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The Soldiers' Writings of Johann Michael von Loen." *The Art of War in the Light of Reason: Military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18th Century. Part I*, edited by D. Hohrath and K. Gerteis, Felix Meiner Verlag, 1999, pp. 5-23. [„Der Offizier im Gesellschaftsbild der Frühaufklärung: Die Soldatenschriften des Johann Michael von Loen. "Die Kriegskunst im Lichte der Vernunft: Militär und Aufklärung im 18. Jahrhundert. Teil I, hrsg. v. D. Hohrath und K. Gerteis, Felix Meiner Verlag, 1999, pp. 5-23.]
- Downing, B.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ranslated by Xinmin Zhao. Fudan UP, 2015. [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 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主与专制之起源》, 赵信敏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Hohrath, D. *The Education of the Officer in the Enlightenment*. Württembergische Landesbibliothek, 1990. [Hohrath, D. *Die Bildung des Offiziers in der Aufklärung*. Württembergische Landesbibliothek, 1990.]
- Hubatsch, W. *Germany between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Ullstein Verlag, 1976. [Hubatsch, W. *Deutschland zwischen de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d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Ullstein Verlag, 1976.]
- Loen, J. von. *The Honest Man at the Court*. By Johann David Jung, 1742. [Loen, J. von. *Der redliche Mann am Hofe*. Bei Johann David Jung, 1742.]
- . *The Soldier or the Calss of War*. By Johann Friedrich Fleischer, 1738. [Loen, J. von. *Der Soldat oder der Kriegsstand*. Bei Johann Friedrich Fleischer, 1738.]
- Lutz, B., and B. Jeßing, editors. *Metzler Lexicon Authors*. 4th edition. J. B. Metzler Verlag, 2010. [Lutz, B., und Jeßing, B. (Hg.) *Metzler Lexikon Autoren*. 4. Aufl. J. B. Metzler Verlag, 2010.]
- Machiavelli, N. *Il Principe*. Translated by Handian Pan.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潘汉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Niu, Xianzhong. *History of Western Strategic Thought*. Guangxi Normal UP, 2003. [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Röttgers, K. "Discursive Sense Stabilization through Power." *Discourse Theories and Literary Studies*, edited by Jürgen Fohrmann and Harro Müller. Suhrkamp Verlag, 1988, pp. 114-33. [Röttgers, K. „Diskursive Sinnstabilisation durch Macht. "Diskurstheorien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hrsg. v. Jürgen Fohrmann und Harro Müller. Suhrkamp Verlag, 1988, pp. 114-33.]
- Schmoller, G. "The Formation of the Prussian Army from 1640 to 1740." *Modern Prussian History 1648-1947*. Bd. 2, edited by Otto Büsch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Walter de Gruyter, 1981, pp. 749-66. [Schmoller, G. „Die Entstehung des preußischen Heeres von 1640 bis 1740.“ *Moderne Preußische Geschichte 1648-1947*. Bd. 2, hrsg. v. Otto Büsch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Walter de Gruyter, 1981, pp. 749-66.]
- Wang, Xiaojue. "The German Staatsroman in the Enlightenment."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2, 1999, pp. 38-44. [王晓珏:《启蒙时期的德国国家小说》，载《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第38-44页。]

◇责任编辑: 吴晋先

朝鲜金泽荣对《诗经》、《论语》等若干问题考论

◎ 王成

内容提要: 金泽荣对《诗经》、《论语》及孔子相关研究等给予了极大关注, 其文章对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 如孔子删诗、郑卫诗淫、孔子专制与尊帝尧、《论语》“吾与点”句的理解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层次的文化背景, 金泽荣的论述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点, 对《诗经》学史、《论语》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金泽荣 《诗经》学史 《论语》学史

中图分类号: I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4-0034-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韩国古典散文与中国文化之关联研究”(14CZW038)

作者单位: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Title: Korean Litterateur Kim Taek-yeong's Textual Research on *Book of Songs* and *The Analects*

Abstract: Kim Taek-yeong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Book of Songs*, *The Analects* and Confucius. His article discussed many issues, such as Confucius's deletion of poetry from the *Book of Songs*, Zheng and Wei's poetry is obscene, Confucius's autocracy and respect for Emperor Yao,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ntence "I give my approval to Dian" in *The Analects*. The proposition of these questions has a deep cultural background, Kim Taek-yeong's exposition shows a relatively distinct fea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about the history of study on *Book of Songs*, and the history of study on *The Analects*.

Keywords: Kim Taek-yeong, the history of study on *Book of Songs*, the history of study on *The Analects*

Author: Cheng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Liberal Arts Colleg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China.

金泽荣,字于霖,号沧江,亦号云山韶濩堂主人,“韩末四大古文家”之一。1905年流亡到江苏南通,在中国生活了22年,有《韶濩堂集》传世。金泽荣曾在张謇介绍下到翰墨林印书局任编辑,出版刊行了朴趾源《燕岩集》、申纬《申紫霞集》、黄玔《梅泉集》、李建昌《明美堂集》等朝鲜文人别集,以及《韩史纂》、《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书籍。中韩学界关于金泽荣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1],但现有关于金泽荣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诗歌、史学、交游、编辑出版等领域,对其散文关注不够。金泽荣的散文宗法秦汉、唐宋,其《自志》言:“于文好太史公、韩昌黎、苏东坡,下至归震川。”(490)其文“或者议政,或者论事,观点鲜明,有雄辩的气势”(李岩、俞成云 1324),尤其是对孔子删诗、“郑诗淫”、孔子专制与尊帝尧、《论语》“吾与点”句等问题的论辩,颇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关于《诗经》相关问题的辨析

关于《诗经》的成书来源有三种说法比较有影响,即采诗、献诗、删诗。据古代典籍记载,古有所谓“采诗之官”,专于民间采诗,献之朝廷,作为统治者了解民情的一种手段^[2]。所谓“献诗”,指统治阶级中的贵族文人有目的地作诗以献王者,意在“补察其政”^[3]。关于删诗,司马迁称古诗原有三千余篇,经孔子删取,定为305篇,此即孔子“删诗”之说。《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774)王充《论衡·正说》沿其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242)

三说之中尤以删诗之说影响大,且历代皆聚讼纷纭。唐人孔颖达疑其说云:“《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三千余篇,未可信也。”(阮元 263)孔颖达通过考察古代典籍对《诗经》的引用篇数进行探究,指出司马迁论断之不可信。

金泽荣《孔子删诗辨》(丁酉)一文也表达了作者对孔子删诗与否的认知,文曰:

自朱彝尊论孔子未尝删诗,而司马迁、孔安国二氏之说挠焉。然余以为孔子未尝删诗,亦未尝不删诗。而二氏之说,略得其影响。何以言之?周自国初,至东迁以后上下四五百年之间,太师所采列国之诗,富至三千,固其宜也。而至于辞义俱美、可弦可歌、可观可兴者,止乎三百篇。三百篇者,盖其择之精而选之妙者也。是以列于乐官、播于四方,几于人牙颊而家弦管。然自圣人观之,或不无小小取舍者,况其时颂声久寝而篇帙芜乱者乎?故就而略删,益致其精,而二氏遂误以为删三千焉耳。或曰:子何以必知孔子删诗之不于三千篇而为此臆断也?曰:孔子不尝自言之乎?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以为。又曰:诗三百,一言

而蔽之，曰：思无邪。以此推之，诗三百者，盖当时天下之成语也。既为天下之成语，则其已择之选之者可知矣。如其不然而始删于孔子，则何圣人之将篋中割削涂抹草创深闭之简札，而公然以命于天下，曰三百三百而不已也。圣人谦让之道，决不若是也。且孔子之穷于世久矣，其说未甚行于天下，虽欲不让以伸其说，而世谁肯信之。且夫被之管弦，三百篇亦已多矣。如三千也，则是举天下之聪而专于乐一事而已，奚暇治他事哉。（315）

金泽荣开篇以清代朱彝尊论孔子删诗与否引出下文的议论话题，朱彝尊《曝书亭集·诗论一》探讨过孔子删诗的问题：

孔子删诗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惟朱子谓经孔子重新整理，未见得删与不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叶氏亦谓《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郑仲渔、苏伯修亦尝疑之。近时陶庵黄氏亦谓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愚心黷之。窃以《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453-54）

朱彝尊的观点是，《诗经》是当时贵族阶层普及的教育，孔子以一人之见而删诗，无法让人信服。孔子曾多次提及“诗三百”，可见是由来已久的确定篇数，而不是删诗之后才提及的。况且季札在鲁国观乐，《诗经》编排的次序已大致确定。

金泽荣认为“孔子未尝删诗，亦未尝不删诗”，他从三个角度来阐释由：第一，金泽荣认为孔子确实是删诗，但并不是从三千篇中删减，而是从三百多篇中选其精，司马迁却误以为是删三千篇。从周初至东迁后四五百年间，太师所采集的列国之诗，多达三千余篇，但是辞义俱美、可弦可歌、可观可兴者只有三百多篇。这三百多篇是“择之精而选之妙者”，但在孔子看来，还是有进一步挑选的可能，况且“其时颂声久寢而篇帙芜乱”，所以孔子略作删改，使其更加精当。第二，金泽荣指出删三百而不是删三千的理由。《论语》中多次提及“诗三百”，金泽荣引述《论语》的几句话分别出自《子路》、《为政》篇，这说明“诗三百”已经是当时约定俗成之用语，“诗之百者，盖当时天下之成语也”。如果始删于孔子，那么作为圣人的孔子怎会将“篋中割削涂抹草创深闭之简札”，公之于天下，而一再强调“诗三百”。圣人懂得谦让之道，所以决不会如此。金泽荣从孔子圣人身份、人物性格等角度来论说孔子删诗之不可信。第三，从政治的角度考察，也不应该是删三千篇。把诗歌被于管弦，配乐歌唱，三百篇已经足够多了，如果是三千篇都管弦配乐，那么，“举天下之聪而专于乐一事而已”，其他事就无法进行了。所以金泽荣主张孔子删诗，但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删三千，而是从三百多篇中“择之精而选之妙”，以便能够“列于乐官，播于四方”（315-16）。

《诗经》十五国风中的《郑风》引起学者的广泛讨论，其中影响最大、也最具争议者莫过朱熹《诗集传》的观点，《诗集传》云：“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啻于七之五。”（66）朱熹把《郑风》、《卫风》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篇看作“淫奔”之诗，尤其是《郑风》，如评《郑风·出其东门》是“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64），评《郑风·溱洧》是“此淫奔者自叙之辞”（65），等等。朱熹对《郑风》的认识当源于孔子，孔子认为郑国的音乐是淫声，主张禁绝郑国音乐，所谓“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

金泽荣对于郑诗淫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其《郑卫淫风辨》（丁酉）云：

说者病朱子郑、卫诗说曰：郑、卫虽曰淫俗，其间亦必多洁男贞女，何至如朱说之甚也。且经可以取淫，则何足名经？噫！诗序不幸不出于孔子，所以来纷纷之议如此。然独不思国风者，本天子劝惩之物乎？国风所载忠臣孤子隐士勇夫贞媛淫妇，一切善恶可敬可丑之类，天子既已采观而刑赏劝惩之矣。及其登诸弦歌，播诸天下，则又有以益暴其善恶，有甚于刑赏之劝惩，而圣人之纂之为经也。因之而已，无所变异，是亦春秋褒贬之义，而其善其恶无非教也。今若以取淫为疑，则是春秋之书，不必有乱臣贼子，而但有忠臣孝子耳。且郑、卫之淫，自古天下孰不言之，孰不惩之。谓之惩者为其淫也，谓之淫者为其多也。淫虽凶德，千百人只有一二，则不得以淫目其国，国而至于目之以淫者，多之故也，童孺之所知也。今说者乃欲弊弊焉，望郑卫淫诗之少，是奚异于为越人讳文身也哉。不求其端，不讯其未，惟立异之是好，此薄俗之弊也夫。（315）

金泽荣指出，批判朱熹郑卫诗淫说者，在肯定郑卫诗淫的同时，认为其中也存在洁男贞女之作，朱熹的言论是过分夸大。金泽荣认为持此观点者没有认识到《国风》的本质属性，“《国风》者，本天子劝惩之物”（315）。《国风》无论是关于忠臣、勇士、贞媛等人的诗作，还是关于淫妇等人的诗作，都有深层寓意，就如同《春秋》褒贬之义一样，“有以益暴其善恶，有甚于刑赏之劝惩”，是为君主“采观而刑赏劝惩”（315）。这些诗作的主旨如果只理解为“淫”，那就未能充分领悟到作诗者、编选者的深意了。论者不追根溯源、探求根本，只想标新立异，这是薄俗之弊。金泽荣的观点是有益的启示，即读书要深入到文章的深层寓意，要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韦丹《朱熹“郑诗淫”辨析》言：“朱熹在《诗集传》中将《郑风》的情诗视为‘淫奔之诗’，但从内容上看，这部份诗并无‘淫奔’迹象。朱熹的主要依据是孔子的‘郑声淫’，但孔子的原意不是指‘郑声’的淫荡，而是指郑国音乐细而高的特点，‘淫’可不是内容上的淫秽，而是就音乐形式不合传统‘雅乐’的标准而言。”（34）

二、关于孔子及《论语》考辨

有人认为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专制,“近日野人之为共和政论者曰:孔子之政专制也。是说也,荐绅先生固已掩耳而不闻矣,然世之荐绅先生少而椎愚者多”(金泽荣 316)。金泽荣对此给予了有力的辩驳,他认为君、臣、民之间有正常的尊卑之分,“得其所者名分也,不得曰专制”,这是《春秋》之义理所在。如果君主过于尊贵,臣民过于卑下,那么“情不相通者专制也,不得曰名分”,秦以来的乱政就是明证(316)。

今说者乃欲以春秋之大法,认为嬴秦之乱政可乎?名分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可一日废者也。一日而废,则一令何可出,一事何可成乎?故今共和之国,虽无君臣之名,而君臣之分,未尝不存,所谓寓名分于无名分之中者也。今说者忘此之隐,惊彼之显,而遂以共和之仇,视孔子乎?(316)

金泽荣指出:“春秋之大法,即今之立宪也。尧舜之揖让,即今之共和也。”(316)如果孔子能得尧舜之位的话,他一定能行共和之名而让天下。但孔子不得其位,不得已只能采用立宪的名分,目的是“救目前之大乱,时中之道”。不知道其中深义者,“必日攘一鸡而不足,欲一日而四五攘者”(316)。“日攘一鸡”典出《孟子》,故事告诉人们有错误要及时改正,不要一拖再拖。金泽荣引此典故意在告诫论孔子之政为专制的人们,应及早放弃这种想法。

金泽荣对尧的看法也能反映这一点。孔子眼中的帝尧德行深厚、广博,不仅顺应天道,建立礼仪制度和文化体系,更开启了中华文明史,功绩彪炳千秋。后人因孔子对尧的称颂而对尧不敢更措一辞,金泽荣《唐尧论》云:“孔子于历代帝王,首推尧舜,而其称尧之言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夫以夫子之万世之大圣,而其所以钦慕推抬之者,有如是矣。故自兹以往,天下之人之于尧也,不敢更措一辞,犹天地日月,但可以观瞻而不容置言议也。”(309)语段所引孔子之语出自《论语·泰伯》,一代君王尧是伟大的,像崇山一样高高耸立着,民众无法用词语来称道他。尧所成就的功业是崇高的,他所制订的礼仪制度是灿烂辉煌的。金泽荣对此深表疑意,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发人深思:“敢问夫子之以尧比天者,指何德与何事耶?谓之亲九族、章百姓、和万邦,则伏羲、神农、黄帝诸圣人,必皆能此矣。谓之命历官、授人时,则历之道,黄帝又已始之矣,尧何以独出类拔群而与天同大哉?”(309)孔子把尧比作天,如果是指尧和睦亲族、百姓,那么伏羲、神农、黄帝等人也能够做到;如果是指命历官授人时,黄帝之时已有掌管历数之人。并且,尧不能掌握鲧的实际能力,偾事误国,未能治理好洪水;又任用共工、驩兜等小人,说明尧的智慧也是有限的,其力也有不及之处。

在金泽荣看来,孔子称颂尧的主要原因是指尧让天下之事,因为尧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儿子的缺点,于是把天下让位于他人。金泽荣又分析了孔子的情况:

抑夫子生于衰周大乱之世人欲滔天之时，有尧之才而无尧之福，不能得位以救其时，寤寐忧叹，何所不至？夫惟天下之大乱者，其原在于不能大公无我。不能大公无我，斯不能忘富贵矣。不能忘富贵，斯不能让天下矣。夫苟能让天下，则胸中更有何物，天下更有何事，而大乱何从以生，此夫子所以俛仰上下于数千年之间，独犁然莫逆于尧之揖让，而至于发愤如此也。（309）

结合孔子的处境，揣摩孔子的心境，金泽荣认为孔子盛赞尧是赞其让天下之事。之所以舍舜而举尧，是因为“揖让之事，尧创而舜师之”，这是天地开辟以来所未尝有之举，可以与天比美，所以孔子称颂尧而未称颂舜。

《论语·先进》篇记录了孔子与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弟子“问志”“言志”的故事。《先进》开篇云：“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先回答，如果让他治理一个中等国家，即使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只需要给他三年时间就可以治理得很好。冉有认为自己只能治理“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一个小国，三年之后，他能取得的政绩仅限于“足民”，至于礼乐教化则不是自己所能及之事。公西华有志于礼乐教化，为避免以君子自居，他先谦虚了一番，后才委婉地说出自己的志向，“愿为小相”。当孔子问到曾皙时，曾皙回答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此的反应：“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为何会有喟然之叹？其“与点”的用意何在？反映出孔子何种理想？这一系列的问题成为历来学者争论的话题。有人认为曾皙是主张以礼治国，他说的那段话（“暮春”至“咏而归”）是礼治的结果，是太平盛世的图景，与孔子的“仁政”“礼治”“教化”等政治主张相符，因此孔子“与点”。还有的认为曾皙是主张消极避世，符合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主张，因此孔子“与点”。

金泽荣对此也有一番见解，《“吾与点”解》一文开篇曰：“孔子闻曾点浴风之说，喟然而叹曰：‘吾与点。’朱子释‘叹’为‘叹美’，释‘与’为‘许’。以为不许三子，而独许点之高明。是说也，余窃疑之。”（305）朱熹认为孔子有喟然之叹，体现出他对曾点“深许之”的态度^[4]。金泽荣对朱熹的阐说表示怀疑，他对“吾与点”的解读是：

孔子之发问，在于天下国家事业之所期待者，故子路、冉有、公西华皆以所期待者对之。独点才不及三子，而但有狂狷旷远之志趣，故舍所问而别举浴风之说以进。时则盖孔子道不行，返鲁之日也，故闻点之说，辄感动于中，以为彼三子所期待者之未必行，亦恐如吾。而所可行者，其惟点之狂狷旷远之志趣乎？其喟然叹者，伤叹道之不行也。若曰叹美，则叹美之声气，何至于喟然也？其曰“吾与”者，欲同

归于浴风之乐也。若曰许与，则许与冉有、公西华之意，着于答点之辞，何尝于点乎独许之乎哉？（305）

金泽荣认为孔子所问之志关乎到国家大事，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以政事对答，而曾皙才华不及三子，并且本身性格又狂狷旷达，所以以“浴风”之说做出回应。孔子此时正处在施政思想不能推行，无奈返鲁之际，所以听到曾皙的话深有感触。况且，子路等三人的想法也可能会和自己的施政思想一样无法推行实现，所以喟然长叹，所叹者，“叹道之不行”。假设遵从朱熹所释“叹美”，就不应该用“喟然”。金泽荣认为“与”字应释为“同”意，“欲同归于浴风之乐”；如果解释为“许”，也应该是“许”冉有、公西华的回答。

三、问题提出的背景、意义

金泽荣《与曹仲谨书》（丙辰）云：“仆生来专攻文字，疏于经学。然平日于经传，间有一二思究，而以本邦论议之狭隘，不能形之于笔。及至中国，目见学士之风气，宽大活泼，自得为功。自孔孟以外，种种弹驳，以为之常。于是胸臆之间，隐然与之俱化，前日之所不能笔者，始乃稍稍敢肆焉。如弈中之囚兔，一朝脱弈，东跳西驰，莫有方向。”（237）“丙辰”即1916年，此时金泽荣已定居中国十年有余。朝鲜文坛环境较差，文人思想狭隘、视野局限，且党阀激烈，很多文人噤若寒蝉，不敢发表议论，这些都使金泽荣无法把思想“形之于笔”。直到来到中国，金泽荣广泛交友，与严复、俞樾、张謇等名流往来频繁；又任翰墨林印书局编辑，阅读、编辑了大量书籍，这些经历提升了他的学识与见识。金泽荣受到中国“宽大活泼，自得为功”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也敢于进行大胆的学术批评。

来中国之前，金泽荣所作文章多是学术探讨，如《孔子删诗辨》（丁酉）、《郑卫淫风辨》（丁酉）、《杂言一》（丁酉）等均作于清光绪二十三年、韩光武元年（1897）。来中国之后，金泽荣受中国学界“种种弹驳，以为之常”的影响，其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日之所不能笔者，始乃稍稍敢肆”。这一段时期，他创作了多篇谈论政治的文章，如作于1910年的《唐尧论》（庚戌）、1912年的《孔子专制辨》（壬子），以及1918年的《孟子劝王道辨》（戊午）。当然，他也并未放弃对文学、史学的深入思考，《“吾与点”解》即作于1911年。

“孔子删诗”“吾与点”“郑诗淫”等问题，历来争议较大，且迄今尚无定论。金泽荣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在整个《诗经》学史、《论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孔子删诗”，后世学者多持怀疑态度，如清代崔述《洙泗考信录·辨〈诗〉之说》曰：“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故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厘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转引自郭预衡94）方玉润《诗经原始·诗旨》云：“夫子反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

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三千’说耶?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转引自郭预衡 94)朝鲜文坛对“孔子删诗”又持怎样的态度?李岩、俞成云《朝鲜古代〈诗经〉接受史考论》指出:“朝鲜历来的儒学者都相信《诗经》经过孔子之手而被删修,最后成为了《诗三百》,所以将其信奉为至高的儒家经典。在长期处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朝鲜文人学者那里,《诗经》无疑成为了反观自己的文学观、诗意识和理论批评的一面镜子。”(127)金泽荣关于孔子删诗的辨析在朝鲜《诗经》学史上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未尝删诗,也未尝不删诗”的论断非常具有思辨性,他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阐说,很有层次性、针对性,前文已论,此处不再赘述。

金泽荣的认知丰富了关于“吾与点”句的理解,他认为孔子所叹者,“叹道之不行”。这一观点与历代许多注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如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吾与点也,言我志与点同也。所以与同者,当时道消世乱,驰竞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点独识时变,故与之也。”(434)当时的孔子正处于无法推行其施政思想之时,子路等人的想法也有无法推行的可能,“盖三人皆以仕进为心,而道消世乱,所志未必能遂”(钱穆 221)。曾皙的话更加深了孔子的感触,“曾皙乃孔门之狂士,无意用世,孔子骤闻其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221),所以喟然长叹。

《诗经》、《论语》与孔子相关议题等对朝鲜古代社会、文化、文学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朝鲜文人的诸多探讨。金泽荣讨论孔子删诗、郑卫诗淫、孔子专制与尊帝尧、《论语》“吾与点”等问题,有着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且对《诗经》学史、《论语》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Notes]

- [1] 中国的研究成果参见:羽离子:《从〈韩史纂〉识金泽荣的历史批评观》,载《韩国研究论丛》2004年,第138-51页;周昶、倪怡中:《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09-15页;尹巍:《金泽荣汉诗创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3;黄伟、董芬:《金泽荣诗学渊源论略》,载《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2-109页;郭美善:《金泽荣在中国的出版著述活动考》,载《延边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26-31,85页。韩国的研究成果参见:吴允熙:《沧江金泽荣诗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国大学校,1989;王淑谊:《沧江金泽荣的散文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尔大学校,1995;裴贤京:《沧江金泽荣的历史认识》。博士学位论文,梨花女子大学校,1998;王敦琴:《金泽荣与张謇诗之比较》,载《中国学论丛》2011年第33辑,第24-32页;钱健:《论金沧江的文学批评》,载《中国学论丛》2011年第33辑,第31-41页;朴淑英:《沧江金泽荣汉诗的文学性和时代性意义》,载《石堂论丛》2016年第64辑,第22-31页。
- [2] 《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宣王十五年”何休注语:“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引自郭预衡主编:《中国文学史长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91页。
- [3] 《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引自郭预衡主编:《中国文学史长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92页。
- [4] 朱熹《论语集注》曰:“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

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引自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65页。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Guo, Yuheng, editor.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Classics, 2007. [郭预衡编：《中国文学史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Huang, Kan. *Commentaries on Collected Explanations of the Analects*.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Wangjia Xu.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2009.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徐望驾校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 Kim, Taek-yeong. *Shao Hu Tang Collection. Photocopy Punctuation Series of Korean Literature, Series 347*, Korean National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 1990, pp. 1-428. [金泽荣：《韶濩堂集》，载《影印标点 韩国文集丛刊》第347辑（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第1-428页。]
- Li, Yan, and Chengyun Yu. *General History of Korean Literatur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2010. [李岩、俞成云：《朝鲜文学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Qian, Mu.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alects*. New collated edition. Jiuzhou, 2015. [钱穆：《论语新解》（新校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
- Ruan, Yuan, proofreader and printer. *Notes to the Thirteen Classics*.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Commented and noted by Zhaoqi Han. 2nd edition. Yuelu, 2012. [司马迁：《史记》（第2版），韩兆琦评注。长沙：岳麓书社，2012。]
- Wang, Chong. *Lun Heng Jiao Shi*, proofread and noted by Hui Hua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0. [王充：《论衡校释》，黄晖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 Wei, Dan. "Analysis of Zhu Xi's 'Zheng Shi Yin.'" *Journal of Guizhou Education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1, 2001, pp. 34-36, 105. [韦丹：《朱熹“郑诗淫”辨析》，载《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34-36，105页。]
- Yang, Bojun, translator and annotator. *Translated Notes to The Analect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version)*.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
- Zhu, Jieren, et al., editors.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Xi. Vol. 6*. Shanghai Classics, 2002. [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Zhu, Xi, annotator. *Collections of Poetry*. Collated by Huabao Wang. Phoenix, 2007. [朱熹注：《诗集传》，王华宝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 Zhu, Yizun. *PuShu Pavilion Collection. Collection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 in Qing Dynasty, Vol. 116*, Shanghai Classics, 2010, pp. 1-742. [朱彝尊：《曝书亭集》，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1-742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

加里·斯奈德《大棕熊经》的后现代性

◎ 罗坚

内容提要: 作为深层生态主义的桂冠诗人, 加里·斯奈德的诗学定位在学界一直模糊不清。本文以斯奈德的《大棕熊经》为焦点, 从斯奈德所持的文化态度, 对新文化的探寻及新神话的创造等方面展开论述, 明确划定了斯奈德诗歌的后现代性, 并对其作品的文学与文化意义予以阐发。

关键词: 后现代性 禅宗 《大棕熊经》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4-004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里·斯奈德研究”(14BWW055)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Title: The Nature of Post-modernity of Gary Snyder's *Smokey the Bear Sutra*

Abstract: As the poet Laureate of Deep Ecology, Gary Snyder's poetics 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blurred in the academic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nyder's cultural attitudes, this paper takes *Smokey the Bear Sutra* as the focus, and make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exploration of new culture, the creation of new myths and other aspects so as to clearly delineates the post-modernist nature of Gary Snyder's poetry and elucidates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his works.

Keywords: post-modernity, Zen, *Smokey the Bear Sutra*

Author: Jian Luo, Associate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确定一位文学家的文学作品的诗学属性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与把握该文学家本质性的诗学立场与文化态度。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诗歌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在该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们大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因而在解读其文学作品时难免出现困惑与误解。斯特丁(Bob Stein)的《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一书详细阐述了斯奈德诗歌风格的形成,论及现代派诸位诗人对斯奈德的影响,但是对于斯奈德诗歌本身的诗学属性却没有明确的认定与阐述;墨菲(Patrick Murphy)的《解读加里·斯奈德》(*Interpretation of Gary Snyder*)更多关注斯奈德每部诗集的诗学特征,对其诗歌的宏观、整体属性却没有做出清晰的划定。其他学者如格雷(Timothy Gray)、亨特(Anthony Hunt)等或是关注斯奈德与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关联性,或是专注于斯奈德《山河无尽》(*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的诗集研究。国内学者如钟玲等的研究也都在这一点上有所缺陷。

本文认为,加里·斯奈德的诗歌具有明确的后现代性,《大棕熊经》(*Smokey the Bear Sutra*)可谓其典型代表。其后现代性主要表现在斯奈德对资本主义—基督教文明决绝式的否定,对禅宗等异教文化的热衷,以及解构之后在他的诗作中重构新的神话,并提出新的深层生态文明模式。

一、对资本主义—基督教文明的决绝式否定

哈桑(Ihab Hassan)在论及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指出,“新文学中有一种逃避或者无视传统的力量,这种力量相当激烈,它摧毁了文学之树的根基,引出了一种隐喻意义上的巨大沉默。这种力量还沿着它的主干向上,直达枝叶,绽放出一簇音调混乱嘈杂的花朵。在这许多杂乱的音调中最响亮的是愤怒的呼喊和启示录式的调子”(39-40)。之所以“逃避或者无视传统的力量”会出现,实际上是因为传统已经崩溃,传统的宗教、政治、社会文化的理想国在残酷的本质性现实面前都暴露出其虚伪性。在此情形下文学必然尝试以新的方式发声,揭示与传统背道而驰的叛逆,但也常常陷入“隐喻意义上的沉默”。这种沉默只是隐喻性的,文学终究会以某种方式表达,或是愤怒的,或是呼喊的,或是异域的,或是癫狂的。“嘈杂的花朵”只是它的表象,其真实的指向或是更为深远的虚无,或是某种确定性的重建。哈桑进一步指出,“就最近其他的文学类型而言,在启示录式的隐喻之后往往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情绪,隐含着某种近乎全盘否定西方历史和文明,甚至全盘否定人的本质特征和人为万物尺度的倾向”(42)。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视域中,这是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彻底抛弃,是对人文主义的彻底厌恶,这种隐喻是对“上帝死了”之后的人类精神世界的状态描述,同时也喻示着重新寻求新的精神支撑的艰难行程。

与现代主义文学不同,后现代主义文学对西方统治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文化是决绝式的否定,而现代主义则是对之展开激烈的批评、质疑、反思,其终极性的旨归其实是维护与修复,并最终恢复庞德所谓的儒家式的“秩序”或T. S. 艾略特的英国国教式的高贵而优雅

的统治,恢复“逻各斯”中心主义“君临天下”的“荣光”。后现代主义则与之相反:“逻各斯”的存在本身就是个笑话,上帝早就死了,世界的本质就是一场虚空。文学的讲述方式是非文学,也许无声、杂语与狂欢可以表达某种相似的状态。艺术只有以变形的、碎片式的,或者颜色染缸式的表达才能对应哲学的真实。如果说现代主义还在发泄与尖刻的批评中寻找西方文明的希望,那么后现代主义则彻底放弃了资本主义—基督教文化理想,另起炉灶,渴望重建新的人类文明。

斯奈德的诗歌之所以是后现代性的,这首先体现在斯奈德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及基督教新教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宗教观持有根本性、决绝性的反对态度。在《能量是永恒之乐》(“Energy is the Eternal Music”)一文中,斯奈德直指西方文明之致命弊端:

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文明已经形成一种男根冲动式的,对物质积累、对政治与经济实力的持续扩张的强烈欲望,并将之称为“进步”。在犹太—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人类必然会在地球行星的戏剧舞台上达至他们最终的命运(天堂?地狱?),树木与动物们不过只是一些道具,自然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补给库。在石油燃料的喂养下,这种宗教—经济观已经发展成为癌症:无法控制的增长。它将最终噎死自己,并将把众多无辜者拖累,与之一同坠落,毁灭。(A Place in Space 53)

在另一篇重要论文《佛教与即将到来的革命》(“Buddhism and Fellow Dharma Revolutionaries”)中,他再次表明了自己政治态度:

现代世界的国家政体是通过特意培植欲求与恐惧而维持其存在的:一种丑陋的、畸形的收取黑社会保护费性质的组织。这所谓的“自由世界”在经济上依赖一套发狂的刺激性系统而存在,其贪婪永远不可满足,其性欲无法餍足,其仇恨无法排遣,只有对自我,对应该给予爱的人们,或是针对像古巴、越南这些值得同情的,饱受贫困之苦的边缘社会中的革命热情发泄。(Earth House Hold 90-91)

可见,斯奈德对现代文明体系的本质形成了清晰、深刻的观点,这决定了他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立场。作为一位诗人,他沉默的方式是主动的边缘化,在群山与森林中劳作、冥思。他主动跳出西方文明体系之外,在人类史前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形式中寻找新的文化支点。他所深度探寻的古文化形式有印第安文化、佛教文化、印度教文化等。他抛弃了从前的文化身份,转而以地球公民的新身份要求自己,力图承担起诗人的历史使命,以诗歌的力量带领人类走出现代文明的困境。正如哈桑所言,斯奈德以逃避与叛逆的方向显示了他“隐喻意义上的巨大沉默”的力量,并在对多种异质文化的探寻中形成了他诗歌语境中的众语喧哗而多元共存的文化样态。

二、多元文化融汇与众语喧哗

斯奈德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基督教现代文明已经病入膏肓,如果继续下去只能将人类与地球家园带向毁灭。诗人应该承担起针砭时弊,指明方向的历史使命。实际上,他认为在人类古文明的各种形式中,尤其在各种原始文化中蕴含着地球文明的原始密码。他认为地球文明的解救之道应该要回溯远古文化形式,或者是西方文明版图之外的异质文化,从中获得新的灵感与文化养料,将各种文化融会贯通,从而形成新的地球文明观。

哈桑指出,“对西方本身的极度厌恶比对其历史和文明的否定更深刻地动摇着它的基础。当这股极度厌恶的情绪在狂欢闹饮式的毁灭中找不到圆满的归宿时,就很可能转向佛教禅宗、另类形而上学或群居杂交”(42)。这一段论述正是对斯奈德之禅宗修行的最佳注解。如前文所引,斯奈德对于西方社会的反对是基于对西方哲学、宗教的根本性立场的解读而产生的,是洞察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本质而形成的。因此,斯奈德与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巴勒斯(Holmes Barnes)等文学家一道吹响了“垮掉派”文学运动的叛逆之声。这些文学青年以在路上的方式,以性狂欢、毒品迷醉的方式表达叛逆,并寻求“圆满的归宿”。其中,斯奈德的抵抗方式尤为独特,他以多元文化的融汇与众语喧哗的方式消解资本主义—基督教的文化统治。

斯奈德在《佛教与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写道:

佛教的欢喜、自愿的贫困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传统的无害与拒绝以任何形式进行生活的做法有了震撼整个国家的意义。坐禅静思,修行者只需要脚下的方寸之地。这样的修行扫除掉大众媒体与超市大学填进大脑中的大量垃圾,对于宁静、慷慨地实现爱之欲望的信念摧毁了那愚弄、残害与压抑的意识形态,也指出了通往社区的道路,这使得那些所谓的“伦理主义者”震惊,并将转变许许多多不能做爱人,只能做斗士的人们。(Earth House Hold 91)

在斯奈德看来,佛教欢喜自在、安贫乐道、与世无争,以及遁世隐居的修行方式和状态具有强烈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意义,也就是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反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立场,与资本主义为满足贪婪欲望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背道而驰。禅宗文化实际上喻示着新的存在方式,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方式。斯奈德进一步指出,“西方的拯救一直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而东方的拯救一直是以个体对本我空无本性的洞见的方式。我们两者都需要,它们都包含在成佛之路的传统三个方面之中:智慧、静思与伦理”(92)。

除了禅宗文化之外,斯奈德对印第安文化、印度文化、日本神道教文化、中国道家文化等多种基督教异质文化都有过一定程度的了解与探寻,其中尤以对印第安土著文化的见解为深。从这些文化形式中,斯奈德想要寻找古老的、质朴的、深刻的,尤其是与自然和谐为一的共有的文化

因子。他认为这些共性的存在是因为人类在史前文明期所发生的文化现实通过历史的河流遗传到了今天，并花开各处。但是这些优秀的传统随着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膨胀而被逐渐丢失、遗弃。故而在人类即将走入万劫不复的困境之时，重新发掘这些古老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就具有特别重大的紧迫性。斯奈德正是通过诗歌的方式重新彰显这些文化的共通性与独特性。在他的诗歌语境中，多种异质文化因子形成了多元文化融汇与众语喧哗。

从诗集《神话与文本》(*Myth and Texts*)开始，经由诸多诗集如《砌石与寒山诗》(*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僻壤》(*Back Country*)、《观浪》(*Regarding Waves*)等，直至《龟岛》(*Turtle Island*)、《山河无尽》等，多种异质文化在斯奈德的诗歌中融会贯通，众语喧哗。这些文化因子的共存并不是冲突性的，而是和谐统一于斯奈德的深层生态文化立场之中。在斯奈德的诗作中，可证实此观点的例子比比皆是，兹举两例为证。第一个例证为选自诗集《神话与文本》的第三部分“燃烧”的第六首诗。这首诗的诗眼在于斯奈德在诗中所引用的，贴在世界产业工会大厅里的警句“在旧社会的壳子里建构新社会”(Forming the New Society within the Shell of the Old) (*Myth and Texts* 40)。这也是“燃烧”部分的主旨所在——希望现代人类社会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凤凰涅槃，希望在资本主义—基督教统治的现代人类社会中孕育与突破，建构新的、理想的地球新家园，建设自然万物与人类和谐共存的美好家园。在这首诗的第三节，斯奈德写道：

菩提达摩一苇渡江
列宁乘坐密闭的火车穿过德国
玄奘穿过帕米尔高原
乔瑟夫，疯马正在高原上，
度过部落中最后三个饥饿的，
自由的冬天。
为自由奋战，反抗奴役与暴政——
孔夫子也处境艰难——
(幸而老子给予他鞭策)。

(*Myth and Texts* 40)

可见，这是斯奈德诗歌中典型的多元文化融汇与众语喧哗。多元是与单极相对立的，对多种异质文化的接受与认可。让多种文化在其诗作中共同发声，是对资本主义—基督教的权威统治与唯一神教话语权的挑战与颠覆。在这一节诗中所涉及的诸位文化斗士的共通之处即在于对暴政的顽强反抗，以及为传播普惠大众的佛法、实现儒家理想而付出的艰辛与坚持。在这些文化斗士中，菩提达摩与玄奘是传播佛法者，列宁是领导俄国人民反抗暴政者，乔瑟夫（即“疯马”）是带领印第安人反抗白人侵略的斗士，孔子是传播儒家思想者，老子是道家思想创始人，传说是孔子请教的对象。斯奈德在这首诗中将这文化斗士们汇聚一堂，以彰显他们共同的斗士精神。同时，这些斗士的壮举也是现代人类社会大众的文化参照。诗人意图鼓励现代人

民向这些斗士学习，在旧社会中破壳而出，建设新的、健康生态的人类家园。

在斯奈德的另一部诗集《观浪》中，有一首题为“燃烧的岛屿”（“Burning Island”）的诗作。在这首诗中，诗人向众神祈祷，希望他们应允他的诉求，将世界带到美好之境。其中第三节写道：

啊！天空之神！
你的车轮转动
自太平洋而出
呼唤暴风雨倾泻
在我们身上
又使光芒照耀
我们的木讷——
（今日刷出一道彩虹
在奶牛饮水槽，
又喷洒十万晶莹剔透之佛田
在手臂毛发之上！）
（*Regarding Waves* 23）

在这一节诗中，印第安文化与佛教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宏观到微观，共同创造出诗人祈求天空之神所创造的美好境界。诗中斯奈德信手拈来，从印第安文化与佛教文化中随意摘取，将自然之神性与毛发之上的不可思议之佛国自然结合，确实别开生面。

斯奈德对于异质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开放性的，是面对所有古老的文化形式敞开的。同时，多种异质文化在斯奈德的诗作中又能做到融会贯通。众多异质文化因子在斯奈德的指挥之下实现了多声部的合奏与共鸣。当众多文化之声在其作品中和谐共存，并激发出其文化能量时，斯奈德诗歌作品的后现代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大棕熊经》之新神话的建构及其他

斯奈德诗歌的后现代性还主要表现在他对新神话的创造与书写。从决绝式地断开与资本主义—基督教现代文明的联系开始，斯奈德经历了对佛教、禅宗等多种异质文化的参悟与融汇，并结合其深层生态主义文化立场，创造出全新的、具有强烈哲学意味的神话。这些新神话的启示性意义，主要在于其开启了人类文明新的可能。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人类文明已经走向穷途末路，如果不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一切都将在不远的未来灰飞烟灭，地球家园也将不复存在。如果回顾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古巴导弹危机，可以看到人类已经数次徘徊在覆没的边缘。斯奈德的《大棕熊经》另辟蹊径，从人与自然为一的哲学高度，从佛禅文化众生平等的宗教理念出发，以在北美印第安文化中备受尊崇的大棕熊之神为文化图

腾，从深层生态主义的角度引领地球文明走向新的路途。

众所周知，佛教经典中，并没有这样一部经书。《大棕熊经》实际上是斯奈德根据佛经的结构而自创的一部现代佛经。也可以说，这部佛经是斯奈德对佛教精神变异性、现代性的运用。

在《大棕熊经》的开篇，一亿五千万年以前，侏罗纪时代，大日如来为众生说法。这个“众生”包括所有站立的、行走的、飞行的，以及坐着的生物，甚至包括青草。他预言，在遥远的将来，将有一片名为美国的大陆。这片大陆上将会有瓦尔登湖、哥伦比亚河、密西西比河、大峡谷等著名的河流与峡谷。在那个时代，人类将陷入非常严重的困境，他们将不顾及自己的真如佛性而毁掉所有的事物。为了拯救遭受苦难的人类与自然，大日如来宣称，“在那未来，我将进入一个新的形式，去治愈这个无爱的世界。这世界以盲目的饥饿与莫名的愤怒到处追寻，吞进大量食物却无法饕足”（Snyder, *A Place in Space* 25）。大日如来现身的新形式正是一只大棕熊（Smokey the Bear）。这只大棕熊的形象很特别，他是一只漂亮的棕熊，后腿直立，这显示出他的清醒与警觉；他的右爪握着一把铲子，用以挖掘表象之下的真实，砍断无用的执着之根，铲起湿沙子以浇灭贪婪之火与战争。他的左爪摆出佛之手印，表示所有的生物都有充分享受生命的权利，不仅是如鹿、兔子、金花鼠、蛇、蜥蜴之类的所有动物，甚至如蒲公英这样的植物都在佛法的版图内生长。他穿着蓝色的工装裤，代表被现代文明所压迫的所有劳工与奴隶。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宽边帽，那是棕熊保护荒野的力量的象征。他的头顶后面罩着一圈神性的、烟与火的光环。他有着圆圆的肚子，这表明他善良的本性，也表明地球母亲能为爱她、信任她的所有生物提供充足的食物。斯奈德认为，棕熊将凭借自己的神力踩烂那些浪费的高速公路与无用的郊区，捣碎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害虫。成为棕熊佛的信奉者之后，信众们将不再被汽车、房子、罐装食品、大学、鞋子等事物困扰，他们将掌握身、言、意三玄，并能无畏地砍断现代美国的腐朽之树，将其残枝败叶付之一炬。对于阻碍他的人，棕熊佛将念起有神力的咒语，消灭他们。而他保护的是那些热爱林木与河流的人，各种神与动物、流浪汉与疯子、囚犯、病人、音乐家、放浪的女人，以及充满希望的孩子们。如果有信众受到商业广告、空气污染、警察的威胁，他们只需唱诵起棕熊佛的神力咒语，棕熊佛就会现身，用他的金刚铲消灭敌人（25-28）。

大棕熊佛的经祷为“我誓致力于无上金刚智慧，愿猛烈的愤怒被摧毁！”（I DEDICATE MYSELF TO THE UNIVERSAL DIAMOND—BE THIS RAGING FURY DESTROYED）而他的神力咒语为“淹死他们/摧毁他们！”（DROWN THEIR BUTTS / CRUSH THEIR BUTTS）在这部现代佛经的最后，斯奈德还敦促信众们经常吟诵这部佛经，并付诸实践，这样他们就能积累河沙功德，进而拯救地球，使之免于彻底被油污污染，也才能使人类社会进入人与自然的和谐之境，而所有的信众都将获得最高程度的悟入（25-28）。斯奈德写道：

吟诵这部佛经并将之实践者将积累无尽功德，如亚利桑那州与内华达州之沙数，
将帮助地球免于彻底的石油污染，

将进入人与自然的和谐时代，
将赢得男人、女人与野兽们的温柔之爱与关怀，
将常有黑莓食用，并有松树下阳光明媚处安坐

并且终将证得无上菩提

如是我闻。

(永远可以自由复制)

(Snyder, *A Place in Space* 28)

从更深的层面看，斯奈德的《大棕熊经》实际上明确了后现代重构中的神性护卫，奠定了其伦理基础。这一后现代再建构的人类社会主体形态是文化社群，如斯奈德所推崇的日本榕树精舍，或是斯奈德与诸位同道在内华达锡耶纳所建立的“奇奇地斯”文化社区。他认为后现代文化社区或社群的存在形态是代替资本主义—基督教文明框架下现代都市的最佳选择。德兰蒂 (Gerard Delanty) 认为，文化社区与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着深度的可连接性。他提出：“社群意味着‘接近性、统一性和地点’，[……] 一个关键的挑战是克服社群和社会，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由于我们正目睹社群在后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回归，这就显得尤为紧迫。” (169) 而在斯奈德的文化理论中，地点 (place) 正是融合了“接近性”“统一性”的核心理念。他所倡导的“重新定居”和生态社区都体现了这些主要特征。在《地点、地区与共有者》(“The Place, the Region, and the Commons”) 一文中，斯奈德提出，“我想谈论作为一种体验而存在的地点，并且提出人类真正‘生活于地点’的倡议，这就如同一个孩子自然生长，逐渐融入自然社区的过程一样”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25)。总体而言，斯奈德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缘概念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大棕熊神等自然之神所庇佑下的文化社群的集合与散布。在这些文化社群中，人类与自然众生和谐共处，相互关怀，充满温暖。

而且，斯奈德这种后现代性的创作手法在他的作品中广泛存在。兹另举斯奈德在诗集《神话与文本》的第三部分“燃烧”中的一首题为《阿弥陀佛之誓愿》(“Amitabha's vow”) 的诗为例。

在佛教文化语境中，阿弥陀佛又名为“无量佛”“无量光佛”“无量寿佛”。根据《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等佛经的记载，阿弥陀佛曾发四十八大誓愿，包括“国无恶道愿”“寿命无量愿”“光明无量愿”“照见十方愿”“三十二相愿”等。汉传佛教之阿弥陀佛常结与愿印，藏传佛教之阿弥陀佛常结弥陀定印。

在这首诗中，斯奈德将阿弥陀佛的弘大誓愿进行了后现代性的改写。他在诗中各节分别写道：

我若已证得无上菩提，然若我所居佛国有在漂泊途中被投入监狱者，我不取正觉。

[……]

我若已证得无上菩提，然若我所居佛国有因连接火车车厢失去手指者，我不取正觉

[……]

我若已证得无上菩提，然若我所居佛国有任何搭便车而不得者，我不取正觉。

(*Myth and Texts* 40)

可见，斯奈德将他对现代美国社会中青年一代的关注与同情写入阿弥陀佛的弘大誓愿，正是他作为一位后现代诗人的超越常规，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创作手法。这一做法与他所撰写的《大棕熊经》如出一辙，是将东西方文化融为一炉的创作方式。这些诗作将佛教文化引入诗歌，同时又以美国后现代社会的现实情境置入其中，从而形成东西方文化的共存与激荡，由此激发出独特的诗学张力。

此外，斯奈德所进行的解构之后的重构不止于此，他通过持续的诗歌创作与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的表达，提出了以生态家庭为基本单位，多个生态家庭组成生态社区，众多生态社区构成大型的生态区域，再由全球性的众多生态区域构成全地球的深层生态家园的社会政治理想。在这一理想社会中，民族国家的概念被完全打破，近现代以来发展出的诸多政治版图都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众生平等、从有情众生到无情存在都享有同等权利的大同社会。具体而言，斯奈德在日本修禅与工作期间，遇见了他未来的日本妻子上原雅，并很快生育两个孩子。对于斯奈德而言，习惯于漂泊的他由此开始经历充满爱的家庭生活。可爱的孩子、温暖的家庭、夫妻之爱与父母对孩子的爱深深地触动斯奈德的灵魂，促使他从生命的根本思考生命能量的转换、女性的力量，尤其是家庭的文化意义。斯奈德在家庭之爱中看到了可以抵抗资本主义—基督教现代文明的力量，家庭之爱与现代文明之自私、欲望之膨胀形成鲜明反差。在他的诗集《观浪》之中的许多诗作，如《今日之凯》(“Kai, Today”)、《凯哭时我为何笑》(“Why I laugh when Kai Cries”)、《不离开房子》(“Not Leaving the House”)等诗作中都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在《波浪》(“Wave”)、《种荚》(“Seed Pods”)、《沙》(“Sand”)等诗作中，斯奈德将万物都看作是大海之中的浪花一朵，生命之流的节点一个，从而将家庭之爱与他一直持有的深层文化立场结合起来。

此外，在与上原交往期间，斯奈德得以深入了解日本深层生态社区榕树精舍的生活。这一社区之中人们之间的相处方式、社区成员共同的生态性生活方式，尤其是榕树精舍的文化模式令他深感触动。在回到美国之后，他与家人、朋友一起建立起深层生态文化社区“奇奇地斯”，并极力推动以此类文化社区为单位所组成的生态区域的发展。

关于深层生态区域，有一个现在的行政区域的误区需要阐明。斯奈德认为，近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所划定的行政区域是人为的，是“政治司法行政辖区和纯经济化再现的非实体世界”(《禅定荒野》39)。由于这些行政区域以粗暴的，不尊重自然固有体系的方式而划定，这些人

为强加的边界就将原本古老而健康的生态区域割裂开来,而近现代以来人类在各区域之中修建的铁路、公路、水库、桥梁等建筑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生态,加剧了其严重后果,其结果就是“居住者失去了生态意识,丧失了群体凝聚力”(斯奈德,《禅定荒野》39)。关于生态区域的正确理解,斯奈德阐述道:“定义一个区域时,生物群、分水岭、地貌和海拔只是其中的某些方面。同样,文化区域也有它的子集,比如方言、宗教、各种放箭器、各类工具、神话主题、音阶、艺术风格。”(40)他认为,现代人类社会需要尊重自然之中千万年以来形成的生态区域,保护其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现代民族国家具有与生俱来的贪婪、动荡、无序与混乱,而且由于基督教一神论的深度影响,现代人类的哲学观带有强烈的统一性、普遍性和集权化倾向,因此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可想而知,即造成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结局,其最终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所以斯奈德积极提倡“深层生态思想”,他身体力行建立的“奇奇地斯”深层生态社区即是未来可以效仿的榜样。

总体而言,斯奈德不只是对资本主义—基督教文明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挑战与解构,还从思想和实践层面提出了建构性的文化策略。从这一思路出发,斯奈德在这一系列文学创作与文化倡导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诗学特性具有深刻的后现代性。

在中西文明史上,文学很多时候是政治的附庸。然而斯奈德显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先知与智者,应该对现实做尖锐、深刻、具体的批评,同时具备前瞻性的视野,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斯奈德诗歌的后现代文学秉性的最大意义正在于其解构与重新建构的过程。他的诗歌是断臂之痛后的重新生长,是刮骨疗毒后的英雄再出江湖。他的《大棕熊经》既创造了后现代性的新神话,又喻示了生态性人类社群社会的未来。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Delanty, Gerard.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Translated by Ruihua Li.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德兰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Hassan, Ihab. *The Postmodern Turn*. Translated by Xiangyu Liu.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15. [哈桑:《后现代转向》,刘象愚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Snyder, Gary. *Myth and Texts*. New Direction Publishing, 1960.
- . *Regarding Waves*. New Direction Publishing, 1967.
- . *Earth House Hold: Technical Notes and Queries to Follow Dharma Revolutionaries*. New Direction Publishing, 1969.
- .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North Point, 1990.
- . *A Place in Space: New and Selected Prose*. Counterpoint, 1995.
- .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Translated by Qionglin Tan and Deng Chen. Guangxi Normal UP, 2019. [斯奈德:《禅定荒野》,谭琼琳、陈登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马妮娅

FLC

翻译史研究

以译求同：麦都思对朱子理学中“理”的翻译^[1]

◎ 帅司阳

内容提要：“理”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概念，兼具世界本原、主宰力量、道德伦理等丰富内涵。由于理学长期被清代官方奉为正统，“理”也成为当时来华传教士研究中国思想的重点。1844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首次节译《御纂朱子全书》，发表于《中国丛报》。该译本不仅是朱子哲学著作英译的开端，更是朱子理学西传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本文从麦译本中对“理”这一关键词的翻译切入，将译本置于“译名之争”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并联系麦都思研究理学的轨迹和自身传教策略，分析他如何通过翻译改写“理”，并探究背后原因。

关键词：麦都思 理学 《御纂朱子全书》 传教士汉籍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19) 04-0053-16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中国 香港 999077

Title: Seeking Reconciliation through Translation: A Study on W. H. Medhurst's Translation of "Li (理)" in Cheng-Zhu Confucianism

Abstract: As the core concept in Lixue 理学 (or Cheng-Zhu Confucianism), Li 理 has all along been endowed with complicated meanings, signifying moral principles as well as the transcendent origin and governing power of the universe. It attracted scholarly attention of the westerners since early Qing period, when Lixue was established as the Chinese orthodoxy. In 1844, Walter Henry Medhurst, a British missionary in China, published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Yuzuan Zhuzi Quanshu* (*The Imperial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Xi*), which is the first ever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hu Xi's 朱熹 philosophical works. The translation's importance also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mposed a great influence on renowned sinologist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present paper, therefore, focuses on Medhurst's rewriting of Li in his translation. It combines textual and contextual analysis to reveal how and why the missionary-translator rewrites the concept.

Keywords: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eng-Zhu Confucianism, *Yuzuan Zhuzi Quanshu*, Missionary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uthor: Siyang Shuai,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在中国近代史上,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以创办墨海书馆、编写基督教《三字经》、参与委办本《圣经》翻译等事迹闻名,学者也多从这几方面对其进行研究^[2]。然而此外,麦都思还是一位多产的汉学译者,曾将多部中国经典译入英文,发表于1844年的《御纂朱子全书》节译本便是其中之一。

在清代,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御纂朱子全书》(以下简称《全书》)的出版标志着官方对其推崇达到极致(杨菁,《李光地与清初理学》161)。西方人对朱子的关注始于17世纪,朱子著作的英译则起于晚清。陈荣捷认为裨治文(E. C. Bridgman)于1849年发表的《全书》节译本是朱子著作英译的开端(《欧美之朱子学》1),学者多采用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早在1844年,麦都思便在当年的《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10、12期上发表了该书中《理气》章《总论》和《太极》两篇的译文^[3]。随后,该译稿又被卫三畏(S. W. Williams)收入其巨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之中(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550-52)。

麦译本在朱子理学英译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首先,该译本是朱子理学首次以原典直译的方式出现在英语世界,且依托报刊和专著,拥有大量读者;其次,译本对“理”这一关键概念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一反自耶稣会士以来对其批判排斥的惯例,试图通过翻译表明中国思想中也有自然神学的因素;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雅各(J. Legge)调和中西宗教的思想。可以说,该译本在朱子学西传的脉络上,不仅是一个开端,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值得细致分析。然而,现有研究却对该译本关注有限。近年来,学者开始注意到该译本,让其得以从历史尘埃中重见天日。但是,由于研究切入点不同,这些研究大都只对译本作简单描述,或以翻译批评的视角将其评之为“错误颇多”,而未梳理、分析其前后脉络(蔡慧清 117-28;赖文斌 67-71;龚道运 40-41),仍有很多在学术上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事实上,麦都思对“理”的翻译与当时传教士之间有关传教策略的分歧和《圣经》翻译等社会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本文尝试从麦都思对“理”的翻译切入,追溯其对“理”的研究,结合当时“译名之争”的历史语境考察其翻译动机,进而分析麦都思对“理”作了何种改写,最后,评估其在朱子学西传史上的历史意义。

一、“所以然之故,所当然之则”:理学之理

自《易传》以来,“理”一直被解释为“义理”和“秩序”。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开始将“理”重新阐释为“理则”或“宇宙本原”(陈荣捷,《宋明理学的概念和历史》147-49)。朱子继承二程的学说而扩大之,“理”从而有了兼具宇宙本体和道德伦理的丰富内涵。

朱子对“理”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所以然”和“所当然”的界定:

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当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四书或问》8)

在这段话中,朱子指出了“理”的两个方面。“所以然之故”是指万物存在原因和理则,是一种“存在之理”(牟宗三 82),而“所当然之则”是指世间的道德伦理的准则,或者称之为“道德之理”。

“存在之理”先于万物而存在,是使万物成为其物的本原,独一至高的“理”贯穿于万物之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朱熹,《朱子语类(二)》398);又通过万物展现出不同的形态,即所谓“理一分殊”。“存在之理”也常被用来解释古经中的“天”“帝”和“主宰”,视之为主宰和权威(《四书章句集注》65;《语类(一)》5)。学者认为这也使得“理”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神的色彩(庞景仁 9)。“道德之理”实际上源自“存在之理”,是它在人事上的一种体现(陈来,《宋明理学》169;陈佳铭 58)。作为“所当然之则”的“理”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仁义礼智信”等儒教伦理准则。简而言之,“理”是本体、规律和伦理准则的统一,是兼有宇宙起源、万物主宰性质的抽象存在。朱子认为“理”是无限、永恒、无所不在的至善。“理”同时兼有道德伦理的内涵,是道德准则的依据,能够决定命运,惩恶扬善。

与“理”关系最为切近的是“气”。“理”是形而上的本原,而“气”是形而下的质料。“理”虽然在宇宙论体系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不具有能动的作用(吾妻重二 128)。只有依附于“气”,借助“气”的运行,才能创设万物。这就是朱子所说的“人物之所生,理与气合也”(《语类(一)》65)。这是“理”与基督教中创世的至高神最为不同的地方,理气关联也成为日后传教士关注的焦点之一。

清初,程朱理学取得了正统地位,但此时关于“理”的讨论却渐渐褪去形而上的色彩。《全书》编者李光地晚年虽然独尊朱子(Ng 70-71),但对于其学说中的主次之序亦有自身的看法。他认为人事之道重于理气之学,因此,在编订《全书》时,一反常例地没有将《理气》等章节放在卷首,而是代之以《论学》《治道》等(李光地 1-2)。这一点也与康熙帝的主张相合(杨菁,《清初理学思想研究》21-22, 29)。可见此时官方理学已慢慢冷落宇宙论方面的探讨。而到麦都思生活的时代,更多学者转向经学考据,很少再就“存在之理”生发出新的理论^[4]。也正因如此,朱子有关“存在之理”的学说渐渐成为不争的共识,在学者的冷落中渐渐固化。而这一方面,却正好是来华传教士们的研究重点所在。

二、从语言外壳到思想内核: 麦都思早期对“理”的研究

麦都思对于“理”的关注一开始便与“译名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译名问题”即是如何翻译《圣经》中的God的问题。1814年,马礼逊(R. Morrison)出版了《新约》的首个中文译本,其中他主要以“神”来翻译God;米怜(W. Milne)东来后,两人合力翻译《旧约》,却在译名上出现了分歧。米怜认为“上帝”是更好的选择,并列出了9条理由(Milne, “Chinese Term” 99; 103-104)。

麦都思自1817年抵达马六甲起,便在米怜的指导下学习中文。米怜的影响^[5]加上自身

早期传教碰壁经历,使其倾向于以语言适应的方式缓和传教中的中西冲突。因此,他也认为“上帝”是更好的译名选择。1834年,马礼逊过世后,麦都思与郭实猎(K. Gutzlaff)等人着手修订中文《圣经》,并于1836年完成。同年,麦都思返英休假,期间携修订本向英国圣经公会申请印刷经费,引发一场风波,最终未能如愿。本文无意考察这场风波本身,因为风波的中心在于差会政治,与本文主题并无直接关联^[6]。不过,本文要指出的是,在这次事件中,差会内部就“译名问题”对麦都思的批评却促使其开始研究理学。

1836年10月,麦都思向圣经公会提交报告,在其中正式提出要以“上帝”取代“神”来翻译God。他指出“上帝”出自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中国人对其有至高的敬畏,与God的地位类似。而“神”“神天”“神主”这些词在典籍中难寻踪迹,是不利于读者接受的(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0)。随后,又大费篇幅分别从字词、语法和修辞的角度说明中西语言差异巨大,因此面向中国的《圣经》必须要适应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习惯(2, 7-9)。这引来了新加坡传教士台约尔(S. Dyer)和伊文思(J. Evans)的批评,二人认为他在《圣经》译本中加强中国经典的话语和词汇,而使之丧失了原文的神圣内涵(48)。而麦都思却回信说宁可将这当做赞美,这说明译文足够地道(50)。

可见此时,麦都思眼中的“译名问题”不过是简单的语言问题。他认为要将God译入中文,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造一新词,要么在中文里寻找一个能够表达其内涵,又适合其地位的词汇,而后者无疑更好(10)。至于这些名词在中文经籍中有何内涵,是否在思想层面与基督教真的契合,他没有再深入考察,只是反复强调语言层面的模仿和适应。

1836年底,圣经公会致信伦敦会,请其另觅人手对修订版本进行细致考察,再尝试修订(55)。同年,伦敦大学学院汉学教授修德(S. Kidd)受托向差会提交评估报告。报告中,他从中国思想的层面批评麦都思的译名主张,其中便论及“理”与“上帝”的关系。他写道:

“上帝”和“天”一样,在注释中被解释为“理”,即一种理则。“理”散布于物质宇宙间,它又是“太极”的另种表达,指万物的源头[……]仅仅是原始物质的内在规律(81)。

引文中,修德点明“帝”和“理”之间的同义关系,要以“上帝”作为译名,就必须弄清楚“理”是什么。而在他看来,“理”仅是事物内在的规律,虽然具有“世界起源”的内涵,但没有任何智性和权威。他表示,“上帝”只不过是这一抽象理则的人格化而已,因此不适于来表达God(83)。

在朱子的学说中,“理”和“天”“帝”确有等义关系。《朱子语类》里有这样一段记载:门人问“上帝降伸于民”“天将降大任于人”等经文中的“上帝”“天”是否指茫茫苍天上真主宰者执掌万物。朱子回答:“只是理如此”(《语类(一)》5),也就是说古经中所说的“上帝”和“天”其实是抽象的“理”。此外,朱子亦有“天即理也”(《章句》65)和“帝是理为主”(《语

类(一)》5)的说法,以“理”来解释“帝”。而“理”和God确有不同,修德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对给了麦都思一针见血的批评。

对于修德的批评,麦都思没有进一步的回应。然而,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关键。相反,他这时应该已经对“理”展开了研究。因为他在1838年出版的《中国:现状与展望》(*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一书中便论及“理”的内涵。而该书的实际写作时间正是1837年前后!麦都思还在序文中表示:原计划只是将自己在沿海航行的日志出版,但在英国的种种境遇使他认为有必要在增加更多有关中国的信息(*China v-vi*)^[7]。他所说“在英国的境遇”之中必定包括《圣经》修订方案被驳回这一件大事。而修德的批评更是直接让麦都思明白,要解决“译名问题”就不可能回避理学思想。因此可以说,麦都思对“理”的关注正是在这场风波中,由修德的批评激起的波澜。

在《中国》一书中,麦都思将“理”作为中国“国教”的宇宙论概念来讨论。他选择从宇宙论而非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层面切入“理”体现了他的出发点仍是“译名问题”。他写道:“中国哲学家总是提到一种至高原则,这一原则制约着整个宇宙”(China 156),承认“理”的无上性和作为世界本原的地位。他进一步分析:

“理”是一种普遍原则,与万物同在[……]几乎等同于欧洲人所说的永恒内在形式;它是非物质的,形而上的。它没有形体,但却是一种组织万物的原则,寄寓在物质之中,并被认为是物质的本原。(159)

引文中所提到的“内在形式”(essential form)^[8]最初出自柏拉图的学说。柏拉图认为“内在形式”是最高本原,是事物具有某种本性和特点的原因和目的(姚介厚 587)。“内在形式”是先在、纯粹的,也是不变、不可感的。柏拉图宇宙论思想与基督教关系密切,其《提迈欧篇》(*Timaeus*)被基督教早期神学家用作解释创世的重要经典。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十七八世纪的剑桥柏拉图学派。而据他们解释,上帝是至高的“太一”(The One),而“内在形式”则相当于“神心灵中的概念”,或者“上帝的意志”(the Mind of God),由上帝而生,与上帝同在(Patrides 3; 姚介厚 1096)。

麦都思将“理”与“内在形式”相类比,无疑是想在“理”和God之间寻找某种共通性。这在他的《华英词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中也得到印证,词典中,“理”对应的解释之一是:“Providence”,即神启、上帝(560)。麦都思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人对宇宙的至高主宰有所认识,并且以之为尊”(China 156)。

然而,麦都思也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他在下文中笔锋一转,写道:

“理”最终是与物质相连的,无法脱离物质而存在,中国宇宙论既以它作为基础,那么这整个系统就成了唯物论。(159)

如前文所述,朱子认为“理”与“气”共同创设世界,因而“理气不离”,即二者只在逻辑上有先后顺序,实际上则是一体不分的(钱穆,《朱子新学案》258-60;陈荣捷,《宋明理学的概念与历史》149)。虽然“理”是万物产生的依据和本原,却又“只是个洁净空阔底世界”(朱熹,《语类(一)》3),它寄寓在物质的“气”之中,并“搭于气而行”(《语类(六)》2376)。离开了“气”的“理”本身是不能造作的,这无疑是“理”与上帝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上帝是可以独力创造的,而“理”则不行。麦都思据此认为“理”与物质关联密切,将理学判定为唯物论。

以上分析可见,麦都思这时对“理”的研究是试图在“存在之理”和God之间寻找某种共性,这种尝试可能是修德批评引发的思考。从这些有关“理”的文字中,我们读出一种矛盾的心态:麦都思一方面看到“理”与基督教的上帝存在共通之处;一方面又认为“理”与物质关系密切,跟基督教背道而驰。最后,这一次寻找共性的尝试还是失败了,“理”与God确是二物。但麦都思也在紧接着的下一段表示,如果能够避免物质主义方面的误解,“上帝”仍是目前可用的译名中最好的选择(*China* 159)。

综上,麦都思早期对“理”的关注因“译名问题”而起,在1836年的中文《圣经》修订风波中,修德的批评使他不得不从语言层面转而关注字词背后的思想内涵,试图在“理”和上帝之间寻找共通的可能,最后发现这难以做到。然而,麦都思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译名主张。相反,这一次失败的尝试成为他研究理学的转折点和英译《全书》的前奏:自此以后,他在传教中对于中国传统的调和不再仅停留在语言层面,而开始在更深的思想领域中寻找调和中西的方案。也正是这一转变为其英译《全书》中有关理气论的章节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以翻译回应论争:“译名之争”与麦都思对“理”的翻译

时隔三年,随着口岸的开放,来华差会日增,马译《圣经》越发不适应传教的需求,甚至出现了不同地区传教士各自使用不同版本《圣经》的情况(Bridgman, “The Doings of the Committee of Delegates” 387-88)。于是,修订中文《圣经》再一次被提上了议程。1843年8月,由裨治文牵头,各口岸的传教士代表在香港集会,决定要修订出统一的中文《圣经》。会上,麦都思以“上帝”为译名的主张遭到裨治文和文惠廉(J. W. Boone)等人的反对。后者认为中国人是唯物论者,遂主张排除中国宗教、哲学的因素,仅以“神”来翻译(Bridgman, “Review of Longdon’s Account” 564; “Revision of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163)。对此麦都思的回应是,中国人并非对上帝和自然神论一无所知,典籍中的“上帝”一词可用(Medhurst, *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Chinese* iv)。由此可见,争论的核心其实在于中国思想中是否存在上帝的观念,是否能够与基督教教义相通。会上,两派没有谈拢,于是决定译名留空,先各自研究,待定稿时再论(Bridgman, “Meeting in Hong Kong” 553)。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译名之争”。

现有研究将委办本“译名之争”的起始点定于1847年,因为这年教士代表来到上海,展

开集中讨论。然而,1843到1847年间,两派传教士并非不发一言。事实上,自离开香港后,裨治文等便纷纷发文,批评“上帝”一词与“天”“理”等中国本土的概念有着同义关系,难免带上迷信崇拜的色彩。即使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无法分清“上帝”和“天”“理”等概念,“上帝”一词是不利于教义传播的(Bridgman, “Review” 564; Lowrie 559)。另一方,麦都思于1844年5月初抵上海后,因形势不明朗,担心遭到居民抵制,更加坚定了避免冲突的策略(“Medhurst to Tidman, 1 May 1844”)。这也促使他更加坚持采用“上帝”作为God的译名,以彰显中西思想的共通之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麦都思于同年10、12月号的《中国丛报》上发表了《全书》的节译本,选译了其中有关“理”的内容。虽然译本发表时并未强调是为“译名问题”而作,但种种迹象均可表明,麦都思选择在这时发表《全书》译本正是为了回应有关“译名问题”的争论。

首先,“神派”传教士频频提到“理”与“上帝”一词的关系,又有1836年被修德批评的经历在先,使麦都思深知理学与“译名问题”的关联。他同时强调朱子思想的权威地位,并在多处表示,“译名问题”的解决必须“参考中国的典籍,尤其是以朱夫子为代表的儒教典籍”(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Chinese iii, iv, 162; “An Inquiry” 126)。由此可见,译本显然是为探讨“译名问题”服务的,只是没有挑明罢了。而在私下,麦都思也对自己的翻译动机直言不讳。1849年6月,他致信伦敦会秘书泰德曼(A. Tidman),报告译名之争的进展。在这封信里,他特别提到翻译这些“御纂书籍”的作用:

我们从中国皇家御纂的书籍中选译出版了这些文章,并附加了评论。您一读便会知道,这极大地强化了我们立场。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必须做好准备,面对这些来自中国最伟大哲学著作中的铁证。(“Medhurst to Tidman, 30 Jun. 1849”)

麦都思虽然没有在信里写明这些“御纂的书籍”是哪些书,但以《全书》的地位,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应该包括在内。可以说,这封信也是麦都思翻译《全书》动机的一个明证,表明他选译《全书》的确是为了借助中国经典的翻译来为自身的译名主张提供支撑。

如前文所述,“译名之争”的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中国正统思想的理学是否能够与基督教义相通。而麦都思翻译《全书》的出发点即是对两者进行调和,以回应“神派”传教士的批评。这在翻译中主要通过节选文本和文内改写来完成。

(一) 作为翻译策略的节译

《全书》共66卷^[9],其中专论“理”的有《理气》、《性理》二章。前者主要从宇宙观层面解释万物存在的依据和运行的规律;后者则关注宇宙论落实到人生观和道德哲学上的心性论学说^[10]。麦都思仅选译了《理气一》中的《总论》和《太极》两篇,而没有译出该章中的另外两篇:《天地》和《阴阳、五行、四时》。此外,《性理》也没有得到翻译。

麦都思选译《理气》章是很容易理解的。如前所述,麦都思 1838 年便注意到理气论,并视之为中国正统的宇宙观。再者,《理气》涉及中国人关于“创世”和“主宰”的观念,关乎“译名问题”的关键。从内容上看,朱子的理气论认为宇宙存在之前,先有超越物质的至高主宰和本原“理”。同时,“理”又作为理据和规律贯彻于万物之中,这与基督教思想中某些概念有相似之处 (Morrison at al. 146-49; Medhurst, *China* viii)。因此,选译该章有利于缓和理学与基督教思想之间的冲突。然而,麦都思在《理气》章内亦有取舍,《天地》等两篇被删去了。考察被删去的两篇内容,便可发现麦都思的选篇策略与其翻译动机之间的密切关联。

如前所述,朱子的宇宙观中“理”和“气”虽有先后,但实际上是一体两分,缺一不可,各有作用(《语类(一)》4)。《理气》章正是根据这一思路进行编排的。《理气一》共有四篇,前两篇关注的是宇宙本体,故多讨论“理”作为世界本原和主导地位;后两篇则关注自然的运行,故而以“气”的功用为中心。这一区别也体现在内容分布上,以《总论》和《天地》两篇为例,前者收录朱子语录或书信 31 条,每条都谈及“理”。而后者收录语录、书信 38 条(朱熹、李光地 1-8),其中只有 7 条谈及“理”,而其余 31 条多讨论“气”在天地生成和运转中的角色(朱熹、李光地 19-28)。

在麦都思的眼中,“气”即是物质(*China* 166; “Philosophical Opinions of Chufutsz on Immaterial Principle” 552; *A Dissertation on the Theology of Chinese* 12),《天地》等两篇集中讨论“气”的功用,在他看来有唯物论的倾向。事实上,他早期否定“理”与基督教思想的共通的原因正在于此。而节译的取舍也正体现了他有意回避这种唯物论解读的可能。

如果说《天地》等两篇是因为重点在于“气”而被删去,那么同样以“理”为主的《性理》章未选入译本则是因为其与麦都思信奉的教义存在根本冲突。

《性理》开篇便提到“性即理也”(朱熹、李光地 1),将“理”解释为人天性的本原。朱子认为人物之性是秉受自天理,是纯粹的善;而气质(或者气禀)的清浊造成了善恶之分。人可以通过道德修养来改变气质,恢复原本的至善之性,从而实现成圣的终极目标(陈来,《宋明理学》176)。而麦都思所信奉的基督教则主张人来到世上便背负着原罪。他在自己撰写的《论罪恶祈祷第五式文》中明确写道“[人]自生出世,就有偏性,向善不向善”(《论罪恶祈祷第五式文(手稿)》1),点明了这一点。其次,朱子认为可以通过一套“修养工夫”,达到成圣的终极理想。而麦都思所信奉的加尔文宗则坚持“因信称义”的教义,认为人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得到救赎。两种体系之间的差异触及教义根本,使得调和两者变得十分困难。麦都思将该章排除在选译内容之外,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翻译朱子的动机,在于宣扬自己的调和立场,对于中西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量隐藏。

以上分析表明,麦都思对原文本的选择极具倾向性。经过筛选,节译本一方面尽可能遮蔽了“理”在道德哲学上的内涵,另一方便凸出了“理”在宇宙创设和万物运转中的主导作用,为译文内对“理”进行基督教化改写铺平了道路。

(二) 对“理”的基督教化改写

在译文中, 麦都思一般采用 principle 或 immaterial principle 来翻译“理”。这并非他首创, 马礼逊和米怜早年介绍“理”时便用过这个词。不过, 麦都思亦非简单照搬前人译词, 而是根据其在文本中出现的情境搭配不同的术语, 对其内涵予以新的诠释。这些诠释处处都回想着“译名之争”中两派传教士围绕“理”而发生的分歧: 其一, 作为宇宙本原的“天理”与“上帝”的关系, 即“理”在创世中的角色是否符合基督教的创世说; 其二, 作为人事规律和原则的“理”是否具有神性, 符合基督教的伦理。

首先, 传教士有关“理”的争论的一大焦点便是理学的宇宙观是否与基督教创世说相违背。如前所述, 在朱子认为“天理”是唯一的终极本原^[11]; 在基督教中, 这一地位只属于上帝, 而两者属性并不完全一致: “理”不能主动创造, 也没有明确的人格属性。“神派”传教士正是凭借这一点来批评“理”只是没有人格的理则, 与之同义的“上帝”绝不能准确传达 God 的内涵 (Boone, “Defense (1)” 365, 368)。

麦都思在《中国》中已经明确了两者的差别。此时, 他转变思路, 指出“理”与“帝”并非同一物; “理”应该是“帝”用以创造和主宰的工具, 而“帝”才是 God。这一主张的出发点是要消解“理”在宇宙论中的至高性, 以调和理学宇宙观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矛盾。麦都思这一思想倾向亦贯彻于他对《全书》的翻译之中。在译本中, 他将“理”由世界本原改写为至高神的仆从。而他对“上帝”一词的翻译始终是 Supreme Ruler 或 Supreme Being, 区别于“理”的 World Soul 和 principle of fitness, 由此将“理”与“上帝”区分开来 (“An Inquiry (1)” 109; “An Inquiry (2)” 162; “Reply” 696); 同时把“上帝”摆到了理学宇宙论的顶端。如在翻译到“先有个天理, 却有气” (朱熹、李光地 1)、“本只是一太极” (10) 等讨论世界起源的句段时, 对于作为世界本原的“天理”或其同义词“太极”^[12], 麦都思在译文中先列出中文“天理”及译词 celestial principle, 紧跟着又以小括号加注的方式将其与基督教神学中 Soul of the Universe 和 Anima Mundi (宇宙灵魂)^[13] 二词一一对应 (“Philosophical Opinions of Chufutcz on Immaterial principle” 554; “Philosophical Opinions of Chufutcz on Tai Kih” 661)。

在目前所见的资料中, 麦都思并没有留下针对“宇宙灵魂”的专门论述。这与他的知识背景有关: 他在来华前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或神学训练, 仅上过四年文法学校, 并在哈克尼神学院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他的神学知识除从小在教会中习得的教义之外, 大多来自于一位名叫派史密斯 (J. Pye-Smith) 的神学教授。因其曾受教于派史密斯, 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多处引用派史密斯的著作, 显然对后者学说十分认同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63; Medhurst, “An Inquiry (1)” 106-107; “Reply (2)” 546 etc.)。因此, 可以借派史密斯的著作来侧面考察麦都思对“宇宙灵魂”的认识。

派史密斯在其课堂讲义集中多次谈到“宇宙灵魂”, 在他的解释中, 创造世界的上帝是独立存在的至高神; “内在形式”则是“至高神的思想”, 和“宇宙灵魂”一样是由至高神派生而来。“宇宙灵魂”则散布于万物之中, 是宇宙的生命力所在, 又是维持世界运行的理性原则。派史

密斯更将其比作“神的管家”(Pye-Smith 209-10),学者亦指出可以将其理解为至高神创造和管理世界的中介(Dockrill 59)。

从这个在内涵出发进行对比,可以说“宇宙灵魂”与“理”确有类似之处。二者都是无限的、无所不在的,是理性的原则。然而与前引原文中的终极本原“天理”之间不同的是,派史密斯和麦都思眼中的“宇宙灵魂”作为至高神的“管家”,具有能动性。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眼中,“宇宙灵魂”并非世界的本原,而是至高神手中的工具。麦都思在翻译中着力凸显两者的散布于万物之中的相似性,他在译文的脚注中写道,“这种观念[理和太极]是一种古老的神学理念,它像一个圆环,中心不知所在,而圆边无处不在”(“Philosophical Opinions of Chufutsz on Immaterial Principle” 554)。

而在自己的中文著作中,麦都思则称“上帝”是“不在万物当中,不与宇宙相杂”的纯灵(尚德者,《天理要论全编》9),是“高于天、厚于地”的“万理之本”(尚德者,《真理通道》1),印证了他译文中的立场。他以“宇宙灵魂”来翻译“理”,着重突出了两者的相似之处,而略过了两者差异。从而解决了理学宇宙论与创世说之间的一大矛盾,并将“理”归化到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之内,同时便于他宣称中国人认识到上帝的主张。

除本原和规律的一面外,“理”亦具有伦理规范的内涵。但如前文所述,朱子认为具体的道德准则源自“天理”,而没有提及上帝在道德伦理领域的存在和作用,这也曾引致传教士的批评,被作为中国人没有上帝观念的证据(Bridgman, “Santsze King” 118; “Heaou King” 353)。

麦都思所选译的《理气一·总论》虽然以宇宙论的讨论为主,但也有少数地方提到“理”作为道德准则的一面。如下一句就是如此:

气则为金木水火,理则为仁义礼智。(朱熹、李光地 1)

在这一句中,朱子指出“理”即是“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准则。而在翻译中,麦都思采取了增译的手段,以基督教伦理的术语来解释“理”在人事道德层面的意涵:

Primary matter is in fact the four element of metal, wood, water and fire, while the immaterial principle is no other than the four cardinal virtues of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and wisdom. (“Philosophical Opinion of Chufutsz on Immaterial Principle” 552)

很明显,虽然译文中“理”的译词没有改变,但在“仁义礼智”前却增译了four cardinal virtues,即“四枢德”一词。“四枢德”是基督教的伦理德性中基本的一类,是所有伦理的总纲(白舍克 384-85),和“超性美德”(Theological virtues)一样都是由上帝赐予人类,它们可以引导人们走向上帝,得到救赎(Wawrykow 387)。麦都思在译文中插入这一术语来定义“理”的译词,

实际上拓宽了这一译词的内涵，将伦理层面的“理”与基督教伦理联系起来。使儒教的伦理不可避免地上帝之间产生了关联。甚至在他的进一步阐述下，上帝成为了儒教伦理的来源。

麦都思在讨论中指出，朱子所说“以理为主，则此心虚明”中“以理为主”是以“理”指引自身行为，规范身心（“Reply (2)” 545-46）。他又称朱子以“帝是理为主”一句表示，此“理”正是上帝用以规范世人的工具（《天理要论全编》91；《真理通道》102）^[14]。言下之意，无非理学所主张的道德伦理正是由“上帝”而来，而理学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这从他所写的祈祷文中也能窥见一斑。他在《论十诫祈祷第三式文》中写道：“多蒙上帝赐我律法教我为善避恶，皆依天理”（《论十诫祈祷第三式文（手稿）》1）；又在《论仁爱祈祷第四式文》中说：“万仁之本、诸爱之源者，上帝乎。求以仁爱之理教我”（《论仁爱第三式文（手稿）》1）。认为儒教的仁爱之道、为善避恶之理都来自上帝的教导，“古之圣人”乃是“凭圣神感动而言也”（《真理通道》84）。如此解读便呼应了他认为理学中存在自然神学因素的观点，同时亦表明理学中的“帝”是“理”的根源，能够传达基督教至高神的内涵，以此回应“神派”传教士的批评。

综上所述，借助对“理”的改写，麦都思回应了“译名之争”中各方传教士针对“理”的两大分歧。他以从属于基督教至高神的“宇宙灵魂”对应“天理”，将“理”与“上帝”由同义变为从属关系。从而调和了理学宇宙观和基督教创世说之间的冲突，以此回应了“神派”传教士以“理”无法等同于God为由反对“上帝”成为译名的论点。其次，麦都思通过翻译为道德层面的“理”蒙上自然神学和基督教伦理的色彩，以此证明中国思想与自然神论并不相悖，因此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一词是可以用来翻译God的。总的来看，麦都思的译本中“理”被呈现为源自上帝，且为上帝所用的工具和理则。经由翻译，麦都思一方面对理学进行了改造，将上帝写入了理学的体系；另一方面，理学的术语也大量进入了他的《圣经》译本和中文教义著作，这亦体现出麦都思试图通过翻译在基督教和中国思想之间架设一道“以译求同”的桥梁。

四、承前启后：麦都思译本在理学西传史上的意义

如前文所述，麦都思虽然将朱子理学著作译入英文虽属首次，但他并非第一个关注理学的西方人。传教士研究理学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只有少数成果进入了英语世界。耶稣会士的作品在欧洲大陆或许有过很大影响，但在英语世界却少有人阅读。据米怜的说法，耶稣会士的作品大多数以外语写成，且篇幅冗长，加上高昂的定价使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即使有几部译成英文，也少人问津。只有一个例外，那便是杜赫德（J.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Milne, *A Retrospect* 45）。《全志》于1735年出版，次年译入英文，并多次再版（Britton 10；Williams, “List of Works Upon China” 417）。直到19世纪初，仍是英语世界少数有关中国的参考书。杜赫德在书中也有专章讨论朱子的理气论，他认为“理”是夹杂在物质中没有生命和智性的能量和伦理规矩，并批评宋儒以玄虚诡辩的言辞混淆了古代儒教里纯粹信仰（53-54）。杜赫德又在文中特别说明，真正的学者都追求古经原本，并不采

用宋儒的注释(56)。

米怜本人和马礼逊早年出于翻译圣经目的,而研究了“理”“气”“太极”等一系列概念,于1819年发表于《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他们采取与耶稣会士不同的立场,将这些概念与基督教神学的概念进行对比,试图寻求共性。但同样得出了“理”具有唯物论色彩的结论,将其排斥在了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之外(Morrison at al. 146-47)。他们的结论在1840年前的英文汉学著作中被不断复述,如德庇时(J. F. Davis)将“理”称为“宋代兴起的物质主义教条”(Davis 63, 64-66),修德认为“理”只是抽象的内在理则等(Kidd, *China or Illustrations* 145, 149)。

以上可知,长久以来,英语世界有关“理”的论述大多是将其作为基督教的对立面进行批判。19世纪初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虽然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思路,但却延续了这一立场。而麦都思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立场,即重点凸出理学与基督教的共通之处,缓和两者之间的冲突。这也是麦都思与其前辈最不同的地方。换言之,麦都思和马礼逊等人通过对比式的研究,都看到了中西思想之间存在差异,也有着不少共同点。马礼逊等人选择突出差异,而麦都思则选择突出共同点。正是这一立场上的细微差别,导致了他们对于“理”不同的解读和呈现。这一立场的差别,或可归因于他们所面临的处境的不同。马礼逊和米怜早年因禁教政策,困于广州、南洋,与中国民众的接触极为有限;而麦都思进入中国时,教禁已然开始松弛,他亦多有机会在中国内地活动;加上他自身早年传教碰壁的经验,使他能够更加深切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状况,尤其是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抵制心态。其次,麦都思还要面对中国开放后各大差会相互竞争的局面,这也使他更倾向于寻找新的传教思路,而非固守传统的途径。

麦都思对“理”的阐释在19世纪初期和声甚寡,甚至遭到不少批评。但却对日后的汉学大家理雅各产生了影响。1850年,理雅各出版《论上帝中文译名的信》(*Letters on Rendering Go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在该书扉页的献词中他将此书献给麦都思,以表达对其“深深的敬仰”,并感谢他在这一论题上的“深刻研究和启发”(i)。1852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人对上帝和神灵的观念》(*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一书,同样是对儒教中的宗教因素进行探讨。以上二书中,理雅各都引用麦都思的观点和文字,认为儒教与基督教并非不可两立(Legge, *Letters* 33; *The Notions* 19, 51, 99, 154 etc.)。在儒经翻译方面,他于1861年出版闻名于世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选译了四书等经典。在四书,尤其是《论语》的译本中,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大多数译者一样采用张居正的注本,而是完整地翻译了朱子的注释,并与之进行宗教对话。在该书中,他将“理”翻译成principle of Heaven,认为“理”是神圣主宰手中超越万物的理则。他指出这意味着朱子“承认存在一位全知至善的至高主宰”(The Chinese Classics 23),称朱子是一位“真正的有神论者”(The Notions 17),这些都与麦都思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脉络上看,麦都思对朱子的翻译确有其开拓意义。他首次以调和的态度来看待理学思想,通过翻译使其摆脱了与基督教思想体系彼此排斥、非黑即白的状况。这种立场为理雅各所继承并进一步发挥,并通过后者广泛的影响力,使得中

西教会通的取向在 19 世纪下半叶渐渐成为一股潮流。

综上,本文考察了麦都思对朱子理学中“理”的翻译和诠释,并将其置于朱子学西传的历史脉络上评估其意义。本文认为,麦都思对“理”的认识和研究从始至终都与其对“译名问题”的思索纠缠在一起。他早期从语言层面的适应思路出发,主张“上帝”为译名。遭到修德批评后,转而关注语言背后的思想。在委办本“译名之争”中,他以翻译《全书》来回应争论。并通过筛选原文和文内改写的方式对“理”的内涵进行了改写,以证明理学与基督教并非无法和谐共生。麦都思的做法可谓是“以译求同”,即通过翻译在两种有差异的思想体系中寻找同一性和会通两者的可能。

麦都思对“理”的翻译在理学西传的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意义,亦凸显了传教士汉学这条悠久传统中的传承和断裂:麦都思继承了前辈中西对比的视角,同时又因面临不同的历史局势而生发出了新的观点和立场,从而为后辈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是 19 世纪传教士翻译史、汉学史上一个显著的案例。

通过分析麦都思《全书》节译本中对“理”的翻译和改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宗教、思想、历史等多种因素的互动。宗教传播是麦都思翻译的首要驱动力,而他自身调和中西的传教思路则为翻译中的改写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译名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催化下,麦都思通过翻译对“理”做了自然神学化的改写,呈现出与主流理解不同的理学概念。与此同时,“理”和“上帝”等儒教词汇也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麦都思的基督教中文写作之中。从该个案中,我们可以一窥 19 世纪在华传教士汉籍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但在于外部历史因素的影响,更在于翻译内部中西思想的碰撞与交织。而这样的文化相遇又对中西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带来了怎样的后续影响?这或许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

注释 [Notes]

- [1] 本文撰写、修改过程中得益于王宏志教授、苏精教授和黄克武教授的指导与帮助。文章初稿又曾宣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主办的“第九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青年学者研讨会”,幸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何光沪教授及与会学友指正,特此谢忱。
- [2] 代表性研究请参见:J. K. Leonard, “W. H. Medhurst: Rewriting the Missionary Message.”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Writings*, edited by J. K. Fairbank and S. W. Barnett, Harvard UP, 1985, pp. 47-60; 邹振环:《麦都思及其早期中文史地著述》,载《复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 年第 5 期,第 99-107 页;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4,第 73-200 页等。
- [3] 该译本发表时,并未注明译者,只写“Furnished by a Correspondent”,因而难以考证。但是在卫三畏所编的《中国丛报》索引中,明确注明了译者为麦都思。参见 S. W. Williams, *General Index of Subjects Contained in the Twenty Volumes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Tokyo: Maruzen, 1851.
- [4] 在这方面戴震是一个例外,他认为气才是宇宙的本体;对朱子的理气论大加攻伐。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然而,传教士关注的似乎更多是官方尊崇的宇宙论,并没有论及戴震的学说。这一方面可能因为传教士接触到的书籍有限,另一方面,传教士出于传教的合法性考虑,因此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已经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思想上。
- [5] 麦都思曾在马六甲传教士开办的中文学校教授米怜编纂的《幼学浅解问答》,该书模仿中文蒙学经典的风格写成,麦都思认为效果很好;他后来编写的基督教《三字经》、《福音调和》等书籍都是采取这种方式,他也曾坦承是学自米怜(Medhurst, *China* 252; 苏精,《铸以代刻》188)。

- [6] 关于这场争议,苏精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但其重点在于麦都思与差会弟兄之间的人事纠纷,与本文主旨无关。加上修德对麦都思有关译名的批评发表于圣经公会的决议之后,便没有纳入细致考察范围。参见苏精:《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载《编译论丛》2012年第1期,第1-41页。
- [7] 从书的目录中也可以看出,航行日志的内容仅仅占6章(第15-21章),而有关中国宗教和思想的内容(第8章)显然是在英国时添加上去的。
- [8] 在一些中文哲学著作中有时也译为“原型”“永恒模型”等(姚介厚 576)。
- [9] 麦都思没有明言自己选用的原文版本,但以他的藏书目录手稿中所写的书名、册数对比当时已有的几个版本,可以推测他用的是1713年武英殿印行的渊鉴斋本,故而文本分析均在此本基础上进行。(详见:澳洲国立图书馆:《墨海老人藏书目录(手稿)》,2)
- [10] 钱穆认为朱子思想最主要分为“理气论”和“心性论”,以前者主要讨论宇宙界的问题,后者主要讨论人生界的问题;陈来等学者则将朱子的思想体系分为“理气论”“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也有将其三分为“宇宙论”“心体论”和“人极论”的划分;但无论是“格物致知”还是“工夫”都是达到完善个人道德修养,实现成圣的终极目的,归根结底是“心性论”的延伸,因此本文采用钱穆的分类法。参见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32页;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第10页;陈翊湛:《朱子哲学的体系》。香港:龄记书店,1960,第2-3页。
- [11] 朱子理学中的“理”是一个分层级的概念,由低至高,首先万物存在的根源是各自的“理”,万物的运行亦有各自的“分理”,或“一物所具之理”。而要论及世界的起源,则万物有着共同的本原,即“天理”,或称为“天下公共之理”,与“太极”同义。相关讨论参看陈佳铭:《朱子理气论在儒家形上体系中的定位问题》,第62-67页。“神派”传教士批判理学与基督教创世说不符,所针对也是最高“天理”这一层面;故而重点处理麦都思对“天理”的翻译。
- [12] 在朱子的宇宙论中,“理”和“太极”的意义有所重叠。“理”是事物的本原,每一件事物都有其自身对应的“理”,而至高无上的“天理”是万物所共有的,这一层次的“理”被称为“太极”。如朱子曾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语类·理气上》),又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周子之书》)。在朱子讨论宇宙论的语句中,“太极”和“理”同义互用的例子有很多。如:“太极只是一个理字”(《语类·理气上》)、“太极理也”(《语类·周子之书》)、“必有所以动静之理,是则所谓太极者也”(《文集·答杨子直》)(朱熹《语类(一)》,1,2;《语类(六)》,2375,2376;《朱子文集(五)》2009)。
- [13] Anima Mundi是World Soul的拉丁文写法,Anima对应Soul;Mundi对应World,两词同义。参见当时的词典词条:R. Ainsworth, et 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and Latin Vol. II*. Charles Rivington and William Woodfall, 1773, pp. 37, 390; D. C. Yogue, *A Phraseological Latin-English Dictionary Part II*. Richard Bentley, 1856, pp. 32, 325.
- [14] 类似提法还有很多处,如麦都思所作《天理要论》中写道:“上帝为万人之主宰,有赐个律法,以条理人行。”《真理通道》中亦有“敬爱上帝者,五常之理,必不见缺”,等等(尚德者,《天理要论全编》91;《真理通道》102)。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zuma, Juji. *New Studies on Zhu Xi: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Thinking in Early Modern Times*. Translated by Xihong Fu, et al.,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傅锡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Boone, W. J. "Defense of an Essay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9, no. 7, 1850, pp. 345-85.
- Bridgman, E. C. "Santsze King, or Trimetrical Classic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3, 1835, pp. 105-18.
- . "Heaou King or Filial Du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4, 1835, pp. 345-53.
- . "Meeting in Hong Kong for Revising the Bible in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no. 8, 1843, pp. 551-53.
- . "Review of Longdon's Account of Dunn's Museu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no. 11, 1843, pp. 561-82.
- .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and Remarks on the Words for God, Father, Son, Spirit, Soul, Prophet, Baptism and Sabbat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no. 4, 1846, pp. 161-65.
- . "The Doings of the Committee of Delegat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no. 7, 1849, pp. 387-88.
- Britton, R.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Kelly & Walsh, 1933.
- Cai, Huiqing.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理 in the 19th Century."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o. 1, 2016, pp. 117-28. [蔡慧清:《19世纪“理”概念英译的实践和演进》,载《中国哲学史》2016年

第1期,第117-28页。]

- Chan, Wing-Tsit. "Studies on Zhu Xi in Europe and Americ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31, 1974, pp. 1-23. [陈荣捷:《欧美之朱子学》,载《华学月刊》1974年第31期,第1-23页。]
- . *The History and Concepts of Neo-Confucianism*. Academia Sinica, 1996. [陈荣捷:《宋明理学之概念与历史》。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史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
- Chen, Chia-Ming. *On the Position of Zhu Xi's Li-Qi System in the Confucian Metaphysics*. Dis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6. [陈佳铭:《朱子理气论在儒家形上体系中的定位问题》。博士学位论文,国立政治大学,2006。]
- Chen, Lai.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y*. Liaoning Education, 1992. [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 Ch'ien, Mu. *A New Study on Zhu Xi*. Jiu Zhou, 2011. [钱穆:《朱子新学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Davis, J. F.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2*. C. Knight & Co., 1836.
- Du halde, J.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the Third)*. Translated by Richard Brookes John Watts, 1741.
- Dockrill, D. W. "The Heritage of Patristic Platonism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Philosophical Theology." *The Cambridge Platonists in Philosophical Context: Politics, Metaphysics and Religion*, edited by G. A. J. Rogers, et a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 pp. 55-77.
- Keong, Tow-Yung.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19th Century: A Study on W. H. Medhurst 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Part 2)." *Journal of New Asia Institute*, no. 1, 2007, pp. 40-41. [龚道运:《基督教和儒教在19世纪的接触:基督教入南洋和中国先驱麦都思研究(下)》,载《新亚学报》2007年第1期,第40-41页。]
- Kidd, S. *China, or Illustration of Symbols, Philosophy, Antiquities, Customs, Superstitions, Laws,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Tylor & Walton, 1841.
- Lai, Wenbin. "A Discussion on the Earliest Transl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to the West." *Shanghai Journal of Translation*, no. 3, 2016, pp. 67-71. [赖文斌:《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首次翻译》,载《上海翻译》2016年第3期,第67-71页。]
- Legge, J. *Letters on Rendering Go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Hong Kong Register Office, 1850.
- .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 Hong Kong Register Office, 1852.
- Li, Guangdi. "Explanatory Notes." *Imperial Yuan Jian Zhai Edition of Complete Works of Zhu Xi*, edited by Li Guangdi. Special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University Library of CUHK, pp. 1-4. [李光地:《凡例》,载李光地等编《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香港中文大学古籍特藏,第1-4页。]
-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edito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New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37.
- Lowrie, W. M. "The Land of Sinim, or a Survey of Christian Missions to Chinese (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no. 11, 1844, pp. 578-603.
- Medhurst, W. H.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John Snow, 1839.
- .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Parapatian, 1842.
- . "Philosophical Opinions of Chufutz on the Immaterial Principle and Primary Matter."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no. 10, 1844, pp. 552-59.
- . *A Complete Edition of Essentials in Christianity*.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44. [尚德者:《天理要论全编》。上海:墨海书馆,1844。]
- .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ity*.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45. [尚德者:《真理通道》。上海:墨海书馆,1845。]
- . "Philosophical Opinions of Chufutz regarding Tai kih, or the great extreme, of the Chines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no. 12, 1844, pp. 609-19.
- . "Medhurst to Tidman, 1 May 1844." CWM/LMS Archives. Central China.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Box 1.
- . *A Dissertation on Chinese Theology*.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47.
- . "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 into Chinese Language (1)."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no. 3, 1848, pp. 105-33.
- . "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2)."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no. 4, 1848, pp. 161-87.
- . "Reply to the Essay of Dr. Boone on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3)."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no. 12, 1848, pp. 601-46.
- . "Medhurst to Tidman, 30 Jun. 1849." CWM/LMS Archives. Central China.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Box 1.
- Milne, W.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The Anglo-Chinese, 1820.

- . “Chinese Term to Express Deity.”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vol. 3, no. 16, 1821, pp. 97-105.
- Morrison, R., and M. Milne. “Chinese Metaphysics.”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vol. 2, no. 9, 1819, pp. 146-49.
- Mou, Tsung-San. *On Mind and Nature Vol. 1*. Chung Cheng, 1996.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台北:中正书局, 1996。]
- Ng, On-Cho. *Cheng-Zhu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Qing: Li Guangdi (1642-1718) and Qing Learning*. State U of New York P, 2001, pp. 70-71.
- Patrides, C. A. *The Cambridge Platonists*. Edward Arnold, 1969.
- Pang, Jingren. *A Study on Nicolas Malebranche's Notion of "God" and Zhu Xi's idea of "Li"*. Translated by Jun Fe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庞景仁:《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 冯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 Perceke, K. *Christliche Ethik Vol. 1*. Translated by Ye Jing, et al. Joint Publishing, 2002. [白舍克:《基督宗教伦理学(第一卷)》, 静也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Pye-Smith, J. *First Lin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Form of a Syllabus, Prepared for the Us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Old College, Homerton*. Jackson and Walford, 1854.
- Wawrykow, J. P. “The Theological Virtues.” *Oxford Handbook of Aquinas*, edited by B. Davis, et al., Oxford UP, 2012, pp. 287-88.
- Williams, S. W. “List of Works upon China, Principally in English and Frenc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no. 8, 1849, pp. 402-43.
- . *The Middle Kingdom*. John Wiley & Sons, 1871.
- Yang, Ching. *Li Guangdi and Neo-Confucianism in Early Qing Period*. Huamulan, 2008. [杨菁:《李光地与清初理学》。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08。]
- . *A Study on Neo-Confucianism in Early Qing Period*. Li Ren, 2008. [杨菁:《清初理学思想研究》。台北:里仁书局, 2008。]
- Yao, Jiehou.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the West Vol. 2 (Part 2)*. Phoenix, 2004. [姚介厚:《西方哲学史·第二卷》(下)。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4。]
- Zhu, Xi, and Guangdi Li, et al. *Imperial Yuan Jian Zhai Edition of Complete Works of Zhu Xi*. Special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University Library of CUHK. [朱熹、李光地等:《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
- Zhu, Xi. *The Four Books Annotated*.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8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 *Collected Works of Zhu Xi Vol. 5*. Rudolf Steiner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0. [朱熹:《朱子文集(第五册)》。台北:德福教育基金会, 2000。]
- . *Reflections on The Four Books*. Shanghai Classics, 2001. [朱熹:《四书或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 *Collected Sayings of Zhu Xi Vol. 1, 2, 5, 6*. Zhong Hua Book Company, 2007. [朱熹:《朱子语类(第一、二、五、六册)》。北京:中华书局, 2007。]
-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The Fifth Prayer on Original Sin (Manuscript).” nla.gov.au/nla.obj-46642728/view?partId=nla.obj-46642731. [澳洲国立图书馆:《论罪恶祈祷第五式文(手稿)》, nla.gov.au/nla.obj-46642728/view?partId=nla.obj-46642731。]
- . “The Tenth Prayer on Ten Commandments (Manuscript).” nla.gov.au/nla.obj-46642728/view?partId=nla.obj-46642731. [澳洲国立图书馆:《论十诫祈祷第三式文(手稿)》, nla.gov.au/nla.obj-46642728/view?partId=nla.obj-46642731。]
- . “The Forth Prayer on God's Love (Manuscript).” nla.gov.au/nla.obj-46642728/view?partId=nla.obj-46642731 Accessed on 10 Oct. 2017. [澳洲国立图书馆:《论仁爱祈祷第四式文(手稿)》, nla.gov.au/nla.obj-46642728/view?partId=nla.obj-46642731。]

◇责任编辑:马纳克

《岩窟王》翻译文本的接受与影响研究

◎ 禹玲

内容提要: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在清末民初时期有多个中文译本。论文选取1914年至1915年连载于四川文艺副刊《娱闲录》上的《岩窟王》(即《基督山伯爵》)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文本的翻译特征、读者接受以及翻译对于译者创作小说《松冈小史》影响等问题。文章期待透过该案例研究,厘清《岩窟王》翻译活动与当时社会、文化大背景的种种牵涉,尽量还原早期中国内陆地区对于西方小说接受的历史真实场境,以启发当下国外文学作品译介的思考。

关键词: 《岩窟王》 翻译特征 《松冈小史》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4-0069-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湖湘翻译家与中国思想现代化研究(1840—1949)” (16BYY019);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重点项目“湘籍翻译家与中国近代化研究”(15A068)

作者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Title: Study on the Acceptabil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Gankutsuou*

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emerged plenty of Chinese versions of *Le Comte de Monte Cristo*, a novel by French novelist Alexandre Dumas. Taking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Gankutsuou* (*Le Comte de Monte Cristo*) serialized in Sichuan literary supplement *The Record of Recreation and Leisure* from 1914 to 1915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trans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vel, reader's acceptance, and in particular, the influence on the creative translation of *General History of Matsuoka*. Through this case study, the paper expects to comb out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then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volved,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complicated moods in the acceptance of western novels in early Chinese mainland.

Keywords: *Gankutsuou*, translation characteristics, *General History of Matsuoka*

Author: Ling Yu,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China.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Le Comte de Monte-Cristo)从1902年至1914年能够收集到的中文译本共五种,其中一种是连载于文艺副刊《娱闲录》上的《岩窟王》。1914年7月创刊的《娱闲录》为半月刊,是《四川公报》的增刊。《娱闲录》的出现,代表着近代四川报刊中有了专门的文艺副刊,该刊物一方面注重大众阅读兴味,另一方面宣扬新派思想。1914年7月至1915年9月的《娱闲录》上,连载了长篇小说译作《岩窟王》。目前能够查证的《岩窟王》译本共26期,缺第2卷3号一期。《岩窟王》从《基督山伯爵》的一个日文版本,即黑岩泪香(くろいわるいころ)发表于明治38年(1905年)的《巖窟王:史外史伝》(共4册280章)转译而来。中文译本共有100章,相当于日文版本129章内容。如根据法文原版117章的内容而言,则仅翻译出法文原著第1章到第48章的内容。本文期望在译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译者确定翻译策略的缘由;探讨译本在副刊发展过程中是否有所作用,以及是否存在对于译者的影响。如果发生了作用和影响,那么这些作用和影响又具备何种意义?

一、《岩窟王》译者及转译版本情况

《娱闲录》连载长篇小说译作《岩窟王》,该译作标明是法国岳珂著,毋我口译,觉奴笔述。觉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长子刘鹏年。刘鹏年在光绪十五年生于北京绳匠胡同,幼时与弟弟凤年受教于父。1898年,父亲刘光第与谭嗣同、杨锐、林旭等六人因“戊戌政变”殉国后,他随家人扶棺柩返乡。此后,他先后到宗叔刘举臣和刘庆堂家中读书。1901年,刘鹏年和弟弟到其父生前好友赵熙和周孝怀所主持的泸州川南经纬学堂就读。周孝怀为鹏年取名长述,弟弟凤年取名孝述,希望他们继承父志。1903年刘长述由刘光第的挚友乔树楠接至北京湘学堂读书。1905年,从北京湘学堂转四川高等学堂读书。1906年,刘长述加入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盟员。可惜的是,刘长述于1918年因病逝世,年仅三十岁。

刘长述自幼受父亲思想、道德熏陶,关心国家大事,很有奋发图强的志气。他长于文学,赵熙在《刘大夫传》中曾说:子三,长鹏年,与文事绝精悍^[1]。这里鹏年即为长述。刘长述在成长过程中受父亲好友关怀和提携,同盟会员的指教,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和爱国激情。1905年刘长述取笔名为“先觉奴”,并作一篇《“先觉奴”释名》的文章,全文如下:

先觉奴,喟然叹!奴隶已非奴,奴隶之奴,何以视息于天地!彼洋人奴隶满清,汉族又为满人奴,天乎!皇汉之裔,曷为而至此乎!?血气之伦,孰能忍须臾之命,甘为奴之奴而恬然寝食?曷兴乎,皇汉之胄!倾吾人之血汗,以淹没奴人者,一转念耳!先觉奴,人呼我愤!呼我者,宁不勃然怒!卒然起!我知毁灭强横者有日矣!(张颖震、张壮年210)

从刘长述《释名》一文中,可以知道其笔名的含义是相当深刻的,它一方面体现出忧国忧民

的爱国之情,另一方面也对国家面临满汉冲突、外来侵略的危机局面表达出深切关注。

1906年,刘长述为了响应同盟会的盟员深入民间的号召,弃学回到家乡富顺赵化镇,筹办了“半日工读学堂”,即私立赵化镇半日学堂。刘长述为半日学堂拟定的宗旨是:“启发民智,爱国爱乡,学习科学,锻炼身体,半日作工,半日读书,便利工农子弟。”(刘海声 70)他还写了一篇《告父老兄弟书》和“招生广告”同时贴出:

敬告故乡父老兄弟:洋人侵袭我国,瓜分之祸日急,血气之伦,谁不痛愤!缅思救亡,惟有富国强兵。富强之基,首在振兴教育,开展民智,学科学,兴实业,练体魄,使我四万万,人人有志有能,然后能上下一心,团结御侮。民智不开,心志不齐,实业不振,国我无关,亿兆涣散,是今日贫弱之原!国之不存,家于何有?奴隶之祸,谁能甘心!必具爱国之热诚,然后有视死如归之战士,然后有忠勤尽瘁之士大夫,然后能四民无荒,人效其谋,人尽其力,慑强寇于四邻,安兆庶于衽席,宁非盛事!爱集同人,兴办半日小学,挥发爱国热情,树立富强之基;昔日本维新,法报德仇,皆自小学教育始,愿我乡人子弟,踊跃就学,工读兼顾,便利殊多,实深企望!(70-72)

从《“先觉奴”释名》到《告父老兄弟书》,已经可以看出,充满爱国激情的刘长述已经决定投身到救国救民的队伍中,他的思想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一致的。

1911年四川同盟会趁全川保路运动的契机,借保路名义,鼓动四川人民革命。刘长述与同盟成员朱国琛、杨允公一起撰写了《川人自保商榷书》,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散发,激起全川保路同志军武装反清,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辛亥革命后,刘长述主要在成都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成为了一名著名记者和作家,他的文学活动在成都颇有影响。

“从1912年至1918年期间,只要知道当时成都事情的人,可说很多人都知道刘觉奴(即长述)、吴虞(爱智)、方觚斋、李老懒(劫人)、曾安素(孝谷)、李哲生、胡安澜、何雨神(与宸)这几位记者先生的。其中吴虞、李哲生以政论著称,曾安素以艺术著称,而刘长述和李劫人则以小说著称。”刘长述十多万字的小说《松冈小史》,1915年出版,吴虞作序,在成都可以说是风靡一时,广受读者好评^[2]。

目前可以确定的刘长述的翻译作品为8种,创作为58种(禹玲 153-58)。他的代表作为《松冈小史》、《记大刀王五》、《贤庸传》等。就现在译作目录整理情况,刘长述是以《娱闲录》为作品发表主阵地的,在第7期《娱闲录》的“本录主撰者”一栏中刊登有刘的照片。

毋我这位口译者目前查证不到太多资料,不过相关线索显示了几点情况。首先是他应该去过日本,《娱闲录》第4册第66页刊有“毋我词稿”,其中一首《满江红》的题目下标明:“庚戌生日,客日本子焉,寡俦酤酒独酌,感而赋此。”同页另外一首《减字木兰花》中第一句为“扶桑小院,细雨轻寒人意倦”前一首词很明确说是庚戌年,即1910年的生日是在日本一个人过的,

第二首词提及的“扶桑小院”，也很可能是在描述日本居所处的情形，因为当时有把日本称为扶桑国的说法。笔者认为，正是有过居留日本的经验，所以毋我能够承担日文版本的口译工作。此外，毋我也是《娱闲录》的主撰者之一，在第7期的《娱闲录》“本录主撰者”一栏中同样刊发有他的照片。

毋我目前可以查证的翻译作品有10种，创作有72种（禹玲158-65）。与觉奴一样，毋我的译作也主要刊发在《娱闲录》上。不过毋我和觉奴不同，觉奴是集中精力在小说的创作和翻译，毋我译作涉猎的范围很广，除不同类型的长篇和短篇小说翻译外，他还翻译时事、杂俎、奇闻异事等，另外还有创作短篇小说、笔记、诗词等。

整体而言，刘长述是一位有着爱国激情的作家，他在翻译活动中所起的作用集中在对合译者口述文字的整理和润饰，目前为止没有查证到他进行外语学习情况的确切资料，尤其是依据可以核查的翻译目录，他没有单独译过小说，基本上与毋我合译^[3]。毋我有着比较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功底，他的日语水平应该不错，这从中文译本《岩窟王》与日文版本的对照可以看出。笔者推测，他很可能也承担了《娱闲录》部分的编辑工作，因为在《吴虞日记》（上册）中，樊孔周给吴虞的书信中提及了该事（吴虞230）；另外毋我在《娱闲录》中刊发的作品并非单一类型写作，他的活动涉及不同文类的翻译，如小说、新闻、奇闻轶事等；创作上有小说、诗词、杂文等，其中如《益智集》、《异闻集》等，类似于刊物补白性质。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刊物投稿作者那么简单。

迄今为止，毋我口译，觉奴笔述的译作《岩窟王》可以查证文本的共有26期（即《娱闲录》1914年7月的第1期第1卷1号至1915年9月的第2卷2号，缺第2卷3号），包括中文译本100章，相当于日文版本前129章的内容。如果以法文原著章节内容对照，则相当于法文原著1-48章的内容。

日文版本的译者为黑岩泪香，黑岩泪香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报人、评论家、翻译家。黑岩在大阪英语学校毕业，27岁时做《都新闻》主笔，30岁时创刊《万朝报》。这位大众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出版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在19世纪最后十年间，开创了日本“意译”的先河和后人所称的“泪香类作品”时代。《明治·大正的翻译史》里评论其翻译活动说：“由于黑岩泪香的译作以大众为目标，不将原作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仅将其梗概以近乎翻案的大胆手法翻译成为一种兴趣本位倾向的读物，所以一经问世，就迎合了大众热望已久的需求，从而形成了欢迎‘泪香类作品’的热潮。”（吉武好孝178-79）评论家白石实三（よしただけ よしのり）明确指出黑岩泪香的译作有着民族化的特征，是“十二分消化原作后，作为创作而再现的东西。不以文字为主以人情为主进行描写，无论何处描写都力图使日本人容易接近，容易理解和容易记忆”（751）。中江兆民（なかえ ちょうみん）曾说：“黑岩泪香的小说，很值得看。我没有读过黑岩泪香所翻译的原著，想来可能是大加删节过的，然而绝对不露痕迹，其剪裁的巧妙，恐怕也不是他人所能够赶得上的”（40）。黑岩泪香的翻译活动的确具有大众化、日本化、进行删改的特征。黑岩泪香的《岩窟王：史外史伝》（共4册）于1906年出版，

他的日文版本共有 280 章, 已经完成了《基督山伯爵》的全部内容。不过这个译本经过了删减和改动, 它删改的内容在于人物心理活动描写、人物形象描写、景物描写或者说种种场景描写等。但小说整体情节, 发展关键线索和主要人物活动、对话是基本保留的^[4]。

二、《岩窟王》翻译文本特征

母我和觉奴根据日文版本翻译时, 基本上是依照黑岩泪香的译本进行。只是他们的翻译活动带有自身的三点特征。第一是他们将所有日文人名都进行中国化, 这种中国化的人名与日文版本中的人名目前没有发现有任何关联性。如主人公方伟(日文名: 团友太郎 だんとも たろう)(现译名^[5]: 爱德蒙·唐泰斯); 船主人李洋(日文名: 森江氏 もりえし)(现译名: 莫雷尔); 意大利神甫梁谷(日文名: 梁谷 はりや)(现译名: 法里亚神甫); 航船会计员尤金(日文名: 段倉 だんくら)(现译名: 唐格拉尔); 方伟未婚妻玛依(日文名: 露子 おつゆ)(现译名: 梅尔塞苔丝); 裁缝开文(日文名: 毛太郎次 けたろうじ)(现译名: 卡德鲁斯); 方伟未婚妻的追求者也是堂兄貌(日文名: 次郎 じろう)(现译名: 费尔南); 代理检察官胥庐弥(日文名: 蛭峰 ひるみね)(现译名: 德·维尔福)。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界, 将译文中的地名、人名都中国化处理是很普遍的现象, 这是关照到受众的理解和接受问题。《岩窟王》的两位译者当然需要考量《娱闲录》的读者接受, 尤其该杂志是在四川刊发, 并非处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开放地区, 读者对西方小说的阅读和理解是相当有限的。母我、觉奴两位译者应当是根据自身了解的情况采用了人名中国化的处理, 不过他们并没有大刀阔斧地将日文版本中的西方地名也改变过来, 相比较晚清最初一批倾向于译文完全中国化的翻译风气, 他们的翻译策略还是有所区别。

第二是母我和觉奴对译文中相关内容以括号方式进行注释。注释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对国外不同国情和风俗习惯的解释, 如第四章方伟的未婚妻玛依的堂兄貌向玛依求婚, 并说玛依的母亲临终前已经许可了他们的婚事。关于堂兄妹之间的婚姻, 译者的注释写到: “此种风俗, 欧美习之, 不以为怪。以吾国礼视之, 则灭伦也。”第八章中有“继挝门者三而入”, 译者在“继挝门者三”后注释说, 这种入室敲门的行为是“欧洲入室之礼”; 第十五章, 法国路易十八大发雷霆, 因为军务大臣没有在第一时间将拿破仑归国消息确认, 他说“设彼有使用电报之权, 则四日以前朕即知横领者之密谋”, 译者在“使用电报之权”注释说: “是时, 法电报仅政府有使用之权, 故云。”^[6]

然后是针对译文的相关情节进行说明, 如第十九章代理检察官的父亲谈及拿破仑给他密信时, 译者在注释中写到: “第一章巴黎号之滞爱耳巴一日, 良非无故。”这就帮助读者理解小说开头, 为什么死去的老船长一定要求方伟去爱耳巴岛的真正原因, 即取回拿破仑给代理检察官父亲的信件; 第二十一章译者在结尾写“此章及次章为全书之关键”, 因为译者认为第二十一和第二二章节内容很重要, 所以在翻译时, 尽量按照日文版本忠实译出, 以免读者遗

漏关键情节，影响后续情节理解。

最后是评论小说译文不同人物，如在不同章节对胥庐弥表面君子，背地恶棍形象的揭露和讽刺。第十九章胥庐弥见到久未谋面的父亲说的是：“阿父来何事？”译者批评说：久别见父之言乃如是，其心行可知。实际上就胥庐弥来讲，他根本不愿见到父亲，急于要撇清两者的关系，唯恐父亲耽误了他的政治前途。就译者而言，这种行为是不敬不孝，有违中国人德行。第二十章胥庐弥欺骗特意来为主人公方伟求情获释的船主说：“足下之事，敢不尽力？”译者在后写：“诚妙于言语者。”译者认为，他明明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将方伟囚禁终生，还能够讲出如此欺骗的话语，实在是太过阴险，所以赞其很会说话来进行讽刺。第十五章结尾处写：“胥庐弥欲毁方伟所持之书，而以释放愚之求伯爵之书，而以利动之，其譎诈过於尤金也。”胥庐弥即为维护父亲而陷害小说主人公方伟的代理检察官，这里译者简单综述了章节大意，并特意强调胥庐弥是四个陷害者中最狡猾奸诈的人，能够体现出译者本身道德价值观的一种取向。

整体而言，中文版本里的注释起到了对异国风土人情的讲解作用，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异质文化；同时，注释中对小说情节的总结和提示，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读者对该长篇译作的连载产生更大兴趣，保持阅读；最后就是译者在注释中对人物评价，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文化修养而体现出的是非判断。

翻译本的第三个特征是中文版本在日文版本基础上进行了再次的删改，中文版本 100 章的内容，相当于日文版本前 129 章。中文版本删改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人物心理活动描写、人物形象描写、景物描写或者说种种场景描写等，这其实和日文版本根据英文版本转译时删改的方向基本一致。我们可以将觉奴、毋我描写方伟未婚妻玛依相貌的文字和日文版及现在的韩沪麟版（据法文原著译）比较。

觉奴、毋我译文：村固多美女，然以巴黎号船副方伟之未婚妻玛依为尤美。彼美方于其室，临窗而缀线物。其年则十七八岁之间，面椭圆而莹如脂玉，其心所蓄之情似可激之于目荡为情波，目尤媚秀，唇赤如染浓朱，发黑如中国之人，其美色嫣态，固非吾文可况者。（《娱闲录》第 3 期）

黑岩译文：西过風の非常な美人が、何其一例だらう、年は十七か八、圓みの有るうたかな顔に、心の波動が一映つて現はれる鏡の様な清い眼、其れに所謂る丹花の唇は、真に書にも無い程の愛らしさである。（黑岩泪香译《巖窟王：史外史伝》第 2 册，32）（日文译为中文：西过风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有多美呢？年龄大约十七、八岁，有圆润的脸庞，一双清澈的眼眸映射出其内心的波动，如花一般娇艳的红唇，真令人神往。）^[7]

韩沪麟译本：一位年青貌美的姑娘倚靠在一块板壁上站着，她的头发像煤玉般乌黑发亮，睫毛浓密，一双大眼睛像羚羊眼睛似的温柔，她纤细而具有古典美的手指间正揉着一株无辜的欧石南，她摘着花朵，残花碎枝已经撒了一地；她的手臂裸

露到手肘处，棕色的臂膀仿佛是照阿尔的维纳斯女神的模样复制的，此时因内心的焦躁不安而微微颤动着；她的一只柔韧的、绷成弓形的脚拍打着地面，让人能窥见她那套着蓝灰边的红色棉纱长袜的线条优美、丰满肉感的小腿。（大仲马，《基督山伯爵》16）

上文三段外貌描写，觉奴版本和黑岩版本相比照，觉奴版本的女子是有着东方女性之美的，如皮肤“莹如脂玉”“唇赤如染浓朱”“发黑如中国之人”，该女子之美，文字无法描述，即“其美色嫣态，固非吾文可况者”。前两段译文都强调了女性之美，不过觉奴版本将中国人自己的审美观添加进了译文，迎合了中文读者的欣赏习惯。当然前两个译本和现在根据法文译成的中文本内容相比，就只能说前两者的译文是一种取其概要的翻译方法了。

通过上文中、日版本比照可以看出，毋我口译，觉奴笔述的《岩窟王》是在黑岩泪香版本基础上，采用了情节删减，部分内容表述中国化的方法翻译而成的。实际上，日译文首先在英语版本的基础上对人物心理活动描写、人物形象描写、景物描写或者说种种场景描写等方面删改，而后中译文又在日文版本的基础上再次对相同的几个方面进行删减。但不论是日文本还是中文本，他们都基本保留了小说整体情节，关键线索和主要人物活动以及对话，因此刊发在《娱闲录》上的《岩窟王》100 章节的内容，清楚描述出了《基督山伯爵》前 48 章内容的，即主人公爱德蒙·唐泰斯被陷害入狱，坐牢，逃脱，获宝，报恩，然后为自己的复仇行动一步一步做好准备工作的情节。

三、《岩窟王》翻译目的

那么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岩窟王》为什么能够持续从第一期杂志刊发到最后一期，即第二十七期^[8]。这是《娱闲录》中唯一每期连载的西方译作，也是唯一每期连载的小说，《娱闲录》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部长篇译作呢？该译作在期刊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呢？实际上，当时要在一本刊物上长期进行西方小说的连载并非易事，一是在于译者是否可以坚持进行翻译，二是读者是否能够顺利接受，三是当时杂志的刊发受限于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等多种因素，它通常不会随意就选定一部小说长期连载。

毋我和觉奴对《岩窟王》的翻译一直没有中断过，那么他们究竟是推崇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还是认为该小说很具有社会价值呢？抑或还有其他的理由和原因呢？民国初年时，译者对译作的定位通常可以从译作里面寻找到线索，也有译者将观点单独写在“译者言”或“译者述”中的。不过似乎有点反常的是，目前为止，都没有能够找到毋我和觉奴对《岩窟王》的相关评价，仅在译本中以注释方式对人物有过少许讨论。如果说这两位译者本身没有写评论的习惯，当然就能够理解这种现象，不过他们刊发在《娱闲录》上的其他译作和创作，大部分都有评论。这些评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针对作品刊发动机和目的进行简单说明。

如第二期《娱闲录》毋我和觉奴合译的印度神话《刺玛王》之前就有一行小字：“印度古文学中有诗史曰：《刺玛雅那都》，六万余行，备极雄奇。兹译其事，以供好奇者之览焉。”该句话就很清楚介绍了译文的背景，同时说明译书目的在于满足读者的好奇心。

第二是将作品内容和现实联系进行评论。如觉奴在其社会小说《官话》的结尾写道：“觉奴曰：王者设稗官以采巷语街谈，意深迢矣。治百里而有千里之听，不蔽于远也。父今古之官，不必胥如所述。然尧舜之盛，犹有四凶，是望贤有司明以察之而已。且吾见一警务长者，家固寒微，而鲜衣健仆，至五六人，妇佣称之，与卒庖夫，一宅喧然，是可怪也。”（觉奴，《译者言》7）觉奴由感叹古代王朝对于官员的监督，再联系当下，指出为官者表面清明，实则腐化，却没有任何监管的乱象。再如，毋我在其侠情小说《秋田艳子》文后写：“毋我曰：婚姻之道，自由尚矣。艳子之于宜甫，相处三年，得悉其人之概，为好男子。芳心默许，始用其情愫，固女子求偶之至，然尚不知其家之有妻也。况夫相遇于陌路，仅耳目之知，其几何不惧失身之痛哉，夫世之非婚姻自由者，或亦以为将陷世间好女子之终生也，非艳子之一询，则二人将有无穷之戚，呜呼，难言矣。”（10）该段话实际是评论当时婚姻自由的呼声。还有毋我和觉奴译《亡指谈》（军事小说）的结尾有一段“译者言”说：德之败法，日之戕俄，固非一时士气激昂可以济也。要在有以教养之者，且其国民不必入伍而后知兵，即于学校莫不有军人之神概焉。小学以强其躯，中学则示以兵法，故国人皆兵。若吾国则学校课表中仅有体操二字备名而已（毋我、觉奴，第四册《译者言》28）。译者认为，德国和日本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贯彻军事教育的方法很是值得中国教育界思考和借鉴的，而当时中国初等和高等教育都没有把军事教育贯穿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的意识。

第三是就译文或作品内容进行更深入的论述。如在第三册《娱闲录》中，毋我和觉奴合译的侦探小说“俄罗斯之参赞（穴栗侦探案之一）”，最后有一段话：

译者曰：子舆氏所谓不见车薪者，是不用明焉，知此则侦探之业不难矣。夫侦探能于纤琐而注其心，不经人意之事，则尤重之，故微至一发，末至靴痕，而往往得巨案之绪焉。伯爵之亡，探者固已用其全力，然不如穴栗之一检新闻而即挈得全案之键，是非于不经意之处而注心耶。至松川为松子之兄，乃伯爵不知，引为心腹之交，而其害较胜于仇讎。伯爵既用情松子至欲死之亦忍矣，而祸因以起，几臻杀身之惨。他日对于未婚之妻，当必惭怍恐怖而谢罪于其裙下也。（29）

该段译者言在论述侦探行业的职业特征后，以此为据来评论该译作的情节发展。在第四册《娱闲录》中，毋我、觉奴合译“弭兵阴谋记”（政治小说），结尾说：“译者曰：俄大臣破其祖国之计，乃维一国之安宁，固非如作虎伥，引强邻以固位者也，故其谋虽阴诡，要不失为正焉，重乎其私，则不可问矣。”（26）小说中，俄国计划在奥地利皇帝传位之际，趁其防守松懈之时发动战争，俄国内阁中的财政大臣主和而不主战，因此找来一位奥国人回国报信，希望以此计阻止战争。

译者在评论中认为,尽管他的方法算不上光明磊落,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宁,所以是能够被理解接受的。

从上述三方面的例证可以看出,毋我和觉奴两位不论是对于译作还是创作,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也愿意明确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并发表。那他们为什么对于每期连载的长篇小说《岩窟王》就没有什么评论呢?这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小说本身所具备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特征有所关联。

《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是个报章连载小说家。19世纪初期的法国,报纸出版相当兴盛,由此应运而生的报刊连载小说发展迅速,成为了报纸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郑克鲁 357-59)。《基督山伯爵》同他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专为报章连载而写^[9],这就决定了它的基本艺术特点:第一,小说必须面向尽可能广泛的读者,适合他们共同的爱好,而读者大众的共同爱好是听故事;第二,要使爱听故事的读者们每期都“有所得”,它必须有大量连续不断的情节(张英伦 47-48)。黑岩泪香是具备丰富的报刊连载小说刊发经验的,他在处理《基督山伯爵》这一报章连载小说时,更是关照了日本大众欣赏水准,以激发大众阅读兴趣为目标,从而引发了当时“泪香类作品”的热潮。中文版本的《岩窟王》根据日文本翻译,相比法文原著,它有所删改,不过仍然保留了小说整体情节,关键线索和主要人物活动及对话,译本依然具备报章连载小说的故事性和情节性,因此对广大读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岩窟王》在《娱闲录》的连载应当受到是读者欢迎的。因为每期《娱闲录》上刊发的译作分量一直是逐步加重,编辑部甚至特意在第十八期杂志中登出一个“本录特别广告”,其中说《娱闲录》自发行以来受到各界欢迎,现在决定从第十八期起,推出一些新举措来感谢读者的厚爱,如增加欧战照片,精心挑选有趣优美的文章等等,广告额外说明的是:特请觉奴、毋我两君,长篇小说加多字数,改用五号字排印。这里要求觉奴和毋我增加字数的长篇小说,即他们刊载在“长篇小说”栏目中的译作《岩窟王》,不过当时该栏目并非译作一种,为何要单独提出将译作的字数增加呢?也许是因为连载了十七期的《岩窟王》在读者中很受欢迎,已经成为一种持续吸引和扩展读者群体的杂志营销策略。

实际上有着通俗化和大众化特征的《岩窟王》在《娱闲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它承担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吸引读者,而报刊连载小说吸引读者所需要具备的情节性与故事性,恰恰是《岩窟王》突出特征。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娱闲录》不仅仅坚持该译作的连载,还能够解释为什么期刊广告特意说明该译作会增加字数。归根结底,是因为《岩窟王》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读者群体,杂志社期望可以吸引到更多读者。总而言之,译作《岩窟王》的刊发,的确吸引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娱闲录》影响的扩大,如它第一期印刷是2000册,登记代办处为七个,且都在四川省内;后来印刷数量逐步增加,至第十期,刊物封底所登载的代办处不仅仅省内增加,而且还扩展到了全国范围^[10]。虽然《娱闲录》影响扩大的功劳不都在于《岩窟王》,但这其中肯定有着这部长篇通俗小说译作的贡献。

不过《岩窟王》毕竟是译作,它与《娱闲录》里的其他小说及栏目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刊物作品倾向政治化参与和启蒙大众的办刊方针之下,《岩窟王》虽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译者中国化的处理,但与《娱闲录》中亦庄亦谐的文字依然区别明显,这特别体现在对西方写作技巧的体现和保留上。虽然觉奴和毋我两位译者没有对《岩窟王》这部译作进行一个整体的评介,但其实暗含一种对这部通俗化、大众化小说有所低看的传统文人态度,尤其是在刊物明确将《岩窟王》作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策略之后,觉奴和毋我之前还有过的少许人物评价再也看不到了。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觉奴在刊物上对《岩窟王》的写作没有什么评价,但是在其创作中,尤其是与该译作翻译过程时间很接近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寻找到其可能受到《岩窟王》作品影响的线索。

四、《岩窟王》翻译对于译者创作的影响

前文提及,1915年时刘长述以“富顺觉奴”名义出版过一部中篇白话小说《松冈小史》。该小说以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为题材,塑造了一群具有爱国激情的青年男女,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富强,不惜流血牺牲,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英雄形象。后来研究者评价它是最早反映四川保路运动的现代文学作品,是现代巴蜀文学在中长篇小说体式上的初试(雷喻义 825)。《松冈小史》前有四篇序言,分别由吴虞、壮悔^[11]、杨明礼、安素^[12]所写。四篇序言从不同角度对小说进行了评述,首先看安素的评论,原文如下:

松冈小史之构造似极费苦心,又似极不经意,随便描写出来。却写山水写禽兽,写忠,写孝,写英雄,写才人,写烈女,写荡妇,写鄙夫,写市侩,写战争,写教育,写良家庭,写恶社会,无不淋漓尽致,书中无奇不有,无一事不活跃纸上的,是妙文字。

松冈小史前段谈谈平叙,看来似觉无味。不知是即布种之时,只见新土,不见萌芽。看到后来开花结果,方知前段没一句是空话,种瓜得瓜,是书中极大主义。^[13]

从上面两段话,可以看出安素认为《松冈小史》的写作具有如下特征:小说构造和情节安排合理;描述社会生活面广;人物形象鲜明,特征突出。另外安素还赞扬《松冈小史》为“最妙之政治小说”“最妙之立志小说”“最妙之家庭小说”“最妙之军事小说”“最妙之教育小说”“最妙讽劝社会之小说”“最妙之言情小说”“最妙之实业小说”“最妙之历史小说”(觉奴,《松冈小史》7-9)。陈平原认为,安素关于《松冈小史》的这种分类,是出于对好友作品诚心诚意地捧场,因为将一部小说同时加上若干个头衔,或者将其归属若干种类型,可以渲染小说内容无所不包、博大精深的特点,这在清末民初是一种时髦(190-91)。

新小说在清末民初时,如何进行类型划分的问题不是本论文探讨的重点,笔者也以为安素上述的评语有对好友刘长述的支持成分在其中。不过从《松冈小史》文本阅读中,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读者确实都能够从不同角度来对该小说进行解读,并有所感悟,如“妇女读之可

以除迷信，爱国治家，相夫教子，知大义，明责任”；“子弟读之，自然志气清壮，不合流俗”；“办学人读之，必不办无生气之学校，教学相融，教育何待相迫”；“军人读之，必乐于从军，勇于公战”；做实业的人读后，可以了解“蚕桑鱼兔，牛羊林木诸事，切实易行”；作为读者，也能够从小说中了解社会和历史，感触“儿女离合悲欢生死之态”（觉奴，《松冈小史》序）。安素这种分类的做法，实际上更进一步凸显出小说描述社会生活面广阔，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不同层次读者阅读兴味的特征。

除安素所言特征之外，壮悔在序言二里强调，小说表达了人需要培养具备一种行事坚忍不拔的精神，如果有这种不轻言放弃的决心，就没有到达不了的目标，尤其是国家有志之士，更需要有此信念，原文为“是书之成，盖深恫乎贞贤之士。方清末造，手足胼胝，以谋乡邦之福。洎国体既更，乃有使志士废然而悔其行者。其所揭橥以告天下，则以世无不就之功，艰困之乘，苟持以精心毅力，无不可达于所企之域”（觉奴，《松冈小史》4-5）。

同时吴虞在《松冈小史·序》中，首先谈中国小说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然后分析同时期社会流行的欧美小说。在阐述中，吴虞正面肯定了小说的地位和功能，认为小说之所以有着伟大的功用，在于它能够“潜移世人之思想，纳绪进化之途，易俗移风”。他指出小说的社会功用，“其势力远过于六经”，西人认为小说是文学与美术之精华，其言不谬。吴虞赞同小说是一方面要“远取稗官之意”，另一方面也需要“近师欧美之长”。他在序言结尾称赞刘长述的《松冈小史》，说它“兼宗新旧，独条所各，枝叶扶疏”，就是认为刘的小说满足了新小说的写作标准，兼具新旧之长，有向西方小说作品学习的成分（觉奴，《松冈小史》序）。刘长述的创作能够吸收欧美之长的特点，与同时期其他部分在川著名作家的特征是一致的，如李劫人、曾兰等（伍加伦5）。

刘长述创作的《松冈小史》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小说的影响，而且笔者认为，刘长述在1914年至1915年关于《岩窟王》的翻译活动对其写作是有着一定影响的，理由有以下两点：第一点是《松冈小史》表现出的写作特征和《岩窟王》的写作特征有相似之处。前文论述过，《松冈小史》有三点写作特征：即小说构造和情节安排合理；描述社会生活面广阔，面向不同阶层读者；人物形象鲜明，特征突出，而《岩窟王》也正是在上述方面表现突出，并为后来研究者和评论者所推崇（郑克鲁357-72）。第二点是《松冈小史》里对于坚忍精神的提倡和《基督山伯爵》里主人公所具备的品质是一致的。在《基督山伯爵》中爱德华·唐泰斯因陷害入狱、坐牢，后又逃脱、获宝、报恩、复仇，他在整个过程中都体现出一种隐忍的性格，对于要达到的目的有着持之以恒的决心与毅力。而《松冈小史》以一群爱国青年体现出的锲而不舍的护国救国行为，呼吁同时期的爱国志士认识到：“世无不就之功，艰困之乘，苟持以精心毅力，无不可达于所企之域。”^[14]

既然能够确定《松冈小史》和《基督山伯爵》之间的某些共同性，那么就能够说明刘长述对《基督山伯爵》的接受和认同。尽管这种接受和认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仍然可以说外国小说翻译活动对于译者本身创作的影响是真实存在而不可忽略的，并且这种因译作

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局限在口译者或笔述者中的一位,可能会同时对两位合译者的相关文学活动都产生冲击。虽然《岩窟王》是根据日文版本转译,有一定删改,但其故事性和情节性的特征是突出的,也因此被《娱闲录》确定作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虽然觉奴可能对于一部大众化、通俗化的流行小说不太以为然,但在持续翻译过程中,西方小说的创作方法以及作品传达的精神,已经透过他翻译活动所做的阅读和思考,影响到了其后来的作品创作,这种改变渐进的过程也能够从他同时期两部通俗小说的写作中看出,一部是《美人心》^[15],标明“侦探言情小说”,另外一部是《他欤依欤》^[16],标明“言情小说”。《松冈小史》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在于刘长述在具备传统文学扎实功底的情况下,接触并阅读到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后来对西方作品的翻译活动,促使他在有意或无意中接受了西方写作技巧,并且能够灵活运用在自身的创作活动中。所以说《岩窟王》这本译作,对于读者是阅读兴味的产生,对于译者,是创作理念的改变或提升。

《娱闲录》选择《基督山伯爵》作为“长篇西史小说译作”连载,是希望这部情节离奇曲折的作品能够得到不同层次读者喜爱,从而提升大众对刊物的关注,这与当时副刊大众化路线发展相吻合。觉奴、毋我两位译者把日文版本的人物名称进行中国化处理,删减了中国读者不感兴趣的心理活动描写、环境描写等内容,尽量保留日文版本中的情节发展、关键线索和主要人物活动。他们使用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考虑到四川读者群体并不是处在一个对外来文化有着开放姿态的地区,他们当时比较少接触西方文学作品,译者对译作中国化处理的方式,能够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消除对异域文化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译作被大众接受,就必须具备一种大众性和通俗性,即文字要浅显易懂,情节要生动传奇。据《娱闲录》对《岩窟王》持续的连载及刊登字数增加的广告,该译作在读者中是受到青睐和欢迎的,也就是说译作刊发目的顺利实现了。同时,前文通过相关资料的论述,展现出翻译活动对于译者小说创作的影响,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和蕴涵的人文精神,在译者自身创作的作品里得到运用和展现。

注释 [Notes]

- [1] 网上自流井一釜溪散人:乡贤张显文遗作楷书赵熙《刘大夫传》。2016-01-15, blog.sina.com.cn/s/blog_53e678910102wfp2.html.
- [2] 该资料出自可容山:《少年英发 才华横溢——记早期白话文小说〈松冈小史〉的作家刘鹏年先生》, blog.sina.com.cn/s/blog_4ebe34f701000dcl.html.
- [3] 刘长述最初跟随父亲刘光第、家乡宗叔的教育过程中,没有提及外语教育情况。泸州川南经纬学堂目前没有留下最初的课程设置记录,仅仅在何白李的《川南师范学校史话》(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四川省文史资料集粹》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中提及,20世纪30年代的学校中是要求学习英、日、法三种语言的(川南师范学校的前身即泸州川南经纬学堂)。北京湘学堂迄今没有留下关于外语学习的确切资料。据陆殿舆在《四川省高等学堂纪略》一文中写:四川高等学堂是列入高等教育阶级的。按照课程分有三类,不论哪一类都必须学习第一外国语英语,第一类和第二类还分别要求学习法语和德语(出自政协武胜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武胜文史第3辑 陆殿舆资料专辑》,第58页)。不过刘长述是在1905年进入四川高等学堂,1906年休学回家,不论他在哪一类课程组学习,不到两年时间里,他学习英语或者其他语种的时间是始终有限的。综合上述资料,

笔者认为刘长述的外语程度是不能确定的。

- [4] 迄今为止,笔者没有能够确认黑岩泪香根据哪一个英文版本翻译而来,不过根据对其日文版本内容的细读,笔者倾向于认为他使用的是当时一个未经删减的英文全本进行翻译。另外国内相关文章提及其懂法语的问题,如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邹振环在《影响中国一百本译作》里,都提及他的法文程度很好。据研究黑岩泪香的伊藤秀雄说:人们误解以为黑岩法语很好,其实有些是出自其自身的描述,他曾发出过豪言壮语读破西洋小说数千卷,其实也是一种夸张,当然这都是细节问题。(出自读书笔记:1月29日 伊藤秀雄『黑岩泪香』(三一书房) <http://cache.yahoo.jp/search/cache?c=14il3FD3E2YJ&p=%E9%BB%91%E5%B2%A9%E6%B3%AA%E9%A6%99+%E3%83%95%E3%83%A9%E3%83%B3%E3%82%B9%E8%AA%9E&u=homepage2.nifty.com%2Fkkomori%2Fdoku9801.htm>)。根据黑岩译本的阅读情况和日本研究者的观点,基本可以确定黑岩的译作一般都是由英文版本翻译。上述日文资料以及中文翻译皆为陈力卫教授提供,在此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 [5] 论文中现译名的出处皆来自于大仲马:《基督山伯爵》,韩沪麟、周克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6] 所有的中文译文都出自1914年7月至1915年9月的共计26期的《娱闲录》,然后文本后其他地方相同原因不再说明
- [7] 该中文为笔者自译。
- [8] 尽管目前没有寻找到第二十七期的译作文本,但有记载《岩窟王》刊发在1期至2卷3号,1914年7月至1915年9月16日,共有27期。出自刘永文著:《民国小说目录(1912-19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0页。
- [9] 1844年,《基督山伯爵》开始在法国《辩论日报》上连载。
- [10] 第一期登载的七个代办处分别是:成都学道街、重庆小梁子、泸县钮子街、嘉定土桥街、叙府学院街、康定陕西街、雅安大北街。第十期增加了如简阳、资中、资阳、绵竹、顺庆、大竹、西昌、保宁、乐至、北京琉璃厂、保定、天津、奉天、广东、上海、苏州、绍兴、杭州、福建、宁波、汉口、长沙、开封、陕西、云南、贵阳等地的代办处。
- [11] 壮悔:指李哲生,即李思纯,笔名壮悔等,四川成都人,曾留学法国,与吴宓、陈寅恪交往甚密,历史学家。
- [12] 安索的生平资料目前未能确认。
- [13] 本文中涉及《松冈小史》四篇序言的内容都出自1915年成都昌福公司出版的《松冈小史》,刘觉奴撰。
- [14] 不过在论文尝试论述《松冈小史》创作与《基督山伯爵》翻译活动之间存在种种可能关系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到,这种相互关系的存在也被其他不少因素所牵制,如《岩窟王》中译本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版本,译者刘长述真的了解到作品全部吗?刘的外语能力似乎不强,一直担任笔述者角色,他真正把握到文本中表现出的上述特征了吗?或者有可能是他本身就具备了写作技巧呢?另外刘长述在同时期也有阅读其他西方文学作品的机会,他也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学功底,是不是其他西方文学作品或本国传统文学给予他的启发呢?
- [15] 《美人心》连载《娱闲录》第9期至21期,1914年11月至1915年5月,作者:觉奴。
- [16] 《他坎依坎》连载《娱闲录》第12期至2卷2期,1915年1月至1915年9月,作者:觉奴。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lexandre, Dumas.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Volume 1)*. Translated by Hulin Han. Shanghai Translation, 2001. [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上册)》,韩沪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 .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Vol. 2. Translated by Ruikoro Kuroiwa, ?? [大仲马:《岩窟王:史外史传》第2册,黑岩泪香译。城市:出版社,年份。]
- Shiraishi, Jitsuzo. *The Narrative of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Meiji-Taisho Literature Complete Works, vol. 8*, edited by Shunyodo, 1927-1932, pp. ?? [白石实三:《岩窟王解说》,载春阳堂编《明治·大正文学全集》第八卷(城市:出版社,1927-1932),第??-??页。]
- Chen, Pingyuan. *History of Fi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Peking UP, 1993.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Liu, Haisheng. "Preface of Full of Patriotic Passion in the 'Education Advertising.'" *Bashu Shuwen*, edited by Pushi Gao, et al., Shanghai Bookstore, 1992, pp. 70-72. [刘海声:《充满爱国激情的〈招生广告〉前言》,载高朴实等编《巴蜀述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第70-72页。]
- Nakae, Chomin. *A Year and a Half*.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Juenu. "Translator's words." *The Collection of Entertainment*, no. 3, 1914, p. 7. [觉奴:《译者言》,载《娱闲录》第三册,1914,第7页。]
- . *General History of Matsuoka*. Changfu Company, 1915. [觉奴:《松冈小史》。成都:昌福公司,1915。]
- Yoshitake, Yoshinori. *Meiji • Taisho's Translation History*. Tokyo Research Institution, 1959. [吉武好孝:《明治•大正的翻译史》。东京:东京研究社,1959。]
- Lei, Yuyi, editor. *The Development of Bashu Culture and Sichuan Tourism Resources*.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2000. [雷喻义编:《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资源开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Wuwo. "Translator's words." *The Collection of Entertainment*, no. 3, 1914, p. 10. [毋我:《译者言》,载《娱闲录》第三册,1914,第10页。]
- Wuwo, and Juenu. "Translator's words." *The Collection of Entertainment*, no. 3, 1914, p. 29. [毋我、觉奴:《译者言》,载《娱闲录》第三册,1914,第29页。]
- . "Translator's words." *The Collection of Entertainment*, no. 4, 1914, pp. 26, 28. [毋我、觉奴:《译者言》,载《娱闲录》第四册,1914,第26,28页。]
- Wu, Yu. *The Diary of Wu Yu (Part 1)*.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1986. [吴虞:《吴虞日记》(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Wu, Jialun. *Study on Sichuan Modern Writers*. Sichuan UP, 1990. [伍加伦:《四川现代作家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 Yu, Ling. "Translation Heteroglossia of Lat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2014)*, edited by Hongzhi Wang. Fudan UP, 2015, pp. 153-84. [禹玲:《众声喧哗的晚清译界——以〈基督山伯爵〉译本为中心》,载王宏志编《翻译史研究(2014)》(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第153-84页。]
- Zhang, Yinglun.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Dushu*, no. 1, 1979, pp. 47-48. [张英伦:《略论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载《读书》1979年第1期,第47-48页。]
- Zhang, Yingzhen, and Zhuangnian Zhang, editors. *The Story of Chinese Names*. Shandong Pictorial, 2005. [张颖震、张壮年编:《中国人名的故事》。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 Zheng, Kelu. "Account of *Le Comte de Monte Cristo*." *The Wider Aspect of French Literature*, by Kelu Zheng,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2006. pp. 357-59. [郑克鲁:《论基督山恩仇记》,载氏著《法国文学纵横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357-59页。]

◇责任编辑:马纳克

FLC

翻 译 研 究

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对比实证研究

◎ 王湘玲 王婷婷

内容提要: 本文对比 31 名学生译者在科技文本英译汉过程中分别进行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时,在翻译速度、译文质量、译者态度三方面的差异,通过击键记录、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发现:(1)就科技文本英译汉而言,相比人工翻译,译后编辑能够显著缩短任务时间,提高翻译速度。(2)相比人工翻译,译后编辑译文错误数量较少,译文整体质量较高。通过对两种模式下的翻译速度与译文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译文质量受到翻译速度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译者自身翻译能力及机器翻译译文质量等。(3)针对译者态度的前测问卷显示,被试对译后编辑所持态度不一,其影响在翻译速度和译文质量上得到验证。相比对译后编辑持中立或消极态度的被试,持积极态度的被试在翻译速度与译文质量方面都有更好表现。研究结果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人才培养有启示价值。

关键词: 机器翻译译后编辑 人工翻译 翻译速度 译文质量 译者态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4-0083-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时代基于认知过程的翻译创新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证研究”(19BYY104);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改研究项目“人工智能时代培养高校学生 ICT 能力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教育模式构建研究”

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Titl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an Translatio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in E-C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peed, Quality and Translators' Attitude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keylogging and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compares two translation patterns, i.e. human translatio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in E-C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productivity, quality and translators' attitud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re revealed: (1) In E-C translation of technical text,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ask time and improve translation speed. (2) Compared with human translation,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produces translations with less errors. Thus, higher translation quality is permitted by using post-editing. Correlation is not found between translation speed and quality under both patterns, which means that translation quality can be affected by other factors beyond speed, for exampl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quality. (3) According to pre-questionnaire, participants show a mixed attitude towards post-editing, and its influence has been demonstrated in translation speed as well as in quality. Compared with those holding a neutral or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participants maintaining a positive attitude perform better in terms of both translation speed and quality.

Keywords: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huma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peed, quality, translators'

attitude

Authors: Xiangling W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Tingting Wang, Post-graduate Studen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一、引言

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翻译人员的工作环境,推动了翻译行业的繁荣。传统的人工翻译(human translation,简称HT)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翻译需求(Doherty 948),因此翻译工具领域的发展,尤其是机器翻译译后编辑(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简称译后编辑,PE)的出现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有效途径。由于当前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简称MT)技术尚未完全成熟,译文质量的保证还需人工介入,译后编辑便成为一种补偿手段与机器翻译一同应用于翻译实践。译后编辑即“对机器翻译的译文进行的编辑或改正”(ISO 2),它是“分析并修正自动或半自动翻译文本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保证译文符合语法、标点、拼写、意义等要求”。美国卡门森斯咨询公司提供的《语言服务市场:2016》报告显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业务占整个语言服务行业市场的3.94%,其中25.39%的语言服务供应商提供译后编辑服务,并且认为该项服务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1]。

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翻译需求的增加,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在语言服务行业中的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学界关于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争论也随之而起,焦点在于二者在翻译速度和译文质量方面孰优孰劣,人工翻译是否会被机器取代等(冯全功、刘明 55)。尽管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近20年内迅速发展,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但深入系统地将其与人工翻译进行对比的实证研究仍十分有限,国外对于翻译速度和译文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尚存在差异,译者态度是否决定译者行为如翻译速度和译文质量,如何决定之,都仅停留在经验观察和提出假设层面,尚未展开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中英语言对尚属未知(王湘玲、贾艳芳 85-86)。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翻译速度、译文质量、译者态度三个方面对科技文本英译汉过程中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进行对比研究,旨在回答以下研究问题:(1)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在翻译速度方面有何差异?(2)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在译文质量方面有何差异?翻译速度与译文质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3)译者态度是否影响翻译速度与译文质量?

二、译后编辑研究

近年来,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翻译速度是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考察指标,也是译后编辑研究的主要选题之一。总体来看,部分实证研究已经证实,

与人工翻译相比,译后编辑可以节省时间、提高翻译速度(Guerberof 14; Flournoy and Duran 426; Groves and Schmidtk 30-31)。普利特和马斯洛特(Plitt and Masselot)发现机器翻译辅以译后编辑使得翻译产出平均提高74%,任务时间缩短43%(10)。通常认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只适用于科技文本翻译,但是马丁内斯(L. G. Martínez)以营销手册作为任务文本开展翻译实验,发现采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比人工翻译要快得多(58-60)。克恩和哈多(Philipp Koehn and Barry Haddow)发现,随着译者对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使用熟练程度的提高,翻译速度也会随之加快。其中,译后编辑是最快的翻译模式,平均比常规翻译快39%(405)。有测试表明,采用译后编辑模式进行多个语言对之间的翻译,翻译速度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提高(Zhechev 92)。然而,少数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结论,发现在部分情况下译后编辑比人工翻译更快,但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Garcia 220-21; Carl et al. 137)。

此外,由于译文质量是语言服务行业中评估翻译活动的重要指标,译后编辑与人工翻译的译文质量对比也一直是研究热点。部分译者,尤其是职业译者,认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译文质量比人工翻译差(Yamada 50),进而造成他们拒绝使用机器翻译。国外翻译研究者已着手对比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在译文质量方面的差异,但现有研究同样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菲德雷尔和奥布莱恩(R. Fiederer and Sharon O'Brien)发现,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译文在准确度和简洁度上得分更高,但在译文风格上得分较低(62-63)。李家璿和廖柏森(Jason Lee and Poson Liao)则发现采用译后编辑能够减少译文错误(106)。部分研究发现译后编辑译文质量与人工翻译相当(Jia et al. 74-76; Screen 332-33)。然而,借助人工评分,德普拉泰尔等(Depraetere et al.)发现采用译后编辑模式得到的译文质量较低(88-89)。

译后编辑译文质量是否取决于译者的态度这一有趣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克林斯(H. P. Krings)发现译者对机器翻译表现出消极态度,主要原因在于担心翻译工作被所取代^[2]。格尔博夫(Ana Guerberof)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译者对于译后编辑的态度较为灵活多变,且受经验影响:对译后编辑持消极态度的受访者多数不从事相关工作,而有相关经验的受访者则多表示译后编辑能够帮助他们发现错误,提高产出(86-88)。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影响译者态度的因素,卡德韦尔等(Cadwell et al.)借助焦点小组的方法,对职业译者展开研究。结果显示,译者对于译后编辑的态度多受文本类型、语言对、机器翻译质量和信任度等因素影响^[3]。为数不多的相关实证研究的结果也并不一致。贾艳芳等(Jia et al.)以中国学生译者为调查对象,发现他们大都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持积极态度,但同时也指出其带来的一些挑战,如译者会过分依赖机器翻译译文而难以发现错误、译者主体性难以发挥等(77-79)。

综合以上文献可见,现有研究在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翻译速度与译文质量的对比方面已有涉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研究结论各异,译者态度的影响未得到足够重视。另外,大多数研究均在同一语系语言对之间的翻译上展开,汉英语言对之间两种翻译模式的差异尚且少有人涉足。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尝试将翻译速度、译文质量与译者态度三者综合考量,探索英译汉过程中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两种模式在翻译速度和译文质量方面的差

异，以及译者态度对二者的影响。

三、实验设计

（一）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为 31 位 MTI 学生（编号 P01-P31），其中包括 26 位女生，5 位男生。被试平均年龄为 23.32 岁（SD=0.91），均以汉语为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平均英语学习年限为 12.23 年（SD=2.06），具备熟练使用英汉双语的能力。参加实验时，所有被试翻译经验多来自于研究生阶段的日常翻译训练，无职业翻译工作经验，且均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译后编辑培训。实验之前，所有被试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在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报酬。被试的所有信息仅用于当前研究，对外严格保密。

（二）实验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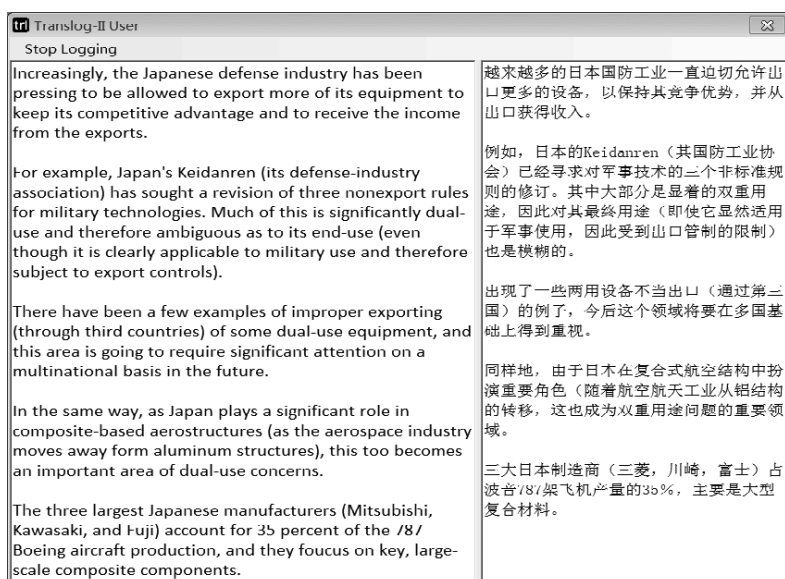
本研究选取 *Democracy’s Arsenal: Creating a Twenty-First-Century Defense Industry*^[4] 一书中的两个片段作为实验文本（文本 1 和文本 2），分别用于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任务，翻译方向为英译汉，翻译文本类型为科技文本。该文本来自真实翻译项目，截止本研究开展时，实验文本尚未被译为中文，因而能够避免出现被试在实验中参考已有译文的情况。为保证两个文本难度的可比性，剔除文本难度这一混淆变量，对两个文本的文本长度、句子数量、平均句长、文本难度和易读性等指标进行了测量（见表 1）。本研究使用谷歌机器翻译系统对文本 2 进行翻译（2017 年 6 月 17 日），得到的机器翻译译文用于译后编辑任务。研究者对被试提供翻译纲要，说明目标读者及译文质量要求，同时为被试提供译后编辑指南^[5]，要求尽可能多的保留机器翻译译文。

表 1 实验文本信息

标准	文本 1（HT 任务）	文本 2（PE 任务）
单词数	168	166
句子数量	6	6
平均句长	28.00	27.67
Lexile 难度测试	1520L*	1510L*
Flesch 易读性得分	24.1	25
适合年级	16	17
易读水平	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适合读者年级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三）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使用 Translog-II^[6] 击键记录软件收集被试的翻译过程数据和最终译文。该软件专为翻译过程研究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TPR) 而设计, 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如 Yuan 22; 黄笑菡、何培芬 33; 冯佳 82; 卢植、孙娟 763)。该软件的用户操作界面分为左右两部分: 左侧部分呈现源语文本, 右侧部分供被试键入译语文本, 或呈现机器翻译译文供被试进行译后编辑 (见图 1)。前测问卷题项为填空题、五点式 Likert 量表和选择题形式, 用于收集被试的个人信息 (如年龄、性别、翻译经验等), 以及对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所持态度信息。两份后测问卷分别用于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任务, 以了解被试在翻译任务中所遇到的问题, 以及对任务文本难度和个人译文质量的评估。



▲ 图 1 Translog- II 译后编辑操作界面

(四) 实验流程

为了避免设备不符合使用习惯而对翻译行为造成影响, 被试均在个人电脑上完成实验任务, 并且都预装了 Translog- II 软件。实验正式开始之前, 向被试介绍研究目的、任务要求以及软件使用方法; 被试了解实验任务之后签署知情同意书; 被试填写前测问卷。实验开始后, 被试首先完成热身文本的翻译, 热身任务的工作环境与正式实验相同。正式实验包括两个阶段: (1) 被试采用人工翻译模式将文本 1 翻译为中文, 并在提交译文后填写后测问卷; (2) 被试根据翻译纲要及译后编辑指南对文本 2 的机器翻译译文进行译后编辑, 之后填写后测问卷。不限制任务时间, 两个任务中间被试可以休息 5 分钟。为最大限度接近真实翻译过程, 实验中被试可以查询在线翻译资源和纸质词典。

（五）数据处理

31 位被试的 Translog-II XML 文件均上传至 YAWAT^[7] 进行手动对齐及错误标注，并导出翻译过程数据及最终译文。本研究共收集到 31 份人工翻译译文，31 份译后编辑译文以及 93 份有效问卷（包括 31 份前测问卷和 62 份后测问卷）。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可靠性，对三份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三份问卷的 Cronbach Alpha 信度系数分别为 0.778、0.802 和 0.866，均大于可接受的信度系数阈值 0.70^[8]，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本研究采用 SPSS 19.0 对定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四、结果与讨论

（一）翻译速度

本小节考察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两种模式在任务时长和翻译速度方面的差异。翻译速度以每秒钟所翻译的源语文本单词数计算^[9]。表 2 显示，就平均任务时长来看，采用译后编辑模式比人工翻译模式节省了 524.52 秒，可以缩短 29.62% 的时间；就翻译速度来看，译后编辑模式下平均翻译速度为 0.1884 词/秒，比采用人工翻译模式时翻译速度要快 0.0594 词/秒。进一步对两种任务模式下任务时长和翻译速度分别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在任务时长和翻译速度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Sig.= 0.000, p < 0.05）。另外，通过分析 31 位被试的数据发现，除 P6, P19, P21, P24 四位被试之外，其余被试均表现为在译后编辑模式下任务时长较短，翻译速度较快。这一发现与达姆斯等（Daems et al.）的研究结论一致（254）。在人工翻译任务中，被试需要自行翻译所有内容，同时需要查询生词，而译后编辑任务中，机器翻译译文能够帮助被试理解源语文本，而且 74%~91% 的机器翻译译文保留在了最终译文中，因此被试花费在打字和查询外部资源上的时间将减少，从而提高翻译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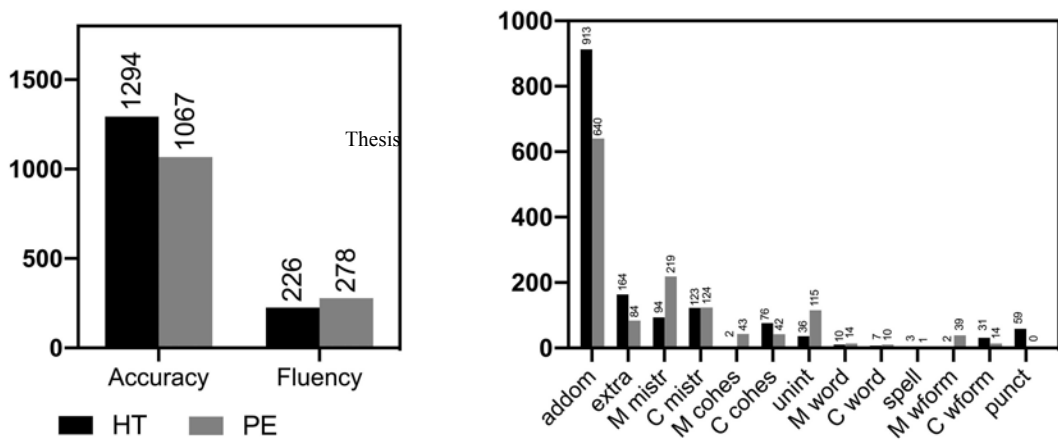
表 2 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过程中的任务时长与翻译速度

		N	均值	标准差	t 统计量	df 值	Sig. 值（双侧）
任务时长（秒）	人工翻译	31	1770.970	527.999	4.176	30	.000
	译后编辑	31	1246.453	618.117			
翻译速度（词/秒）	人工翻译	31	0.129	0.0367	-5.679	30	.000
	译后编辑	31	0.188	0.0645			

（二）译文质量

只有在保证译文质量的基础上提高翻译速度才有意义。译文质量评估是职业翻译流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采用多维质量指标（Multidimensional

Quality Metric, MQM)^[10]方法对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译文质量进行评估。YAWAT对齐工具按照MQM方法,将错误划分为准确度(Accuracy)和流利度(Fluency)两大类,并进一步细分为13种错误类型,即增译或漏译(addom)、过译(extra)、轻度误译(M mistr)、严重误译(C mistr)、轻度衔接错误(M cohes)、严重衔接错误(C cohes)、译文难以理解(unint)、轻度词序错误(M word)、严重词序错误(C word)、拼写错误(spell)、轻度词性错误(M wform)、严重词性错误(C wform)、标点错误(punct),其中前四种属于准确度类型错误,其余九种属于流利度类型错误。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译文错误标注情况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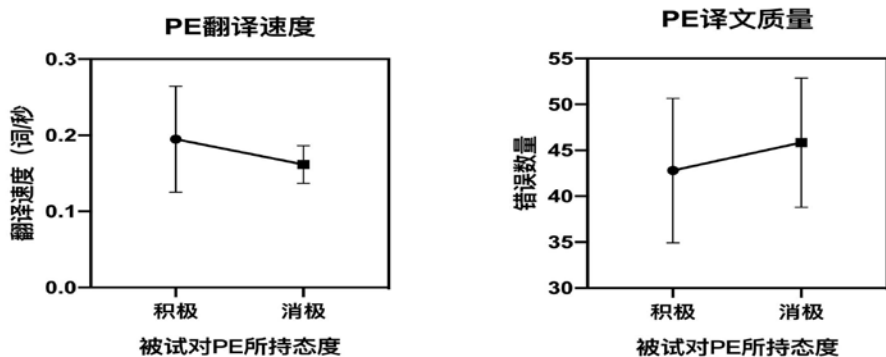
▲图2 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译文质量

整体上来看,采用译后编辑模式完成翻译任务时,被试的译文错误总数为1345个,比采用人工翻译模式少175个,译文质量较高,尤其是在增译或漏译、过译、标点错误、严重衔接错误、严重词性错误等5个错误类型方面出错数量远远低于人工翻译。值得注意的是,轻度误译、轻度衔接错误、轻度词性错误和译文难以理解在译后编辑译文中出现的数量要明显高于人工翻译译文,这可能是由于机器翻译在自然语言处理上仍然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被试进行译后编辑时,受到机器翻译译文的误导而未能发现并改正存在的错误。

加西亚(I. Garcia)通过研究发现在使用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两种模式完成翻译任务时,翻译速度与译文质量之间存在相关性(223)。本研究以翻译速度和错误数量作为衡量指标,分别对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的翻译速度和译文质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发现不论是采用哪种翻译模式,翻译速度和译文质量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text{Sig}_1 = 0.792$, $p_1 < 0.05$, $r_1 = 0.049$; $\text{Sig}_2 = 0.805$, $p_2 < 0.05$, $r_2 = -0.046$)。因此,翻译速度对译文质量没有显著影响,花费时间较长,翻译速度较慢,并不一定能够获得质量较高的译文,译文质量可能最终取决于译者的翻译能力及机器翻译译文质量等因素。

(三) 译者态度

译者对译后编辑和人工翻译的态度可能影响其翻译行为及译文质量,为验证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问卷对译者态度进行调查。总体而言,(1)65%的被试不认同“未来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会取代人工翻译”这一说法,认为尽管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人工翻译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不会被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所取代。(2)被试普遍对机器翻译和译后编辑有一定了解:94%的被试表示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机器翻译的优缺点”,所有被试均表示“知道如何进行译后编辑”。(3)关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和人工翻译的对比,83.9%的被试表示“比起成为一名人工译者,更倾向于成为一名译后编辑者”,94%的被试认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比人工翻译速度更快,97%的被试认为人工翻译所需的认知努力更多,但是,在对两种翻译模式译文质量对比时,87.1%的被试同意或部分同意“人工翻译译文质量高于译后编辑译文质量”,另外12.9%的被试则持相反意见。(4)77%的被试认为译后编辑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翻译能力,且所有被试均认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会成为翻译行业的未来趋势,因此MTI教学中应该开设相应课程,提高学生的译后编辑能力,适应行业发展。(5)所有被试均表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更适合非文学文本的翻译,而对于文学文本则不适用,主要是由于文学文本语言内涵丰富,修辞手法使用频繁,并且多具有美学意义,目前机器翻译系统仍然难以产出较高质量的原始译文供译者进行译后编辑。这一发现与格尔博夫面向职业译者的调查结果吻合(86),均证实译者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态度并未显示出一致性倾向,其态度受以往经验、文本类型等因素影响。



▲图3 译者态度对翻译速度及译文质量的影响

通过将问卷与翻译速度及译文质量数据结合分析,我们尝试探究译者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所持态度对其进行译后编辑任务时翻译速度及译文质量的影响,结果见图3。首先,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持积极态度的被试平均翻译速度为0.1948词/秒,而持中立或消极态度的被试平均翻译速度为0.1617词/秒,进一步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发现,这一差异并不显著

($p=0.1925$)；持积极态度的被试译后编辑译文中平均错误数量为 42.8 个，比持中立或消极态度的被试译文平均错误数量 (45.83) 减少了 6.6%，译文质量更高，这一差异同样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p=0.4403$)。这一发现从实证上验证了译者创建高质量译后编辑内容所需具备的条件之一便是积极的态度 (崔启亮 72)。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持积极态度的被试认为，机器翻译译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加之对于机器翻译的优势和不足都有一定了解，因此，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译后编辑，从而在保证译文质量的同时提高翻译速度。与此相反，其他被试则认为机器翻译译文质量差，对译者思维过程造成干扰和限制，在此基础上进行译后编辑会十分繁琐，译者主体性不能很好发挥，并且随着任务的进行会逐渐对译后编辑活动产生厌倦，进而导致翻译速度和译文质量不尽如人意。

五、结语

本研究以 31 名 MTI 学生为被试，从翻译速度、译文质量、译者态度三个方面对英译汉过程中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就科技文本英译汉而言，(1) 采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能够显著缩短任务时长，提高翻译速度。与人工翻译模式相比，译后编辑能够更高效地完成翻译任务。(2) 在译文质量上，译后编辑译文错误数量少于人工翻译，译文质量较高。总体来看，译后编辑在译文准确度方面表现较好，而人工翻译则在流利度方面更胜一筹。从具体错误类型来看，尽管机器翻译系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导致译文在误译和译文难以理解等方面的错误数量较人工翻译译文多，但是译后编辑在增译或漏译、过译、标点错误、严重衔接错误、严重词性错误等五个错误类型方面出错较少。通过对两种模式下翻译速度与译文质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并未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而译文质量应是受到翻译速度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译者自身翻译能力及机器翻译译文质量等。(3) 被试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所持态度较为复杂。一方面，超过 90% 的被试承认该模式在翻译速度方面具有优势，是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他们又理性地认为尽管受到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的冲击，人工翻译在文学文本翻译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不会被取代。尽管数据并未显示出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但通过描述性数据发现被试对译后编辑的态度进一步影响其翻译速度和译文质量，即与对译后编辑持中立或消极态度的被试相比，持积极态度的被试在翻译速度与译文质量方面都有更好表现。

英汉两种语言的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对比研究仍少有人涉足，相关实证研究更是罕见。未来研究可以在此研究设计的基础上增加被试数量，使用更先进的研究工具（如眼动仪），引入文学文本，以及丰富被试类别（如职业译员），尝试进行历时研究等，从而使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翻译教学与译者培训。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在翻译速度方面具备显著优势，逐渐成为翻译行业的主流翻译模式，因此，翻译教学应顺应这一趋势，在传统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增加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相关培训，使

得学生的翻译能力更加全面,在翻译人才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注释 [Notes]

- [1] 参见 Common Sense Advisory, “The Language Service Market: 2016.” May 2016.
- [2] 参见 H. P. Krings, *Repairing Texts: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E Processes*. The Kent State UP, 2001.
- [3] 参见 P. Cadwell, et al., “Human Factor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Post-editing among Institutional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Spaces*, no. 5, 2016, pp. 222-43; P. Cadwell, et al., “Resistance and Accommodation: Factors for the (non-) Adoption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mong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no. 26, 2018, pp. 301-21.
- [4] 参见 J. S. Gansler, *Democracy's Arsenal: Creating a Twenty-First-Century Defense Industry*. MIT, 2011.
- [5] 参见 TAUS, “TAUS Post-editing Guidelines.” 20 Jan, 2016, www.taus.net/think-tank/articles/postedit-articles/taus-post-editing-guidelines.
- [6] 参见 M. Carl, “Translog-II: A Program for Recording User Activity Data for Empirical Reading and Writing Research.”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Evaluation*, 2012, pp. 4108-12.
- [7] 参见 U. Germann, “Yawat: Yet Another Word Alignment Tool.” *Proceedings of the ACL-08: HLT Demo Session (Companion Volume)*, 2008, pp. 20-23.
- [8] 参见 J. Nunnally, and Ira Bernstein, *Psychometric Theory (Third Edition)*.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4.
- [9] 参见 Ana Guerberof,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in MT Post-editing.” *MT Summit XII-Workshop: Beyond Translation Memories: New Tools for Translators MT*, 2009.
- [10] 参见 A. Lommel, et al., “Multidimensional Quality Metrics (MQM): A Framework for Declaring and Describing Translation Quality Metrics.” *Tradumática*, no. 12, 2014, pp. 455-63.

引用文献 [Work Cited]

- Carl, M., et al. “The Process of Post-Editing: A Pilot Study.” *Copenhagen Studies in Language*, no. 41, 2011, pp. 131-42.
- Cui, Qiliang. “On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vol. 35, no. 6, 2014, pp. 68-73. [崔启亮:《论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载《中国翻译》2014年第35卷第6期,第68-73页。]
- Daems, J., et al.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Experie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Human Translation and Post-editing with Students an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Meta*, vol. 62, no. 2, 2017, pp. 245-70.
- Depraetere, I., et al. “Post-edited Quality, Post-editing Behavior and Human Evaluation: A Case Study.” *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rocesses and Applications*, edited by Sharon O'Brien, et al., Cambridge Scholars, 2014, pp. 78-108.
- Doherty, Stephen. “The Impact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ies on the Process and Product of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 10, 2016, pp. 947-69.
- Feng, Jia. “Comparing Cognitive Load in L1 and L2 Translation: Evidence from Eye-Tracking.” *Foreign Language in China*, no. 4, 2017, pp. 79-91. [冯佳:《译入/译出认知负荷比较研究——来自眼动追踪的证据》,载《中国外语》2017年第4期,第79-91页。]
- Feng, Quangong, and Ming Liu. “Construction of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Post-editing Competence.”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3, 2018, pp. 55-61. [冯全功、刘明:《译后编辑能力三维模型构建》,载《外语界》2018年第3期,第55-61页。]
- Fiederer, R., and Sharon O'Brien. “Quality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A Realistic Objective.”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no. 11, 2009, pp. 52-74.
- Flournoy, Raymond, and Duran Christine.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Document Localization at Adobe: From Pilot to Produ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Machine Translation Summit*, 2009, pp. 425-28.

- Garcia, I. "Translating by PE: Is It the Way forward?" *Machine Translation*, vol. 25, no. 3, 2011, pp. 217-37.
- Groves, Declan, and Dag Schmidtke.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PE Patterns for MT."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Machine Translation Summit*, 2009, pp. 429-36.
- Guerberof, A.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in the PE of Outputs from Translation Memories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Localization Focu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ocalization*, vol. 7, no. 1, 2008, pp. 11-21.
- . "What do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Think about Post-editing?" *The Journal of Specialized Translation*, no. 19, 2013, pp. 75-95.
- Huang, Xiaohan, and Peifen He. "Research on Revising Patterns of Translator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Translation Expertise with Translog."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no. 6, 2017, pp. 32-39. [黄笑菡、何培芬:《基于Translog程序的不同水平译者翻译修改行为模式研究》,载《外语电化教学》2017年第6期,第32-39页。]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18587: Translation Services—Post-editing of Machine Translation Output—Requir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2017.
- Jia, Y., et al. "How does the Post-editing of 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 Compare with From-scratch Translation? A Product and Process Study."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no. 31, 2019, pp. 60-86.
- Koehn, Philipp, and Barry Haddow. "Interactive Assistance to Human Translators using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Methods."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Machine Translation Summit*, 2009, pp. 403-409.
- Lee, Jason, and Poson Liao.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an Translatio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with Post-editing."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vol. 4, no. 2, 2011, pp. 105-49.
- Lu, Zhi, and Juan Sun. "An Eye-tracking Study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in Human Translation and Post-edit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Bimonthly)*, no. 5, 2018, pp. 760-69. [卢植、孙娟:《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中认知加工的眼动实验研究》,载《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8年第5期,第760-69页。]
- Martínez, L. G. *Human Translation versus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Full PE of Raw Machine Translation Output*. Diss. Dublin City University, 2003.
- Yuan, Qingqing, and Xiangling Wa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an Translation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in Terms of MTI's Productivity, Quality and Attitude*. Thesis. Hunan University, 2017.
- Screen, Benjamin.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Welsh: Analysing free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for 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ion of an Under-researched Language Pair." *The Journal of Specialised Translation*, no. 28, 2017, pp. 317-44.
- Wang, Xiangling, and Yanfang Jia. "Research Focus and Trends of Machine Translation Post-editing."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 2, 2018, pp. 82-87. [王湘玲、贾艳芳:《21世纪国外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实证研究》,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2-87页。]
- Yamada, M. "Can College Students be Post-editors? An Investigation into Employing Language Learners in Machine Translation plus Post-editing Settings." *Machine Translation*, vol. 29, no. 1, 2015, pp. 49-67.
- Zhechev, V. "Machine Transl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Post-editing Performance at Autodesk." *Proceedings of the AMTA 2012 Workshop on Post-editing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edited by Sharon O'Brien, et al., 2012, pp. 87-96.

◇责任编辑:马纳克

《诗经》中“帝”字的英译研究 ——以《诗经》的四个英译本为例

◎ 吴晓龙

内容提要:“帝”是《诗经》中重要的宗教色彩词,承载着中国古代社会原始的宗教文化。以“帝”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诗经》四译本中“帝”字翻译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帝”字的文化内涵基础,根据翻译目的论比较四个译本的翻译策略,进一步探讨翻译风格差异的内在成因,并最终建议“帝”字音译,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文化。

关键词:《诗经》 “帝” 英译 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4-0094-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诗经》多译本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研究”(15YJC740102)

作者单位: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津 300222

Title: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帝) in *Shijing* with Reference to Four English Versions of *Shijing*

Abstract: “Di”(帝)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 with religious color in *Shijing*, loaded with the primitive religious cultur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i”(帝) with reference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its translations in four English versions of *Shijing*.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di”(帝), the paper compar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e four ver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further explores the inherent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ends up suggesting the employment of transliteration in translating “di”(帝) to retain the maximum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source texts.

Key words: *Shijing*, “di”(帝), English translation, Skopos theory

Author: Xiaolong W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China.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与媒介,不仅是语言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王宁 1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翻译界定为穿行于意识形态之中的传介过程(刘云虹 252),从文化层面去考察不同的意识形态系统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语境下,翻译批评文化观的树立要求翻译批评者重点关注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和制约,促进中国文化真实面貌的最大化展现,把中华民族“最本质、最优秀、历史最精华的部分译介出去”(许方、许钧 72)。中国典籍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译者在典籍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准确恰当地传达原语承载的文化内涵,将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植入译入语,尽可能多地保留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元素,有效推动中学西传。语言中的民族意识化符号间接地反映了该民族文化的观念形态(刘宓庆 89)。在语言的文化转换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会造成语际转换中存在的文化障碍。作为儒家文化经典之一,《诗经》描绘出中国古代社会原始的宗教文化。《诗经》翻译中对古代宗教意识形态的正确解读,能够帮助译入语读者充分理解原文中民族意识化符号的折射性,有效消除文化障碍。“帝”字承载着中国古代原始的宗教文化,是典型的宗教色彩词。秦以前的“帝”指的是天神“上帝”(常玉芝 36)。《诗经》中塑造了最受尊崇的天神“上帝”。然而,《诗经》中“上帝”与西方基督教“上帝”的文化内涵显然有别。

一、《诗经》中“帝”字解读

在甲骨文中,“帝”指天神,是自然界中高居于天上的天神,故谓之天神“上帝”。《礼记·曲礼》曰:“天神曰帝。”另《字汇·巾部》亦云:“帝、上帝,天之神也。”《诗经》作为中国源头的诗歌总集,汇集了自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的诗歌305篇,被奉为儒家经典。笔者对《诗经》中“帝”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发现《诗经》中“帝”字共出现了43次,其中“上帝”24次。“帝”主要在《雅》尤其是《大雅》和《颂》部分,仅有1次出现在《风》中。这和诗的内容和作者身分密切相关。《风》为周代各诸侯国的民歌,主要是劳动人民的作品。《雅》中诗歌内容多与时政相关。《大雅》大多由统治阶级内部的上层贵族所作。《颂》多为贵族在寺庙中祭神、赞美国君功德的作品。“雅颂部分的文本隐含着寓政教于神恩的主题倾向,服从于政治伦常的理性要求”(周小兵、王志忠 66)。儒家思想中的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源于《诗经》中的神学天命观(韩裕庆 135)。殷周时期,“上帝”是居于天地之中最高秩序的至尊,是天上人间一切的主宰,权能无限,无所不及。因此,统治阶级受命于“上帝”,按照“上帝”的主观意志统治天下。商契受“上帝”之命出生立国,被奉为商的始祖:“帝立子生商。”(《商颂·长发》)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命于“上帝”而导九州“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商颂·长发》)。《商颂·玄鸟》中商汤受“上帝”之命征伐四方:“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另,《大雅·生民》中姜嫄“履帝武敏歆”神奇受孕,在“上帝”的庇护下诞下周之始祖后稷:“上

帝是依,无灾无害。”(《鲁颂·閟宫》)在殷周政权更迭时,云:“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大雅·文王》)证明周朝取代商朝的合理性。在提及王季对周王朝建立之贡献时,曰:“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大雅·皇矣》)文王乃周人崇敬的祖先,得“上帝”意旨建立周王朝,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大雅·文王》)《毛序》说:“《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大雅·皇矣》),赞颂文王的功业。因此,世人从《诗经》中得到警戒,曰:“无贰无虞,上帝临女。”(《鲁颂·閟宫》)、“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大雅·大明》),顺应“上帝”意愿。此外,“上帝”的主观意志决定着年成的好坏,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周颂·臣工》)同时人们遇上天灾、疾苦时,“上帝”意象也在为个人内在心灵服务(张敏等 197),表现为人们“怨天尤人”的思想情绪,和对“上帝”产生的敬畏乞求心理,曰:“后稷不克,上帝不临。”“昊天上帝,则不我遗”(《大雅·云汉》)、“有皇上帝,伊谁云憎?”(《小雅·正月》)、“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大雅·板》)等。总之,《诗经》中“帝”的文化内涵主要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崇拜自然的宗天思想和中国古代原始宗教中存在的“上帝至尊无对”的核心观念。殷商时期,“帝”“上帝”同“天”,被赋予超自然且至高无上的神性,“有命在天”的神学天命观深植于人心。到了西周,神学天命观得以继承和发展,产生了“明德配天”的思想,曰:“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大雅·皇矣》)。西周时期的“君权神授”思想被明显地赋予了“敬德”的道德属性,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增加了政治思想文化的人本主义色彩(韩高年、边思羽 113)。

二、《诗经》四译本中“帝”字英译比较

本文以“帝”字为研究对象,对《诗经》四译本中“帝”字翻译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进一步探讨翻译风格差异的内在成因。本研究选取的四个译本分别是伦敦特鲁布纳(Trübner)出版公司 1876 年出版的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诗经》韵体诗全译本(*The She King: Or The Book of Ancient Poetry*)(以下简称理译);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的庞德(Ezra Pound)的《诗经》全译本(*Shih-ching: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1](以下简称庞译);《大中华文库》版汪榕培《诗经》全译本(*The Book of Poetry*)(以下简称汪译);以及湖南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许渊冲《诗经》全译本(*Book of Poetry*)^[2](以下简称许译)。笔者对“帝”字在《诗经》四个译本中的英译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诗经》四译本中“帝”字英译比较

译本 “帝”的英译	理译	庞译	许译	汪译
God	39 (90.70%)	3 (6.98%)	29 (67.44%)	5 (11.63%)
god(s)	2 (4.65%)	3 (6.98%)	2 (4.65%)	23 (53.49%)
Sky/sky	0 (0%)	16 (37.21%)	0 (0%)	0 (0%)
Heaven/heaven	0 (0%)	4 (9.30%)	4 (9.30%)	8 (18.60%)
其他	2 (4.65%)	17 (39.53%)	8 (18.60%)	7 (16.28%)

从表 1 可知,《诗经》四个英译本中译者对“帝”字的诠释各不相同。理译基本上采用“God”与原文中的“帝”“上帝”对应,“God”在理译中的使用比例在四个译本中最高,占总数的 90.70%。许译中也大量使用了“God”来翻译“帝”,占总数的 67.44%。汪译中“God”的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占总数的 11.63%。值得一提的是,庞译中“God”的使用频率在四个译本中最低,仅占总数的 6.98%。此外,汪译中主要将“帝”译为“god”或“gods”,占总数的 53.49%,而理译、庞译和许译中“帝”字“god”的译法并不多见,分别占总数的 4.65%、6.98%和 4.65%。庞译则更多地选择使用“sky”来翻译“帝”,占总数的 37.21%,然而“sky”这一译法在其他的三个译本中未出现过一次。“Heaven”一词的使用可分为首字母大、小写两种情况。“Heaven”首字母大写,属于西方宗教神学范畴,用来指基督教等宗教中的上帝,而“heaven”首字母小写,指自然之天。在四个译本中,理译未使用“heaven”的译法,庞译中有 4 处将“帝”“上帝”译作首字母小写的“heaven”,许译和汪译均选择了首字母大写的“Heaven”,其中许译中出现了 4 次,而汪译中出现了 8 次,在四个译本中使用频率最高。综上分析,不难发现《诗经》的四个译本中对原语中的“帝”字有着各自不同的诠释,同时也体现了不同的译者不同的翻译选择。

我们不妨结合具体的实例直观地感受不同的译者对《诗经》中“帝”字的翻译选择。例如:

原文: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大雅·板》)

理译: Reversed is now the providence of God; The lower people groan beneath their load.

庞译: The sky's course runs a-foul and in reverse, a jaundiced people sink beneath the curse.

许译: God won't our kingdom bless; people are in distress.

汪译: The god above becomes insane; The people below suffer from great pain.

原文选自《大雅》中的《板》的首二句诗。据《毛诗序》记载,《板》乃凡伯刺厉王之作。

整首诗告诫同僚要敬畏天命,实则劝谏周厉王。该诗的首二句高度概括出作者作诗劝谏的原因。全诗围绕这两句展开,周朝的“敬天思想”贯穿始终。从译文不难看出,理雅各习惯性将原诗中的“上帝”用“God”表达,庞德则有意将“上帝”译成“sky”,许渊冲选用了首字母大写的“God”,而汪榕培则选择了首字母小写的“god”来翻译“上帝”。

三、《诗经》四译本“帝”字英译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 翻译目的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学界开始从功能和交际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研究。瑞斯(K. Reiss)提出,译文和原文功能之间的对等是评判译文最重要的因素(109)。霍斯(Holz-Mänttär)将翻译放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的专家通过各种信息传递综合体(“message-transmitter compounds”)进行跨文化的信息转换(转引自Munday 115)。霍斯的翻译行为理论过于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专家”地位,未对翻译行为的本质给予合理的解释。瑞斯的学生维米尔(H. Vermeer)突破了瑞斯对等理论的限制,进一步发展了霍斯的翻译行为理论,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的主流“目的论”(Skopos theory)。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Vermeer 227)。维米尔提出目的论的三大原则: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信原则(228)。目的原则是指任何翻译行为均由其目的来决定。连贯原则指的是译文要符合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的要求。换言之,译文须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忠信原则强调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语际连贯(intertextual coherence)。目的论者认为,译者应首先使译文达到预定目的,其次使译文文内连贯,最后才是使译文与原文连贯(Munday 118)。也就是说,目的原则是三大原则中的最高准则,即翻译行为最终由翻译的目的来决定。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各种选择都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根据翻译的目的决定具体的翻译手法,以实现译语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的交际功能(贾文波 49)。

(二) 译者翻译目的之差异

《诗经》四译本“帝”字英译统计可知,四位译者在“帝”字的翻译选择上表现出不同的翻译风格。根据翻译目的论,笔者认为不同译者“帝”字英译选择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译者在翻译目的方面存在差异。

理雅各的《诗经》英译本是西方世界公认的标准译本,对后来《诗经》英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乎成为后世《诗经》译者必备的参考书(李玉良 58)。作为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理雅各特别关注《诗经》中中国古代原始的宗教文化及其蕴含的一神论思想。在理雅各看来,《诗经》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原始的宗教信仰,是研究中国神学思想的可靠信息来源,其经

学价值无疑高于其艺术价值。儒家思想向西方的传播和翻译具有明确的目的(李玉良、罗公利 239)。理雅各英译《诗经》的最终目的是将基督教的部分教义与儒家神学思想相结合,以“合儒”宣教。理雅各在英译《诗经》时,努力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会通的翻译手段(李新德 296)早在明朝时期,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曾提出:“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转引自李新德 277)。利玛窦认为,中国上古时期先民崇拜的唯一至上神之“上帝”既是基督教的“上帝”。理雅各认同利玛窦的主张,在《诗经》中找到基督教“上帝”的存在,将《诗经》中的“上帝”主要用“God”表达。表面看,理雅各的翻译忠实于原文。实则,译者在翻译中的归化处理显然模糊了基督教与中国原始宗教的差异。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讲,翻译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可能使引入的异质文化完全本土化。理雅各用归化的方法以“God”去附会《诗经》中的“上帝”,显然混淆了英语“God”与中文“上帝”之间的区别,一方面会误导目的语读者,使之认为“上帝”(God)无处不在,译者似乎意在巩固基督教徒的宗教信仰,但未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另一方面,译者这种翻译方法使中国民众误信“God”等同于中国的“上帝”,从而更易于接受基督教教义,以便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最终使中国文明成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理雅各站在西方文化和宗教的立场上审视中国文化,试图用译语来吞噬原语及其意义,以进一步实现其用译语文化改变原语文化的决心和愿望。

庞德的《诗经》译本独树一帜,将翻译与创作融为一体,自由主动地对原诗进行阐释与改造。从前文中“帝”字英译统计分析不难看出,庞德在译文中主要采用自然之天“sky”。除此之外,庞德还分别使用了首字母大写“Heaven”首字母小写“heaven”“God”“god”“Welkin”(古语:天空;苍穹)、“holy sky”“over-sky”,以及“Shang Ti”等多种译法。庞德“帝”字的英译中出现了“God”,但频率很低,这显然与理雅各译本中“帝”字的处理有很大差异。按照目的论理论,庞德在“帝”字的翻译上,有意地避讳使用“God”,一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翻译目的由特定的文化态度及政治立场决定(刘云虹 255)。庞德的《诗经》翻译主要是为了改变西方社会与文化(吴伏生 433)。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庞德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20 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正处在战火纷飞、分崩离析的时期。随着西方文化危机的加深,庞德对西方文明深感不满,对中国文化这一异族文化寄予理想与期待。对庞德来说,儒家思想是拯救西方社会的“良药”。庞德试图通过他的汉诗翻译来满足西方读者逐渐接受并向往异族文化的这种需求。然而,庞德在“帝”字的翻译上世俗化倾向更明显。他只在极少数情况下使用西方读者熟知的基督教词汇“God”,这足以透露出庞德贬抑基督教文明的态度。庞德更多地采用“sky”或“Welkin”,或不加注解直接使用音译“Shang Ti”,使得译文淡化了原诗中的宗教色彩和庄重语气。不知西方读者是否能够揣测出原诗蕴含的上古中国文化中的宗教精神。

与理雅各和庞德的异族身份不同,许渊冲和汪榕培均是中国著名的典籍翻译家,他们翻译《诗经》的主要目的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虽同为中国的典籍翻译家,许渊冲和汪榕培在“帝”字的翻译上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许译本中大量使用“God”，而汪译本中主要采用“god”或“gods”。这种差异或许来自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标准。许渊冲把“三之论”称为中国学派文学翻译理论中的目的论（85）。这里的“三之论”显然更加强调译文与读者的关系。许渊冲希望传达《诗经》的意美、音美和形美，使西方读者“知之，好之，乐之”。鉴于“三之论”，许渊冲有意将“帝”译作“God”，用西方读者更为熟知的基督教词汇作为参照物唤起读者对宗教的联想，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是，这造成了西方读者对古代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误识”。汪榕培按照“传神达意”的原则，力求使英译的《诗经》再现其原有的风貌（35）。本文讨论的“帝”字翻译主要涉及“达意”，即译者应准确地理解和阐释“帝”字的内涵。汪榕培在译文中较多地使用小写的“god”或其复数形式“gods”，这就有效避免了借助基督教的观念对“帝”进行诠释。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出于译者担心西方读者误解中国上古宗教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之差异的考虑。值得指出的是，小写的“god”似乎更贴近“天之神”的释义，但“god”本身具有“二元主义”的危险，并未明确“帝”字的文化内涵。因此，将“帝”字译作“god”是否达意亟待进一步商榷。

综上所述，根据翻译目的论，理雅各和庞德翻译《诗经》的目的不同，故“帝”字处理方式也不同。相比两位西方学者，许渊冲和汪榕培同为中国学者，翻译《诗经》的目的是一致的，但由于各自推崇的翻译标准侧重有别，两位译者“帝”字翻译策略也不同。总的来讲，四位译者将“帝”字译为“God”“sky”或“god(s)”，都未能向西方读者准确传达“帝”字的文化内涵。当代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安乐哲提出用音译的方法来处理英语中没有相应对等词语的文化术语（常青、安乐哲 89）。笔者认为，在处理“帝”“上帝”这类有关中国上古宗教文化核心关键词汇时，译者不妨采用音译的方法“Ti”“Shang Ti”，以文化自觉作为出发点，把原语中有关中国上古宗教文化的重要概念移植到译语中去，免于西方读者误解其文化内涵。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讲，译文中适度的异质性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更易为译语读者所接受，因其可满足译语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期待。早在唐代，玄奘翻译佛经时就曾提出过“五不翻”的音译理论，其中“生善故”的论点尤其与我们谈及的“帝”字翻译相关，因其更加能体现出译者对原语文化的崇敬。事实上，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就曾采用过音译的方法。例如，伦敦会传教士高大卫在其《四书》译文中将“上帝”译为“Shang Te”（李新德 260）。19世纪80年代，来自英美的新教传教士曾在当时的《教务杂志》上建议理雅各将“帝”“上帝”直接音译成“Ti”“Shang Ti”（438）。又如，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苏慧廉曾将《中庸》中的“郊社之礼，所以祀上帝也”译为“The ritual offerings at the suburban altar were for serving the Shang Ti”（Soothill 258）。前文提到过，庞德的《诗经》译本中也用过“Shang Ti”。庞德将《周颂·执竞》中的“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译为“Shang-Ti(over sky) king'd our Ch'eng and K'ang”。这些实例其实足以说明，西方读者完全可以接受“帝”字之音译处理。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典籍翻译过程中，译者应采取文化自觉的视角，树立文化自信，以实现文化自强（王方路 8）。采用音译法有助于保留原语文化的“异国情调”，同时便于外来语

被植入目的语文化中并为之吸收,以丰富译语文化(白靖宇 19)。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加准确地把握“帝”字的文化内涵,建议在对“帝”字音译处理的同时加以注释说明。随着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相信西方读者会广泛接受“Ti”“Shang Ti”这类音译处理的中文外来语。

注释 [Notes]

[1] 参见 E. Pound, *Shih-ching: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 Harvard UP, 1954.

[2] 参见许渊冲:《诗经》。北京:中华书局,1993。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i, Jingyu.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10.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Chang, Qing, and Roger T. Ames. "Roger's View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Classic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Daode Jing*."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4, 2016, pp. 87-92. [常青、安乐哲:《安乐哲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英译观——从〈道德经〉的翻译谈起》,载《中国翻译》2016年第4期,第87-92页。]
- Chang, Yuzhi. "A Study of So-called 'Yellow Emperor' Based on that of the 'Emperor' of Shang Dynasty."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6, 2008, pp. 35-48. [常玉芝:《由商代的“帝”看所谓“黄帝”》,载《文史哲》2008年第6期,第35-48页。]
- Han, Gaonian, and Siyu Bian. "The Political Concepts in *Shijing*: Making the Poems of Political Praise and Irony, Poems of War, Poems of Banquet in the *Shijing* as the Investigation Centr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no. 2, 2013, pp. 111-18. [韩高年、边思羽:《〈诗经〉中所见的政治观念——以〈诗经〉政治美刺诗、战争诗、宴饮诗为考察中心》,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111-18页。]
- Han, Yuqing. "Theological Fatalism of *Shijing* and Its Influence on Political Thought in Later Generations."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 3, 2001, pp. 133-35. [韩裕庆:《〈诗经〉神学天命观及其对后世政治思想的影响》,载《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133-35页。]
- Jia, Wenbo. *On Pragmatic Translation with Functionalist Approach*. China Translation, 2012. [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
- Legge, J. *The She King: or The Book of Ancient Poetry*. Trübner, 1876.
- Li, Xind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Daoist and Buddhist Canons by Western Missioanries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李新德:《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注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Li, Yuliang. *Research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hijing*. Qilu, 2007. [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
- Li, Yuliang, and Gongli Luo.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the West*.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09. [李玉良、罗公利:《儒家思想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Liu, Miqing.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Translation (2nd edition)*. China Translation, 2012. [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
- Liu, Yunhong.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Criticism*. Nanjing UP, 2015. [刘云虹:《翻译批评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3rd edition)*. Routledge, 2012.
- Reiss, K. *Translation Criticism: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4.

- Soothill, W. E. *The Hall of Light: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Kingship*. Edited by Lady Hosie and G. F. Hudson. Lutterworth, 1951.
- Vermeer, H.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ition)*, edited by Lawrence Venuti, Routledge, 2004, pp. 227-38.
- Wang, Fanglu.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wareness: A Case Study of Shijing*. Guangming Daily, 2016. [王方路:《文化自觉关照下的典籍翻译——以〈诗经〉为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
- Wang, Ning.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Classic Interpretation*. Zhonghua Book, 2006.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北京:中华书局, 2006。]
- Wang, Rongpei. *The Book of Poetry*.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2008. [汪榕培:《〈诗经〉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Wu, Fusheng.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Legge, Giles, Waley and Pound*. Xueyuan, 2012. [吴伏生:《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2。]
- Xu, Fang, and Jun Xu. "Some 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Xu Jun."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1, 2014, pp. 71-75. [许方、许钧:《关于加强中译外研究的几点思考——许钧教授访谈录》,载《中国翻译》2014年第1期,第71-75页。]
- Xu, Yuanchong.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ory of the Chinese School: Forerunner of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no. 4, 2012, pp. 83-90, 127. [许渊冲:《再谈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载《中国翻译》2012年第4期,第83-90, 127页。]
- Zhang, Min, et al. "On 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 of God in *Shijing*." *Religious Studies*, no. 1, 2011, pp. 196-200. [张敏等:《浅论〈诗经〉中“上帝”意象的心理学意义》,载《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96-200页。]
- Zhou, Xiaobing, and Zhizhong Wang. "The Original Theory of Religious Phenomenon in *Shijing*." *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2, 1999, pp. 63-66. [周小兵、王志忠:《〈诗经〉宗教现象原论》,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63-66页。]

◇责任编辑:罗辉

FLC

语 言 学 研 究

“情感强化副词+X” 构式研究

◎ 刘芬

内容提要: 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程度副词+X”构式,对“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的研究十分鲜见。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下,探讨“情感强化副词+X”结构的构式表征及其不同的形式与意义,同时解析它与“程度副词+X”构式之间的承继关系,有以下几点主要发现:1)从语义上看,“情感强化副词+X”可能解读为程度语义和态度语义的并重,也可能程度语义凸显,态度语义漂白;2)“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与“程度副词+X”构式构成子部分和隐喻扩展的多重承继联接的关系,“程度副词+X”构式是“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存在的理据,对之进行统辖并压制;3)情感强化副词在隐喻认知机制的作用下,从其语义潜势中选择“高程度”语义参与“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的语义建构。

关键词: “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 “程度副词+X”构式 程度副词 构式语义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4-0103-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汉‘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的多维研究”(18YBA016);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英情感强化词的比较研究”(14YBA23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3

Title: A Study of “Emotive Intensifier + X” Construction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Degree Adverb + X” construction, and they seldom pay attention to “Emotive Intensifier + X” construc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by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representation and its different forms and meanings of the structure of “Emotive Intensifier + X”, and analyzing its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s with “Degree Adverb + X” construction,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ere made: 1) “Emotive Intensifier + X” may be interpreted as encoding equally degree meaning and attitude meaning, or as profiling degree meaning with a bleached attitude meaning; 2) “Emotive Intensifier + X” is related to “Degree Adverb + X” construction by subpart and metaphorical extension links, the latter motivating, dominating and coercing the former; 3) With the operation of metaphor mechanism, the potential high degree meaning of emotive intensifiers is selected for the meaning building of “Emotive Intensifier + X” construction.

Keywords: “Emotive Intensifier + X” construction, “Degree Adverb + X” construction, degree adverb, construction meaning

Author: Fen Liu,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语言中表达情感的词语以副词的形式用作高等级程度标记,相当于very或“很”,这就是情感强化副词(emotive intensifier)。这一类词英语中有jolly, bitterly, terribly, desperately, unbelievably, 汉语中有“好”“怪”“老”“死”等,它们作为程度副词的一个重要次范畴,异质性十分鲜明。然而,已有研究多将其看作普通的程度副词成员,在分类、句法和语义上等同处理^[1]。也有学者认识到情感强化副词与其他词语组合时具有特殊的语义特征^[2],但是该现象与“程度副词+X”结构的关联与区别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构式语法是语言学考察非常规结构的重要理论工具,为“非理想的”语言现象提供“理想的”解释,鉴于此,本文以构式语法为理论指导分析“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3](以下简称EIX构式)及其语义,以期获得一些新的发现。

一、“情感强化副词+X”的构式表征

戈德伯格(A. E. Goldberg)将构式界定为:“当且仅当一个结构式为形式-意义配对体,且无论形式或意义的某些特征,都不能完全从这个构式的组构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构式推知”(Constructions 4)。后来她对该定义进行了修正,认为“即使能从语言形式完全可以推知,只要出现的频率足够高,它们也可以以构式的方式存储”(Constructions at Work 5)。EIX构式是人们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情感强化副词使用中剥离、抽象出来的图式性的句法构式(刘芬,《语义压制》173)。

语言的更新一方面是为了社会发展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和新概念的命名,另一方面语言使用者也在不断地求新求异,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以获得特殊的表达效果,EIX构式因此产生。譬如,我们谈论一位沉鱼落雁、貌若天仙的美女时,可以说She is very, very beautiful,也可以说She is unbelievably / terribly / enviably / awesomely beautiful,汉语则可能用“怪漂亮的”“好漂亮”“狂漂亮”表达,方言里还有“老漂亮”“贼漂亮”。相较而言,情感强化副词unbelievably, terribly, enviably和awesomely的使用不仅强化表征了“美”的程度,还生动刻画了人们对美的不同体验。从情感体验的角度来看,每个人对美的感受可能有所不同,习惯性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也不一样,这就出现了不同情感强化副词和beautiful组合的情况。再如,描绘苦苦挣扎而无法摆脱的贫困落后时,可能会有如下表达:a terribly poor family, desperately poor countries,“怪落后的国家”“好穷的乡村”等。terribly的使用意味着贫困是一件可怕的事情;desperately表达贫困的程度显然更深,贫穷似乎没有尽头,是令人绝望的状况;“怪落后”和“好穷”也表达了贫穷和落后的程度超过人们的预期。

英汉语依托情感体验,表达“高程度”语义的语言表征十分常见,除上述表达之外还有deliriously happy, outrageously expensive, sorely miss, appallingly reckless,“好喜欢”“怪可怜的”“老长”“奇热无比”等。情感的常态偏离属性使之与认知结构中“程度副词+X”构式关联起来。该现象离不开人类识解机制对构式演化的调控(王雅刚、刘正光 460)。

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即 COCA) [4] 的数据来看, 英语情感强化副词, 尤其是语法化程度比较高的 *jolly*, *desperately*, *awfully*, *terribly*, *incredibly*, *bitterly* [5] 等, 与其他词语组合时, 表高等级程度的用法占比相对较高, 具体为: *jolly* 的语法化程度很高, 有些词典中 *jolly* 用作副词时, 唯一的义项就是 *very*, 为英式英语中的非正式用法; *desperately*, *awfully*, *terribly* 和 *incredibly* 的强化副词用法占比也分别为 61%、69%、85% 和 96%; *bitterly* 在词典中也有 *very*, *extremely* 的高程度释义, 但其强化副词用法占比相对较低, 为 33%。汉语中的“好”“老”“怪”等的程度副词用法也受到关注, 是程度副词研究的重要内容。

jolly pleased, *desperately afraid*, *disgustingly filthy*, *amazingly good* 和“痛苦”“暴怒”“奇痒”“怪可怜的”等在形式和语义上符合 EIX 构式典型示例的要求。上述表述中填充 X 槽孔的为具有层级性特征的形容词和动词等, 它们与情感强化副词在语义上重合或相近, 且具有相同的或褒扬或贬抑的语义取向。但是, 这些示例传递了一般程度副词不具备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色彩, 用独特的情感体验实现对程度的度量, 相对于“程度副词+X”构式来说, 它们是非原型的高程度表达。

EIX 原型构式义为“X 达到让人产生某种情感的高程度”(刘芬, 《英语情感强化副词》111)。该意义中的“高程度”语义不能从情感强化副词或其后的 X 直接推出, 换句话说, 由于情感强化副词频繁地出现于 X 之前, 在类推机制的认知运作和“程度副词+X”构式的压制之下, 情感强化副词的语义潜势中的“高程度”语义被选择参与构式的语义建构(刘芬, 《语义压制》177)。整个构式除了表达 X 的高程度以外, 还生动地传递了语言主体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态度和评价。以上分析表明, EIX 的高频使用及其意义的不可推测性使该语言形式表征成为构式单位。

英语情感强化副词一般与 *good* 和 *fast* 一类的等级性形容词组合; 汉语情感强化副词则倾向于与性质形容词组合。状态形容词, 如“雪白”“笔直”“粉碎”等, 因自身已有程度蕴含, 所以一般不再受程度副词修饰。当然也有例外, 学界对此探讨较多, 此处不再赘述。EIX 构式中 X 主要是形容词和动词, 英语中也可能是副词和介词, 如下例中的 *incredibly quickly*, *desperately in need of*。

(1) The water's spreading out **incredibly quickly**!

(2) Yet not for a generation has the country been so **desperately in need of** mor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汉语中的“程度副词+名词”结构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譬如, “很青春”“很雷锋”“很美国”。汉语情感强化副词“好”在地方方言中也有与名词组合的现象, 如湘方言中:

(3) 小王是我们身边少有的暖男, 他好**细致**, **好**体贴, **好**绅士。

(4) 你不要有事没事地招惹他, 他**好**婆婆妈妈。

句(3)和(4)中的名词性成分“绅士”和“婆婆妈妈”用于情感强化副词“好”之后, 不再凸显它们区别于“淑女”和“公公”的指称范畴。它们所蕴含的“温文尔雅, 体贴周到”和“啰嗦个没完”等性状语义得到认知的关注, 其超乎一般的程度为“好”所强化。

二、“情感强化副词+X”对“程度副词+X”构式的多重承继

构式之间允许多重承继 (Goldberg, *Constructions* 73)。例如, 动结构式与致使-移动构式之间具有子部分承继联接 (Subpart Inheritance Links), 即动结构式可以被看作是致使移动构式的隐喻拓展。EIX 构式和“程度副词+X”构式之间也具有相似的多重承继关系。EIX 承继了“程度副词+X”相关特征, 后者是前者存在的理据。

1. “情感强化副词+X”与“程度副词+X”构式的子部分联接

英汉情感强化副词标量的是构想标准以上的高等级程度范围, 我们熟悉的高等级程度副词主要有 *very* 和“很”, 以及表示大量的词语 *extremely*, *totally*, *completely*, *highly*, *largely*, “十分”“极”等, 只要具有量的概念, 要理解和认知它们的高程度语义并非难事。这些词语被认为是较为客观的程度的标量。除了规模 (*enormously*)、深度 (*deeply*) 和强度 (*heartily*) 方面的极度语义词汇, 门德斯纳亚 (B. Méndez-Naya) 还提到, 表达惊讶 / 可能性、消极情感和禁忌语等领域的情感强化副词也传递极度语义 (377)。通常情况下, *jolly*, *disgustingly*, *terribly*, *desperately*, *amazingly* 在心理词库中以情感方式副词的形式存储, 但是人们反复使用 *jolly good*, *disgustingly filthy*, *terribly wrong*, *desperately in love with*, *amazingly strong* 之类的表达时, 除了自身的情感体验和态度, 他们想要表达的还有被修饰成分的高等级程度特征。

情感强化副词是对“程度副词+X”构式的创新, 程度副词范畴因吸收新的成员也得到扩容。试比较情感强化副词和典型的高等级程度副词 *very* 和“很”在具体使用中的异同:

(5) The IQ test is **very difficu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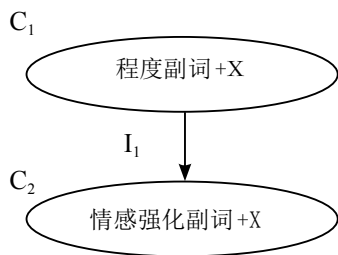
(6) The IQ test is **incredibly difficult**.

(7) 今年夏天**很**热。

(8) 今年夏天**奇**热。

very difficult 相对客观地描绘了 IQ 测试的难度。相比之下, 除了强化说明测试难度以外, *incredibly difficult* 还充分体现了语言主体对难度的“难以置信”的切身感受和体验, 形象生动

地传递了话语的意义,能引发他人的共鸣。与“很热”相比,“奇热”的强度更大,也可以更确切地描述热的程度远远超越常态或预期,让人感同身受。incredibly difficult和“奇热”是一种新奇而夸张的表达方式,更能吸引他人的注意,留下深刻印象。EIX与“程度副词+X”构式的子部分联接用图标示如下:



▲图1 “情感强化副词+X”与“程度副词+X”构式的子部分承继关系

(注: I_1 =Subpart Inheritance Links; C_1 为“程度副词+X”构式; C_2 为“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

图1中 C_2 承继了 C_1 的“高程度”语义,与 C_1 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即EIX是“程度副词+X”构式的家族成员之一,不过它是原型成员的偏离,除了高程度语义,还具有主观的情感态度语义。 C_1 对 C_2 具有统辖的功能,没有 C_1 就可能没有 C_2 ,同时 C_1 是 C_2 存在的理据,这些特征同样适用于“情感强化副词+X”与“程度副词+X”构式的隐喻扩展承继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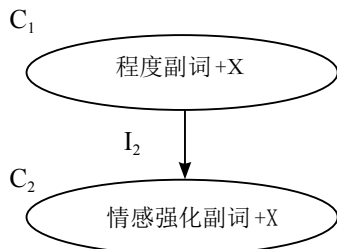
2. “情感强化副词+X”与“程度副词+X”构式的隐喻扩展联接

作为“程度副词+X”构式家族中的特殊成员,EIX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表达高程度语义,还表达语言主体对程度的评价和情感态度,实现特定的语用效果。表达情感的词语用于标量程度,表明情感强化副词的解读超越了其字面意义。具体来说,incredibly difficult和“奇热”的“高程度”语义解读,无论是事实描述还是有意夸张,都是经由了人类隐喻和转喻的认知机制才能达成的,对非本族语者或隐喻思维没有发展起来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表达很难理解。

尽管情感也有强弱之分,但是基于人们对情感的体验与认知,总的来说情感是相对于“平静”而言的心理状态,不论消极还是积极,都是对“平静”的偏离。正如在一根轴线上,“平静”是居中的一个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则分居“平静”的两个相反方向。无论是快乐、惊奇还是愤怒、痛苦、害怕,人们处于某种情感时都会产生特定的生理反应或心理唤醒。譬如,快乐时我们可能眉开眼笑、手舞足蹈、血脉喷张,快乐的心理唤醒表现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情绪。害怕时我们会感到毛骨悚然、噤若寒蝉、呆若木鸡,害怕的心理唤醒则是一种负面的消极的情绪。如果将“平静”视为一种常态的心理体验,那么情感对它的偏离就表现为高于或低于“平静”。刘芬在研究中发现,情感的常态偏离属性可以从情感的概念化和情感隐喻中得到佐证(《英语情感强化副词》174-81)。《牛津英语词典》对情感的释义表明,情感是

一种强烈的感受 (Emotion is a strong feeling); 奥斯特 (U. Oster) 曾指出, THE EMOTION IS AN INSANITY 的情感隐喻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 (739)。这意味着, “癫狂” 或 “非常态” 是情感的重要特征。

情感的常态偏离属性是概念隐喻发生的认知语义基础, 跨域投射到更为抽象的度量域中, 由于情感的层级性, 它便是位于假想标准值之上的某一范围, 与程度副词的概念内涵一致 (Quirk et al. 445), 情感强化副词因此解读为 “高程度” 语义。常态偏离属性是人们对各类情感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切身感受的认知, 所在的情感域为隐喻映射发生的源域, 目标域则是人们用于认识世界的更为抽象的度量域。从概念化的层面来看, 情感强化副词具有 “高程度” 的语义潜势, 基于一定的使用频率, 在 “程度副词+X” 的识解干预和压制下, “高程度” 语义得到凸显, 获得认知的关注, 解读为 “very / 很” (王雅刚、刘正光 458-59; Audring and Booij 17)。据此, “程度副词+X” 与 EIX 构式还构成隐喻扩展联接, 用图标示如下:



▲图2 “情感强化副词+X” 与 “程度副词+X” 构式的隐喻扩展承继关系
(注: I_2 =Metaphorical Extension Inheritance Links; C_1 和 C_2 与图1同)

图2中 C_2 通过隐喻认知机制解读为 C_1 的 “高程度” 语义, 与 C_1 构成隐喻扩展的承继关系。

三、“情感强化副词+X” 的构式语义

根据构式意义进行划分, EIX 构式有 EIX_1 构式和 EIX_2 构式两种类型: EIX_1 构式程度语义和情感态度语义并重, 除了标记X的高等级程度外, 语言主体的情感态度也得到明确表征; EIX_2 构式的程度语义是认知的焦点, 情感态度语义漂白, 即情感强化副词原快乐、愤怒和害怕等情感语义隐退, 不再被人们重点关注。

1. “情感强化副词+ X_1 ” 构式及语义

一般情况下, EIX_1 构式中情感强化副词和组合词语义重合或相近。在戈德伯格看来, 构式具有体验性, 与反映人类经验的情境的语义结构直接相联 (Constructions 5)。当事物性状态达到超乎常态的高度时, 激发了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此情此景中, 基于自身的情感体验,

人们选择用EIX₁进行语言编码,实现对程度或强度的个性化表达。情感强化副词的使用使得该构式在标量高程度的同时,传递了语言主体的情感态度和评价,例如:

(9) These high heels might be the latest style, and they did put her a bit closer to being able to look Mr. Phipps right in the eye, but they were **horribly uncomfortable** to balance in.

(10) I stayed in the city last night. Yes. And I don't often do it. I — it either has to be a cause I truly, truly believe in, or it has to be an honor for someone I **dearly love**.

(9)中horribly和uncomfortable同为消极意义的词语。句子表达的是“高跟鞋可能很时髦,也让她更高一点可以更近距离地注视Mr. Phipps,但是高跟鞋穿起来极不舒服,要保持平稳十分费劲”。horribly uncomfortable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穿高跟鞋成了让人后怕的经历”。(10)中的dearly love是爱恋情感强化副词与语义重合的动词组合,强化了爱的深度和强度,表达了语言主体的满怀的深情。

汉语中语法化程度较高的情感强化副词“老”和“好”与其他词语组合的能力很强,不过也依然保留与语义相近词语共现的用法,例如:

(11) 赵薇:也不至于那么天真,人家觉得我**老大**不小了,我还觉得我没长大呢。

(12) 这条裙子穿在你身上**好漂亮**!

“老大”是一种语义重叠的组合,这里并不是说赵薇很老了或年龄很大了,只是相对来说,别人可能认为她应该不至于那么天真,而是更稳重。从词源上看,“好”原为“容貌美”之意。《史记·孔子世家》中“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的“女子好者”为“美丽的女子”。在现代汉语中与“漂亮”组合,是EIX₁构式的示例构式。

EIX₁构式中也有情感强化副词和X语义冲突的现象,例如:

(13) I am naive enough, hopelessly **romantic enough**, to believe that writing helps me hide less, lets me trap some of the strangeness, the mad bouncing mystery of the everyday, in words.

(14) “I hear she's looking for a husband? If that's true, there will be no end of applicants for the position. She's young, beautiful, and **sinfully rich**, if you'll pardon the expression. What more could a man want?”

(13)和(14)中hopelessly romantic, sinfully rich的情感强化副词与组合词语义相悖。一般来说,romantic是一种与爱有关的浪漫,rich是“富有的”。与hopelessly, sinfully组合时,一

方面“浪漫”和“富有”的程度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它们受到情感强化副词消极语义的影响,失去原有的褒扬的意味,发生语义的降格。也就是说,情感强化副词在保留原有的绝望或怨怒的情感语义的同时,还传递了语言主体否定的情感态度,即“过于浪漫”和“不合理的富有”,其贬抑的态度语义和“高程度”语义同时得到凸显。汉语中也有情感强化副词与组合词语义相悖的情况,它们的态度语义通常弱化,因此多属于EIX₂ 构式的情况。

2. “情感强化副词+X₂” 构式及语义

EIX₂ 构式的语言理解过程中,人们更多关注了事物超越常态的属性,并没有特别感受到褒扬或贬抑的情感渲染,例如:

(15) Iraq's support for dissident elements in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such as the Abu-Nidal or Abu al-Abbas groups, which **dearly harme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interests.

(16) But when bad things happen and you get support from people, then that's wonderful. So you can't have one side of it without having the other side of it. And people have been **terribly good** to me and **terribly supportive**.

(15)和(16)中的情感强化副词dearly和terribly与组合词语义冲突,它们所在的语境并没有鲜明的喜爱和恐惧的情感意味,更多的是重在对形容词高程度的刻画。换句话说,语言主体的情感体验不是认知关注的焦点,注意力聚焦的是形容词表达的远超常规的属性特征。dearly harmed刻画了伊拉克支持解放组织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巴基斯坦国家利益的情况,dearly关于“爱”的原词语义已不见踪迹,只表损害的程度;terribly good和terribly supportive与“害怕”无关,而是good和supportive的高程度标记。亚达纳西婊(A. Athanasiadou)也发现表达式I terribly love you, She's fearfully clever中terribly和fearfully虽源自“害怕”概念,在句中却并没有“害怕”的情感意味(17)。情感副词情感意味的消失同样适用于dearly harmed和其他类似情况,情感强化副词情感语义漂白,不再做字面意义的解读,是它们区别于一般程度副词的重要特征之一。

EIX₂ 构式在汉语中十分常见,例如:

(17) 伪镇长的儿子李二秃眉飞色舞地向王二糟报告:“格个女人**好狡猾**,从我们埋伏着的香樟树底下过,象条猫一样,声响都没有……”

(18) 昨天举行的足球赛,主队以**6比0** **狂胜**客队。

“好”与语义相悖的“狡猾”组合,用于标量“狡猾”的高程度,并不表达赞赏或愉悦的

情感或态度;“狂胜”中的“狂”失去了原有“精神失常,疯狂”之意,表达“大胜”之意。

EIX₂ 构式中的情感强化副词通常语法化程度高,可以打破原有语义的限制,与其他词语的组合能力强。譬如以上提到的jolly, desperately, terribly, awfully, bitterly, amazingly, incredibly等,在《牛津英语词典》中专门有“very, extremely”之类的义项,它们都是语法化程度高的词语,其“高程度”语义已为语言使用者普遍接受和认可。汉语的“老”和“好”等的语法化程度也很高。根据卢惠惠的考察,“老”在元代开始有了程度副词的用法,在明代有了迅速的发展(99)。其语法化机制是对“老大+名词”的重新分析,分析成“老+大+名词”,“老”用于强化“大”的程度,后来“大”逐渐为其他形容词所代替,“老”完成其语法化进程,如“老远”“老高”“老长”,以及东北方言中的“老喜欢”“老漂亮”等;同样,“好”语法化程度也很高,诸如“好恶心”“好感动”“好无聊”等都容易理解,不会因为冲突语义的组合而占用我们太多的认知。

本文在构式语法框架下,通过与“程度副词+X”构式的对照,探讨了EIX结构的构式表征、不同形式及其语义特征。EIX构式是人们基于情感体验表达事物性状程度或动作行为强度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原型构式义为“X达到让人产生某种情感的高程度”,整个构式除了表达X性状的高程度以外,还生动地传递了语言主体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态度和评价。EIX构式是“程度副词+X”构式家族中具有很强异质性的成员,并与之构成子部分和隐喻扩展的多重承继联接关系。EIX构式主要为两大类:EIX₁构式除了标量事物性状程度或动作行为的强度以外,它还承载了语言主体鲜明的态度意义;EIX₂构式表现为程度语义的凸显和态度语义的漂白。

注释 [Notes]

- [1] 相关内容参见D. Bolinger, *Degree Words*. Mouton, 1972; C. Paradis, “Configurations, Construals and Change: Expressions of Degree.”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no. 12, 2008, pp. 317-43;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 季薇:《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 [2] 相关内容参见Jing-schmidt Zhuo, “Negativity Bias in Language: A Cognitive-Affective Model of Emotive Intensifiers.” *Cognitive Linguistics*, no. 3, 2007, pp. 417-43; A. Foolen and Van der Wouden, “Dutch between English and German.” *Presented at A Comparative Linguistic Conference*. KU Leuven, 2013; J. Calle-Martin, “On the History of the Intensifier Wonder in English.”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no. 3, 2014, pp. 399-419; 马真:《普通话里的程度副词“很、挺、怪、老”》,载《汉语学习》1991年第2期,第8-13页; 邢福义:《南味“好”字句》,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第78-85页。
- [3] 如果X为动词,英语中“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也存在“X+情感强化副词”的形式,如desperately need / want / hope / wish和need / want / hope / wish desperately都有相关用例。这种语序区别不影响本文的讨论,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只选用“情感强化副词+X”的形式进行分析。
- [4] 本文中英文例句均来自该语料库。COCA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为当代最大的英语平衡语料库,网址为corpus.byu.edu/coca/。
- [5] 通常情况下,情感强化副词表达的语义比very和“很”的程度更高,囿于篇幅,本文不在此展开进一步的论述。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thanasiadou, A. "Emotive Intensification and Subjectivity." *Emotions in and around Language: Book of Abstracts*, edited by Ene Vainik and H. Sahkai, The Institute of the Estonian Language, 2010, pp. 17-19.
- Audring, J., and G. Booij. "Cooperation and Coercion." *Linguistics*, no. 54, 2016, pp. 17-37.
-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U of Chicago P, 1995.
- .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UP, 2006.
-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1)*. Stanford UP, 1987.
- Liu, Fen. *A Cognitive Semantic Study of Emotive Intensifiers in English*. Dis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6. [刘芬:《英语情感强化副词的认知语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 . "Forms and Operations of Semantic Coercion: Interpretations for 'Emotive Intensifiers + X'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 2, 2019, pp. 171-79. [刘芬:《语义压制的表现形式及其运作——兼论“情感强化副词+X”的语义解读》, 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第171-79页。]
- Liu, Jianhui, and Fen Liu. "Research Status and Analysis of Emotive Intensifie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Journal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6, 2017, pp. 121-28. [刘剑辉、刘芬:《英汉情感强化副词研究现状与分析》, 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第121-28页。]
- Lu, Huihui.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Degree Adverb 'Lao'(老) in Modern Chinese."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no. 4, 2009, pp. 97-101. [卢惠惠:《近代汉语程度副词“老”的语法化》, 载《语言研究》2009年第4期, 第97-101页。]
- Méndez-Naya, B. "On Intensifier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The Case of SWIPE." *English Studies*, no. 4, 2003, pp. 372-91.
- Oster, U. "Using Corpus Methodology for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nalyses: What can Corpora Tell us about the Linguistic Expression of Emo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no. 4, 2010, pp. 727-63.
- Quirk, 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gman, 1985.
- Wang, Yagang, and Zhengguang Liu. "Construal Shifts in Constructionalization."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no. 4, 2017, pp. 451-62. [王雅刚、刘正光:《构式化中的识解干预》, 载《现代外语》2017年第4期, 第451-62页。]

◇责任编辑: 陈忠平

转喻心理加工深度的认知语用研究

◎ 范振强

内容提要: 转喻的加工深浅问题是转喻认知研究亟需解决的重点课题。运用概念结构多层级理论对转喻进行分析发现,就内部认知机制而言,作为认知方式的转喻是一种概念结构复合体,至少存在意象图式、认知域、框架和心理空间等四个加工层级;就外部语用机制而言,转喻也是一种交际方式,转喻认知在交际中受到互文性、文本结构、语境和交际个体四个因素的制约;研究再次表明,转喻是一种复杂的认知和交际方式,其复杂谜底的解开需要综合运用认知和语用因素。

关键词: 转喻 心理加工深度 概念结构层级 认知语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19) 04-0113-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刻意性转喻的认知语用研究”(19BYY008)

作者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Title: The Depth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Metonymy within a Cognitive-pragmatic Perspective

Abstract: The depth of metonymic processing is a newly-emerged key issue in cognitive metonymy studies. A multi-level conceptu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metonymy operates within a matrix domain or metonymic complex, which includes four hierarchical levels: image-schema, domain, frame and mental space. On the other hand, as a communicative phenomenon, metonymy is also constrained by intertextuality, rhetorical structure, context and communicators. This research once again indicates that the explanation of metonymy, which is a communicative and cognitive phenomenon, requires insights from both pragma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Keywords: metonymy, depth of metonymic processing, conceptual structure hierarchy, cognitive-pragmatic mechanisms

Author: Zhenqiang Fan,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雷科夫(G. Lakoff)与约翰逊(M. 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的出版,引发了隐喻研究的一场认知革命,书中论述了隐喻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将隐喻提升到“我们赖以生存”的高度。近来许多认知语言学者认为转喻比隐喻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Metonymies We Live By”(王寅 236),有学者还呼吁建立转喻学^[1]。

本文针对当前转喻研究存在的不足,引入交际因素和认知主体因素,将转喻视为一种在具体语境下使用的语用交际现象,并借鉴认知语言学有关对认知主体多层次概念结构的最新研究成果(Kövecses 1-26),尝试构建转喻心理加工的深浅程度等级连续统及其与语境因素的互动。

一、现有转喻深度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转喻的认知研究范式主要有两个: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的关联理论。

首先,纯认知语言学范式下的转喻研究存在不足。它面临“将转喻扩大到句子层面而引发的弥散性问题”(赵彦春 80)和“将转喻无限泛化的问题”(霍四通 238)。

其次,作为认知语用学基础的关联理论也重视转喻研究,在关联理论范式下,主要的转喻理论有三个:阐释说(Papafrogou 165-95)、临场概念说^[2]和心理图式说(Jodłowiec and Piskorska 161-87)。但转喻是关联理论显义研究的短板(Carston 253)。

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关联论在对转喻的解释中,除了各自存在的问题,两者都忽视了转喻认知语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转喻的加工有深浅之分,可以从下面两个例子表现出来,

(1) Buckingham Palace issued a statement.

a. (正常句) They expressed their satisfaction.

b. (正常句) It expressed its satisfaction. (Blanco-Carrión 62)

(2) a. (正常句) Molly married money but kept it a secret.

b. (正常句) Molly married money but loves her husband.

c. (异常句) Molly married money but never spent it. (Radden 164)

例(1)中的“Buckingham Palace”既可以取字面义直指“地点”,也可以转指“英国王室”,因此属于浅加工;而例(2)中的“money”只能转指有钱人,属于转喻的深加工。

在认知语用学研究中关注转喻深浅问题的仅有约德沃维茨(M. Jodłowiec)与皮斯科尔斯卡(A. Piskorska),他们在关联理论的范式下提出了一种转喻浅层加工理论,称为心理图式模型。但这种模型将所有转喻浅层加工中的转喻目标域都界定为[ENTITY],这种一概而论的解释思路,有过于笼统之嫌,且忽视了各种具体转喻之间的差别。该模型将转喻视为一种显义,根据语用关联理论,显义的定义是,“当且只有当话语U所传递的假设是由U编码的逻辑形式拓展形成,那么该假设才是显义[……]所有不是通过这种显现的方式传递的假设都是隐义。

[……] 显义是语言解码和语境推理的结合”(Sperber and Wilson 182)。转喻与消解歧义和确定指称相关,属于话语显义,其最佳关联有时候表现在有助于生成足够的隐义,有时候本身就具有语境效果。

心理图式模型认为受话者在加工转喻时并不需要在显义层面推理出一个完整的概念或命题,而只需要到达形成一个高度抽象的心理图式的程度即可,这种心理图式的外延由转喻表达式加以限定(而不是决定)(Jodłowiec and Piskorska 173)。例如,

- (3) The Washington Post has been digitized from cover to cover.
- (4) The Washington Post has been writing about draconian cuts in social spending.
- (5) The Washington Post has been one of Buffett's flagship investments. (173)

例子中“Washington Post”做转喻用法时,目标域是“Copies of The Washington Post in circulation”“The Washington Post journalists”“The Washington Post stock ratings”。在理解上面转喻用法时,受话者在认知语境中检索最凸显的语境假设,并且对话语的显义和隐义进行推理。关联理论指出,显义和隐义的推理是相互调整的关系,最终是为了获得具有最佳关联的交际意义。最佳关联的取得对转喻义加工的深度有不同要求,有时候需要深加工,而有时候浅加工即可获得最佳关联。约德沃维茨与皮斯科尔斯卡指出,转喻的解读过程或许不需要推理出一个全面的、有真值的显义,而只需要生成一个不完整的显义图式,图式内的某些成分不用赋具体的值(174)。换言之,在某些语境下,转喻推理得到的只是一个有待变量赋值的空概念。以例(1)为例,它的显义可能是,如果[ENTITY M_{The Washington Post}] HAS BEEN DIGITIZED FROM COVER TO COVER,那么有可能推知:

我就可以用手机看《华盛顿邮报》了;

我就不需要天天跑报摊买《华盛顿邮报》了;

我可以在上班的地铁上随时阅读《华盛顿邮报》了

……

受话者在获得这些隐义时,最佳关联期待得到满足,推理即刻停止,不再逆向对显义进行深层推理。具体而言,例(1)中受话者只需用到粗略的显义[ENTITY M_{The Washington Post}]即可获得上述隐义,而无须具体推理出“copies of Washington Post in circulation”(176)。同理,例(2)和例(3)的显义分别为[ENTITY N_{The Washington Post}]和[ENTITY O_{The Washington Post}]。

总之,转喻的心理图式理论虽然意识到了转喻显义加工的深浅问题,但该理论存在以下不足:(1)将转喻的加工程度分为深浅两极,忽视两极之间的过渡体或连续统;(2)只关注转喻显义的浅加工,对转喻的深层加工重视不足;(3)只聚焦概念推理和关联原则,相对忽视了认知主体及语境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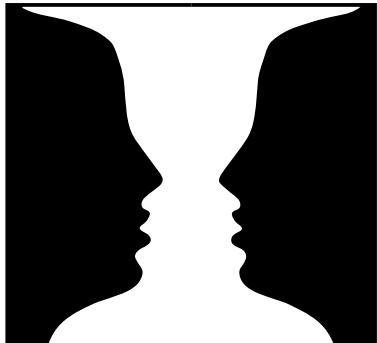
二、转喻复合体及其加工影响因素

认知语言学的转喻是一个概念复合体，它的运行一方面遵从人们的基本认知规律，另一方面受到外部语用因素的制约。

（一）转喻复合体

转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不一定是一种以此代彼的关系（表示为“X代替Y”），而常常是一种“X加Y”的关系。比如说“喜欢听贝多芬”并不是说喜欢听“音乐”，而是说喜欢听“贝多芬的音乐”（范振强，《具身认知视域》51）。最新研究表明，“所有的转喻都是认知域的扩展 [domain expansion]，即源域为目标域的构建增添了新的概念材料。换言之，源域意义从概念上整合到了目标域意义之中”（Panther and Thornburg 142）。也就是说，转喻的结果是形成了源域和目标域的意义复合体。

人们对转喻复合体的认知受焦点/背景法则的支配。完形心理学认为，人们的知觉组织法则之一是焦点/背景法则，“焦点”是认知加工的突出实体，是我们感知到的事物，而“背景”是用来衬托焦点的事物。例如在图1中，我们要么感知到花瓶，要么感知到两张脸，而不能同时感知到脸和花瓶。被感知的事物是焦点，处于激活状态，是注意力和短时记忆加工的对象，也就是被深加工的对象；而背景是潜在的加工对象，一定的语境下或处于特定的交际目的时也会上升成为焦点。



▲图1 脸与花瓶幻觉图（Rubin 201）

就转喻复合体的认知而言，在一定的语境下，当转喻的源域为焦点时，目标域为背景，无需转喻深层推理，为转喻浅加工；反之，当语境要求将目标域推理出来并作为认知焦点时，则转喻受到深加工^[3]。浅加工不等于不加工，而是加工的强弱问题，焦点加工强度强，背景强度弱，两者都是潜在的激活对象，如例（1）所示。

（二）影响转喻复合体焦点和背景切换的因素

转喻复合体中源域和目标域作为焦点与背景切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语言因素，例如：

（6）[乐队指挥]：Is everyone here?

[乐队成员]：The saxophone just left. (Falkum 245)

音乐指挥问所有人（乐队成员）是否到齐了，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关涉人的，这是

双方共知的背景信息。而回答说“萨克斯管刚刚离开了”，谓语动词“left”激活“人”，因此源域和目标域同时激活，使得萨克斯管和演奏萨克斯管的人成为一个转喻复合体。但在当前语境下，对于乐队演奏而言，乐器的存在和与其他乐器的配合是凸显的，各种乐器在演出中的作用是意义的焦点，“萨克斯管”成为焦点，是深加工的对象，而演奏者是背景，仅获得浅加工。如果话轮继续进行下去，可以说，“那赶紧找人来代替一下啊”，这里要找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能够演奏萨克斯管的人，萨克斯管依然是焦点。

其次，转喻复合体的焦点与背景切换也受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认知距离的影响。比如：

(7) 这本书很难懂。

(8) 这本书很重。

转喻学者认为例(7)中的“书”转喻“书的内容”，而(8)转指“书的物理实体”。实际上，这两个转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认知距离如此之近，除非被专门指出或提示，普通认知主体一般感觉不到转喻的存在，属于浅加工。

实际上，按照约德沃维茨与皮斯科尔斯卡的分析，例(6)的转喻显义是[ENTITY M_{the saxophone}]。如果转喻的浅加工只激活到一个抽象ENTITY的程度，就无法区分不同转喻之间的细微区别。“显义和隐义的界定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交际传递的假设要么是显义要么是隐义，但是显义的显现程度有轻重之分”(Sperber and Wilson 182)。例(6)中的转喻如果按照抽象等级可以分为“部分代部分”→“物体代人”→“乐器代演奏者”→“萨克斯代萨克斯管演奏者”。不难看出，四个等级代表了不同的加工深度，尽管都是浅加工，谓语“left”的出现至少可以将[ENTITY]具化为[PERSON]。

三、转喻的多层级概念结构与转喻层级的加工深度

为了更好地分析转喻的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内部认知距离和外部语境因素，本节尝试将转喻复合体按照概念抽象程度或者图式化程度，细化到四个层级结构，结构中的任何一个层级都可以成为意义的焦点，其他层级则属于背景。聚焦不同的层级和选择不同的焦点体现了不同的加工深度，而影响加工深度的语用因素除了上下文语言因素之外，还包括互文性、文本结构、客观语境和交际主体等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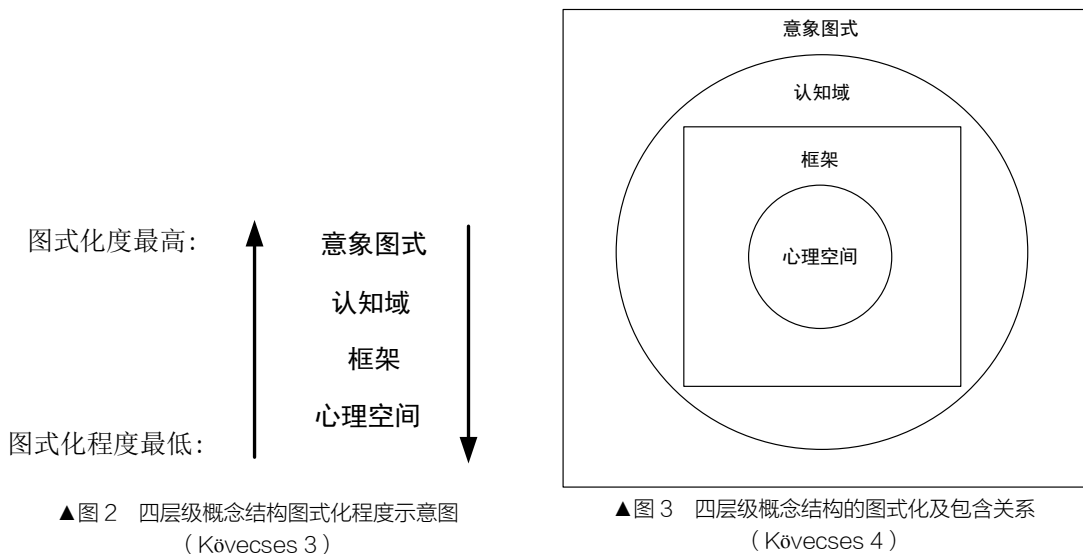
(一) 转喻表征的多层级概念结构

目前的修辞语言心理加工深度的研究多围绕隐喻展开^[4]，“尚没有转喻模型关注转喻的浅层解读机制”(Jodłowiec and Piskorska 181)。实际上，同样一条转喻按照加工深浅可以分为多个层级，如，

(9) 报道认为, 拥有可靠的涡扇-10A发动机和良好航电系统的歼-16可以在挂载大量精确制导武器的情况下, 对敌人进行远程奔袭, 让北京获得远程打击能力。有了这款飞机, 解放军空军将拥有性能良好的远程攻击平台, 足以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军及其盟友的军事基地和其他设施形成威胁。(新浪网 we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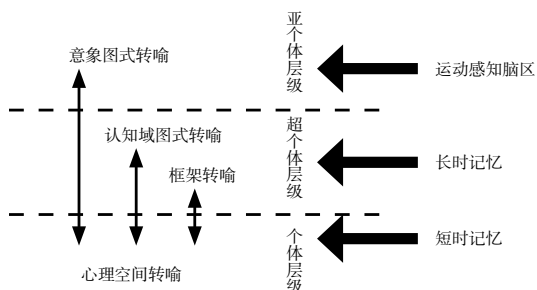
例(9)中的“北京”按照等级结构由高到低可以分为: “地点代国家” → “首都代国家” → “北京代中国” → “北京代中国人民解放军” → “北京代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我们尝试借用科维西斯(Z. Kövecses)的概念结构四层级理论更精确地说明转喻的层级特征。根据该理论, 概念结构按照抽象程度或图式化程度由高到低呈递减层级分布, 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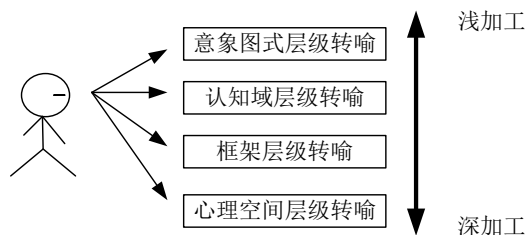


在语言或多模态交际过程中, 层级结构中的意象图式、认知域、框架和心理空间同时发挥作用。四个层级之间的关系是, 下位层级是上位层级细节的填充和增补; 反之, 上位层级是下位层级的抽象化和概括化。因此, 四个层级之间存在继承关系, 如图3, 但是在具体的语言内和语言外因素的基础上, 依然可以区分清楚。

就具体定位而言, 四层级中, 意象图式源自身体经验, 为大脑的感知运动区所表征, 属于亚个体的无意识认知(subindividual unconscious cognition)。认知域和框架知识是特定语言文化社团约定俗成的集体概念表征, 存储于社团所有成员的长时记忆中, 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因文化而异, 属于超个体认知(superindividual unconscious cognition)。心理空间是个体在交际过程中实时构建的话语空间, 是基于意象图式并整合语境和话语因素, 对认知域和框架空位的细节填充过程, 是一种有意识认知(individual conscious cognition)(范振强、郭雅欣 62-63)。见图4。



▲图4 不同层级的概念结构激活示意图



▲图5 概念结构层级与转喻心理加工深度

综上所述,层级越高,转喻就越抽象,加工就越浅。反之,层级越低,转喻概念结构越详细,激活程度也越高。见图5。

按照上述概念结构四层级理论,例(10)——(14)中转喻的层级结构可以表示表1:

(10) The sax has the flu today.

(11) The BLT is a lousy tipper.

(12) The gun he hired wanted fifty grand.

(13) We need a better glove at third base.

(14) The buses are on strike.

(Lakoff and Johnson 38)

表1 转喻加工层级及示例(范振强、郭雅欣 63)

	源域	转喻关系	目标域	例子编号
1. 意象图式层面	部分	激活指代	部分	例(10)——(14)
2. 认知域层面	物体	激活指代	人(使用者)	例(10)——(14)
3. 框架层面	乐器	激活指代	演奏者	例(10)
	食物	激活指代	餐馆点餐顾客	例(11)
	武器	激活指代	武器使用者	例(12)
	衣服	激活指代	穿衣服的人	例(13)
	交通工具	激活指代	司机	例(14)
4. 心理空间层面	萨克斯	激活整合	萨克斯演奏者	例(10)
	BLT 三明治	激活整合	点BLT三明治的顾客	例(11)
	枪	激活整合	枪手	例(12)
	棒球手套	激活整合	戴手套的棒球手	例(13)
	公共汽车	激活整合	公共汽车司机	例(14)

(二) 基于多层次结构的转喻加工深度连续统

1. 转喻加工的深浅程度的认知语用机理

心理语言学家指出,修辞语言的心理加工有深浅之分,认为“人们对修辞语言的理解既可以是快速的理解以获得粗略意义,也可以是慢节奏的精细解读,甚至鉴赏,两个极点之间

是一个渐进的过渡体”(Gibbs and Colston 214)。根据关联理论,人类的交际行为遵循关联原则,即认知努力越大,认知效果就越大,反之亦然。这里的认知努力指的是认知资源的消耗程度,消耗越大,对刺激信号(包括语言交际信号)的心理加工就越细致和深入,收获的认知效果或回报也就越大;相反,认知消耗越小,对刺激信号的心理加工就越浅,认知效果就越趋于平淡。在交际中,认知付出和认知效果之间总是保持最佳平衡,认知效果从最大到最小之间呈现一个连续统分布。而图2所示的转喻层级结构就构成了转喻在线加工深浅的基础,在不同的语用因素触发下,层级结构从上到下体现出由浅入深的过渡体。

2. 互文性与意象图式层面转喻的最浅加工

首先,互文性会影响转喻的加工深度。如,

(15) Bush Bombed Iraq.

该例子被认为是CONTROLLER代CONTROLLED的关系,“Bush”代表他统率、控制的美国军队(李福印 158)。但拉登(G. Radden)对类似CONTROLLER FOR CONTROLLED转喻提出疑问,例如,

(16) Reagan and Gorbachev won the cold war? What of the citizens of Eastern Europe who worked so hard, often with great sacrifice, to gain freedom? (175)

例子取自读者对《时代周刊》一篇文章的评价,问句是该读者截取了文章的原话并提出了质疑。显然,该读者对下划线名词进行了字面而非转喻解读,即句中Reagan和Gorbachev就是指的CONTROLLER,才有了下文和CONTROLLED(citizens of Eastern Europe)的对照。“我们甚至质疑CONTROLLER FOR CONTROLLED转喻的心理现实性”(Radden 175)。

我们对以上两个战争转喻进行重新分析发现,实际上,例(15)轰炸事件整体包括轰炸的决定、策划、准备、发动和事后处理等整个事件序列过程,布什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轰炸过程,但他从决策层面批准部队实施轰炸,所以是轰炸事件序列整体的一部分。总之,布什和军队都是整体事件的参与者,布什是部分,所有参与者是整体,例子从高层级分析也是“部分代整体”转喻。该转喻的层级结构(加工深度)可表示为: Part for Part => Controller for Controlled => Bush for The army。转喻到底是在哪个层级发生,取决于具体语境。例(15)中,发话者知道虽然布什没有亲自参加炸弹空投,但使用转喻的主要动机是强调布什是事件的发动者、批准者,对该事件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听话者只需激活最高层“部分代整体”转喻,做模糊浅层推理即可,而无须追究到底是哪只部队,哪种轰炸机型参与了轰炸。例(16)中读者的反应也正好印证了这种解释,读者知道,不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单枪匹马赢得了冷战,而是以两者为首的整体(即读者已经做了“部分代整体”转喻推理),例(16)中作者反对的是,原文转喻过

分凸显两个个体（部分）的功绩，而对普通大众（整体）的功劳隐匿。这种认知方式跟脸与花瓶幻觉图类似，其原理就是焦点—背景理论，即个体是焦点，普通大众是背景。见表 2。

表 2 意象图式层级和转喻的浅加工

结构层级	源域	转喻关系	目标域
1 意象图式层面	部分	激活指代	整体

3. 文本结构与认知域层面转喻的次浅加工

文本的结构或呈现方式也会影响转喻的加工深度。例如，

（17）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dominate is the lack of a viable rival. The European Union is too fractured, Japan is too old, Russia is too corrupt, India is too poor, Brazil is too unproductive. （Radden 174）

例子中下划线名词包含一个国际组织和四个国家,涉及潜在转喻及其层级图示如下(表 3)：

表 3 转喻的认知域层级心理次浅加工

	源域	转喻关系	目标域	例子
1 意象图式层面	整体	激活指代	部分	
2 认知域层面	国家（组织）	激活指代	成员国	The European Union
	国家	激活指代	居民	Japan
	国家	激活指代	机构	Russia
	国家	激活指代	经济	India
	国家	激活指代	产业	Brazil
3 框架层面	欧盟	激活指代	28 个成员国	The European Union
	日本	激活指代	老龄化人口	Japan
	俄罗斯	激活指代	政治机构	Russia
	印度	激活指代	经济状况	India
	巴西	激活指代	产业的生产力	Brazil

例子中，由于主语和谓语的搭配异常，这使得认知主体模模糊糊觉得有必要对下划线的主语进行指称转移,即在认知域层面“国家”域需要转换成其他子认知域（成员国、居民、机构、经济、产业）才能保持语句通顺。但读者几乎不大可能注意到不同目标域的存在，更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些具体的目标域上。“语句的平行结构的使用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暗示，读者往往会对五个国家的述谓做相同解读”（Radden 175）。总之，特殊的文本结构使得转喻停留在浅层加工层面即认知域层面，换言之，认知主体意识到需要进行认知域的转移，但不会深入到具体的目标域，而仅停留在上表中的第二层级，不会进入第三层级。见表 4。

表 4 认知域层级与转喻的次浅加工

	源域	转喻关系	目标域
1. 意象图式层面	整体	激活指代	部分
2. 认知域层面	国家（组织）认知域	激活指代	子认知域

4. 语境与框架层面转喻的中度加工

有些语境以程序化运作为主，对框架知识中的角色或者事件结构依赖明显，而具体的角色值相对不重要。比如在餐馆语境中，服务员之间交流时可以说：

- (18) 二号桌买单。
- (19) The ham sandwich is getting restless. (Papafragou 176)

服务员说例（18）的主要交际目的是提醒收银员同事准备收取二号桌的付款，受话者理解到这个交际意图即可获得最佳关联，而无需对于二号桌客人的身份或其他特征进行额外推理。在这种情况下，“发话者不知道指称对象的名字或者不想暴露交际对象的真正身份”（Rebollar 196），既然连发话者对指称对象都不熟悉，就谈不上传递给受话者了。更何况，即便发话者知道对象身份，这对当前的语境而言也没有关联，餐馆工作人员此刻关心的是营业活动的顺利进行，即消费买单程序的顺利完成。收银员只要走到相应号码的桌前即可收费，或者消费者亲自走到前台，告诉收银员自己的桌号以付费买单。同样，在分析例（19）时，雷科夫与约翰逊指出，发话者“根本不关心指称的人是谁，而只关心其顾客身份，这样的句子是一种去人化 [dehumanizing] 的用法”（39）。总之，例（18）和（19）中，交际者只关心框架层面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的填充是什么，甚至是否由人来填充这些角色，则对交际没有关联，所以无须认知深加工。在餐馆语境中，用桌号或所点菜品来区分不同的消费顾客已经成为该领域的常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这都促进了转喻的浅加工。

在脱离具体语境下，这类转喻的浅加工甚至更浅，例如：

- (20) The ham sandwich does not look very fresh.
- a. The ham sandwich does not look very fresh today, does it?
- b. The ham sandwich does not look very fresh today, does he?
- (Jodłowiec and Piskorska 178)

可以看出，例（20）中的下划线词语有歧义，既可以做转喻解读，也可以取字面义。约德沃维茨与皮斯科尔斯卡据此认为 “The ham sandwich is waiting for his check.” 一句中的 “The ham sandwich” 并不需要被解读为 THE HAM SADWICH CUSTOMER 或 THE HAM SANDWICH ORDERER 或 THE HAM SANDWICH PERSON。在抽象语境下，我们认同这种

最浅加工解释模式,但在具体语境下,受话者还是会激活框架知识进行转喻理解,利用桌号或不同的菜品来区分不同的消费数额来进行相应收费。这种转喻加工是一种中等深度的加工,主要激活框架知识,但又不至于细化到对具体的个人进行深加工。见表5,

表5 框架层面与转喻的中度加工

	源域	转喻关系	目标域	例子
1 意象图式层面	部分	激活指代	整体	
2 认知域层面	物品	激活指代	物品使用者	二号桌
	商品	激活指代	商品消费者	The ham sandwich
3. 框架层面	桌号	激活指代	桌号对应的消费顾客	二号桌
	汉堡	激活指代	消费汉堡的顾客	The ham sandwich

5. 交际个体与心理空间层面转喻的深度加工

本节从发话者、受话者和交际双方的交互主观性三个角度分别论证转喻的深加工。

第一,从发话者角度的交际意图而言,转喻的深加工分两种情况。

首先,发话者利用现场语境因素意欲让受话者在显义的层面进行转喻深加工,促使其超越概念对现实语境中的具体个体进行指称。

(21) [在阅览室中,一位图书管理员对同事说]:

The Washington Post is trying to get rid of her chewing gum. Let's watch her.

(Jodłowiec and Piskorska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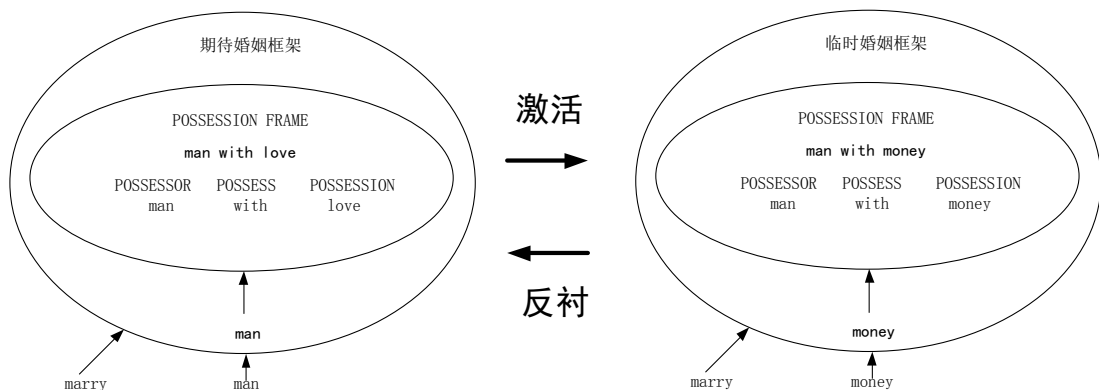
在当前图书馆语境下,“手里拿着《华盛顿邮报》”是识别当事读者的凸显特征,这种区别性特征对于现场的交际双方都是显现的,发话者使用了该特征意图让受话者识别指称对象,而这种识别取决于转喻的深加工。祈使句“Let's watch her.”更加彰显了这种意图,发话者脑海中有清晰的指称对象,“her”连指称对象的性别都交代清楚了,更加促进了转喻的深加工。

再次,发话者利用框架及其非常规赋值之间的矛盾,促使受话者进行转喻深加工。下面一首英文歌名为例:

(22) Molly married money. (Radden 162)

例子中的歌名包含一个转喻,转喻义是“Molly married a man with a lot of money.”该转喻的动词“marry”会激活期待婚姻框架(expected marriage frame),框架中包含新郎这样一个角色空位,该空位本该由现实世界的个体(即Molly的丈夫)填充,而且选取“新郎”所依据的标准或特征是“爱情”(love)。但例(22)中却用了“money”代新郎或爱情而填充该空位,构建了一个临时的婚姻框架(ad hoc marriage frame),这就造成了框架冲突,诱发深层推理。这种推理的“深层”

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在婚姻的框架内构建一个“POSSESSION”框架，见图6。



▲图6 “Molly married money.”的转喻加工

“marry”原本应该激活期待框架（包括man及其典型特征love），而“人”和“钱”之间的领属关系使得受话者从转喻的源域“money”推知转喻的目标域“man”，“money”特征的引入彰显了与默认的“爱情”（“love”）的反差。

其次，这里的目标域不是简单的“man”，因为除非是在同性恋群体，否则说“Molly married a man”是一句信息量较小的话。所以这里的转喻目标域是一个“复杂目标域”（Radden 163），即图6所示的“man with a lot of money”，即有钱人。该目标域同时包含了“man”“领属关系”（with体现出来）和源域“money”。转喻的源域承担了两个功能，它作为激活目标域的切入点，同时也作为复杂目标域的一个成分，参与概念的进一步深加工，即概念整合。

最后，转喻的源域本身也经历了深加工。从图中不难看出，例子中的源域“money”指的是“a lot of money”。在人们期待的婚姻心理空间中，人们应该以与对象的真爱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而“Molly married money.”一句用“money”来指称新郎的做法与人们期待空间的理想化认知模型有所出入，发话者的施喻意图（隐义）被进一步解读为表达鄙视或者不赞成态度。在显义层面可以推出，Molly在乎钱胜过在乎爱情，男人的钱是出嫁的唯一标准，而这里的钱显然特指大钱。这里的深层语用推理可以用语用学的可取消性方法加以验证。

(23) a. Molly married money but kept it a secr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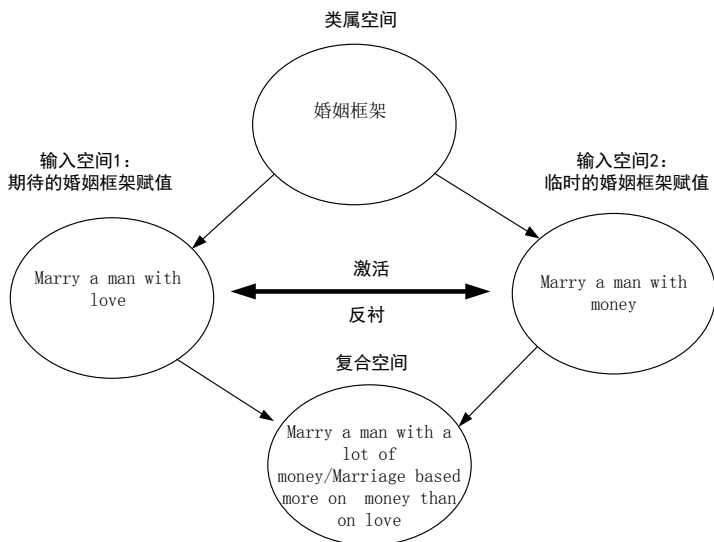
b. Molly married money but loves her husband.

c. (异常句) Molly married money but never spent it. (Radden 164)

(23a)中的“it”既可以指丈夫拥有的很多钱，也可以指Molly嫁给了有钱人这个事实，两条推理都指向目标域“man with a lot of money”。在用“but”取消含义的时候，取消的是Molly为钱而嫁给该男人这层含义。(23b)中“her husband”和推理得出的“man”共指，但

反预期的复杂目标域“man with a lot of money”(特别是a lot of money)依然出现在人们的推理中,因此“but”取消的依然是Molly为钱而嫁这层含义。(23c)一句不符合语用,因为“it”只与“money”共指,与实际的复杂目标域“man with a lot of money”相矛盾(164)。

基于以上分析,图6更精确地表示为图7的转喻深度加工。



▲图7 心理空间层面“Molly married money.”的转喻深度加工

第二,转喻的深加工也跟受话者的知识、体验和兴趣相关。欧足联主席约翰森(Lenart Johansson)曾这样描述自己如何从亲密的助手那里得到信息,

(24) He came to me, someone who was close to me, that I cooperated with for several years previously, who had seen how brown envelopes were given from one to the other. (Radden 174)

不同的受众对例子中的“brown envelopes”有不同深度的解读:有人做直接做字面解读(无转喻),理解为就是用来收集代表的选票的普通棕色信封;也有人做转喻理解,即在最高层级上激活意象图式“部分代部分”,信封和信封装的物品为整体,信封和所装物品皆为部分,这种一种较为抽象的浅层转喻加工;还有人更深一层,在认知域层面激活“容器代内容”,信封是一种具体的容器;更有人具体到框架层面,信封框架的一个重要角色空位就是信,棕色信封是一种正式的信件邮寄方式,所以受话者可以理解为“brown envelope”转指“书信”;更有某些受众由于听说过世界足联的腐败丑闻,也可能将“brown envelope”理解为里面装着行贿钱财。“对于这些业余侦探而言,CONTAINER FOR CONTENT转喻特别有吸引力,因为这个转喻式解读能让他们破解开‘棕色信封之谜’”(Radden 174)。可见,受话者的知识储备、

动机和兴趣都能影响转喻加工的深度。

第三,从交际双方而言,交际双方的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也能影响转喻加工的深度。以同语引发的转喻深加工为例:

(25) 连长毕竟是连长,脸色由黄变紫,由紫变黄,黄中泛青,嘴唇哆嗦着,可就是没吼起来。

(26) 咱们的张书记真是咱们的张书记,他没哪回没点中我的。经他这一点,我就像鱼儿得了水那么欢。(范振强,《新认知语用学》15)

同语的生成和理解需要运用概念转喻(马文、范振强 103),可能用到不同深度的转喻,包括“整体代部分”→“人代特征”→“框架角色代角色的典型特征”→“具体的人代具体的特征”。例(25)中的“连长毕竟是连长”中的连长可以直接激活框架层次的转喻,即连长指代连长这个框架角色典型的特征(比如身先士卒、起到表率作用等等)。但结合例(25)的具体语境分析不难发现,这里虽然用的是框架概念,但实际上讨论的是一个双方共知的具体个体,而且同语强调的是眼前连长的表现印证了交际双方共享的关于具体某个连长的已有知识,同语的运用显示了发话者对受话者认知状态的考虑,体现出交互主观性。“同语更加印证和加深了交际双方对张书记和连长的共享CM[认知模型],增进了群体归属感,相反,对不具备相关的局外人来说很难引起共鸣”(范振强,《新认知语用学》16)。局外人或许也能激活转喻思维,但是最多深入到框架层级,他们知道同语中的“连长”是转喻用法,指称的是“连长的典型特征”,由于他们对谈论对象(具体的连长个体)不熟悉,不可能深入推知眼前这个连长的具体特征,也就无法深加工到心理空间层级。这在例(26)中表现的更为明显,谈论的张书记到底有什么特殊特征,这种深层次的转喻推理或许只有熟悉张书记本人的交际双方才能心领神悟了,因此对“圈内人”而言,属于深加工。

四、转喻加工深度研究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基于多层级转喻分析模式的心理加工深度的构建,可以为转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首先,就可操作性而言,概念层级之间是继承关系,即下一层级是上一层级结构的具体化和细节填充,因此各概念层级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构成一个综合体,下位层级的深度激活以上位层级的同步激活为前提。本文着重引入互文性、文本结构、物理语境,以及交际双方的语用意图等因素,旨在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可操作性,降低主观性,如图8。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因素与多层级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呈现交叉互动的复杂关系,参与的因素越多,转喻心理加工深度和对应的层级区分就越明显,客观性越强。本文分别展开详述纯属论证的需要。

其次,就理论意义而言,多层级结构的构建可以将转喻认知语用研究从纯理论方面向前推进一小步。以最高层的意象图式转喻为例,例(7)、例(8)是否属于转喻存在争议(Barcelona 16-18),也让转喻理论饱受泛化的质疑(赵彦春 80)。基于多层级转喻模型,我们可以保留例(7)、例(8)的字面义身份,同时承认其背后有一个普适的“部分—整体”意象图式转喻。根据认知科学的研究“意象图式本身不需要任何解释,它本身就具有意义”(王寅 178),意象图式的运行是一种无意识认知,因此一般语言使用者往往意识不到例(7)、例(8)背后的转喻机制。但无意识不等于不存在,语言学家通过有意识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发现语言现象背后普遍的认识规律(即意象图式转喻)。这种解释思路有望消解诸如例(7)和例(8)的争议,同时避免转喻概念泛化的弊端。此外,当人们说转喻是隐喻、夸张等背后的机制时,指的也是高层转喻(范振强、郭雅欣 61-74),而就低层转喻而言,转喻、夸张、隐喻等是并列或互动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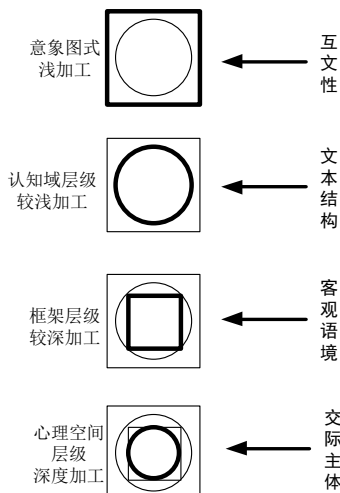
再次,就应用价值而言,认知域层级可以彰显转喻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价值,例(22)中的反讽含义正是源自于“人”和“物”(金钱)这两种不同认知域之间的强烈反差。再比如,

(27) 可是那年月时髦姑娘们流行的歌诀是:一颗“豆”太小,两颗“豆”嫌少,三颗“豆”正好,四颗“豆”太老。她很快就和“一颗豆”吹了。不久找了位“三颗豆”。

(古华 9)

例(27)中军人肩章上豆的多少转喻军衔的高低,该转喻形象地凸显了“时髦姑娘”挑选和看待军人的独特视角。这种对她们只见物(“豆”)而不看“人”的价值观念和择偶标准进行善意讽刺的认知机制也是源自两种不同认知域的反差。此外,框架层级的转喻能够更好地解释文化层面的转喻,而个人心理空间层级有助于转喻突破指称认知概念,实现指称现实世界,在剖析转喻的语用和修辞效果方面有特殊的价值。篇幅所限,另文详述。

最后,就对转喻研究方法的价值而言,转喻研究应该根据不同的层级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避免一刀切。跟隐喻一样,意象图式层级的转喻可以采用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认知域层级的转喻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更有优势,框架层级的转喻更适合用跨语言和跨文化对比的方法。而利用语料库检索转喻时的关键词只有在最低层的心理空间层级才能找到(见表1)。这些不同研究方法已经获得的趋同证据(converging evidence),一定程度上可间接证明本文多层级转喻的理论探讨。多层级隐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起步^[5],将来转喻加工深度也需要多种不同实证研究方法的通力合作,以便把理论探讨的主观性降至最低。



▲图8 多层级概念结构转喻与语境因素的互动

转喻作为一种认知语用现象,是为交际目的服务的,而交际目的不仅限于指称。根据关联理论,任何话语都包括显义和隐义,成功的交际遵循最佳关联原则,当隐义的获得能够满足最佳关联期待时,受话者就无需付出额外的认知加工去深度处理转喻的显义;相反,当交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准确识别或深入认知某实体时,就需要以转喻的字面义为跳板,深入直达转喻的目标域。当然,有时候,隐义的推理也需要对转喻的显义进行深度推理,两者之间是平行加工、互相调整的关系。因此转喻的加工有深浅程度差异。

转喻的认知加工深度可以借助认知语言学的概念表征层级理论得到更清晰和具体的分析。分析证明,转喻按照知识结构可以至少分为四个层级,四个层级代表了不同的抽象程度和加工深度,不同层级的处理需要不同的认知努力,涉及复杂的语用交际因素。这种转喻加工深度梯级的刻画,综合考虑了交际中的内部认知和外部语用等多种因素,故而比约德沃维茨与皮斯科尔斯卡的简单二分法更加详尽和全面,再次证明了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优势。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通过心理实验的方法检验转喻加工深度的心理现实性,也可以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在不同的层级上考查转喻对批评话语分析的价值。按照层级结构细致探讨不同层级转喻与其他认知方式如隐喻、反讽或夸张的关系,可以更加细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将朝着这些方向继续努力。

注释 [Notes]

- [1] 我国学者魏在江教授在2017年全国认知语言学大会上呼吁建立转喻学,参见范振强、郭雅欣:《高层转喻视域下夸张的认知语用研究》。
- [2] 相关内容参见I. Falkum,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Polysemy: A Relevance-theoretic Account*.
- [3] 相关内容参见P. Koch, "Frame And Contiguity: on the Cognitive Basis of Metonymy and Certain Types of Word Formation."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edited by K. Panther and G. Radden, John Benjamins, 1999.
- [4] 参见R. W. Gibbs,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UP, 1994; R. W. Gibbs and H. L. Colston, *Interpreting Figurative Meaning*. Cambridge UP, 2012.
- [5] 参见Z. Kövecses, "Levels of metaphor"; R. W. Gibbs and H. L. Colston, *Interpreting Figurative Meaning*.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rcelona, A. "Reviewing the Properties and Prototype Structure of Metonymy." *Defining Metony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wards a Consensus View*, edited by R. Benczes, et al., John Benjamins, 2011, pp. 7-58.
- Blanco-Carrión, O. "Conventionality and Linguistic Domain(s) Involved i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Metonymies." *Conceptual Metonymy*, edited by O. Blanco-Carrión, et al., John Benjamins, 2018, pp. 55-74.
- Carston, R. "A Unitary Approach to Lexical Pragmatics Relevance, Inference and Ad Hoc Concepts." *Pragmatics*, edited by N. Burton-Roberts,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230-59.
- Fan, Zhenqiang. *Metonym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China Book, 2014. [范振强:《具身认知视域下转喻的动态构建机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
- . "The Contextual Effects and Motivation of Tautology within Neo-cognitive Pragmatics."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no. 7, 2015, pp. 12-16. [范振强:《新认知语用学视域下同语的语境效果和生成动因》,载《当代外语研究》2015年第7期,第12-16页。]

- Fan, Zhenqiang, and Yaxin Guo. "A Cognitive-pragmatic Study of Hyperbole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gh-level Metonymies." *Contemporary Rhetoric*, no. 4, 2019, pp. 61-74. [范振强、郭雅欣:《高层转喻视域下夸张的认知语用研究》,载《当代修辞学》2019年第3期,第61-74页。]
- Falkum, R. *Th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f Polysemy: A Relevance-theoretical Account*. Dis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11.
- Gibbs, R.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UP, 1994.
- Gibbs, R. W., and H. L. Colston. *Interpreting Figurative Meaning*. Cambridge UP, 2012.
- Gu, Hua. *A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People's Literature, 1981. [古华:《芙蓉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Huo, Sitong. *The Cognitive Study of Active Rhetoric in Chinese*. Fudan UP, 2018. [霍四通:《汉语积极修辞的认知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 Jodłowiec, M., and A. Piskorska. "Metonymy Revisited: Towards a New Relevance-theoretic Account."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vol. 12, no. 2, 2015, pp. 161-87.
- Kövecses, Z. "Levels of Metaphor."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28, no. 2, 2017, pp. 1-26.
- Lakoff, G., and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U of Chicago P, 1980 / 2003.
- Li, Fuyin. *An Introductory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Peking UP, 2008. [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Ma, Wen, and Zhenqiang Fan.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Nominal Tautologies."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no. 1, 2007, pp. 103-109. [马文、范振强:《名词性同义反复语的多视角研究》,载《贵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103-109页。]
- Papafragou, A. "On Metonymy." *Lingua*, vol. 99, no. 4, 1996, pp. 169-95.
- Panther, K., and L. L. Thornburg. "What Kind of Reasoning Mode is Metonymy?" *Conceptual Metonymy*, edited by O. Blanco-Carrión, et al., John Benjamins, 2018, pp. 121-60.
- Radden, G. "Molly Married Money: Reflections on Conceptual Metonymy." *Conceptual Metonymy*, edited by O. Blanco-Carrión, et al., John Benjamins, 2018, pp. 161-82.
- Rebollar, B. E. "A Relevance-theoretic Perspective on Metonym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o. 173, 2015, 191-98.
- Rubin, E. "Figure and Ground." *Readings in Perception*, edited by D. Beardslee and M. Wertheimer, Van Nostrand, 1958, pp. 194-203.
- Sperber, D., and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Blackwell, 1995.
- Wang, Y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007. [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Zhao, Yanchun. "The Fallacies of Metaphor Research: The Metonymic Model." *English Studies*, no. 2, 2017, pp. 80-87. [赵彦春:《隐喻研究的误区——基于转喻模型的考察》,载《英语研究》2017年第2期,第80-87页。]
- Xinhua News: "U.S. Media: China's New J-16 Aircraft will Have a Comprehensive Long-range Strike Capability," 28 Aug. 2018, k.sina.com.cn/article_5305757517_13c3f6f4d02000ck6d.html?cre=sinapc&mod=g&loc=13&r=0&doct=0&rfunc=14&tj=none. [新华网:《美媒:歼16即将全面形成战力 强化中国远程打击能力》,2019年8月28日, k.sina.com.cn/article_5305757517_13c3f6f4d02000ck6d.html?cre=sinapc&mod=g&loc=13&r=0&doct=0&rfunc=14&tj=none。]

◇责任编辑:陈忠平

CET对大学英语学业成绩考试的反拨作用 ——基于北京市10所高校期末试卷分析与教师访谈

◎ 董连忠

内容提要: 基于北京市10所高校大学英语期末试卷分析与教师访谈,探究了CET对大学英语学业成绩考试的反拨作用。研究发现,多数普通高校期末考试内容、题型构成及分值设置以CET为模板,不设口语考试,且主观题分值权重较低;而重点高校受CET的负面影响较小,采用多样化的主观题考查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造成以上差异的部分原因与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和命题教师对CET和期末考试的认知有关。因此,加大期末考试改革力度、增加口语考试及分值权重,并加强大学英语教师语言评价素养培训是当前大学英语教学评价改革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 学业成绩考试 期末考试 反拨作用

项目基金: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改项目(JG1207);北京市教改项目(2013—lh07)

作者单位: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外语教学部,北京 100048

Title: CET Washback Effects on the Achievement Test of College English: A Stud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nals of Ten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 Interviews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washback effects of CET on the achievement test of college English, and it employs the end-term exams of 10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and interviews of college English directors and lecturer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demonstrate that the end-term exams of most colleges or universities do not include oral English test, but simply copy the CET in aspects of its test contents, question types, and the score weight; the end-term exams of key universities, however, are less impacted by using a variety of subjective question types to examin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English competence; and the causes resulting in the above distinctions can be partly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language assessment literacy of college English directors and teachers. Hence, a number of measures, such as accelerating the end-term exam reform, introducing the oral English test and increasing its score weight in the end-term exam, and conducting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training of language assessment literacy, should be adopted to upgrade and innovate current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ssessment practice.

Keywords: college English, CET, achievement test, end-term exam, washback effects

Author: Lianzhong Dong, Professo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Depart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考试的反拨作用（亦称反拨效应）是考试效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Bachman and Palmer 113）。尤其是大规模高风险考试，其对教与学乃至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范围广且复杂多样，还可能会因人、因时及因地而异，“从个体、一个系统到整个社会，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的、显性的到深层的、隐性的”（黄大勇 298）。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是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考查已修完大学英语四级的学生是否达到教学大纲确定的目标，自施测以来对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金艳、杨惠中 29-39）。然而，虽然CET与大学英语期末考试都是基于教学大纲的考试，前者是面向全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统一考试，更倾向于考查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考试，且考试成绩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对大学英语教学有一定的反拨作用；而后者属于学业成绩考试，目的是检查大学生是否达到大学英语基础阶段的课程要求，二者的目的及意义有所不同（王海啸 4-12）。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必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学评价仍由以CET结果为主的终结性评价和校本形成性评价两部分组成（教育部高教司 8）。由于重点与普通高校在生源、师资及教学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用CET统一标准作为衡量高校基础阶段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主要依据，对高校的学业成绩考试势必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本研究拟通过对10所高校的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大学英语期末试卷分析及教学负责人与教师的访谈，探究CET对大学英语学业成绩考试的反拨作用，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CET对高校大学英语期末考试有哪些重要影响？2）大学英语教师如何看待CET与期末考试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反拨作用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普通教育测试，90年代受到了语言测试界的广泛关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其看法不一，但对反拨作用的大小与考试的重要性相关均表示认同，即考试的社会权重越高，影响面越广，后果越严重（亓鲁霞 29-32）。

国内学者的反拨作用研究主要集中在大规模高风险考试，如高考（董曼霞 19）、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Zou and Xu 140-59）等。对CET的反拨作用研究主要围绕其多年来的不断改革与变化，如从考试内容、题型的变化到计分体制的改革（金艳，《改革中的CET》27-29），从笔试到机考的实验（赵希林 286-89），口语考试从直接型面试到人机对话、从限制考试规模到全面放开等（金艳，《CET口试反拨作用》56-61；蔡基刚 66-75；贾国栋 1-9）。其中，大多数研究探析了CET对大学英语教与学产生的影响（辜向东 39-45；詹颖 39-46），个别学者探究了CET对考试策略的反拨作用及其机制与模型（辜向东、肖巍 30-38；Xie and Andrews 149-70）。学业成绩考试是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且在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原萍 73-76），鲜有学者关注CET对其产生的影响。期末考试是大学英语学业成绩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不同高校期末试卷分析及与教学负责人和教师的访谈，可探析CET对大

学英语学业成绩考试的反拨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为期末试卷与访谈。选择期末试卷作为研究工具主要是由于期末考试是学业成绩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期末试卷分析不仅能够了解学业成绩考试内容和课程评价目标，还有助于评价考试效度。

访谈是针对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交谈获取一手资料的方式。研究初期采用了开放式访谈，旨在获取研究所需信息，为正式访谈内容的完善提供参考依据。基于反拨作用的显性与隐性、宏观与微观等特征，并结合大学英语教学评价内容框架及期末试卷分析发现的主要问题，研究者围绕如下话题分别对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和教师进行了半结构访谈。

表 1 访谈对象、访谈目的和访谈要点

访谈对象	访谈目的	访谈要点
教学负责人	了解教学评价情况及 CET 对期末考试的主要影响	● 课程设置与教学评价方式 ● 期末考试构念、内容、题型和分值分配及命题情况 ● 口语考试 ● CET 与期末考试的关系
教师	了解 CET 对教学、期末考试、口语教学与考试的实际影响	● 期末考试和命题情况 ● 期末考试成绩与材料来源、题型及分值分配情况 ● 口语教学与考试 ● CET 考前辅导、对教学的影响及与期末考试的关系

(二) 研究对象、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对象为北京市 10 所高校（综合院校 5 所，理工 4 所和师范 1 所）的大学英语期末试卷和 8 位接受访谈的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和教师。为深入挖掘 CET 给重点与普通高校学业成绩考试带来的影响，研究者选择了重点与普通高校各 5 所，并与 10 所高校教学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说明了研究目的。经学院/系部领导允许，仅对收集试卷的考试内容、试卷结构、题型构成及分值分配等项目进行了定性分析。

接受访谈的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和有期末考试命题经历的教师各 4 人。教学负责人是期末考试的主要设计者和组织者，教师是策划期末考试内容和试卷编辑的主要执行者，因而对期末考试目的、考试构念、考试内容、考试结构与分值设置等有较深入的理解。为深入了解 CET 对重点与普通高校期末考试的反拨作用差异，研究者选择了重点与普通高校各 2 所的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和教师，年龄为 38 ~ 55 岁（男 5、女 3，教学负责人分别为 K1D、K2D，

G1D、G2D, 教师分别为KT1、KT2, GT1、GT2), 且均有 12 年以上的大学英语教学经历。使用微信语音对他们进行了半结构访谈, 访谈时间从 28 ~ 52 分钟不等。访谈后及时对访谈内容作了转录, 并用扎根理论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分析。

表 2 大学英语期末考试内容、题型及分值分配情况 (G=普通高校; K=重点高校)

	G1	G2	G3	G4	G5	K1	K2	K3	K4	K5
词汇	10	25	无	10	10	无	无	15	7.5*	10
听力	35	25	10+25	10+25	10+20	10+25	10+25	10+25	5+20	10+10+10
阅读	30	30	35	30	30	40	35	35	25	30
完形	无	无	无	5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写作	15	10	15	10	15	15	15	15	7.5*	15
翻译	10	10	15	10	15	10	15	15	10	15
口语	0	0	0	0	0	0	0	0	25	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主观分	25	20	40	30	40	35	50	40	40	65

如表 2 所示, 在题型构成和分值分配上, 60% 高校的听力分值为 35 分, 20% (G2 和 K4) 为 25 分, 仅 1 所高校 (10%, K5) 为 30 分, 且采用了判断对错、简答题和复合式听写题。这与近年来 CET 增加听力分值权重, 教学中加强听说训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方向是分不开的。听力题型, 尤其是重点高校, 呈多样化趋势, 且采用了效度较好的复合式听写和其它主观题型考查学生的英语听力水平。

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一直占重要地位。表 2 显示, 绝大多数高校 (90%) 阅读分值在 30 ~ 40 分之间, 这一点与 CET 基本一致, 仅个别高校 (10%, K4) 阅读分值为 25 分。经调查, 该校期末考试大学英语视听说和读写 2 门课分开施测, 总分均为 100 分, 听、说、读和综合技能 (写作、词汇、翻译) 四项分值均为 50 分, 因而听力、口语和阅读分值按百分制折合为 25 分。可以看出, 作为提升学习者外语水平的主要输入技能, 阅读在大学英语期末考试中所占权重仍较高。

写作、翻译和口语考查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表 2 显示, 绝大多数高校 (80%) 写作分值与 CET 相同, 均为 15 分 (标记为 7.5 分的 K4 按百分制折合为 15 分), 个别高校 (20%) 为 10 分; 翻译分值为 10 分和 15 分的高校各占 50%; 仅 1 所高校 (K4) 有口语考试。主观题分值一行显示, 总分为 20 分、25 分、30 分和 35 分的高校各占 10%, 总分为 40 分的高校占 40%, 50 分及以上者占 20%。

从总体上看, 10 所高校期末考试内容均涵盖了听力、阅读、写作和翻译等语言技能和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 仅 1 所高校有口语考试。但不同高校的试题, 尤其是重点与普通高校之间, 存在较大差异。

四、结果与讨论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评价的不断改革与完善,近年来多数高校期末考试主观题分值权重不断增加(董连忠、周颖 117-20)。然而调查发现,大多数普通高校的期末考试题型和分值分配仍以CET为准,考查产出性技能(写作、翻译、听写、口语)分值较低,接受性技能(听力、阅读)较高;而重点高校的期末考试成绩覆盖面较宽,题型设置较为多样化,且主观题分值较高,尤其是口语考试,重视考查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针对以上现象,笔者就重点与普通高校在期末考试成绩、题型构成、分值分配、口语考试及对CET与期末考试关系的认识等方面与教学负责人和教师进行了访谈。

(一) 期末考试成绩、考试题型、分值分配及口语考试情况

大学英语期末考试是用来检查大学生一个学期内完成教学大纲或教材的学习情况,因而期末考试应以本学期所学(教材)内容为主。研究发现,虽然调查的10所高校期末考试成绩表面上均覆盖了听、读、写、译等语言技能和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但在题型设置和分值分配等方面,多数高校存在过度使用多项选择题现象,从而造成主观题分值相对较低。研究者就这一现象与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考试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基本采用四级考试的方式。我们学校比较传统,基本都是采用应试的方式,[……]比如说四级听力考试去掉了短对话,我们就去掉短对话。(G2D)”

与普通高校教师的访谈同样验证了以上现象:

“不管是哪个级别,听力基本上和四级差不多,[……],阅读题与四级阅读考试基本相同,[……];翻译以前是句子翻译,现在四级考试改为段落翻译,我们也采用段落翻译,(也)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段落翻译。(GT1)”

事实上,学界对大规模考试过度使用多项选择题一直存有争议。支持者认为,多项选择题信度高,且具有便于考查多种语言现象等优点,而主观题信度低,评阅标准难以把握、可操作性差等(潘之欣 67-74)。访谈结果发现,多数高校期末考试过度使用多项选择题主要是由于效仿CET的缘故,以CET为标杆,让学生尽快适应CET,以提高他们的CET笔试成绩和通过率。然而,重点高校的做法则有所不同。

“拿读写来说吧,100分里面,(考试内容)有写作、翻译、句子选词填空,包括短语啊,还有阅读理解,传统的四选一的,四级题型的Cloze,还有信息匹配题这几个类型吧[……]。(K1D)”

“阅读理解的题型是比较多样化的,如传统的阅读,然后有普通的学术话题的文章,需要他们比如说subheading选择啊,还有判断题啊,还有写概要的填空啊,简答题啊,题型是多样化的,主观题比较多。(K2D)”

与普通高校相比,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学生的入学英语水平,重点高校均有较大优势,

再加上丰富的教学资源,绝大多数重点高校的学生参加CET都能取得较好成绩,因而教学中对CET的关注较少,期末考试内容、题型设置及分值分配等受CET的影响自然就小。正如两位重点高校的教学负责人所言:

“我们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不怎么看重的。[……],整体上来说,四、六级考试对他们不是什么问题。我们基本上只告诉他们题型,让他们自己去准备。(K1D)”

“四、六级是由教务处来组织的,跟我们公外教学没有任何关系。(K2D)”

可以看出,重点高校大学英语期末考试受CET影响较小,能根据教学目标采用多样化的考试题型考查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这一点在口语考试方面也得到了验证。

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实际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尤其是口语和书面语的表达能力(教育部高等教育司8)。然而调查发现,仅有1所高校期末考试有口语考试,多数学校(70%)将口试纳入平时成绩,且分值权重较低,个别高校根本就不设口语考试。笔者就口语考试情况与教学负责人和教师进行了访谈。

“[……]但事实上呢,口语是比较侧重的,虽说占的分数和其他技能是一样的,考试的形式是比较标准化的,不管你是一级、二级、三级,还是四级起点的,包括实验班的,试题完全是一样的。(K1D)”

“(我们的)口语考试放在第三学期,主要有两个模块。一个是基于图片的描述,然后呢,还有一个回答问题,回答问题后呢,还有一个discussion task。(K2D)”

接受访谈的重点高校教师也谈了自身的教学感受:

“口语很重视啊。即使(讲授)听、读、写技能,[……],也有许多让学生‘说’的任务。所以,‘说’是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KT1)”

“口语这块我们就结合教材的话题,给他们留一些口语任务做term project,还要做presentation,还有系统口语考试平台,总体占期末10%的分数。(KT2)”

与重点高校相比,普通高校的做法则有所不同:

“最初我们把口语考试作为期末考试的一部分,[……],但每个年级上千学生,感觉投入太大,而且效果不理想,[……]后来我们进行了改革,把口语考试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每位老师自己把握。(G1D)”

另一所普通高校根本就不设口语考试。“两门课程分开考,读写译和视听说。但视听说就是考‘听’,没有‘说’这一项。(G2D)”

可以看出,重点与普通高校在口语考试方面同样呈现出较大差异。究其原因,除一些客观因素外,如师生比过高、缺少人机对话考试设备等,也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如CET笔试和口试分开施测,且只统计笔试通过率,因而一些高校教师教学中忽视口语训练,期末考试不设口语考试,不利于学生口头交际能力的提高。

可见,CET对重点与普通高校大学英语学业成绩考试的反拨作用与学校的办学层次有关,学校的办学层次越高,所受的负面反拨作用越小,反之亦然。

（二）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和教师对CET与期末考试关系的认识

测试是教学的评价工具，按其功能可分为学业成绩测试、水平测试、诊断测试和潜能测试。研究表明，对不同类考试试题的设计、命制、修改和评价及使用大规模标准化考试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是判断教师语言评价素养的重要标准（林敦来、武尊民 711-20）。访谈发现，造成CET对重点与普通高校期末考试反拨作用差异的原因，除客观因素外，也与教学负责人和教师的语言评价素养，即对CET与期末考试关系的认识有关。研究者就这一话题与两位重点高校的大学英语负责人进行了访谈：

“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考试），都要充分考核学生实际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尤其是实用型口语和书面语的表达能力。（K1D）”

“我们这些考试都是跟课程配套的，比如我们以阅读为主的时候，阅读是考查重点，听力会稍微少一点，其它课程也是相应的。（K2D）”

可以看出，重点高校的期末考试构念是基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从本校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出发，考查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因而题型的选择较为多样化，分值分配更趋合理；而普通高校则有所不同。虽然CET更倾向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英语水平考试，然而无论是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还是一线英语教师，对提早采用CET题型和相关考试内容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CET成绩和通过率这一“观点”均表示认同，因而在考试内容、题型的选择和分值分配等方面受CET的制约，给大学英语学业成绩考试带来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考试还是要有个结合，学生最终要考四级，所以在题型（设计）上基本是按照四级题型，帮助他们调整，总的思路是按四级考试。（G1D）”

“期末考试是四、六级考试的必要准备和演练，应该尽早地让学生适应四、六级考试题型和环境，[……]比如说，我们学校期末考试阅读（部分）没有（四、六级考试的）段落匹配题，平时上课我会针对这一题型给学生进行训练，[……]。（GT1）”

访谈还发现，持此“观点”的教师不在少数，即使是重点高校教师也表示认同：

“所以嘛，（四、六级考试）表面上是弱化，其实还是比较强调的。当然了，我们的教学环节中不明令重视四级（考试），但平时测验的考题我还是用四级题型，督促学生加强训练，了解四级。（KT2）”

测试是教学的重要环节，也是评估教学的工具，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尤其是学业成绩考试，考试结果不仅能为学习者提供即时信息反馈，激励他们提高学习效率，还能检查教学效果，帮助教师调整授课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然而访谈发现，一线教师，尤其是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对CET和期末考试缺少应有的认知，以CET为模板开发设计校本期末考试，从而给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带来较多的负面反拨效应。鉴于多数高校期末试卷的开发由一线教师完成，教师自身语言评价素养的高低会直接影响试卷的信度与效度，因而提升一线教师的语言评价素养，尤其是增加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对CET与期末考试关系的认知，会减少CET对大学英语教学和学业成绩考试的负面反拨作用。因此，相关部门应亟需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一线教师,尤其是大学英语教学负责人的语言评价素养培训,从而在开发和实施学业成绩考试过程中,合理使用大规模考试,全面提升大学英语教学评价与学业成绩考试质量。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大期末考试改革力度。大学英语期末考试在大学英语教学评价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因而其考试构念、考试内容、题型构成及分值权重等势必会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产生较大的影响。《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以下简称《课程要求》)明确规定,期末考试应以评价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为主,因而其考试内容、题型设计与水平考试应有所不同(8)。研究发现,多数普通高校大学英语期末考试内容、题型设置和分值分配均以CET为模板,这种片面追求表面形式的现象势必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大期末考试改革力度,减少客观题比重,增加信息匹配、概要写作及简答题等主观题型及分值权重,有利于减少CET给学业成绩考试带来的负面反拨作用。

第二,增加口语考试及分值权重。虽然早在本世纪初《课程要求》就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这一新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8),由于大多数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班人数较多,再加上追求CET笔试通过率等因素的影响,使口语教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口试分数设置较低,一些学校甚至根本就不设口语考试。随着新一轮四、六级口语考试改革的实施,为全面反映自身的英语水平,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会参加四、六级口试。因此,加强口语训练,提升校本期末口试分值权重,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口头交际能力和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反拨作用研究是一项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全面的调查。本研究仅从期末试卷分析与访谈两个方面探究了CET对北京市高校大学英语学业成绩考试的反拨作用,所得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全国多所高校大学英语期末试卷及学生考试成绩进行比较分析,并辅以师生问卷调查和访谈,将会更深入地挖掘CET对大学英语学业成绩考试的反拨作用。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chman, L. F., and A. Palmer. *Language Assessment in Practice: Developing Language Assessments and Justifying Their Use in the Real World*. Oxford UP, 2010.
- Cai, Jigang. "A Study on the Validity, Reliability and Operation Ability of Computer-based Spoken English Test of CET4 and CET6."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4, 2005, pp. 66-75. [蔡基刚:《大学英语四、六级计算机口语测试效度、信度和可操作性研究》,载《外语界》2005年第4期,第66-75页。]
-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Higher Education, 2004.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Dong, Lianzhong, and Ying Zhou. "A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Achievement Test: A Case Study of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Labor Relations*, no. 2, 2015, pp. 117-20. [董连忠、周颖:《大学英语学业考试现状探析——以北京高校为例》,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17-20页。]
- Dong, Manxia. *NMET Washback and Its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ongqing* (Unpublished

- Doctoral Thesis*). Diss. Shanghai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16. [董曼霞:《高考英语考试的反拨效应及其形成机制——以重庆市高中学生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6。]
- Gu, Xiangdo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the Washback Effect of CET4 and CET6 on Classroom Teaching." *Journal of Xi'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o. 4, 2007, pp. 39-45. [辜向东:《大学英语教学的特征——兼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课堂教学的影响》,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39-45页。]
- Gu, Xiangdong, and Wei Xiao. "A Washback Effect of CET on Test Use Strategy of China's Non-English Major College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Testing and Teaching*, no. 1, 2013, pp. 30-38. [辜向东、肖巍:《CET对我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考试策略使用的反拨效应研究》,载《外语测试与教学》2013年第1期,第30-38页。]
- Huang, Dayong.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Testing Effects."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no. 3, 2011, pp. 296-302. [黄大勇:《构建语言测试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载《现代外语》2011年第3期,第296-302页。]
- Jia, Guodong. "The Expected Washback Effect of Spoken English Test of CET: A Case Study of Spoken English Test of CET4 and CET6." *Foreign Language Testing and Teaching*, no. 4, 2016, pp. 1-9. [贾国栋:《大学英语口语测试的预期反拨效应——以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测试为例》,载《外语测试与教学》2016年第4期,第1-9页。]
- Jin, Yan. "The Washback Effect of CET4 and CET6 Spoken English Test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4, 2000, pp. 56-61. [金艳:《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语考试对教学的反拨作用》,载《外语界》2000年第4期,第56-61页。]
- . "On the Reform of CET4 and CET6."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1, 2004, pp. 27-29. [金艳:《改革中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载《中国外语》2004年第1期,第27-29页。]
- Jin, Yan, and Huizhong Yang. "Taking the Path of Language Test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Enlightenment of the 30th Year of CET4 and CET6."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2, 2018, pp. 29-39. [金艳、杨惠中:《走中国特色的语言测试道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三十年的启示》,载《外语界》2018年第2期,第29-39页。]
- Li, Qinghua.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ts Future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Foreign Language Testing and Teaching*, no. 3, 2012, pp. 1-7. [李清华:《形成性评估的现状与未来》,载《外语测试与教学》2012年第3期,第1-7页。]
- Pan, Zhixin. "On the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Types of Language Testing." *Foreign Language World*, no. 4, 2001, pp. 67-74. [潘之欣:《语言测试中的多项选择题型》,载《外语界》2001年第4期,第67-74页。]
- Qi, Luxia. "On Testing Washback."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no. 8, 2006, pp. 29-32. [齐鲁霞:《论考试后效》,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8期,第29-32页。]
- Wang, Haixiao. "On the Reform of CET4 and CET6 from the Systematic Point of View."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no. 4, 2008, pp. 4-12. [王海啸:《从系统的角度看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载《中国外语》2008年第4期,第4-12页。]
- Xie, Qin, and S. Andrews. "Do Test Design and Uses Influence Test Preparation? Testing A Mode of Washback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Language Testing*, no. 1, 2012, pp. 149-70.
- Yuan, Ping. "On the Positive Washback Effect of Achievement Test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o. 4, 2002, pp. 73-76. [原萍:《成就测试对外语教学的正面反拨效应》,载《外语教学》2002年第4期,第73-76页。]
- Zhan, Ying. "A Study of the Washback Effect of CET4 on Extracurricular English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Testing and Teaching*, no. 1, 2013, pp. 39-46. [詹颖:《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对课外英语学习的后效作用》,载《外语测试与教学》2013年第1期,第39-46页。]
- Zhao, Xilin. "An Enlightenment of the Washback Effect of Computer-based CET4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ollege English (Academic Edition)*, no. 2, 2012, pp. 286-89. [赵希林:《大学英语四级机考反拨效应对英语教学的启示》,载《大学英语(学术版)》2012年第2期,第286-89页。]
- Zou, Shen, and Qian Xu. "A Washback Study of the Test for English Majors for Grade Eight (TEM8)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Program Administrators." *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 no. 2, 2017, pp. 140-59.

FLC

麓山笔谈

跨文化视角下的东方和西方

◎ 陆建德 阮炜（录音及文字转录：吴晋先）

阮炜（以下简称“阮”）：（谈到东方与西方）我们首先可以讨论一下方位上的东方与西方。通常所谓西方，可以包括很多国家，不仅仅指欧洲和北美，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包含在内。但如果从方位上看西方，就不太容易概括了。其实澳大利亚也可以视作东方，西方人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就是把澳大利亚和中国、日本、印度、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等看做一个整体，就是亚太地区。

陆建德（以下简称“陆”）：现在人们说到东方西方这两个词，往往有言外之意，甚至暗含善恶对立。它们并不纯是地理方位词，还有其他的含义。实际上，我国的东方概念是 20 世纪的产物。

阮：以前没有的。

陆：我们原来称日本为东瀛，东南亚叫南洋，后来东方西方的观念逐渐流行起来，可能和十八、十九世纪开始的全球化进程有联系，也与帝国、殖民这些观念相关，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吉普林说的“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这种东西分野产生在非常特殊的时期，吉普林心中就有 19 世纪末英帝国殖民统治的观念。其实西方东方都不是吉普林想象的那么固定，这些观念都随着具体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将这句话改写一下“East is not east, and West is not West, and the twain shall always meet”。

阮：完全可以这样说。

陆：吉普林是熟悉印度的，孟买是他的出生地。写的动物也好，儿童丛书也好，认真去看的话也是蛮有吸引力的，并不由简单的帝国主义话语主导。他对印度当地人也抱有兴趣，相关的描写并不能说落入东方主义的窠臼。我们有时候说到东方就是专指中国，范围太窄了。

阮：日本叫东瀛，印度叫西天，包括现在新疆在内“中土”以西的广大区域，以前都叫西域。

陆：在先秦，我国东部地区部落泛称东夷。

阮：那就是在中国境内了，江苏山东啊。

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地理概念实际上也在发生变化，原来的这套话语，可能就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现代中国的观念，包括中华民族，其实非常新。

阮：晚清，20世纪初才出现中华民族的说法，华夏、华族倒是说的比较多、比较早。我觉得人类有个共性，都以自我为中心。确立方位的时候，人们是不会以其他人为中心的，必然以自己为中心。所谓东南西北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东南西北。比如，中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日本便是东瀛，西边叫西域，后来到利玛窦那个时期，不停有西方人坐船从欧洲过来，于是便有了西洋的概念。西洋又比西域的概念要大，因为包括了海域在内。所谓南蛮北狄，都是历史上汉人的概念。

陆：历史有很多悖论，利玛窦来华后是大大地沟通了中外的文化。

阮：这是学界共识。最近这二三十年，不管是中国人做的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研究，还是西方人的相关研究，对他的肯定是很多的。

陆：他把西学带到中国来了，也想让中国人了解世界地图。地图本身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英国人几百年前画的地图是不是把英国放在世界的中心？英国划分了地理和时间的方位，格林威治天文台子午线是了不起的发明。原来我们说天圆地方，后来慢慢就认识到地球确实是球形的。

阮：这里我觉得，西方人对我们所在的星球的认知，在准确度上，很早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为希腊人航海时发现稍稍远一点的地方，即便有帆，船也看不见，你站高一点又看得见了，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球形。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早早地就提出了地球的概念。到了中世纪晚期，西方人又重新把这个概念拿出来讨论，后来确切地知道，地球就是一个球体。到了哥伦布的时候，当时的人已经有了共识，就是不管是往东航行还是往西航行，最后都可以回到原点。这个共识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达成了，只不过还没证实而已。

陆：也正是在这个理念支配下哥伦布才“发现”美洲，他本来以为一直往西可以到印度去。

阮：西方这个概念，即所谓west，不仅我们在使用，西方人自己也在用。它其实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如果强行以方位说事，那么非洲也可以包括在西方里面，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都在西方，或者说很多在文化上不属于西方的地区，都是西方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澳洲，它其实是在东方啊。可见，西方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方位的意思仅指其最初的含义，但后来，把政治和文化的意义加进去后，西方已经不是最早意义上的西方了。比方说日本，它也算西方，至少在政治上，它属于西方的一员。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反过来看，东方意味着什么？我们中国肯定会认为自己是东方，虽然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才开始流行起来的。我们说东方，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定位。使用“西方”，也是把他们假定为中国以西的一个位置上。

陆：50年代说的“东方”非但包括苏联，甚至以苏联为代表，有很多政治的内涵。

阮：那个时候是的。俄罗斯历来把自己看成是东方，把西欧看成是西方。

陆：俄罗斯可能并不是这样，从彼得大帝开始。

阮：这个可以考证一下。看看俄语中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东方西方的概念，东方什么时候确切地指俄罗斯。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肯定没有把广大的非西方国家都包括进来，像印度中国等。但是慢慢地，它的内涵就扩大了。

陆：俄罗斯后来兴起的时候，整个欧洲的观念已经很强了。所以俄罗斯文化里的欧洲元素

特别多。地理概念其实不能绝对化，用我现在喜欢用的词来说是不要把它们本质主义化，不能认为东方必定如何，西方又必定如何，不然东方西方真的就无法汇通在一起了。如果读俄罗斯小说，你就会发现，俄罗斯和欧洲的文化互动太多了。像屠格涅夫，他有一段时间就生活在法国。托尔斯泰作品里的上层社会是说法语的，皇室一整套宫廷文化都是以法国宫廷文化为范本的，军官地位很高。军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地位是低的，外国文学可以提供重要的参照。林琴南翻译过很多外国小说，他说他那些小说都符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价值观，还多一种美德叫“勇”。我们现在也崇尚军人，崇尚勇敢，说明文化交流过程中价值观是不断变化的。

阮：其实在希腊文化里我们可以看的清清楚楚。希腊人把勇敢放在一个极重要或者说首要的位置，儒家经典里面的勇不知道放到第几位去了。希腊文中表卓越、优秀的词 *Arete*，其原义指勇敢。勇敢就是卓越，所以它的位置非常高。

陆：勇敢还有一个词，英文叫 *valor*，它来自拉丁文 *valeo*，它有勇气、强大的含义。罗马文化——其源头是希腊文化——看重勇气。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值得我们深思。希腊有城邦政治，背后含有很强烈的爱国主义，与城邦相关的公共事务叫 *politics*，*politics* 就是由城邦 *polis* 演变过来的。

阮：城邦事务就是政治。但是希腊人对城邦的热爱和现代的爱国主义之间，还是有些不一致。我们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其他古希腊的作品，会发现，城邦内部有很多斗争。在斗争中会出现这种情形：城邦内弱势的一派向外求救，把外邦军队引进来，“引狼入室”，攻击和自己派系不同的同胞。这种情形很常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雅典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阿尔西比亚德，有人把他翻译成亚西比德，他在雅典是精英分子、贵族，而且是个帅哥，连他说话有点口吃都有人模仿。他影响力非常大，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但就在他领军攻打西西里的过程中，因为有人告发他在城里亵渎神灵，民主派方面的民主之神，导致在出征的过程中对他进行审判，结果被判有罪，于是他在还没有到达西西里的时候就叛逃了，叛逃到雅典的敌人斯巴达那方去了，给斯巴达出谋划策。这是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希腊人的城邦情结和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不是一回事。

陆：他的这种行为，在城邦内部是被批评的。与之相比，中国早期，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就有朝秦暮楚的说法。

阮：那个时候好多游士。

陆：你说的那个事例，在希腊是受到批评的，但春秋战国的游士是没有国家观念的，谁给他官职他就服务谁，这套行为得到认可，在价值上是不排斥的。中国后来的国家观念其实一直比较模糊，士大夫更多的是忠于君主。不像一个城邦，它的背后有公共性。的确，你说的那种事例是有的，但它在希腊那种特定社会氛围里是受到谴责的。莎士比亚也处理过这个话题。《科里奥兰纳斯》的同名主人公是罗马的勇士、将军，为罗马去打仗，但是后来他不满罗马的普通民众，普通民众也反对他，要他道歉，导致他走向敌营。这个故事在戏剧中是作为悲剧来呈现的。戏剧里科里奥兰纳斯的母亲鼓励他做英雄。

阮：鼓励他勇敢杀敌，但并不鼓励他投敌。实际上，科里奥兰纳斯最后的死和他母亲很

有关系，因为他母亲最后央求他不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他也顺应了这个要求。这个要求不光来自于他母亲，背后也是整个罗马城的要求。但是这样一来，就把他加入的敌方阵营给得罪了，最后死在了从前的敌人手中。那是罗马早期的事情。

陆：是啊，这种故事影响都特别大。他母亲有些话说得很过头，他的夫人心肠比较柔软。

阮：夫人也是希望他不要成为城邦的敌人。

陆：城邦的敌人不能去投靠。但我们看春秋战国，游士是不讲忠诚的。

阮：确实，在先秦时代，并不存在一个与现代爱国主义相当的概念，甚至连希腊式的城邦情结都说不上。游士转换门庭就像现代足球转会，或是现在所谓明星学者跳槽，哪里出钱多他就去哪，性质是一样的。

陆：《战国策》是一本值得关注的书。后来历代读书人说到《战国策》，就会批评当时的行为方式，因为里面的人没有国家观念，特别自我中心。到了宋朝以后，人们开始慢慢转变观念，会对战国人物提出异议。

阮：后来的认识水平提高了。

陆：所以说，我觉得大量的东西都是在历史过程里面生成的。

阮：但另一方面，西方所谓的爱国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讲，从所谓普世价值的角度来看，背后其实是民族主义。西方在1945年以前有两次大战，这之前还有几百年烈度不如两次大战的战争，其实都是所谓民族主义造成的。但现在整个欧洲，或者西方，民族主义情绪已经淡了很多，人类还是进步了。德法要搞联合，甚至在好几十年里，英国也是欧共体、欧盟的一部分。当然现在英国离心离德，要退欧，但至少德法和其他主要欧陆国家的立场是很清楚的，经过几百年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自相残杀，现在必须要联合起来，否则在战后美国苏联唱主角的世界上，欧洲没有前途。最近几年，德法的欧洲意识就更强了，因为中国崛起了，俄罗斯仍有一定的威胁，再加上对美国也不是十分信任，尽管欧洲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就这点而言，我觉得西方人在二战以后还是取得了很大进步的，整体的道德水平、认知水平提高不少。

陆：对民族主义的评价要看具体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国民党叫Nationalist Party？辛亥革命前的“驱逐鞑虏”一说以民族主义为前提。朱元璋要推翻元朝，也用了这种说法。章太炎是民族主义者，非常汉族中心，他对少数民族的态度现在看来是很“政治不正确”的。但是这套话语在特殊时期又起到过特殊作用。印度原来的语言太复杂了，英国对其进行殖民统治时印度知识分子——包括民族主义者——受的是英式教育，甘地的很多观念是来自于欧洲的，这些殖民主义的遗产在当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度才能够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不然的话，印度还是无数的土邦。英语在印度统一过程中起到了通用语的作用，最终成为官方语言之一。

阮：英语是印度事实上的共同语或通用语。印度宪法上并没有说英语是它的国语。

陆：的确没有。

阮：其实印地语才是印度的正式国语，英语只是印地语的辅助语——至少官方是这样表

述的。但实际上，英语发挥了国语的作用。印地语的使用人口只有百分之四十几，而且把印地语作为国语，在印度国内已经遭到其他语族的反对。1962 年把印地语立为国语时，发生了全印范围的骚动，死了好几百人。所以，就这方面而言，应该为中国感到自豪，我们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普通话的推行很容易。北方话方言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国语，普通话其实就是北方话里面的一支，最后被挑出来作为标准语。北方话的范围非常广，像四川话就属于北方话方言，东北话也是北方话，从北往南，所有北方省份（不涉及少数民族语言）一直到湖北、安徽、四川，甚至云南、广西、江西、湖南的很多地方，都是北方方言。这个语言已经占了全国人口的 75%，所以基本上推广普通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印度确实要得益于英语。英语作为一种外来语言被印度人使用，起到了弥合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种姓之间隔阂的作用。印度被正式认定的语言有 200 多种，其中 14 种是强势语言。

陆：印度原来作为一个种姓制社会，它本身是跳脱不出来的，但印度现在走出来了。所以在世界不断流动变化时，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观念——回到历史上的某一个点上去，回不去的！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一定要积极看待。具备了这个意识之后，又有开阔的胸怀，自然会坦然面对外来事物和思想习惯。你刚才提到，我们从爱国主义转过来看普通话，其实中国的普通话和拼音体系是得益于外部影响的。

阮：是的是的。

陆：晚清的时候像罗振玉、吴汝纶这些中国学界最优秀的代表，到日本去考察教育，大开眼界。原来的读书人会说一套官话，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说地方方言，比如湖南人和浙江人就无法沟通。吴汝纶去了日本才知道推广普通话与培养国家认同之间的联系。我小时候只会说杭州话，杭州周围的方言我就听不懂了。

阮：有这么夸张？

陆：浙江的方言是非常复杂的。当时我一家邻居说温州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中国以前很多老百姓是无法交流的。当然，读书人可以用书写文字交流，我们渐渐的产生了一种焦虑，希望实现文言一致，就是书写文字要和发音一致。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就对他说，统一一个国家的发音非常重要，由此会生出爱国心。很多问题我们自己意识不到，但外面的人看得比较清楚。吴汝纶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人，严复翻译《天演论》，他是写前言的。他是河北莲池书院的山长——相当于院长，一度有可能做京师大学堂的校长，但因身体不好没有就任。我们的普通话这个观念其实来自国外。中国语文现代化先驱叫卢戇章，他想用厦门话作为中国的普通话。

阮：这有点可笑。厦门话应该属于闽南话方言了。

陆：到后来，新的注音系统传到中国后，北洋政府在推广上是发挥了作用的，但进展缓慢。普通话的真正普及还是近半个多世纪的事情，所以我们来自各地的人士能自由交流，一百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阮：在读书人中间，官话的普及还是没问题的。

陆：但是中国原来的文盲率很高，社会流动性相对较低。一个国家真的要强大的话，不

能仅仅依赖读书人，还得让平民百姓参与进来。我们不要以为普通话的推行就是自然而然的，它早期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阮：这个我们可以慢慢讨论。我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就你刚才的说法而言，普通话和西方的关系非常大。这个我不否认。但是中国和印度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印度有十几种主要语言，四五种最重要的语言，每一种都有相当于普通话在中国的地位，而且互不买账。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存在着一个覆盖面极广的北方话方言。什么是北方话方言？不管四川话、东北话、云南话、湖南的邵阳话等，其实是一种语言，只不过发音有所不同而已，个别词汇有点不一样，但是不影响交流。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北方话方言已经遍布全国，从东北最北地方直到最南的汉族聚居地，包括海南，都有这种语言，云南更不用说，他基本上是四川过去的移民。

陆：你说的是读书人，还是一般老百姓？

阮：一般的老百姓。

陆：他们交流没问题吗？

阮：没问题，没问题！在北方方言内部，你不管是说四川话还是其他话，交流是没有障碍的。占了80%的人口是讲北方方言的。（**陆：**有这么多？）而且这是在西方到来之前就存在的现象。

陆：中国80%的人口讲北方方言？（**阮：**对！）我觉得你完全错了。

阮：这个可以查，不重要。我记不太清楚，应该在75%至85%之间。

陆：无论如何，中国的普通话推广绝对是受外国影响的，甚至于我们曾经一度提出过文字拉丁化。现在用的汉语拼音，大大的方便了我们。在这一方面不要有一种语言民族主义，我觉得语言民族主义是很可怕的。现代汉语，包括它的语法，都是受西方影响的。《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懂拉丁文，而且和天主教有紧密关联，他在整理中国语法的过程中头脑里已有来自外部的语言概念。吕叔湘先生编写现代汉语语法著作的时候也得益于他的英文修养。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真的很不一样，相对来说和西方语言比较接近。

阮：的确如此。因为不光是语音，现代汉语的整个概念系统是和西方接轨的。要不，西方的东西根本译不进来，它对你来说是不透明的。这就很可怕。至少在这200年来，西方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文明。我认为最大的成就还是整个概念系统的引入。

陆：其实不光概念，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阮：**那当然！）像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的时候就翻译小说。

阮：应该说他的写作受日本影响比较深。

陆：他讲欧洲文学——比如摩罗诗力——用的是日本材料，可以说是编译。但是《摩罗诗力说》标志着新文学的发端。我们看中西，一定要摆脱那种“我很清楚了”的姿态，实际上中西之间的边界本身就是模糊的，流动的，变化的。

阮：而且以后这个边界还会继续的模糊化。中国现在发展太快，影响力在走出国门且急剧提升，以往都是西方影响中国更多，但未来中国也会倒过来对西方施加影响。之后的几十年、一百年这个趋势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陆：我们也不要一说到西方影响，就仿佛中国吃亏了。我不太同意萨义德揭示的西方的所谓东方主义，不妨看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李约瑟的成果洋洋大观，也有一些华人参与了，包括李约瑟后来的夫人鲁桂珍，后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这项研究最初的倡导者、设计者是李约瑟。读者丝毫看不出他是有意贬低中国的成就，把中国作为一种东方学上的“他者”来描述。

阮：萨义德很多时候是把阿拉伯世界当成了东方，他写了那么多书，却基本上不涉及中国。他起到了伊斯兰世界代言人的作用。

陆：他最早出东方主义的书是在 70 年代后期，被人以为是反西方的，后来他看到伊斯兰教中某些原教旨主义的趋向，持严厉批判态度，这一点我很欣赏。我相信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也不主张东和西的绝对分野。原教旨主义否认信仰的历史构成性，追求一种纯洁性，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本质主义。萨义德后来表示，当他批判欧洲学界一些成见的时候，他并不希望助长阿拉伯世界形成一种反过来的东方主义。我们在谈所谓的中外、东西时也要意识到，这些观念都是历史生成的，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思维能更开阔。没有什么东西是始终不变的。现在欧洲的人种构成也是在发生变化，比如说英国二战后成立英联邦，有五十几个国家，包括一些非洲国家。说到非洲，我们还是不得不感慨世界的复杂，因为非洲有很多国家说法语。既然如此，还有非洲本土固有的特性吗？

阮：好像说法语的国家有好几十个。

陆：非洲还有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这种历史进程是多元的。我不会说，非洲如果摆脱欧洲影响就好了。回到一个原初的非洲，没必要。我对这种回归原生态文明的冲动是有一点抵触的。

阮：但是好像还没有哪个人正式提出这种观点，说我们必须清除欧洲的影响。

陆：英语也好，法语也好，都在非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很多的非洲作家用英语、法语创作。非洲也有个别的部落几乎与外面的文明隔绝，它们已经作为人类学的标本保留下来了。

阮：有这种专门的保护吗？保护他们不受现代文化影响？这个有点残酷吧。

陆：是不是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主张不干预也不改变民俗习惯。这也是一种潮流。但是有的习俗在伤害女性。

阮：不光是非洲，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都有。

陆：但是变革的潮流还是不可阻挡，这得益于一种人本主义，即看重一个人充分发展的权利，减少限制。我国持续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不断推倒“大山”。改变了之后，中外东西的简单划分就站不住脚了。尤其说到非洲，不知道怎么划。

阮：非洲和拉丁美洲。按照方位来算，拉丁美洲完全属于在西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陆：拉丁美洲的巴西用葡萄牙语，其他国家用西班牙语。

阮：如果不用东方西方划分的话，拉丁美洲可以划作一个文明。

陆：欧洲国家的语言都是瑰宝，拉美人不会只读拉美文学而不读西班牙文学。如果说英语的非洲肯尼亚人只读肯尼亚的文学而不读莎士比亚，那就太可惜了。语言在世界历史进程

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如果要把语言的影响力地图画出来，那也是很有趣的事。总之简单的东方西方分类有其局限。如果从政治上分类的话，我们会把整个拉美划为第三世界。

阮：现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好像不大使用了。

陆：对，已经不大使用了。所以观念会生成，也会消逝。所以我们看问题要灵活一些，必须注意到自身的文化，自古以来的外来因素就很多。

阮：这个没争论，中国历来都是开放的。

陆：我们的丝绸之路，用复旦葛剑雄的话来说，主要用的人都来自西域。

阮：古代中国人往外闯的人并不多，倒有不少外国人利用路上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陆：使用这些路的人都是在为人类文明做贡献，加强了交流，然后才有了今天的文化丰富性。不要以为我们文化的周围有一座长城，内外的文化泾渭分明。历史上长城内外的民族和部落一直都是互相交流、融通的，当然也有战争。最近有一个叫马丁·雅克的英国人发表了一些言论，值得商榷。现在要注意这种情况，国外有些人经常被高价请来中国开会，他们会说一些讨中国人喜欢的话。马丁·雅克强调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且是自我生成的文明。他实际上对中国历史了解很少。

阮：Civilizational State一个是马丁·雅克在使用，另一个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里面有些人在使用。

陆：我担心这一说法背后的本质主义预设。

阮：但实际上，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一个美国人，叫白鲁恂（Lucien Pye）。应该是最早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陆：马丁·雅克过分强调差异，而且把差异本质主义化。现在学界也有此风吧。我们要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就不宜太强调差异，还要讲shared values，共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文明是非常丰富复杂的，唐代开放到何种程度？

阮：唐代是大家都比较向往的朝代。

陆：那时从西域进来无数物品，当然还有音乐舞蹈。中国吸引无数外国人，也有大量物品出国。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受惠于中外交流的例子不胜枚举。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就是美国的传教士创办的。中国近代最初的医院，如上海仁济医院，也是传教士创办的。

阮：的确如此。

陆：我们现在的身体比较好了，千万不要过分强调中医中药的作用。五六十年代公共卫生事业突飞猛进，主要靠西医。

阮：这个我们是没有分歧的。但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看看你什么意见。我们不讲东方西方，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战以后成立了联合国，当时中国在安理会里头占了一席之地。

现在媒体不大提的一点是，中国其实是这一体系的受益者。因为好多国家都没进去，印度那么多人口没有进去，主要是还没独立。

陆：大量的事情需要平台。一个人学问很好，但他没有讲座的平台，没有杂志的平台，他就边缘化了。

阮：我们可以再回到东方西方的话题。我们假定，所谓东方指的是欧洲以东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阿拉伯世界，甚至也包括南美、非洲，这些都是非西方国家。这些国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明显要高过西方国家。这就会冲击到世界权力的分配。我最近注意到马凯硕的一本书，书中提出了很尖锐的观点，顺便把中国也骂了。地球上大量人口在联合国“五常”中没能代表，拉丁美洲没有代表，非洲没有代表，亚洲占50%多的人口只有一票。最严重的问题是，欧洲8%的人口占了两票。这个问题以后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印度未来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它的经济体量可能会达到中国现在的水平，它怎么可能接受这一套秩序？这个格局显然是不公平的。

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格局，不能轻易改动。

阮：没错，因为当时不这么定的话，似乎无法保证人类的和平。用这个办法，让安理会常务理事会有否决权，通过设计这样一个平台，让世界以后不要再打世界大战。当然，后来一些不算是真正大战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的五次战争，还是发生了。虽然局部战争没有能够阻止，但真正的大战没有再发生，因为那些可能发起真正世界大战的国家都在安理会里面。但现在还是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像印度和日本。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欧洲8%的人口占了两票。中国以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将坐在一个不得不出来主持公道的位置上。

陆：我不知道这是公还是不公，可以请外交部发言人评论一下。回到东方西方的话题吧。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结果是人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它的三个来源和中国文化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谁能说在中国历史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不重要？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是伟大的，绝不能说，凡是西方的东西，我们都要拒斥。可以看看上海的城市发展史。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个口岸，它有很多个中国第一，不要因此说，这些第一都是外来的，不好。

阮：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太多的分歧。我以下的话可能说的有点极端，英国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给中国送来了好几个一线城市。第一个就是上海，广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深圳、香港都是送的，因为没有香港就没有深圳。

陆：选深圳当时就是因为它离香港近，不然不会有深圳。

阮：英国送给我们一份特别的礼物，尽管从民族的感情来说，它的方式是不公平的，你把战争烧到我们家门口来，把中国人给打败了。

陆：战争也可以避免。清朝官员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习俗坚信，外国人是不能来中国城市居住的。后来中外互派使节，情况有所改善。岳麓书社钟叔河先生80年代编了“走向世界”丛书，中国早期的外交家到外国去，比如说湖南出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郭嵩焘。

阮：曾国藩也不错，还有曾纪泽。曾国藩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人。

陆：但是曾纪泽作为外交使节，好像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交朋友。他到欧洲后，老是窝在自己的使馆里下围棋。

阮：但他还是立了功，在和俄国打交道方面捍卫了国家利益。郭嵩焘，他是真正睁开眼

睛看世界,而且亲身实地观察,在那个时候非常难得。魏源写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利用各种有限的资料,他并没有到欧洲去过。

陆: 魏源描写西方国家用的还是较幼稚的语言。

阮: 他的了解可能不是太准确。

陆: 到郭嵩焘的时候,情况就变了。他出使英国是有压力的,牵涉到教案,同辈官员没人愿意去,害怕受辱。郭嵩焘去了英国以后参加各种活动特别积极,勤于走动。当时维多利亚女王还在,他递交了国书。

阮: 清朝那时脑筋不开。郭嵩焘的英语水平到底怎样?

陆: 他不懂,依靠翻译。他根据亲身经历写的书被有些士大夫认为大逆不道。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有平等的交往,这个观念是我们原来所没有的,在朝贡体系内也不可能有这种想法。

阮: 中国历史上几次闭关锁国,尤其是东南沿海的锁闭,都是有原因的。明朝最开始也是开放的,但是因为倭寇的活动,为了海防,干脆整个沿海地区往后撤二十里,制造一个无人带。

陆: 这实际上说明,中国原来的政府治理程度还比较低下。(阮:是的是的。)我们说倭寇,其实很多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

阮: 最初是日本人多一些,后来中国人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就是些没有生计的流民、海盗。

陆: 所以到了晚清的时候,沿海地区是特别不安定的,动不动就是海盗。

阮: 十三行为什么设在广州?为什么规定只在广州一个地方通商?其实主要就是为了防海盗。

陆: 国家和国家之间如何展开正常的交往和贸易,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学的,我们付出代价。清朝一度有着过强的壁垒观念,也许跟鸦片走私无法禁绝有关。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大片大片的罂粟花,能纯粹把它看做是观赏性的植物,那我们的心里就有了一道长城,能自然而然地去拒绝它。心里的长城没有了,一看到罂粟花眼睛就发亮,那就得靠强有力的政府来管理。清廷和当时的社会没有这种能力。

阮: 现在是倒过来了,美国人似乎开始学清朝了,搞贸易战。但是西方人当时贩卖鸦片,似乎并不是一心一意要毒害中国人。实际上,鸦片在英国普遍不被当作一种毒品,吸食鸦片是十六七世纪时英国上层社会的一种习俗,后来慢慢扩散到一般阶层。那时候鸦片的提炼工艺还不像后来那么先进。

陆: 任何文化、民族,面对鸦片这种毒品,除了政府的干预、管理,还要有普通人的心防。这个非常重要。鲁迅先生说过,鸦片在外国是当药吃的,到了中国就成了一种瘾品。

阮: 英国人最初就是把鸦片当作一种药。甚至蔗糖,在英国最初也是一种药。

陆: 认识自己是不太容易的,有时候我们还要打破中外、东西的壁垒,借助来自外面的眼光。

阮: 没有对比,没有借鉴,就不会有自我认知。其实人的自我认知甚至自我的形成,都是要在与外界互动、交往的过程中才能形成的。

陆: 对啊,这种互动最终使得我们跨出边际,让我们更容易交朋友。现在讲人类命运共

同体,还是要更多的去世界上交朋友,而不能够把自己的文化用本质主义的高墙圈起来。不难发现,世界各国其实有很多共同的或者说共享的价值。鲁迅那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往往是勇于实行拿来主义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形成动态的关联。他们也乐意接受域外人士的视角来改变自己的社会。美国有一个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中文叫明恩溥,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气质》。(阮:这本书看过。)这本书翻译出来后,鲁迅是肯定其价值的。

阮:那本书对中国国民性格负面的东西讲的比较多,但是我们也没必要为这个生气。

陆:我倒是没看到什么虚构出来的负面描写。为什么现在看到这么多贪官被查处?腐败背后有一定的文化因素。因为原来人们相信,每个人做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明恩溥就发现,中国人在祭灶王爷的时候,会给灶王爷嘴上抹糖。

阮:这是贿赂灶王爷。

陆:对。这就和有宗教传统的民族不一样。中国人的思维是,我做了很多坏事,灶王爷你不要向玉皇大帝汇报,我给你好处,你为我美言几句。范成大还专门写过《祭灶词》。里面就是讲到了腊月二十三或是腊月二十四,老百姓准备很多好吃的食品给灶王爷,希望灶王爷就算看到了很多丑事也不要禀告给天庭。我给你好处,你为我说话,就是这样一种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所以鲁迅先生看到明恩溥的书,就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做功夫,挣扎向前。明恩溥以一个外来人的视角,发现了你的问题。明恩溥在山东生活了很长时间,知道民间的风俗,会说方言。

阮:但是我们如果结合来看利玛窦那批最早来华的西方人,当时他们所看到的中国,跟明恩溥所看到的社会下层,非常不一样。利玛窦这个人非常聪明,最开始他是在澳门接受了两年汉语训练,然后进入中国。他很快就大致掌握了中国的语言和典籍。他雄心勃勃,希望通过学习中国的文化,打入皇宫,最终说服皇帝皈依基督教,再带动整个中国皈依基督教。他对中国上层了解很多,所以他传回去的信息,对中国的肯定特别多。

陆:利玛窦、徐光启这些人对中西方交流绝对居功至伟。但是我们看利玛窦,一个年轻人,不结婚。

阮: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婚不仕。

陆:他的行为模式和中国人的传统很不相同。中国传统士大夫比较喜欢人间的享受。

阮:但这个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吧,传教,即改变其他民族的既有信仰,是利玛窦的根本目的,现在的基督教也在提倡尊重其他民族的既有信仰了。

陆:这是一个问题。我要问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不断产生像白求恩这样的人?中国传统文人会不求回报地自我牺牲、为他人服务吗?他们太在乎社会或皇帝对他的认可了,所以我们文学里面有一大套“屈居下僚”“怀才不遇”的表述,归根结底是一句话:我才高八斗,我有经国之才,我有王佐之才,怎么还在地方上做小官?背后一句话我都不好意思说,他其实想做的是宰相。所以我这里还要加上一句,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和他说,你们国家,想做李相国(即李鸿章)的人太多。

阮:日本人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中国人个个都想做官。

陆: 而且是做大官。鲁迅先生的译文里面有很多内容读来特别长见识。一位日本人说,很多英国人有一种钝根,就是比较本分,没有很多小聪明。他说,一个社会里面要有很多这样的人,社会才会好。如果很多人特别长于计算,这个社会的群体力量会比较弱。

阮: 那个日本人的观察是准确的,中国社会的确有太多相当官的人,太多想当大官的人,但是我必须要说,每个人类社会,不管是西方东方还是其他地方,其实都会产生一批忘我的、为公的人,你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举出很多例子。没有一点自我牺牲的精神,一个民族是没法生存的。这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所有的民族都可能会产生这种人。安史之乱时睢阳保卫战以身殉国的张巡至少算一个吧,文天祥为了民族大义慷慨赴死也算吧,甚至还有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神农辨药尝百草,从这些传说中也看到中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甚至鲁迅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没有自我牺牲,一个民族怎么可能发展得这么大?

陆: 我想说的是近代以来这样的人多一些。旧中国缺少公共精神,不必讳言。我们的很多著名书画上都盖了“某某秘赏”之类的图章。中国原来的公共机构是不发达的,我们的收藏家也不热衷于捐献,现在我们的观念变了,有了公共的博物馆,公共的图书馆。

阮: 晚清之前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大体上是事实,但公共精神在西方也是有一个产生的过程的,并非历来都有。

陆: 相对来说是比较早,比我们要早很多。“共和国”的拉丁文就有公共事物的意思。

阮: 这个西方的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也是近代才有的。你像英国的公共图书馆, circular library 即对公众开放的藏书流通的图书馆, 19 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

陆: 我并不是说他们自古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他们确实要比我们早不少。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消除中外的界线,引入无数域外的设想、机制,在本土生根发芽。

阮: 这个没问题,中国还需要发展。可以再回到东方西方的话题。我们假定,所谓东方指的是欧洲以东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阿拉伯世界,甚至也包括南美、非洲,这些都是非西方国家,它们近年的发展速度明显高过西方国家。这就会冲击到世界权力的分配格局。印度未来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它的经济体量达到中国现在的水平,它怎么可能接受这一套秩序?

陆: 我不得不说,国家是自私的。

阮: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想说,中国以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会坐在一个必须要主持公道的位置上,不能出于自己的私利不想改变现状。

陆: 不大可能要求国家不考虑利益,国家永远是自私的。个人之间讲伦理道德,国家之间是讲利益的。

阮: 所以现在无论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最根本的还是一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

陆: 我们从文学文化上讲,中和外、东和西之间,我们不要去造墙,然后把我们自己圈起来。要结交朋友的话,我们总得说,你我两个人之间有一些共同的想法,而不是说,我和你不一样,

生下来就不一样，这个差异永存。这个话在有些场合下是不能说的。

阮：但是我觉得，现在造墙的并不是中国人，不是东方人，而是西方人。不说特朗普的贸易战科技战了，还可以举其他一些结构性的例子。比如欧美人，尤其是英语国家，他们似乎对外部世界有点懒于去了解。

陆：那么多厉害的汉学家就是出自于他们那里的呀，如何解释呢？

阮：这个问题，少数精英没问题。我们都是跟精英打交道，他们的精英很好，但是你一旦接近中下层民众，就会发现，普遍的对外部没有兴趣，对学习外语没有任何兴趣。相比之下，我们就不说它成为印度事实上的国语了，在中国，这么大量的人口，英语是一种被普遍学习的状态，据说大学的英语老师就有十一万多人，其中一万五千是教授。很多场合我们都是将就西方人的，这种做法无形之中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这种做法或许目前还能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力量的强弱对比会越来越鲜明，西方相对来说会更弱，而中国、印度、拉美、非洲国家会更强，这个矛盾必然要越闹越大。西方世界你不去了解外部世界，不去了解中国，毕竟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历史都很丰富，我们有很多问题，你怎么不来了解这些问题。这个牵涉到的不光是中国，而是整个东方，最近这一百多年不停学习西方，但我看不到一个相反的过程即西方人大规模地学习东方。仅从整个地球的管理，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西方人也应该积极地学习非西方。当然我也不否认，中国人、东方人应继续开放国门，学习西方，但是呢，西方人是不是也应当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不断发展的世界？

陆：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对别人说，You should respect me。水到渠成比较好。

阮：确实不能这样说。

陆：一个人待人接物的态度无形中会决定别人是否尊重他/她。我不能说因为我家钱多，你就要尊重我。早在十年前，就有个年轻学者说，欧洲已经不行了。这个话讲得太早了。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的产品，不要小看欧洲，它对人类的贡献很大。而且欧洲有些国家是不讲自己的成就的，你有没有发现？它们还是有很深厚的底子，比如欧洲好几个国家都会造航空发动机，生产精密仪器。

阮：中国在这方面攻关了好多年了，不可能永远都不成功。

陆：我们在进步，人家也在进步，不会原地踏步。不同的国家在讲自己成就的时候，态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喜欢讲，有的国家不大讲。有一些事物的影响是无形的，比如英语，法语。如果按照文化相对主义，任何语言的文学享有同等地位，同样伟大，那么我下面说的话就在政治上不正确了：我不大相信每一种文学，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应该平起平坐。有些语言、文化传统本身拥有强大的支撑，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它们产生了巨大的自我批判、更新能力。

阮：的确，并非每一种文学都同等地伟大，但是英语世界，它有啥问题呢？由于它的政治军事力量比较强，就自然把它的文学的力量给带上去了，这里有一个英语文化的霸权在里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点。因为中国的外语学者中，英语学者的人起码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包括以前你在《外国文学评论》的时候，还有程巍（盛宁或许和你们不太一样）对英语的霸权是不以为然的。英语的过分强势，让其他语言文学显得都不重要了，这终究是个问题，对人类

社会的良性发展不利。英语文学的成就毕竟不是全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欧洲国家,还有中国,还有整个东方,都有好的文学。

陆: 莎士比亚是英语霸权的产物,那么热爱莎士比亚的马克思也上当了。我感到英语世界也有很强的自我批判能力,很多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在英语文化中产生的,包括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和萨义德的东方学,等等。一种语言并不是简单的服务于政治目的。

阮: 英美知识界的确有自我批评传统,正如基督教有忏悔传统那样。但是自我批评是每个民族都有的,并不是只有英语文化才有。暂且不说历史上的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怎样,我觉得现代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一直在不停地自我批评,如果没有这种自我批评,怎么可能这么大规模地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为我所用?

陆: 没有西学,我们各个领域的建设成就是无法想象的,不然的话,我们还要吃科举的饭。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自己的立足点。

阮: 科举的确早就过时了,虽然在历史上有过进步作用。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能简简单单说英语就代表了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法语不代表吗?甚至连俄罗斯,它也有两三百年的侵略行为。但是我必须要说,如果一种语言太过强势,它可能无形之中对其他文化、其他的语言形成压制,最终有害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有害于人类文明的进步。

陆: 这个我完全承认,但这有一个难处: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是同样的伟大。

阮: 的确如此。如果按照西方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正确的观点,假定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平等的。这是有问题的。

陆: 有的国家的文学,对我们的吸引力会更大一些。是不是呢?

阮: 这是事实。

陆: 有些文学富有自我反思的精神,使我们具有一种批判的能力,与自己对话的能力,思考问题时更锐利,不会麻木、僵化我们的思想。英语世界里面也多背叛者,即使是马克思这样的异端,他也能在治学、写作过程中在英国得到充分的支持。19世纪欧洲的思想非常多元。

阮: 现在有一种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潮,就是把启蒙以后发生的所有灾难,什么暴力革命啊,两次世界大战啊,甚至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啊,都归咎于启蒙运动,真是大错特错!欧洲所有的活力,都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一脉相承的,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等。简单地说,它们其实就是现代性。现代性当然会带来一些难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欧洲所有的活力都来自现代性。

陆: 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是19世纪的法国人提出来的,Renaissance本身是个法文词。其实欧洲的中世纪也很了不起,那时的阿拉伯文化、拜占庭文化也丝毫不逊色。说到这里,我更相信文化之间的融通。上面说到的三种文化是互相渗透的。

阮: 就古代而言,我们说区分不出东方和西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产生于东方,现在的巴勒斯坦一带,甚至可以说产生于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就其孕育期即叙利亚宗教或犹太教而言,基督教跟欧洲或西方没有什么关系。巴勒斯坦不管你怎么算,都

属于所谓的东方，但是耶稣基督从那里出来，一小群门徒跟随他，分散到各地去，然后宗教逐渐发展繁荣，成为全欧洲的宗教。所以如果我们把东方西方分得太清楚的话会有一些难办。其实是一个悖论的问题。回到我们刚刚开始对话时提到的，我们说的东方的概念其实也是20世纪初才有的，然后开始流行。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人中国人会把自己算作是东方？我们把凡是西方以外的地方都算做是东方，这其实是不准确的。而且我们笼统地使用西方这个概念也要小心，为什么呢？从最近一年的情况来看，美国和欧洲国家非常不一样。

陆：我在外文所工作时接触过不少欧洲国别文学的专家，这位是做匈牙利语的，那位是做波兰语的，所有欧洲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传统，不能把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化同质化。

阮：是啊，不能来了个匈牙利人、捷克人或波兰人，我都说他是西方人。

陆：大的范畴有时特别无聊。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特点，《好兵帅克》就是特殊的，然而又能被普遍接受。

阮：捷克的吧？

陆：捷克的，影响很大。我们需要更多的专家，对具体的国家和文化传统有更精深的研究，不要被欧洲、西方等大概概念支配学术写作。

阮：从贸易战最近一年的情况来看，我们使用西方的概念就显得有点过时。欧洲国家的表现和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有自己的主体性和国家利益。他们不是简简单单地说我们是西方国家，我们要团结一致对付敌人。没有这个思维。

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也不是说欧洲各国会永久这样，因为形势在变化。

阮：那当然！日本在政治上被人认为是西方的一部分，但是使用东亚这个概念是他们开始的，到现在还在使用。而且我们还看到最近日本人的表现，像安倍跟中国的所谓“眉来眼去”，其实都是和美国的军事结盟多少是相矛盾的。我感觉日本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经济体量进一步扩大，二十年后日美同盟到底是个什么含义，很难说。日本在文化上完全就是从中国派生的，日语中很多发音都是汉语发音。

陆：我们也有大量双音节的词汇来自日本。

阮：的确如此。我写了一些文字专门讲这个问题。

陆：但是并不能说，唐朝的时候日本受我们的影响，我就是你的祖宗。

阮：当然没有这个必要。正如我们学了那么多西方的东西，也不能说西方人是我们的祖宗，西方文化是我们的祖宗。这是一个道理。

陆：任何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都是双刃剑，稍微发展过了一点就很可怕了。中国人在1900年的时候对国家观念的认同还是特别淡的，外国军队到中国来，中国民众显得很麻木。

阮：是的，鸦片战争时同样如此。

陆：鲁迅先生有同感，他要写文学作品，那是比学医还要重要。

阮：是要唤起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陆：但是民族主义同样是有问题的。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一定要学会一种成熟的说

话方式。

阮: 中国官方认定了五十六个民族,这个跟日本不太一样。日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朝鲜、韩国也是单一民族。他们要形成一种真正的民族意识其实比我们要容易。中国人形成真正的民族意识是在抗战当中。

陆: 中国三四十年代变化特别大,三十年代的国难起到了很强的团结作用。

阮: 整个民族的意识在这过程中迅速形成,没有这场战争的话那不知道还要拖多久。鸦片战争中,很多民众跟英国人做小生意,像卖水给他们,卖食品给他们,卖鸡蛋给他们。这是不是叛国呢?后来也没人追究。为什么当时中国人的思维会是这样的呢?其实很简单,首先他们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官员对朝廷却必须是忠诚的。官员叛变,那要追究,但是对一般老百姓,朝廷也不觉得有必要追究你和英国人做了什么小生意,甚至给英国人带路了。义和团事件后,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有照片为证,当时民众卖给外国人食品,还带路什么的。“带路党”历来有之。

陆: 当时英国人在山东组建了华勇营。印度发生兵变的时候,英国人也是带了旁遮普人去镇压的。有的地方本身是分裂的,外人可以轻而易举支配你。

阮: 印度就是差在这里,一盘散沙,很多个小土邦,于是被英国人分而治之。

陆: 兵变事件后英国的政治,英国的统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原来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统治,后来英国议会想对印度实施加引号的“仁政”,英国女王也成为印度女王,当时是迪斯累利做首相。

阮: 我以前跟印度学者接触过,他们对待英国殖民的那种感觉,和中国人对待鸦片战争的感受不一样。同处亚洲,同处东方,印度和中国不同。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以下领域具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性、实证性和综述性论文: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域与国别文化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教学与测评等,也欢迎介绍相关学科最新动态的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8,000~12,000字左右,综述性文章8,000字以内,新书评介、名家访谈等一般为4,000字左右,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方式:Word电子稿请发编辑部邮箱:jflc@hunnu.edu.cn。
6. 编辑部电话:0731-88873041 传真:0731-88872636

2019年卷总目录

2019年第1期目录

2019年第1期目录

“英国文学”亦或“爱尔兰文学”

曹波

现代与经典的对话: 当代爱尔兰文学管窥

陈丽

见证历史——论《秘密手稿》中的创伤叙事

王路晨

萧伯纳的爱尔兰情结——《英国佬的另一个岛》解析

李成坚 邓红灿

从凯列班、爱丽儿到星期五——论文艺复兴晚期到18世纪初英国文学中被殖民者身份的流变

逯璐

以史为鉴, 关注“美国梦”带来的社会腐败: 略评E. L. 多克托罗的《供水系统》

胡哲

英语挽歌审美功能与仪式功能述评

张磊 彭予

论《威尼斯商人》中的宗教冲突与社会正义

陈师琴

三岛文学再认识——三岛由纪夫大众文学作品创作特色评析

陶思瑜

诗化小说的幻象重构——以《静》的英译本为例

徐敏慧 管军慧

准确性和可读性——叙事学术语unnatural译法刍议

郝利群 陈文铁

音乐传播学视阈下畲族新民歌的翻译

万兵 曹波

《射雕英雄传》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叶铨铨 邓高胜

《西游记》翻译研究(1980—2018)——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刘道影 朱明胜

合法化语码理论的专门性及其在学术论文分析中的应用

吴格奇

我国语篇连贯研究25年: 回顾与思考

李洪坤 白解红

2019年第2期目录

柳鸣九的法国文学批评

王宁

超越传统——对埃伦·格拉斯哥《战场》的政治解读

曾艳

苏珊·桑塔格《死亡匣子》中的替身历险

周思源

作为言说者的黑奴——解读《奈特·特纳的自白》中历史人物的重塑

曾传芳

“土著文学美学必须政治化”——从《灵力》中爱玛之多重形象看琳达·霍根的文学创作

龙娟 梁文婷

恩托扎格·商格的戏剧美学——以《献给想要自杀的有色人种女孩》为例

龙跃 郑燕虹

消费社会、生活方式与趣味“追逐”——20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学中的文化观念变迁

胡强

《性感》中的异域情调

任海燕

论萨义德对福柯理论的继承与反叛

蔡天星

“不合时宜”的情感教育: 论梁实秋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

黄若泽

唐代佛教注经家对“正翻”和“义翻”的认同与取舍——兼论“修多罗”(Sūtra)一词的翻译

陶磊

师从先贤, 潜心翻译——纪念杨宪益先生

党争胜 冯正斌

中国文学英译怎么办? ——《杨宪益翻译研究》的启示

张智中

从副文本解读戴乃迭的翻译观——以《沉重的翅膀》英译本为例

辛红娟 唐宏敏

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内涵与建构策略研究

刘立华 童可

当代中国托马斯·品钦作品研究评述

张海榕 李梦韵

2019年第3期目录

寄语	奥特马尔·埃特
岛屿、群岛和群岛写作——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古巴岛，安的列斯群岛》	奥特马尔·埃特
洪堡密码——关于创建19世纪环球旅行者的混合数字学术版本	托比亚斯·克拉夫特
犹太—基督宗教强烈的道德意识自何而来？	阮 炜
《旧约》与希伯来精神的书写	唐立新
黑人、犹太人、城市人——评索尔·贝娄中晚期城市小说中的种族问题	张 甜
重返“自然”——A. S.拜厄特《巴别塔》中的语言与科学	姚成贺
鲁丝·普罗厄·贾布瓦拉晚期印度小说后殖民创伤研究	黄 然
民族主义时期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边缘人——亨利·劳森作品中的华人形象研究	张加生 林宝琪
儿童文学翻译中互动性的语域再现——以吉卜林《原来如此的故事》三个中译本为例	陈雪梅
《黄帝内经·素问》四个英译本的翻译策略和接受	徐 冰 张 莹
论曹译莎剧的演出适应性	刘云雁
元思辨理论框架构建与培养原则	张 莎
美国隐性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对外语教育发展的影响	罗 辉
广播情感热线节目中咨询人批评应对的面子管理研究	彭 卓

2019年第4期目录

作为方法的“东方学”	刘曙雄
批判性对话与中国“东方学”的建构	曾 琼
“实用批评”：缘起与目的	曹 莉
洛恩小说中的文学与军事启蒙	史敏岳
朝鲜金泽荣对《诗经》、《论语》等若干问题考论	王 成
加里·斯奈德《大棕熊经》的后现代性	罗 坚
以译求同：麦都思对朱子理学中“理”的翻译	帅司阳
《岩窟王》翻译文本的接受与影响研究	禹 玲
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对比实证研究	王湘玲 王婷婷
《诗经》中“帝”字的英译研究——以《诗经》的四个英译本为例	吴晓龙
“情感强化副词+X”构式研究	刘 芬
转喻心理加工深度的认知语用研究	范振强
CET对大学英语专业成绩考试的反拨作用——基于北京市10所高校期末试卷分析与教师访谈	董连忠
跨文化语境下的东方和西方	陆建德 阮 炜